

默默無聞的服務：  
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

■ 林榮鈞、張小蘭、劉慶廣 著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 目錄

## II

## 前言

IX

默默無聞的服務：  
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

## 第一章 基督宗教的醫療傳教及其東來

1

### 1. 基督宗教與西方醫療

1

### 2. 醫療傳教與中國

6

## 第二章 1890-1945 醫院附近及沿海區的天主教診所

15

### 1. 殖民統治初期的醫療概況

15

#### 1.1 宗教及慈善團體的發展機會

16

#### 1.2 鼠疫帶來的轉捩點

20

#### 1.3 華人公立醫局

21

### 2.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26

#### 2.1 踏上醫療服務的舞台

26

### 3.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29

#### 3.1 第一個海外傳教站

29

#### 3.2 悠久的醫療服務

30

#### 3.3 油蔴地、紅磡、九龍城的診療所

32

#### 3.4 西營盤凌月仙診療所

33

#### 3.5 香港仔漁民探訪

35

#### 3.6 筲箕灣嘉諾撒診療所

36

### 4. 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

38

#### 4.1 寶血會的醫療服務傳統

39

### 5. 瑪利諾女修會

42

#### 5.1 廣傳福音人人有責

43

#### 5.2 首度嘗試踏足香港醫療系統

44

#### 5.3 初次投入診所服務

45

|                                     |           |
|-------------------------------------|-----------|
| 6. 戰時及日佔時期的教會醫療服務                   | 47        |
| 6.1 日佔時期的醫療環境                       | 48        |
| 6.2 拘留營中照顧病人                        | 50        |
| 6.3 在拘留營外的教會                        | 52        |
| 6.4 戰事結束再次動盪                        | 55        |
| 小結                                  | 56        |
| <b>第三章 1946-1969 偶然的歷史時空創造發展的機會</b> | <b>67</b> |
| 1. 五十年代的社會及醫療概況                     | 67        |
| 1.1 肺癆傳染猖獗                          | 70        |
| 1.2 《醫生註冊條例》                        | 71        |
| 1.3 《不良廣告（醫藥）條例》                    | 72        |
| 2. 六十年代面對的另一艱難時期                    | 74        |
| 2.1 世界難民年與難民醫生                      | 74        |
| 2.2 《診療所條例》                         | 75        |
| 2.3 首份醫療白皮書                         | 77        |
| 3. 挑戰與機會兼備的天主教醫療服務                  | 79        |
| 3.1 診所大幅增長的二十年                      | 81        |
| 3.2 兼具留產所的診所                        | 84        |
| 4. 與調景嶺相關的診療所                       | 86        |
| 4.1 雷鳴遠的子弟兵與調景嶺                     | 87        |
| 4.2 鳴遠醫務所                           | 90        |
| 4.3 聖耀漢診療所                          | 97        |
| 4.4 由修女主辦的聖若瑟護理站                    | 99        |
| 4.5 教友夫婦的記憶                         | 102       |
| 4.6 小說中的原型                          | 104       |
| 4.7 修會隨調景嶺發展而遷出                     | 105       |

|                      |     |
|----------------------|-----|
| 5.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社區診所    | 106 |
| 5.1 社區診所推手——納德·貝克維修女 | 106 |
| 5.2 大坑天主教福利會隆巴第診所    | 107 |
| 5.3 堅尼地城若望二十三世診療所    | 108 |
| 5.4 新界區服務的落腳點——大埔    | 108 |
| 5.5 第一期海星診所          | 112 |
| 5.6 六十年代大埔的醫療服務      | 113 |
| 5.7 海星診所的病人和修女       | 114 |
| 5.8 服務的演變、海星診所服務落幕   | 116 |
| 5.9 對一切人，就成為一切       | 117 |
| 6.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 118 |
| 6.1 五六十年的香港仔漁村       | 118 |
| 6.2 五十年代香港仔的醫療服務     | 120 |
| 6.3 診所、會院集於一身的姑娘堂    | 121 |
| 6.4 瑪道納海上診療所         | 126 |
| 6.5 田灣聖高弗烈服務中心       | 127 |
| 6.6 香港明愛聖高弗烈診療所      | 129 |
| 6.7 延續的服務精神          | 131 |
| 7. 拯望會               | 133 |
| 7.1 在中國的服務赫赫有名       | 133 |
| 7.2 輾轉到港、落戶荃灣        | 134 |
| 7.3 第一代啟明診療所         | 135 |
| 7.4 第二代啟明診療所         | 136 |
| 7.5 不同的稱謂：天佑學校診所、姑娘堂 | 137 |
| 7.6 被撿回一命的病人         | 139 |
| 7.7 以「聯合國修女」之稱為傲     | 141 |
| 7.8 夜夜無眠的修女          | 144 |
| 7.9 日與夜的傳福音事工        | 145 |
| 7.10 診所的演變和結束        | 146 |

|                        |            |
|------------------------|------------|
| <b>8. 瑪利諾男修會</b>       | <b>148</b> |
| 8.1 《遠方》的中國            | 148        |
| 8.2 早期的醫療工作            | 149        |
| 8.3 難民救助及醫療工作          | 151        |
| 8.4 福主教診療所             | 153        |
| 8.5 聖伯多祿診療所            | 155        |
| 8.6 海星義診所              | 156        |
| 8.7 庇護十二診療所            | 157        |
| 8.8 六十年代的診療所           | 159        |
| 8.9 美國政府停止資助           | 161        |
| <b>9. 瑪利諾女修會</b>       | <b>163</b> |
| 9.1 瑪利諾修女義診所           | 163        |
| 9.2 花園大廈診所             | 165        |
| 9.3 嬰兒診所               | 167        |
| 9.4 為貧民而設的聖母醫院         | 167        |
| 9.5 醫院？診所？醫生的抉擇        | 169        |
| 9.6 合作與發展              | 170        |
| <b>10.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b> | <b>171</b> |
| 10.1 澳門護士學校惠益香港        | 171        |
| 10.2 來自五湖四海的馬鞍山居民      | 172        |
| 10.3 貧困社區的宗教團體         | 173        |
| 10.4 馬鞍山的兩間天主教診所       | 174        |
| 10.5 馬鞍山的診所修女          | 176        |
| 10.6 修女的回憶             | 177        |
| 10.7 馬鞍山和附近鄉村的生活       | 180        |
| 10.8 守護馬鞍山的軍醫天主教徒——張渤  | 183        |
| 10.9 服務隨新市鎮發展而結束       | 184        |
| <b>11.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b>   | <b>185</b> |
| 11.1 有助在中國傳播福音的使徒工作    | 185        |
| 11.2 初抵香江              | 186        |

## VI

### 默默無聞的服務： 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

|                       |            |
|-----------------------|------------|
| 11.3 深井的「陸洲」診所        | 187        |
| 11.4 修女進駐打鼓嶺          | 188        |
| 11.5 打鼓嶺的修女團體         | 191        |
| 11.6 衛生教育和診所的小病人      | 194        |
| 11.7 名醫拔刀相助           | 195        |
| 11.8 在打鼓嶺的生活          | 195        |
| 11.9 不捨和延續            | 198        |
| <b>12. 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b>  | <b>201</b> |
| 12.1 在診所服務的修女         | 202        |
| 12.2 粉嶺會院內的聖若瑟義診所     | 203        |
| 12.3 從害怕到終身服務         | 204        |
| 12.4 病人減少反映時代轉變       | 206        |
| 12.5 西式醫療轉為中醫診所       | 207        |
| 12.6 中醫世家出身的修女        | 207        |
| 12.7 回望人生             | 210        |
| <b>13. 聖母聖心會的三間診所</b> | <b>211</b> |
| 13.1 國家的規定成就醫療服務      | 211        |
| 13.2 三位診所推手           | 212        |
| 13.3 紅磡愛德診所           | 216        |
| 13.4 診所轉讓完成歷史任務       | 218        |
| 13.5 坑口明愛法俾洛診療所       | 219        |
| 13.6 鯉魚門派藥所           | 221        |
| <b>14.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b> | <b>222</b> |
| 14.1 慈母診療所            | 222        |
| 14.2 中西融匯、互助友愛的鑽石山    | 224        |
| 14.3 聖家施藥所            | 225        |
| 14.4 講「唔鹹唔淡」廣東話的護士修女  | 227        |
| 14.5 忙碌的每一天           | 229        |
| 14.6 診所內的難忘場面         | 230        |

|                       |            |
|-----------------------|------------|
| 14.7 診所姑娘成為終身事業       | 230        |
| 14.8 醫療服務需求轉變         | 232        |
| <b>15. 公教信徒善會及組織</b>  | <b>233</b> |
| 15.1 公教婦女會            | 233        |
| 15.2 定點及流動診所          | 236        |
| 15.3 公教華人聯誼會          | 245        |
| 15.4 天主教醫生會及護士會       | 246        |
| 15.5 聖雲先會             | 247        |
| 15.6 其他團體             | 249        |
| <b>16. 流動診療所</b>      | <b>252</b> |
| 16.1 流動專科診所           | 253        |
| 16.2 天主教流動診療所         | 254        |
| 16.3 流動醫療求診者之回憶       | 257        |
| 16.4 取締流動診療車的政策爭議     | 257        |
| <b>17. 香港明愛</b>       | <b>259</b> |
| 17.1 香港明愛的源起          | 259        |
| 17.2 華德中蒙席            | 260        |
| 17.3 明愛的「眾人老實」——力理德神父 | 262        |
| 17.4 明愛的醫療服務          | 263        |
| <b>小結</b>             | <b>266</b> |

## VII

## 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

|                                 |            |
|---------------------------------|------------|
| <b>第四章 1970-1990 在歷史使命中功成身退</b> | <b>303</b> |
| 1. 七十至九十年代的醫療概況                 | 304        |
| 1.1. 中醫藥再獲重視                    | 307        |
| 1.2. 新的服務趨勢——生死教育               | 309        |
| 2. 法例和政策對天主教醫療服務的影響             | 311        |
| 2.1. 教會內對醫療使命的重新定位              | 314        |
| 2.2. 明愛的診所服務                    | 321        |

VIII

默  
默  
無  
聞  
的  
服  
務  
：  
香  
港  
天  
主  
教  
診  
所  
歷  
史

|                  |     |
|------------------|-----|
| 3. 天主教牙科診所服務     | 321 |
| 3.1 早期香港牙醫發展     | 321 |
| 3.2 山寨牙醫、城寨牙醫    | 322 |
| 3.3 香港政府牙科醫療政策   | 324 |
| 3.4 天主教會營辦的牙科診療所 | 325 |
| 3.5 現存及未來的牙科服務   | 327 |
| 4. 天主教會為病者服務的延續  | 330 |
| 小結               | 332 |
| 總論               | 338 |
| 參考資料             | 346 |

# 前言

IX

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

香港史學界在二十一世紀之前對本港醫療史的研究，據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吳國樑先生整理的結論是「著墨甚少」，亦很少將之列為獨立課題。<sup>1</sup> 直至近二十年，尤其是 2003 年沙士（非典型肺炎）一役之後，關於這方面的專書才漸見多起來。天主教會在這方面更是大幅落於人後。天主教在香港扎根一百八十多年來，在不同方面參與社會發展，但在歷史研究和書寫，除了教育這一範疇，其他都甚為匱乏，尤其是醫療歷史。在教區檔案中，教育有九個卷宗，醫療的只得一個。至於提供醫療服務的團體，對自己的服務要麼在編年史裡提到，要麼出版紀念性的刊物，或在整體歷史中用一兩個章節交待。第一本與天主教醫療史相關的專書，要數到 2018 年出版的《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不得不承認，誠如研究香港醫療史的楊祥銀教授所說：「關於近代香港天主教醫療活動的研究幾乎處於空白狀態。」<sup>2</sup>

本研究的主體是天主教診所及施藥所（或稱派藥所），不包括醫院的門診部。診所最簡單的定義，是一間為病人提供診治服務的基層醫療機構，病人不留宿於診所，故與醫院不同。不過，在醫療設施缺乏的五十到七十年代，部分偏遠地區的診所包含了留產所功能。至於施藥所，多是沒有全職或兼職醫生負責，由有醫學知識的護士開醫治傷風感冒等普通科西藥給求診者。護士又與診所姑娘不同，後者不需要有專業醫學知識，一般只有中學程度，因為診所的相關法律責任皆由醫生或診所主理人負責。

為這個項目申請經費時，我們就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容易處理的題目。香港的天主教診所所在五六十年代最為興盛，但它們在使命達成後，

已隨同城市發展一起消失。與有偌大建築標記的天主教醫院不同，要一一找回這些診所的歷史痕跡，絕非易事。隨便問一下身邊的天主教親朋好友，大多數都不能說出一間他們知道的天主教診所，而不熟悉天主教會的一般教外人就更難有印象了。的確，生病時已很辛苦，到診所求醫的病人，誰還會像去看展覽般細心注意診所的一切？難以找到診所受惠者作口述歷史訪問的原因，他們對天主教診所沒有印象是其一，沒有去看醫生是其二。這些經歷艱苦歲月的民眾，不少為了省錢選擇不去看醫生，而是飲用中藥、吃中西成藥，甚至蓋一床大棉被「焗出一身汗」就算。若接觸不到診所受惠者，沒聽到用家的意見，這個題目若單方面從教會營辦單位的角度出發，很容易成為自吹自擂的宣傳，不是我們樂見的。

本研究要面對的另一難題是，開始前期準備工作之時，香港仍在疫情籠罩之下，檔案資料搜集及對經歷五六十年代的目標長者的口述歷史訪問，皆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礙。另外，部分修會已撤出香港，或年老一批會士已回國頤養天年或回到天家，研究小組更為關注的是教會老年化的問題，修會檔案館負責人多已年紀漸長，更有一位在研究小組拜訪前不久逝世，新負責人未熟悉運作而未能即時提供資料。有受訪者直言，「這研究早十年就應該做了。」各個機構對借出檔案參考的開放態度亦有所不同，而教內人士認為教務和社會事務繁重，「保存及探索歷史，應屬次要的事」，這為保存教會歷史形成困難，香港教區周報《公教報》的社論在二十多年前就點出了有關問題。<sup>3</sup> 研究小組十分理解，醫務工作繁重，有時候甚至影響修道人的祈禱神修生活，要在工作以外再抽時間記錄歷史，是加重他們的負擔。不過，研究小組也希望不論從事哪一種教務或職務，投身教會工作的人士能至少在退休之後，親自執筆或接受他人的訪問，把所知的一切記錄下來，讓更多人認識教會，知道教會跟隨基督而作出的善行。本書以「默默無聞的服務」作為標題，一方面反映出教會診所工作不張揚的特性，同時亦希望教會同工認識到，教會做的善事若不為人廣知，便會在默默中消失，故而應該「在屋頂上張揚出來」（瑪 10:27），因為「保存歷史見證的工作，其實也是傳教工作的一部分。歷史往往激起人們對前輩的思念，引人們的歸屬感及使命感」。<sup>4</sup>

天主教的醫療服務只是香港醫療史的一個輔助部分，研究小組的目標成果是對天主教診所作的一個歷史介紹，所以亦只能蜻蜓點水地同時回顧本港整體醫療系統的發展，未敢自詡為很深入的歷史研究。在非常有限的研究時間之下，即使困難重重，研究小組仍願意承擔起帶頭作用，希望能從幾乎「空白狀態」梳理出各個天主教團體緣何出現在香港、為何從事醫療工作、開辦診所的緣由、各自的營運狀況，以及與當時社會的關係。這裡需要解釋的是，教會往往被形容為一個大家庭；但天主教「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格前12:12），由不同部分組成，所以本研究將營辦診所的天主教單位分為三大類：修會、公教信徒善會及香港教區福利機構——香港明愛（前身是天主教福利會）。他們從事同樣的慈善事業，原因卻不盡相同。對修會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他們各有不同「神恩」，意即天主白白賞賜的恩寵，會依其神恩而決定從事何等工作，故並非所有修會都會投入到醫療事業。例如慈幼會的神恩是教育和青年事工、安貧小姊妹的神恩是照顧貧困無依靠的長者；若修會的神恩是傳教，則可以從事各樣能傳教的工作，既可以是醫療，也可以是教育。此外，修會與香港教會<sup>5</sup>的關係是合作者，修會有義務跟隨地方教會的大方針，但也有其獨立性，是地方教會需要尊重的。

本書共有五章，第一章介紹基督宗教及西方醫療的關係，以及西方醫療由傳教士東傳到中國的概況，香港天主教會的轄區在1949年之前有部分在大陸境內。接著三章分三個時段來介紹天主教診所：第一個時段是1890-1945年，由香港監牧區成立五十年後至戰爭告終作結。第二個時段是1946-1969年，戰後教會重建至難民潮消退，三大類型的教會團體提供服務。第三個時段是1970-1990年，由政府第一份醫療白皮書落實後至醫院管理局成立，期間的社會環境、政策及教會內部的變化，均影響了天主教會整體醫療服務的變化，剛好是個一百年的故事。最後第五章為整個研究的總結。

研究小組在這裡須向所有為本研究提供珍貴歷史檔案和照片的修會、教區檔案處及教會團體，以及各位受訪者致謝。文中錯漏皆是研究小組的責任。

|        |         |
|--------|---------|
| 香港中文大學 | 天主教研究中心 |
| 主任     | 林榮鈞博士   |
| 研究助理   | 張小蘭、劉慶廣 |

2023 年 12 月

1. 吳國樑：〈近四十年來香港醫學發展史的研究概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31 期，2001 年，頁 73。
2. 楊祥銀：〈近代香港醫療衛生史研究的新視角〉，《社會科學輯刊》，2010 年，頁 209-213。
3. 公教報：〈香港教會應為保存歷史作出更多的貢獻〉，1996 年 5 月 10 日，《鐵筆七十年：公教報社論選輯》（香港：公教報，1998），頁 60。
4. 公教報：〈香港教會應為保存歷史作出更多的貢獻〉，頁 60。
5. 因不同時期名稱不同，監牧區、代牧區及教區，以香港教會統稱。

# 基督宗教的醫療傳教及其東來

## 1. 基督宗教與西方醫療

要探討香港天主教診所醫療服務，或許我們該從為何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及東正教）與西方醫療有關係說起。這問題與五六十年代，初次接觸天主教會義診服務的人問：「為何對我那麼好？」有異曲同工之妙，答案也不難找到。一般信徒很輕易就可以從《聖經》中引申出不少例子：

〈瑪竇福音〉：有人請求耶穌可憐他患了癲癇的兒子，耶穌遂叱責魔鬼，魔鬼就從孩子身上出去了，「從那時刻，孩子就好了」（瑪 17:15-19）；又當耶穌在加里肋亞山上時，「許多殘廢、瞎子、啞吧，和許多其他的病人來到耶穌跟前……他便治好了他們」（瑪 15：29-30）。〈馬爾谷福音〉：有癲病人跪在耶穌跟前求他醫治，耶穌動了憐憫的心，伸手撫摸他，「癲病立時脫離了他」（谷 1:40-42）。〈若望福音〉：有瞎子告訴其他人：「名叫耶穌的那個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給我說：你往史羅亞去洗洗罷；我去了，洗了，就看見了」（若 9:10-11）。〈路加福音〉：耶穌迎接跟隨他的群眾，「治好了那些急需要治療的人」，也召集他的信徒，賜給他們治療疾病的能力和權柄，派遣他們治好病人（路 9:1，11）。耶穌更在安息日治好患水臌症的人，而被猶太法學士和法利塞人質疑違反安息日的律法，但耶穌反問他們，若有人兒子或牛隻掉進水井，是救還是不救？（路 14:1-4）以此說明救急扶危的重要，人命不是用律法來衡量，反對迂腐行事方式。<sup>1</sup>

基督宗教相信《新約聖經》中的這四部福音是耶穌的行實，從上面的少許例子可見，耶穌就是「治療者」。他在世時除了教導和訓誨，也有不少記載關於他醫治平民百姓的事蹟，有些更是以近乎神跡的方式治癒他們。在耶穌言行的影響下，基督徒視他的教導和事工為典範，立志跟隨。即使在《舊約聖經》中，個人健康與否亦反映了天主與人的關係：「我要將災禍不斷加在他們身上……必為熱症、毒疫所消滅……除我以外沒有別神；我使人死，也使人活；我擊傷人，也加以治療」（申 32:23-24，39）。換言之，當時的人認為生病的人是因其罪過而與賜予生命的天主產生隔閡，治癒病症才能重拾與天主的關係。

如此，救急扶危、拯救生命的醫療服務很自然成為天主教會的其中一項重要使命，因為在基督宗教傳統中，「使命」（mission）有「蒙上主差遣」的意思。在公元前五世紀至公元四世紀中葉的古典時代，地中海港口城市凱撒勒雅（現今土耳其東南方）首間對公眾開放的醫院「巴西略院」（The Basilad）於 367 年的出現，便歸功於聖巴西略總主教（St. Basil the Great，330-379）。事實上，在古羅馬亦有醫院場所，稱作 *valetudinarium*，但主要是治療傷病的士兵和奴隸，好使他們能繼續打仗和勞動；古希臘則是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廟（Asclepius Temples，傳說中的阿斯克勒庇俄斯掌管治療和藥物），但其甚少聘用專業醫師，而且不接受垂死之人，認為他們死於神廟為不潔。巴西略院的不同在於，它是一個特別為照顧住院病人而建造的大型建築，有受過訓練的醫生和護士，並且是慈善性質，無分貴賤。聖巴西略說：「我們為照料陌生人，無論是為旅途中的人還是因病需要治療的人，建造一個場所，並建立途徑為這些人提供他們想得到的安慰、醫生、運輸和護送，這會造成任何傷害嗎？」，又在闡明巴西略院的附加功能時，提到它是一個「專業醫療的場所」。<sup>2</sup> 教會醫院到達歐洲西部的時間比東部稍晚，一般認為是聖女法比奧拉（St. Fabiola）為了贖罪，於公元 380 年在羅馬帝國西部建立第一間公眾醫院，並親自照顧病人，不迴避那些令人厭惡的傷口和膿瘡。<sup>3</sup> 教會的這些慈善醫療事業得以遍地開花，歸因於君士坦丁一世頒布《米蘭敕令》（公元 313 年）給予人民宗教自由，政權對基督徒的迫害停止，有利於基督宗教的發展。

時至中世紀（476-1453），基督宗教成為歐洲合法的宗教，對社會、經濟和政治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其權威甚至左右國家大事。除了教宗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任期 1198-1216）在 1198 年敦促富人在每個城鎮建設醫院<sup>4</sup>，隱修院的盛行，懂拉丁語的修士的抄寫工作，協助了醫學和其他知識的流傳，而更多大學的成立，亦促進了西方醫學發展。同樣在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期（1096-1291），十一世紀出現的「耶路撒冷聖若望醫院騎士團」（Order of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又稱 Knight of the Hospitaller），從其名字可見與醫療相關。他們在收復聖地、剷除異端後，便開始從事醫療工作，像施行手術、照顧傷病的朝聖者和商人，甚至醫治痲風病人。<sup>5</sup>當然，戰爭並非耶穌所願，但當時的信徒認為自己是正義之師。醫院騎士團在歷史中有多個名稱，他們於 1309 年統治羅德島時，改稱為「羅德島聖若望騎士團」，直至 1522 年被鄂圖曼帝國佔領而離開。在 1887 年成立的「聖約翰救傷隊」<sup>6</sup>就是與羅德島聖若望騎士團相關。騎士團離開羅德島後，至 1530 年以馬耳他島作為駐地，改為「馬耳他騎士團」。目前，馬耳他騎士團在一百二十個國家從事醫療及人道援助項目。至於現存的天主教修會和組織裡，約有三十個是以醫療服務作為唯一或其中一項主要使命，如聖嘉民（St. Camuillus de Lellis，1550-1614）在 1586 年創辦專務醫療服務的「靈醫會」（Camillians）。聖嘉民本身也成為了醫療主保，即保佑醫護人士的聖人。

從前面可見，教會在早期並沒有反對神職人員行醫，直至後來有違規行為出現，在十二世紀以後，多任教宗和教廷的指示、教會會議的法規開始變得不利於神職從事醫療工作。例如圖爾會議（Council of Tours，1163）的禁令，特別針對修士們藉口參加醫學講座離開修道院從而違反居住義務。教宗何諾略三世（Pope Honorius III，任期 1216-1227）將這項法規擴大到所有高層神職人員，違者絕罰逐出教會。拉特朗第四屆大公會議（Fourth Council of Lateran，1215）不容許神職人員涉及切割或燃燒的醫學行為。不過，教會法學者認為，在必要和不涉及生命危險的情況下，神職可以基於憐憫和慈善向窮人行醫，因這是世俗醫師不會做的。教廷聖部亦曾多次授予許可讓神職人員製作和分發

醫療配方，並允許以前擔任過醫生的神父行醫，但附帶條款是要「免費，且是出於天主對所有人的愛和缺乏其他醫生的情況下」，有時又會添加一條條款，即他們可以接受病人自發給予的診金，但絕不可以是來自窮人的。若神職人員原是醫生，除非必要，否則沒有教宗的許可也不得行醫，而教宗的許可又是很難獲得。神父們會被提醒最好是學習神學，成為治療靈魂而非治療身體的專家醫生，因為後者是一種世俗職業，不當行為可能會導致意外殺人或殘疾的風險。<sup>7</sup>

教會法典亦包含許多對教友醫生的嚴格規定。醫生被警告必須努力說服病人做悔罪的告解聖事。教宗庇護五世（**Pope Pius V**，任期**1566-1572**）頒布法令，任何人都不能獲得醫學學位，除非他宣誓不去探望未有合理理由而超過三天都不請神父來告解的病人。若醫生是由公眾團體支付報酬，他有義務免費治療神職人員。醫生一旦開出違反十誡的藥物時，本身就犯下嚴重的罪過。教會也要求醫生恪守免費為窮人提供服務，同時又提醒醫生，他們沒有權力執行教會規定的禁食和禁慾，除非經謹慎判斷病人因健康受到嚴重危險或不便而必須這樣做。另外，被指派到女修道院看診的醫生年齡不得低於五十歲，除非無法找到符合年齡規定的醫生。當他們對修女作出一般的醫療照顧時，要先獲得進入修院的許可，即使在情況緊急的晚上亦然，且不能與病人獨處。至於生活在傳教國家的修會神職人員則享有行醫的特權，尤其是教宗克萊孟十二世（**Pope Clement XII**，任期**1730-1740**）的詔書 *Cum Sicut* 之後，但切割和燃燒的醫療行為仍被禁止，及不得在其醫療機構以外地方行醫。然而，傳教士要取得特權，必須精通醫學，一旦地方上有充足的合格醫生，就應避免行醫；而獲得進行外科手術的特權又要比當普通醫生要困難得多。<sup>8</sup>

到了近現代，文藝復興運動和資本主義的形成，加速了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使得醫學得到一定的進步，如解剖學成醫學教育的必修課，生理學對各個器官發育的研究，臨床醫學上出現了現代的叩診法和聽診法，人工合成藥物的產生等。<sup>9</sup> 這時西方醫學被視為更先進。歐洲傳教士深信只有信奉天主才能得救，到海外傳教以把信仰帶給化外之

民為目標，醫療服務就成為傳教的一種手段。教宗庇護十一世（Pope Pius XI，任期 1922-1939）在 1926 年發表的《論教會傳教》（*Rerum Ecclesiae*）<sup>10</sup> 通諭，除了重提 1919 年《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諭關於教會本地化的重要性，亦被認為是教會傳教工作的指引，推動了教會社會訓導及鼓勵教會人士投身醫療服務。歷任教宗被視為宗徒的繼承人，在天主教會內享有首席權，關於信仰與道德的教理具有「教宗不能錯」（*infallibility*）的特恩，是法定的訓導權威，全體基督信徒的最高牧人與導師。信眾相信他得到聖神的引領，所以要在意志及理智上敬重服從他，「尊敬地接受他的訓導，真誠地附和他的論斷」。<sup>11</sup> 因此教宗發表的各種訓示，是整個教會的指導思想。《論教會傳教》這份社會性的宗座通諭，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五份關於「傳教方針」的其中一個重要指示。<sup>12</sup>

《論教會傳教》說：「傳教士應該記住，在向當地人傳教時，他們必須遵循神聖導師在世上時所使用的相同方法。在他開始向群眾傳道之前，他首先醫治了病人：『凡有病的，他都醫治了；有許多人跟隨他，他都治好了他們；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治好了他們。』（瑪 8:16；瑪 12:15；瑪 14:14）他吩咐門徒也這樣做，並賜給他們醫治的能力：『不論進了那座城……要醫治城中的病人，並對他們說：天主的國已經臨近你們了』（路 10:8-9），並且『他們就出發，周遊各鄉村，宣傳喜訊，到處治病』（路 9:6）」（#30）這是因為傳教士十分清楚，「那些照顧當地人健康的人和關心他們的病苦或對他們的嬰兒和兒童表現出真愛的人，為教會贏得了多少善意和真正的感情。這一切都能證明人心是多麼容易對慈善和仁慈做出反應」。（#30）這一段正好說明，教會非常清楚以善行能贏得人們的好感。

此外，該通諭亦提醒傳教士，「為了人民的靈魂和身體的福祉而建立的各種機構聚集在一起，實際上是擠在一起，既不正確也不可取」，而是應該分散服務，使得托付給他們的地域任何部分都不至被忽略。（#30-31）在本研究中，就可看到許多的服務都是遍佈在不同地區，大多在當時來說是偏僻之地。天主教講究身、心、靈的關顧，每到一個

新地方，多以醫療來解除人類身體的疾苦，以教育來發展成熟的心智，以講授信仰去拯救靈魂。從以上天主教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看到，醫療、治癒在教會有一定的重要性，並且延續至今。

該通諭發表的同年，羅馬也舉辦了一個包括醫療服務的傳教展覽。宗教研究學者德里·瓦紐扎克（Dries Vanysacker）認為，這些舉措為傳教活動「建立起一個基於現代科學、充滿熱忱的天主教醫療框架，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並同時指出，在教宗的敦促下，歐洲的一些天主教大學和組織亦開始或加強了針對醫生或傳教士的殖民醫學課程。<sup>13</sup>

## 2. 醫療傳教與中國

西方醫學與基督宗教，因著歷史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前面已介紹了。然而，若要再追溯其源，實際上包括了多個發展自古文明的醫學系統，包括希臘醫學、羅馬醫學，當中又包含了不同學派。故此，以歐洲為主體的西方醫學是相對於中醫學的一個詞彙。西方醫學在 1600 年以前已經進入中國，傳教士扮演了重要的推動角色。在 1569 年，天主教會在澳門的慈善組織仁慈堂，開辦了中國以至亞洲第一間西式醫院聖辣非醫院，俗稱白馬行醫院、醫人廟，「於澳之東，醫者數人，凡夷人鰥寡孤獨，有疾不能治療者，計就廟醫」。<sup>14</sup> 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是天主教第三度進入中國。他們就曾以金雞納樹皮治好清帝康熙。有醫學背景的歷史學者白雅詩（Beatriz Puente-Ballesteros）研究康熙朝代的滿文「醫療奏折」時指出，康熙曾在 1685 年告訴耶穌會南懷仁神父（Fr. Ferdinand Verbiest, SJ, 1628-1688），有興趣接納精通醫學的歐洲專家。南懷仁推薦了一名會士之餘，也向修會總部請求派遣醫學專家來華；於是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都見到身兼內外科醫生和藥劑師的耶穌會士出現在宮廷。<sup>15</sup> 耶穌會及另一些天主教修會在民間也同樣提供醫療服務，很多時亦因為病人得到治癒而全家受洗入教，有時則以治病為條件，要求病者放棄原來信奉的「邪教」和迷信行為。例如，沙守信（Emeric Langlois de Chavagnac, SJ, 1670-1717）治好一位瘋病的撫州女子後，幾乎三十多位家庭成員都皈依了天主教。<sup>16</sup>

即使在清代禁教時期，傳教士行醫活動沒有完全停止，且以治病來掩護傳教，像耶穌會殷弘緒神父（Fr.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致函總會時提到有會士發給病人藥品，得到許多人的稱讚，稱他為仁醫，「在這個藉口下，基督徒可以毫無擔憂地進入我們的房子。唯一要當心的是做聖事時要壓低聲浪」，而負責牧養女信徒的他，也藉分發藥物「使我能以醫生的身份去看望病人」。<sup>17</sup>不過，在學術上，整個十八世紀未見有西醫著述，「西醫留給中國人的印象，大概就是金雞納、日精油、玫瑰露等零星的西洋藥品」。<sup>18</sup>

出現於十七世紀的東印度公司，每艘船上都聘有外科醫生，並有紀錄曾為船上華人治療，其後又在中國的工場設有外科醫生，增加了華人與西方醫療接觸的機會。<sup>19</sup>在十九世紀，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傳教士亦加快進入中國的步伐，開展醫療及各樣事工。天主教會除了意識到醫療工作使人們「容易對慈善和仁慈做出反應」，實際上與基督新教雙方都存在競爭心態，如以下兩個例子：1844年基督新教《傳教士紀事報》（*Missionary Register*）的一則報道：「在香港，我們認為我們可以而且應該為整個傳教活動系統打下廣泛而深入的基礎。儘管教宗的傳教士在帝國各處擁有眾多機構，但他們還是這麼做了。在我現在寫作一箭之遙的地方，他們豎立了一座三層樓的大房子，毗鄰它的一座大教堂亦即將完工。光是這兩地點，他們就要花費約兩萬元。他們讓我們感到羞恥。」<sup>20</sup>此外，羅馬教廷傳信部（現稱福音傳播部）是負責協調教會在傳教地區的工作，佔約全球三分之二的地方；該聖部的烏戈·貝爾蒂尼蒙席（Monsignor Ugo Bertini）在二十世紀初曾評論天主教對於改變傳教方法的態度太保守：「但若這些是天主教徒關於醫學主題在傳教上的想法，那麼如何解釋它們緩慢的應用，以及天主教醫療活動與基督新教活動相比的劣勢呢？」

基督新教的差會派遣醫療傳教士到海外時，已「明確是從事醫學傳教工作」，故一般都「接受過較為嚴格的醫學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其中有不少具有大學以上的學歷，一些人還是醫學博士」。為了展開中國的服務，基督新教在1838年成立了「中國醫療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sup>21</sup> 在約半個世紀後的 1883 年，倫敦傳道會派員視察中國的教務後，宣稱「在中國沒有任何一種傳教工作要比醫療傳教來得更成功、更有效」。<sup>22</sup> 可見兩教對醫療傳教的重視，並且以基督新教更為進取。事實上，在 1923 年，基督新教已有一千七百多名專業醫生，其中 88% 是在亞洲地區工作。<sup>23</sup> 兩教之間的競爭心態，一直至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推動基督徒合一運動後，才漸見緩和。

1934 年 9 月 19 日，中國天主教全國教務會議醫院委員會（1928-1936）的一份報告中，呂岸登神父（Fr. Joseph Rutten, CICM，1874-1950）講述了中國傳教地區的衛生和醫療狀況。<sup>24</sup> 這份八頁的報告既反映了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在中國的醫療服務之間的差異，亦點出了天主教醫療服務的一些困境。以下是這位在華北地區服務的聖母聖心會士所撰寫的部分內容：

- 中國擁有真正文憑的華人醫生有三、四千人。還有數百名外籍醫生。這些人幾乎都身處於大型港口或基督新教的傳教地區。即使華人醫生也很少在外省。某些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宗座代牧區，在整個區裡沒有一個真正的醫生。與外國人一樣，華人醫生更喜歡安全、舒適和便利的現代化沿海城鎮，而不是不舒適且往往危險的內陸城鎮和村莊。光是上海一市就有七百多名醫生。因此，如果撇除少數大型港口，可以說，中國是世界所有國家中，醫療狀況最差的一個。
- 大多數華人醫生都是異教徒或基督新教徒。沒有統計數據提及天主教徒的人數。我不相信全中國有一百個天主教醫生。
- 天主教徒總共有多少？不能準確地說，從來沒有進行任何調查。僅限於我在中國北半部掌握的一些資訊，情況如下：
- 在這些省份的五十三個代牧區或宗座監牧區中，有三十多個既沒有醫生也沒有醫院。
- 這三十個地域的人口有一億，其中有五十萬天主教徒和約八萬

基督新教徒。因此，在三十多個地域上，無論是傳教士、學童還是基督徒都沒有醫療保健；因此，從這些地區的衛生發展來看，傳教士的影響力是零或幾乎為零。

- 那些發現自己身處基督新教傳教區附近的人，有時會得到傳教區醫生的幫助。
- 在這半個中國裡，有十九個代牧區設有醫院。但它們的價值卻很不平均。有些是好的，但它們本身通常不如鄰近的基督新教徒的工作。其他醫院則平庸、不常有人光顧、不被重視；……當病人可以自由選擇時，他們往往更喜歡基督新教的醫院。
- 至於施藥所，幾乎所有的傳教區都有。它們確實減輕了很多疾苦，因為修女們很熱心，她們的照顧，即使是缺乏技巧的，也讓求助於她們的窮人感到欽佩。但大多數施藥所從未有過醫生應診和醫囑。因此，診斷和治療中存在許多錯誤、缺失。我們常聽到華人說：「西藥不比我們古老中藥好；但我們去教會的施藥所是因為我們窮，我們在那裡接受治療不用付錢。」如果在同樣的醫院和施藥所的工作由好的醫生監督，將會獲得多麼不同的結果啊！同樣的費用，同樣的奉獻，回報將增加百倍，傳教的有益影響將遍及全國。
- 不幸的是，有些天主教醫院沒有醫生；其他則有平庸的醫生，他們在沒有資訊的情況下被接受，因為他們滿足於微薄的薪水。當遇到好醫生，有時會得到沒有文憑的護士的幫助，這些護士在絕對不充分的準備下，由修女們指導在醫院裡工作。
- 簡而言之，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的許多地區，二十世紀天主教傳教士的慈善工作，幾乎沒有從近代歐洲科學的巨大進步中獲益。
- 自我到中國（1901年）以來，已有一百多名傳教士英年早逝。
- 儘管傳教士對神學院的學生非常關心，但不少年輕中國神父健康狀況不佳，無法提供很多服務；他們過早衰老，有眼疾，閱讀困難。

- 幾種傳染病幾乎從未被及時識別，特別是沙眼和結核病。因此，患病的修生傳染給他們的同學。在一些神學院，40%的學生一年內感染了沙眼病毒。需要一兩年的日常護理才能治癒！
- 即使是現在，歐洲醫學也常常引起部分人口的不信任。
- 基督新教傳教差會除了醫院，幾乎沒有其他工作，他們可以投入大量資金來建造它，裝備它，甚至建立醫學院，這些錢都是由慷慨的慈善家支付的。像北京洛克斐勒基金會這樣的機構所建立的，就可以承擔全中國一百個宗座代牧區的預算。
- 許多基督新教傳教士只有在得到其差會保證他們及其家人的醫療保健的情況下，才同意住在內地。相反，天主教傳教士最關心的是拯救生命和減輕他們所目睹的苦難，總是同意留在內陸省份，他們非常清楚，在一生中直到去世之時，他們從不會得到醫生的照顧。
- 傳教士的朋友有時建議天主教傳教士自己成為醫生。這是一個烏托邦；而且即使這個計畫可行，實施起來也不方便。1) 神父首先必須履行其作為神父的職責，這些職責很難與醫生的專業相協調。特別是在傳教國家，醫生從早到晚都忙於照顧病人，不可能再做其他事情。醫生神父只不過是個醫生。2) 教會的修道培育已經很長了，對任何神父，特別是傳教士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們仍然必須站在頂端，熟讀他想要工作的國家的語言。如果想讓他額外遵循整個醫科課程，使他成為一名受過教育的醫生，就會有損候選人的健康，使他們洩氣，從而使招生變得更加困難。
- 未來的傳教士應該熟悉醫學的元素，這是可取的；因為這將使醫生和傳教士之間的合作更加有效、更加開明、更加密切。我們必須把希望寄託在這種合作上，而不是寄託在神父醫生或修士醫生身上。
- 在中國，我認為不必太依賴外籍醫生。大學裡有一些這樣的人是一件好事；但在內裡，他們對語言的無知使得他們的用處大大降低。然後，他們幾乎總是要求傳教區無法支付的薪金。以外籍醫生的年薪，在中國一年可以養活十五個傳教士。

- 有關醫院和施藥所，以及所有正在或將要為傳教區服務的醫生，這些資訊也應集中在主教會議委員會。這樣可提升有能力者的位置，不好的就被淘汰。
- 醫療工作特別昂貴，因此有必要，在不挪用傳教區一般補貼的情況下（不幸的是，這種補貼正在越來越少），嘗試為這一寶貴的工作找到特定資源。若然聖嬰會的事工能夠維持數百所孤兒院，聖伯多祿宗徒會能夠維持數千名中國神學生，那是因為這兩項工作都有經常性的資源。對於最昂貴的醫療工作，（因為它不僅需要現代化的設備和建築物，還需要優秀的醫生，已婚者必須有體面的薪金），沒有組織負責為他們提供資源。



香港宗座代牧區全境圖（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香港在 1841 年被英國佔領，天主教會亦於同年在香港成立宗座監牧區，1874 年升格為宗座代牧區，涵蓋新安縣、歸善縣及海豐縣，內地轄區的面積足足是香港的五倍。戰後，教廷於 1946 年建立中國聖統制，彰顯中國教會已趨成熟，所有代牧區升格為教區，屬於廣東教省的香港代牧區即使已被英國殖民統治也包括在內，而已有四百年歷史的澳門教區則因歸屬於果阿總教區而不受影響。直至內地政權轉變，中英雙方於 1949 年先後封鎖內地與香港的邊境和關口之後，轄區範圍才限於現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境。在此之前，香港代牧區仍是中國教會一部分，1924 年首次召開的全國教務會議，亦參與其中，會議的決定及其反映的情況，與香港代牧區也有關係。故此，基督宗教與西方醫療的歷史關係，以及其在中國的發展過程這兩大背景，與接下來介紹香港天主教診所醫療服務息息相關。首先，上述教務報告解釋了在本研究中，男修會對診所的直接參與比較少的原因。神職人員是所有傳教活動的核心人物，尤其在聖事方面，若再兼顧勞力密集的醫療服務，只會是個「烏托邦」的想法。再加上當時教會和華人社會的保守氛圍，男性傳教士不方便與婦女接觸，婦女和新生嬰兒因衛生問題死亡率很高，早期的醫療工作便主要委託給女修會，因為聘用信徒醫生經費不菲。其次是，醫療服務作為傳教的策略或心態，在意與基督新教作對比，直至梵二會議之前仍然存在。不過，由於人力物力所限，本研究僅限於目前香港特區全境。

## 註釋

1. 傅立吉神父著，陳小霞譯：《醫院牧靈工作》（台灣：光啟文化事業，1976年初版，2009年再版），頁15。
2. Thomas Heyne,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s First Hospital: The Basiliad," in *Hektoen International: A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Spring 2015): <<https://hekint.org/2017/02/24/reconstructing-the-worlds-first-hospital-the-basiliad/>>
3. George Dunea, ed., "St. Fabiola and Her Hospital," in *Hektoen International: A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Vol. 15, Issue 2, (Spring 2023): <<https://hekint.org/2023/01/03/st-fabiola-and-her-hospital/>>
4. Patti Maguire Armstrong, "Religious Orders Carry on the Traditions of Health Care, Education," in *Our Sunday Visitor*, April 4, 2022.
5. Pietro Battistella, "Hospitaller History (2): The Knights as Medics and Doctors," *Medieval Reporter*, March 22, 2023: <<https://medievalreporter.com/knights-hospitaller-healthcare/>>
6. St John 及 St John the Baptist 天主教分別翻譯作聖若望及聖若翰洗者，而基督新教譯為聖約翰及施洗約翰。
7. William Fanning, "Medicine and Canon Law,"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0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1):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0142a.htm>>
8. William Fanning, "Medicine and Canon Law."
9. 〈古代醫學〉，收於王曉鶴編：《中國醫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210-220。
10. 通諭英譯為 *On Catholic Missions*，沒有中文譯本，文件名稱亦有多個中譯版本。台灣光啟社出版的《神學詞語彙編》，稱為《中國傳教》。香港教區夏其龍神父根據教廷原文憲翻譯為《論教會傳教》。通諭的引文由天主教研究中心翻譯。
11. 教宗保祿六世：《教會》教義憲章，#25，1965年11月21日。
12. 其餘四份宗座文憲是：《夫至大》、《致中國教會通諭》（*Evangelii Praecones*，1951）、《信德特恩》（*Fidei Donum*，1957）及《牧者的王子》（*Princeps Pastorum*，1959），參見 James Kroeger, MM, "Papal Mission Wisdom: Five Mission Encyclicals 1919-1959," in Steven Bevans ed., *A Century of Catholic Mission: Roman Catholic Missiology from 1910 to the Present*, (Oxford: Regnum, 2013), pp.93-100.
13. Dries Vanysacker, "Body and Soul: Professional Health Care in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Between 1920 and 1940," in Koen de Ridder ed., *Footsteps in Deserted Valleys: Missionary Cases,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in Qing China*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9.

14. (清) 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頁 60。
15. 白雅詩著，董建中譯：〈康熙宮廷耶穌會士醫學：皇帝的網絡與贊助〉，《清史研究》，2014 年 2 月 1 期：頁 3。
16. 張先清：〈疾病的隱喻：清前期天主教傳播中的醫療文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4 期，第 48 卷，頁 101。
17. 黃巧蘭：〈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傳教活動之探究（1717～1840）〉（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14-115。
18. 劉遠明：〈近代西醫在中日兩國傳播之比較〉，《中華醫史雜誌》，2009 年 5 月第 39 卷第 3 期，頁 146。
19. "Hospital Sunday Service: Professor Gordon King's Inspiring Sermon at Cathedr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Oct 17, 1949;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5.
20.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s," *The Catholic Standard and Times*, Vol 12, Number 24, 13 June 1844,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st18440613-01.2.4&srpos=9&e=-----184-en-20-1--txt-txIN-hong+kong----->>>
21. 林富士編：《宗教與醫療》（台北：聯經，2011），頁 367。
22. 林富士編：《宗教與醫療》，頁 366。
23. Dries Vanysacker, "Body and Soul," p.39.
24. "Hygiene Et Medecine dans les Missions de Chine"（中國傳教地區的衛生和醫療狀況）。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I-03-05，全國教務會議有關學校及醫院委員會（1928-1936）。

〔1890-1945〕

## 醫院附近及沿海區的天主教診所

第二章

1890-1945

醫院附近及沿海區的天主教診所

## 1. 殖民統治初期的醫療概況

英國 1841 年佔領香港後的頭五十年，殖民者面對的其中一個最大挑戰，是不適應這個中國南方小魚村潮濕炎熱的氣候和亞熱帶地區常見的疾病，包括熱病、腹瀉、痢疾、天花和霍亂。當 1843 年首位殖民地醫官安德森（Dr. Alexander Anderson）被任命之時，約有四分之一的官兵和十分之一的歐洲平民染病死亡，使得香港被視為「白人的墳墓」<sup>1</sup>。迪爾醫生（Dr. Francis Dill）一年後接替安德森的職位，於 1845 年開始每年提交殖民地醫官報告成為慣例。其後的殖民地醫官輪轉很快，直至艾爾斯醫生（Dr. Philip Ayres）自 1873 年起任職二十四年為最長；到他 1897 年退休時，政府將殖民地醫官的職銜改為首席民事醫務官（Principal Civil Medical Officer），並重組人員和職務，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才再次出現架構上的改變。

很多論者指出當時政府著眼點是為公務員、警員及其家屬，以及歐籍人士服務，以不願插手華人事務為由，甚少顧及主要華人人口的醫療需要，以免成為經濟負擔，不過在最初的半個世紀，在西式醫療和醫學方面的發展並非毫無寸進。在 1841 年佔領首年，殖民政府便設立了海員醫院，坊間亦出現私營的「香港大藥房」，售買西藥給駐港英軍。<sup>2</sup> 在接著的五十年間，既落成了國家醫院（1850），又通過《傳染病條件》（1857）、《醫藥登記條例》（1884）、《公共衛生條例》（1887）；

由翟維克（Osbert Chadwick）調查香港社區衛生情況（1881）；以及成立醫務委員會（1881）、潔淨局（1883）、香港華人西醫書院（1887）等等。而在二十世紀之前，九龍界限街以南仍是「山岡不毛之地」，人口稀少，故沒有公營醫療設施。<sup>3</sup>

## 1.1 宗教及慈善團體的發展機會

宗教及慈善團體在這期間亦有投入服務。除了華人領袖於 1870 年成立以中醫藥為華人服務的東華醫院，最早來港的西醫，除了是殖民者派來的，還有就是醫療傳教士。基於英國奉聖公會為國教，原在澳門和廣州提供醫療服務的倫敦傳道會，在 1843 年便在港島摩利臣山開設傳道會醫院，由合信醫生（Dr. Benjamin Hopson）主理，是第一間專為華人而設的醫院。門診部第一年便診治了三千三百多人，主要是傳統中醫不能根治的眼疾。<sup>4</sup> 然而，與天主教會一樣，當時基督新教傳教士視香港為進入中國大陸的跳板，不願長期在港服務，傳教會醫院十年後關閉，轉賣給政府作為海軍醫院。<sup>5</sup>

香港首位華人西醫黃寬（1828-1878）就是在倫敦傳教會的醫療傳教士。黃寬早年跟隨牧師到美國留學，後來到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醫，成為中國第一位留洋醫學博士，並參與籌建中國第一所醫學院「南華醫學院」。<sup>6</sup> 愛丁堡大學有英國最悠久和最大的醫學院，對醫療團到非洲和亞洲傳教工作發揮重要作用。<sup>7</sup> 黃寬畢業後獲聘為醫療傳教士，適逢 1857 年中英發生「亞羅號事件」，外籍教士撤離廣州，他便留在香港的診所為基層華人服務。雖然黃寬的老師在學生檔案中稱讚黃寬的品性和能力：「不僅僅是成為一名醫生，而且也是一名傑出的基督新教醫療傳教士」，顯示他能力不輸外國人，但他在港仍受到英籍傳教士排擠，最終辭去傳教士之職，到廣州行醫。<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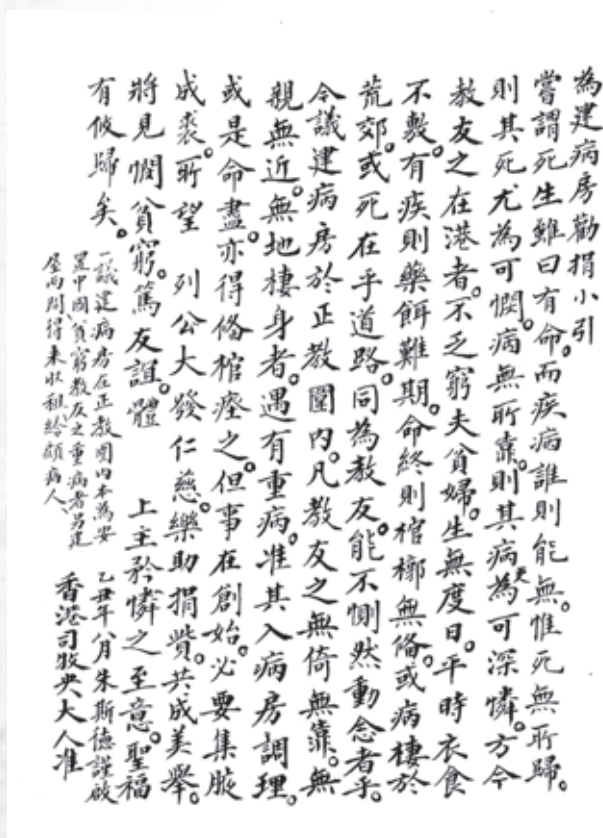
此外，蘇格蘭醫生楊威廉（又稱楊格，William Young）號召成立醫療傳教委員會，欲建設醫院服務華人，但因資金有限，只能租用倫敦傳道會在太平山區禮拜堂內的房間作診所。<sup>9</sup> 委員會主席戴維斯（H.M.

Davis) 以其母名字將之命名為那打素診所。1881 啟用的診所規模雖小，求診人數在 1889 年仍達一千三百多人。<sup>10</sup> 後來得到何啟加入後，華人基督徒開始有了開辦醫院的目標，最終於 1887 年成立了以何啟妻子名字命名的雅麗氏利濟醫院，服務貧苦大眾。<sup>11</sup> 倫敦傳道會其後再開設了三間醫院，包括那打素醫院（1893）、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1904）及何妙齡醫院（1906）。不過，基督新教的醫療傳教士很快發現，通過醫療傳教並不如想像般容易，一方面是皈依為基督徒的病人不多，而開辦醫院相較辦教育成本高很多，醫療傳教士私人執業的問題也使傳教士和教會之間產生張力，種種原因使得基督新教也改變傳教策略，更多地投入到教育範疇。<sup>12</sup>

至於天主教會，香港被佔領後，教會隨即派員來港建立監牧區，有意擺脫葡萄牙的保教權。教會初期的運作集中在灣仔區——一個華洋雜處，龍蛇混雜的地方，並且已有醫療服務的計畫。在《香港天主教掌故》一書中關於 1840 年代的初期教會機構，便提及在灣仔山區天主教墳場的外面，設置「慈善機構區域」，在面向海的山腰建築棄嬰院、醫院、修院、學校和小聖堂，在山腳皇后大道則「可築一座診所，內附醫生住所」。<sup>13</sup>

可是，最早期的兩間醫療機構，「均由於財政問題和教會內部意見不一」，很快便停擺。<sup>14</sup> 首間稍具規模的天主教醫療機構是 1852 年落成的聖方濟各醫院（位於今秀華坊）。設立醫院起初是著眼於來自果亞和菲律賓的天主教徒，他們在英國艦艇上工作，上岸後艦長留下他們，不給予援助而「因憂成病」，不過當裴神父（又稱傅安當，Fr. Antonius Feliciani, OFM, 1804-1842）為建院向全港市民發出公開募捐呼籲時，表明這所醫院是「為貧苦大眾（不分宗教）」而建。<sup>15</sup> 從募捐信中亦可知，裴神父「曾開辦一所小醫院」，但空間有限，「只好到貧病者的家中，協助他們接受診斷和藥物的治療」。<sup>16</sup> 可是由於聖方濟各醫院經營情況惡劣，1857 年轉租給美國政府作救治海員和海軍的醫院，翌年又由荷蘭籍郭醫生（Von Covorden）租用作服務外籍人士的海員醫院。雖然郭醫生只收取二千元年薪，比商船上的醫師少三份之

二，可算是半義務地工作，醫院仍被病人在報章上投訴「殘忍對待病人並為他們造成不必要的痛苦」，使之最終關閉，產業轉租給英軍作已婚士兵宿舍。<sup>17</sup> 1869年，教會當局收回聖方濟各醫院，交嘉諾撒仁愛女修會重新開辦，附設藥房和高默斯醫療所。其後於1909年在現今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的位置建造新醫院大樓，直至戰後才遷往舊山頂道與嘉諾撒醫院合併。



朱斯德神父的勸捐書（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另一間聖若瑟醫院是 1865 年，朱斯德神父在盎神父（Fr. Luigi Ambrosi, 1829-1867）去世前兩年得到批准，在聖方濟各醫院和聖方濟各堂向山的後方建造。這間為華人臨終者開辦的療養所，同樣只短暫運作便停辦。<sup>18</sup> 其中一個原因是高神父（Fr. Giovanni Timoleone Raimondi, MEM, 1827-1894, 1874 年祝聖為主教）成為教會領導人後，不希望華人神職成為任何機構的負責人，故此從華人手中取回，交由嘉諾撒會另作他用。<sup>19</sup> 此外，嘉諾撒會的修女在 1886 年已踏出香港島，在油蔴地開設診所。

傳教區的神職人員亦在政府的醫院內，提供牧靈服務，慰藉病人。1884 年，港督寶雲（George Bowen, 任期 1883-1885）向德比伯爵發送文件，提及將天主教神職與聖公會神職看齊，在監獄醫院和國家醫院擔任專職司鐸的神父應該得到一些報酬，並按當時在駐港的天主教徒士兵工資一樣，向高主教提議每月六十元的薪金，每兩年調整一次；主教已正式表示接受。<sup>20</sup>

從上面可見，在英國殖民統治的頭半個世紀，不論是公營還是慈善和教會團體的西式醫療，皆以醫院為主，西醫診所並非主流。管治者的著眼點在於殖民者和外籍人士的健康，而香港的華人大多依靠中醫中藥治病。這一方面是華人對不懂華語的洋人西醫有一定的抗拒，又害怕外科手術和遺體解剖，且不知國家醫院是對華人開放，看到昂貴收費亦令他們卻步。<sup>21</sup> 一方不願供給，另一方不願接受，反而給了宗教和慈善團體在醫療服務上的發展機會，提供免費或價格低廉的西醫服務。宗教團體更借此接觸市民，達到傳教目的。另一方面，人性難免有弱點，即使講求愛與寬恕的教會，以至以中醫藥學診治華人的東華醫院在營辦上曾被迫使轉用西方醫療，同樣都要面對西方人的優越感和對華人的歧視。

## 1.2. 鼠疫帶來的轉捩點

本研究的時段由 1890 年開始，因為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香港醫療狀況出現幾個重大的轉變。首先當然是 1894 年爆發的鼠疫，這是中世紀黑死病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sup>22</sup> 香港醫務衛生署前署長蔡永業醫生（1921-2001）曾寫到：這場鼠疫「一定算是香港史上最著名的醫學事件」，影響長達三十年，1894 至 1923 年間共有二萬多宗個案，死亡率達 93.7%。<sup>23</sup> 為了減低致死率，政府採取多了多項強制衛生措施來遏止疫情，包括宣佈香港為疫埠，強行把鼠疫患者遷至傳染病醫院，安排埋葬染疫死者，強行消毒民居，甚至遷拆華人聚居的太平山區，重新分配住房等。楊祥銀教授認為，這場疫情可說是「殖民政府對華人社會進行全面和深度干預的開始」。<sup>24</sup>

其次，這次疫情亦改變了華人婦女對西方醫學的接受程度。港英政府本來就不重視華人的保健，在重男輕女的華人社會，政府又「基於未開發民族的性別差異不大的觀點」，<sup>25</sup> 華人婦女的健康更備受忽視。此外，英國社會當時本身仍然保守，首位女醫生也遲至 1865 年才逐漸得到認可，直至 1892 年才可加入英國醫學會，故此十九世紀沒有女醫生來港服務。與華人女性相關的醫療措施，主要是當年妓女罹患性病情況嚴重，當局通過《傳染病條例》（1857），要求妓女定期接受檢驗，並設立性病醫院（1858），為的仍然是保障洋人的健康。不過，大多數妓女都不願意配合，接受全是男性的西醫檢查。另外少數會接觸西式醫院的女性，是出現難產情況的產婦，但殖民地政府所關注的是代表文明象徵的殖民地嬰兒死亡率，而非華人婦女的安危。<sup>26</sup> 其後，雅麗氏紀念產科醫院 1887 年聘用第一位華人護士關黎式，成為華人婦女與不懂中文的西醫之間的重要橋樑，吸引每天逾百華人婦女到教會醫院求診，「是國家醫院從未出現的情況」<sup>27</sup>；傳道會的醫院又為華人開設護士訓練學校，再拉近華人婦女與西式醫療的距離。這些轉變同樣為天主教女修會開辦的西式醫療機構帶來助益。而 1894 年的鼠疫，對一般華人婦女造成更大的實質影響：入住國家醫院的女性由 1889 年的 4.75% 增加至 1896 年的 15.5%，醫院的鼠疫病患中，女性作為高風險的家庭照顧

者，死亡率達 51%。<sup>28</sup> 隨時喪命的疫病打破了華人婦女對西醫的性別障礙，改變了她們對西醫和西藥的態度。雖然港英政府仍然漠視女性的健康，在國家醫院只有一間有十四個床位分配給女性的普通病房，這樣的環境卻給了機會教會組織得以發揮作用，亦讓更多女性在教會醫療機構接受西醫的診治。<sup>29</sup>

### 1.3 華人公立醫局

華人公立醫局（Chinese Public Dispensaries）中的「公立」二字是指「為公眾設立」<sup>30</sup> 的西醫診所，由華人出資和管理，受政府監督，服務對象是華人，它在二十世紀初的出現，標誌著西醫診所的普及。

設立地區醫局的想法，殖民醫官艾爾斯早於 1892 年提出。當時英國殖民辦公室提出關於香港的出生及死亡登記及對華人社會提供醫療服務的意見，艾爾斯認為不應強迫華人做任何事，反而建議在不同地區設立醫局，試驗為期三年。華民政務司洛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則認為先在香港及九龍各設一間醫局，為期一年，若效果好才開設更多。港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任期 1891-1898）同意二人的建議，但因缺乏經費，將計畫推遲。然而，在有機會開展計畫之前，香港已籠罩在鼠疫的死亡陰影之下。<sup>31</sup>

政府其後再次諮詢有關醫療問題。1895 年的《醫學委員會報告》同意成立醫局，但基於無法準確估計由此涉及的支出及成效，他們建議先在九龍作試點，一旦取得成功，才將計畫擴展至各區。選取九龍的原因是，當時界限街以南的「英屬九龍既沒有合格的私營執業醫生，也沒有銷售歐洲藥品的藥房」，故建議在該處設立醫局，由一名具有西醫資格的華人醫生負責，政府直接監督。這名醫生的職責是「熟悉並及早通報任何流行病的存在、調查可疑死亡的原因以提供給總登記官，以及擔任九龍區的公眾疫苗接種員」。<sup>32</sup> 該報告認為「應向華人收取少量藥費，這是中國醫療傳教團的做法，並且從這些團體所顯示的結果來看，我們有充分理由預期醫局將在財務上取得成功。」<sup>33</sup>

即使如此，有關計畫仍沒有立即落實，直至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任期：1898-1903）於 1902 年批准興建，並與西醫書院合作，學生畢業後須為政府工作三年，由畢業生擔任診所主任，職銜為華人醫官，隸屬於醫務署；而診所方面，則找來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合作。<sup>34</sup> 這個組織由劉鑄伯、馮華川及何甘棠等華人富商成立；劉、馮二人為潔淨局成員，當時鼠疫猖獗，他們曾向華民政務司蒲魯賢（Arthur Winbolt Brewin）諮詢遏止疫情的措施。

在 1904 年成立之初，華人公立醫局協助政府處理街上棄屍問題，後來還提供種痘、出生登記、發放死亡證、移送屍體到殮房、供應棺木及安排葬禮。原由東華醫院主席及潔淨局兩名非官守成員負責管理，1908 年，港府委派華民政務司擔任主席，至 1934 年政府直接管理所有醫局。<sup>35</sup> 由於照顧婦孺的健康乃是醫局的要務，他們不時會討論嬰兒死亡率的問題，政府除了派助產士到部分醫局提供西式接生，又將傳染病醫所改建為贊育醫院，後者的建造和醫療器材的資金都是來自華人公立醫局。

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dwin Richard Hallifax）1922 年在贊育醫院啟用致辭時，對華人公立醫局作了更多的介紹：

為這裡的許多人來說，華人公立醫局可能是一個陌生的機構；華人慈善團體就是這樣，他們做得很好，但從沒想過要宣傳或得到即時的讚許。但我，因著我的職位有幸擔任主席，知道當中許多值得那些負責人感到自豪的理由，而我沒有同樣的理由去保持沉默。

華人公立醫局源起於卜力爵士管治期間，當時鼠疫在殖民地非常猖獗，也是人們對這種疾病仍未有更廣泛了解以消除對它的一些主要恐懼之前。保障城市健康的西式（醫療）方法至關重要，必須採用，但要消除華人社會底層——疾病發生率最嚴重的階層——對它的偏見是非常困難的。婦孺的情況為政府帶來了一些最棘手的問題；亦正是在這個時期，棄置兒童屍體的情況達到最高峰。<sup>36</sup>

夏理德又指出，華人公立醫局的兩個目標就是：讓社區普遍地習慣使用西式醫療方法，特別是在流行病時期；其次是將主要精力集中投放在婦女和兒童身上。直至 1922 年，華人公立醫局已開辦八間醫局，每年診治十四萬人次，開支達五萬元，當中只有二千元是政府津貼。在同一場合上，何甘棠亦講及華人公立醫局的計畫最初遭到一些華人反對，待他承擔了頭六個月的營運開支，半年過去，華人社會開始發現醫局的作用和對他們的幫助。<sup>37</sup>

在戰前港島區的醫局有：西營盤的西約華人公立醫局，又稱西約方便所。1904 年西營盤街坊值理會建議提供病床作鼠疫醫療服務，1909 年得政府撥地興建落成。地面樓層作診症之用，上層是用作照顧疫症病患或其他傳染病者的方便醫所。西約方便所位於舊贊育醫院旁邊，現為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辦公室。東約公立醫局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因地方不敷應用，獲政府撥地於石水渠街建造新局，於 1911 年落成。二十世紀末因地區發展被拆卸。九如坊中約醫局位於上環九如坊與鴨巴甸街交界，1909 年興建，戰後發展為中區健康院普通科門診診所，至今仍投入服務。<sup>38</sup> 其他醫局包括：1909 年，銅鑼灣的艇戶開會商討水上人生活相關事務，決議開設立水上醫局；筲箕灣的艇戶於 1910 年亦仿倣開辦。至於另一漁港香港仔，在香港仔大道 45 號的醫局遲至 1930 年才出現。<sup>39</sup>



位於深水埗醫局街的公立醫局（攝於 2023 年）

在九龍和新界區：1906年，油蔴地及紅磡先後於5月27日及6月27日有醫局落成。油蔴地公立醫局位於甘肅街，而水上醫局「原先是在銅鑼灣一隻船上」，後政府撥地在甘肅街興建新局，1916年落成將兩局合併為「油蔴地及水上公立醫局」，至第二次大戰被毀才停辦。<sup>40</sup> 觀音街紅磡公立醫局，由「紅磡三約公所」創設。紅磡三約是由紅磡、鶴園角及土瓜灣組成，早於十九世紀已出現，於1902年正式創立「紅磡三約公所」，先後設立義學和公立醫局，提供免費教育和贈醫施藥。1910年新醫局落成，取代原有舊局。深水埗公立醫局在1911年已籌募建造，因深水埗區是貧困地區，礙於資金不足而拖延多時。它原設於天后廟旁，1915年啟用時是「新九龍新界的第一間醫局」<sup>41</sup>，至三十年代不敷應用，在醫局街137號另建新館，街道因醫局得名。新醫局於1936年落成，舊醫局隨之停辦。深水埗醫局在戰後繼續提供門診服務，1971年開始提供美沙酮戒毒服務，至2001年門診服務遷出，成為專用戒毒診所，更名為深水埗美沙酮診所。樓高兩層的建築物於2010年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門外上方刻有「深水埗公立醫局」，乃深水埗原有寫法。九龍城公立醫局於1905年在宋皇台附近租用一地舖開始，為該區二十一條村落服務。在1916年求診者有三千多人，1931年達一萬四千餘人，十五年間增幅近五倍，只得另覓更大的地方。醫局一度計畫搬進九龍城寨內，後得到政府撥地，於1932年遷至隔坑村道（約現今石鼓龍道遊樂場位置），「是當時所有醫局中最大的一間」<sup>42</sup>，可惜被日軍於戰爭期間炸毀。

華人公立醫局於1941年已停止運作。在戰後初期，大部分醫局被醫務衛生署用作地區診所。隨著政府醫療服務改善，華人公立醫局的角色逐漸減弱，由政府診所和健康中心所取代。最終在《1967年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結束）條例》之下，由華民政務司動議結束委員會一切事務，並將剩餘基金撥作其他公眾福利事務。至於醫局的建築物，許多仍保持醫療用途，部分則歸還街坊組織用來建校或其他社會服務。<sup>43</sup>

與此同時，政府亦在二十世紀初將西醫診所推廣到新界區。上水古洞路的何東夫人醫局是新界區最早期的鄉郊診療所之一，由何東爵

士出資捐助讓政府興建，以其原配夫人名字命名，於 1933 年落成，在 1934-1973 年間主要用作留產所和印度籍軍人療養所。何東夫人醫局亦曾用作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醫療服務和舉辦健康教育活動，直至 2005 年為止。這座糅合中西建築風格的醫局，2009 年獲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當局將它活化並交由薺色園作為生態研習中心。<sup>44</sup>此外在大埔墟亦設有診所，華人醫官需每周兩次前往元朗應診。然而，三十年代經濟不景，迫使港府擱置在荃灣及長洲等新界地區開設其他診所的醫療計畫。<sup>45</sup>在這些醫局中，九龍城和古洞兩間醫局曾與瑪利諾女修會及嘉諾撒女修會有關，在後面相關章節會有介紹。

正如前述，華人公立醫局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出現，除了是協助政府遏制嚴重的疫情，政府透過撥地使之得以在多區發展，標誌著西式診所的普及化。華人公立醫局加上政府開辦的診所，產生「逐步以西方醫學排擠和壓制中醫」的效果<sup>46</sup>，這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在 1890-1945 年間，香港天主教會的醫療服務起初集中在灣仔一帶，自英國於 1880 年透過《北京條約》取得了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後，也跨過海港到九龍服務。相關服務主要由女修會提供，包括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意大利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從嘉諾撒會獨立的耶穌寶血女修會，以及美國瑪利諾女修會。在這些傳教點上，修女們營辦起小型甚至可說是簡陋的診所，同樣以西式醫學診治病人，贈醫施藥，間接推動西式醫療在香港的發展更為普及。後面會以修會在香港出現的先後次序來介紹她們曾經開辦和服務的診所及醫療設施。

## 2.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1696 年，在法國沙爾德附近一條小村樂維威村，堂區神父沙路易（Louis Chauvet）召集了四位少女幫助他在堂區內照顧窮人、兒童和病患者，更重要的是要幫助他們脫離無知。到了 1708 年，沙爾德教區保祿·葛德·馬列主教（Bishop Paul Godet des Marais, 1647-1709）接管了這個團體，並以自己的聖名給她們正式命名為「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SPC）。1847 年 12 月，當時身處巴黎的香港宗座代監牧科嘉主教（Bishop Theodore-Augustin Forcade, MEP, 1816-1885）寫信邀請聖保祿女修會派成員來香港服務，計畫包括為愛爾蘭官兵開辦醫院、為他們的孩子開辦學校和設立照顧棄嬰的收容所等工作。在 1848 年 9 月 12 日，四位修女隨同科嘉主教一同回到香港，成為第一個來港服務的女修會，正式開展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這小島上的服務。

修女們最初的服務主要集中在灣仔區，重點包括成立孤兒院「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拯救和撫養被遺棄的嬰兒，且主要是女嬰，為垂死的嬰兒付洗。這家孤兒院的名字源於對法國「聖童之家」經濟支援修女工作的感謝。隨後的幾十年，聖童之家經過多次的遷移、擴建，除了照顧更多的棄嬰，還設立「仁濟之所」，收容傷殘兒童，對他們提供特別的照顧和教導，也為過境的傳教士、受迫害的國內基督徒、海難生還者和受傷、患病的法國軍人與船員提供臨時的棲身場所。

### 2.1 踏上醫療服務的舞台

1894 年 5 月香港爆發了極具破壞性的淋巴腺鼠疫，在香港肆虐了近三十年才消失。這場疫症不單影響了本地公共醫療的發展，也成為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服務的轉捩點，從而成就聖保祿醫院迄立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在《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一書中有詳盡的紀錄。當時的修會省會長菲力斯·佐頓姆姆（Sr. Felicie Jourdan，

1856-1926，任期 1891-1926）眼見孤兒院收容的病弱殘疾、受苦者，棄嬰和孤兒都需要醫療及藥物的供應，加上聖童之家的空間已到了極限，她提出建立一所醫院的請求。兩年後，這所位於聖童之家內的小型醫院於 1898 年 1 月正式啟用，也就是人所通稱的「法國醫院」。醫院旁附設藥房，每年約有二千名婦人及孩童來求診和取藥。<sup>47</sup> 其實，之前聖保祿女修會在照顧孤兒、殘障者和傷患者時，已提供包紮和基本的醫療服務。到了鼠疫爆發時，社會整體醫療服務不足，修會回應當時的需要，在原先的基礎上，創立聖保祿醫院，正式投身香港的醫療服務。在 1914-1918 年間，修會在巴黎外方傳教會總務長金神父（Fr. Leon-Gustave Robert，1866-1956）的協助下，賣出灣仔物業，轉購並改建銅鑼灣一家棉織廠廠房，把修院、孤兒院、學校和醫院搬進這建築群。1918 年 3 月 24 日，師多敏主教（Bishop Domenico Pozzoni, MEM，1861-1924）為銅鑼灣聖保祿醫院的啟用祝聖。<sup>48</sup>

1920 年 1 月 25 日法文周刊《印度支那經濟復甦》（*L'Éveil économique de l'Indochine*）文章描述和稱讚這所新醫院時，也提及其診所服務：「醫院對那些無力支付的病人沒有任何歧視，他們可獲得免費治療……此外，有一間為窮人看病的診所由老修女亞納（Anna）管理，她是這些窮人眼中，香港最好的醫生」。<sup>49</sup>

到了 1936 年，聖保祿女修會的服務擴展至九龍半島，當時的省會長聖沙勿略姆姆（Sr. St Xavier Vermeersch，1867-1948，任期 1935-1947）在太子道開辦聖德肋撒育嬰院，照顧孤兒和棄嬰，同時在育嬰院附設置小型診所治療貧窮病患者。四年後，聖德肋撒醫院投入服務。

除了上述與醫院或育嬰院相連的診所，聖保祿修女在 1937 年應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的邀請，在薄扶林太古樓管理聖約瑟女子學校（St Joseph Girls' School）時，也負責一所小型的診所及藥房的運作。<sup>50</sup> 按 1938 和 1941 年的資料，當年診所的診症人數分別有一百五十人和三百人。當時的主管是勒妮·德瑪利·布萊斯特羅修女（Sr. Renee de

Marie Boulestreau，1878-1941)<sup>51</sup>，同期還有呂妙金修女（1907-2001）<sup>52</sup>和後來創辦聖華小學的葉漢英修女（1905-1968）<sup>53</sup>。由於二戰時日本與法國屬於敵對陣營，而物業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所以在1941年12月被迫關閉，學校和診所服務也隨之終止。

上述資料記載了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醫療服務發展過程，當中包括零碎的診所服務，甚或在沒有診所概念之前的醫護服務。聖保祿醫院醫務總監何兆煒醫生論及診所醫療資料時說：「香港的醫療史一般比較注重醫院，因其組織龐大而且相對持久。但診所開業和關閉可以很流動，所以資料很零碎。……起初修會搬往灣仔時是沒有醫院的。從修女來香港服務到聖保祿醫院的正式出現相隔五十年，之前一定有醞釀過程，可能是人道地收留病患，做一些非正式的護理工作，例如為受傷的人包紮傷口或者餵食等。……這樣的事不會記載，因為沒有甚麼組織規劃，是本著見到有需要就去做的心態。」<sup>54</sup>這些零碎記錄的服務間接反映了香港早期醫療服務的匱乏，窮苦華人面對疾病的苦況，以及聖保祿女修會為回應困苦者的需要所作出的服務。修會興辦的診所要到下一章，六十年代才有較多的資料記載。

### 3.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1808 年聖嘉諾撒瑪大肋納（St. Maddalena di Canossa，1774-1835）在意大利韋羅娜成立嘉諾撒仁愛女修會（Daughters of Charity of the Canossian Institute, FDCC），服務窮苦大眾，特別是教育貧苦女青年，讓人認識和愛慕耶穌基督。她強調修會的服務「要以敏銳的觸覺留意時代的徵兆，以最恰當的方式來回應當時當地人的需要。」<sup>55</sup> 憑藉這份敏銳的觸覺，嘉諾撒會在 1860 年回應香港宗座監牧盎神父透過米蘭外方傳教會總會長、威尼斯宗主教安日洛·拉瑪佐蒂（Patriarch Angelo Ramazzotti, MEM，1800-1861）的邀請，派遣了第一批六位修女往香港開展使徒服務，當中包括香港第一任院長古柏詩修女（Sr. M. Lucia Cupis，1820-1869）。

#### 3.1 第一個海外傳教站

不過，這份派遣並非一蹴而就。撰寫教會歷史的賴詒恩神父（Fr. Thomas Ryan, SJ，1889-1971）在嘉諾撒會來港一百周年時，向修女們講述了影響整修會發展的一個小故事：當收到去香港服務的邀請時，總會長嘉姆姆（M. Luigia Grassi，1811-1888）告訴拉瑪佐蒂宗主教：她非常抱歉，那不是她的權力範圍可作主的事。這是因為在教會傳統中，修會憲章是要經教宗及相關教廷部門批准；根據嘉諾撒會的會憲，她們的成立是為在意大利的兒童服務，沒有提及到外方傳教。宗主教隨即到羅馬求見教宗庇護九世（Pius IX，任期 1792-1898），教宗的反應是相當於：「拿筆給我」。自此，經修改過的會憲讓嘉諾撒會的工作得以遍佈世界各地。當時意大利北部屬於奧地利，宗主教回程時順道到維也納向皇后請求所需路費。最後，去與不去的決定權便落在總會長身上，她可以決斷地說「不」。然而，總會長卻是嘆一口氣回答說：「現在她們全都會想去香港。」<sup>56</sup> 賴神父的演講中沒有提到的是，其實在受邀往中國之前，總會長嘉姆姆亦曾收到來自印度的邀請，但修會內部大多數都反對而作罷。<sup>57</sup>

嘉姆姆陪同六修女出發前到韋羅娜，在會祖的墓前祈禱，巧遇一位往昔與會祖一起生活的老修女阿德奧達塔·馬扎（Sr. Adeodata Mazza）。她們問老修女若會祖知道她們去中國會怎麼說。老修女回答說：「她會怎麼做？懷著對鄰人的愛，她不但會派修女去，她自己也會去。所以，去吧，天主召叫你們，天主想要你們，願天主祝福你！」<sup>58</sup>

「這是嘉諾撒修女會首次在意大利以外進行的傳教遠征，因此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焦慮」<sup>59</sup>，同時也可以看到這六位先鋒修女的傳教熱忱、勇氣和愛心。她們抵港後不到一個月就立刻開辦英文、葡文、中文學校（培貞學校<sup>60</sup>）；之後獲得恩人捐贈一幢座落堅道的樓房設立會院，展開培育青年、收養孤兒、棄嬰和服務貧困等慈善工作。隨後幾十年，其他批次的嘉諾撒修女陸續到港，修會先後在筲箕灣、紅磡、尖沙咀、西營盤、香港仔等地區開辦學校、診所、孤兒院、兒童之家、婦女庇護所等服務。過去一百六十三年，嘉諾撒修會按社會需要，超過五百三十位修女在教育、傳教和照顧孤兒及病患方面服務香港。<sup>61</sup> 嘉諾撒會亦以香港為基地，分別在 1868 和 1874 年派遣修女往中國內地和澳門開展服務。她們因為穿著棗紅色的會衣，當時的人稱她們為「紅衣姑娘」。<sup>62</sup>

### 3.2 悠久的醫療服務

在眾多使徒工作中，嘉諾撒會最為人熟悉的是教育事業，原來嘉諾撒會的醫療服務也是歷史悠久的。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時，修女們除了祈禱和照顧院舍的孤兒、病弱外，還派出六名修女往外服務疫症病人。當年修會的報告中提及「她們日夜輪流值班，每班三人，每次值班十二小時，由上午六時至下午六時……她們不會返回修院，免得傳染。主教神父們讓我們借用一間屋，就在聖安多尼教堂附近，在西環，在往醫院的半途中。她們就輪流在那兒休息。我們送食物給她們，從修院送往醫院和那間屋」。1896 年修會也記錄了兩位年輕修女因照顧疫症病人而染疫去世。<sup>63</sup> 在上述記載中可以看到修女們為窮困病弱者毫無保留付出她們的愛心服務，甚至生命。

除了回應突發醫療需要，早在 1869 年嘉諾撒修會在灣仔設立會院，服務誤入歧途的少女時<sup>64</sup>，也接管在 1852 年開辦但很快關閉的聖方濟各醫院<sup>65</sup>，照顧在醫院患病的婦女，講授要理。當時的醫院規模和診症模式不是按現在的概念，修會只是利用數間小房舍設立小型貧民醫院，並附有高默斯醫療所（Dr. Gomes Hospice）。這醫療所從其英文名稱可知，是一所照顧臨終者的設施，它得到天主教信友組織聖雲先會經常的捐款，以維持服務。<sup>66</sup>按資料顯示，當時獲得貧民醫院贈醫施藥的貧困者平均每月達五千人。醫務人員主要是義務醫生，醫院裡的護士大部分是嘉諾撒修女，而經費來源依靠修女們辛勤工作，售賣刺繡，教鋼琴、繪畫、外語，並舉辦賣物會，以及聖雲先會的資助和向本地及海外募捐。多年來在醫院服務的修女不計其數，包括一些原本在國內服務，但在五十年代初因著局勢變化不得不離開中國而輾轉來港的修女，其中有曾受病理學訓練，在漢口從事醫療服務十八年（1933-1951）的李修女（Sr. Angelina Rivetta, 1907-1988）<sup>67</sup>。她在 1951 年抵港後，擔任聖方濟各醫院院長一職，直至 1955 年被派往非洲服務。離任時，與她在聖方濟各醫院合作的兩位醫生埃里克·維奧（Eric Vio）和若望·卡雷-休格（John Carey-Huges）在他們的推荐信中高度評價李修女的表現和貢獻：「我從未遇過像她這樣結合了護理經驗、忠於職守以及作為醫院負責人所需的堅定仁慈的修女」、「她對於所有醫學和科學的知識確實是令人驚嘆的。除了無庸置疑的專業能力，她也是個和藹可親的人，在任期內，醫院內的友好精神盛行，完全沒有磨擦和爭議」<sup>68</sup>。1961 年李修女回港任遠東區省會長。



李修女在聖方濟各醫院照顧病人（照片由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提供）

到了 1960 年，舊山頂道的嘉諾撒醫院重建完成，在灣仔服務了約有一百年之久的聖方濟各醫院才正式結束歷史任務。<sup>69</sup> 之後修會把空置醫院改作失明兒童學校，名為「嘉諾撒盲女院」，1968 年更名「嘉諾撒啟明學校」。到了 1974 年修會在剩餘的醫院舊址空間開辦「嘉諾撒達言學校」給聽障兒童就讀。兩所學校分別在 1987 和 2007 年結束。<sup>70</sup> 談到舊山頂道的嘉諾撒醫院，那是 1929 年一位恩人把位於舊山頂道的一塊土地遺贈給修會，修女們就在那處開辦新醫院，吸納和取代灣仔方濟各醫院和堅道會院內的小醫院。醫院經歷二戰摧毀、1960 年的重建，到了 1991 年，嘉諾撒修會把醫院的管理權轉交香港明愛，更名為嘉諾撒醫院（明愛）。<sup>71</sup>

### 3.3 油蔴地、紅磡、九龍城的診療所

在醫院服務以外，修會在早期已開辦診所服務貧困。早於 1886 年，修會在油蔴地租用一間小房子成立第三間會院<sup>72</sup>，擴展在九龍區的服務，照顧貧困人士。當時油蔴地如同整個香港，缺乏醫療服務，修會《紀事報》（*The Chronicle*）記載：「在短短六個月內，已有超過三百名『病人』前來這間小小的修院向修女求助和索取藥物；這間小修院已變成了配藥處。」這樣，修會設立第一所施藥所，為該區居民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其後，修會在油蔴地開辦一所小型女子中文學校，主要為附近漁民女童提供教育，直至 1923 年結束。<sup>73</sup> 到了戰時油蔴地會院被破壞，不復存在，估計診療所服務約在 1941 年結束。油蔴地會院以教育及醫療服務並重的特色，成為日後其他地區會院的發展模式。<sup>74</sup>

1890 年當修會在紅磡買了一間小屋設立會院時，仿倣油蔴地會院模式，同時開辦了一所小型中文學校和免費診所，照顧附近漁民子女的教育需要，也為漁民和船塢工人家庭提供基本醫療服務。四年後，修會在當時是海邊的寶其利街擁有兩塊土地，興建了一所學校，估計是把附設在會院的學校和診所搬移至這個新地方。<sup>75</sup> 1899 年左右，修會又再把會院、學校和診所搬遷至蕪湖街後面的小山丘，當時學校名稱已是聖德中文小學。那座小山丘沒有正式的名字，村民們以學校的名字

稱它為聖德山。<sup>76</sup> 1942 年學校與診療所遭戰火摧毀，服務被迫停止。戰後為應付不斷增加的教育需求，1949 年修會在被炸毀的學校原址附近一所鋅鐵大屋重開學校與診所服務，修女也不時外出探望該區的窮困居民。後來政府收回土地興建房屋，估計紅磡診療所服務在這個時候結束，而聖德小學則借用九龍城聖家小學上課。至 1958 年紅磡鶴園街的新校舍落成，學校遷回紅磡，改名天神嘉諾撒學校。<sup>77</sup>

曾經在這裡服務的有德修女（Sr. Elisa Dall' Acqua，1909-2003），她於 1936 年加入修會，1939 年發初願時便希望到他方傳揚福音，1941 年她終於得償所願來港傳教。除了早期在聖德學校，她亦分別在明愛醫院和西營盤凌月仙會院服務。<sup>78</sup>

此外，嘉諾撒會在 1940-1942 年間也曾在九龍城區開辦「一間規範不大的學校以及一間診療所」，當時求診的多是在附近耕作的農民家庭。學校和診所後來遭受劫掠和摧毀，被迫停止運作。到了 1954 年修會在聯合道重開小學，名為聖家小學，同時恢復診療所服務。1956 年為騰出地方作教育用途，診所服務結束。<sup>79</sup>

在上述診所服務過的修女雖非全都有名字記錄，但她們確實為當時的居民帶來支援和希望，更難得的是嘉諾撒會早在十九世紀末已關注九龍半島居民的困境和需要，無怪乎油蔴地會院和紅磡會院的服務被譽為九龍社區服務的先驅。<sup>80</sup>

### 3.4 西營盤凌月仙診療所<sup>81</sup>

與紅磡會院差不多同期，1893 年嘉諾撒會在西營盤設立聖心修院，開辦聖心育嬰堂（孤兒院）、嬰兒醫院和一所幼稚園。隨著社會發展，孤兒院和嬰兒醫院的服務需求漸漸減少，到了六十年代，代之而起的是托兒中心和凌月仙診療所服務。診所有醫生應診和嘉諾撒修女作護理服務，這服務維持至七十年代後期。曾在凌月仙醫院及診療所服務的修女

有六十年代的院長嘉撒諦修女（Sr. Giuseppina Casati，1909-1957）和七十年代的林瑞玲修女（1927-2020）。<sup>82</sup>

林瑞玲修女 1950 年入會，1958 年發永願，在接受護士培訓後，一生為嬰孩、病人和長者服務。她先後在澳門望廈和路環，以及香港明愛醫院、凌月仙育嬰院和堅道會院工作。退休後在堅道初學院培育年輕修女，繼續教授要理，幫助貧苦者，直至 2006 年因年邁退居到修會的安老院生活，至 2020 年病逝。



凌月仙嬰兒醫院需求減退後用作診療所  
（照片由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提供）

曾在凌月仙育嬰院診所求診的郭秀英女士撰文懷念林修女：年幼時父母忙於生計，如果她們姐弟三人身體不舒服時，已懂得自行到診所求診。診所一般不收費，需要使用昂貴的特效藥時才會問求診者能否付費。郭秀英回想「診所擠滿求診的病人，林修女用憐憫的眼光看著我們這群人。她和另一位修女默默服務，為我小心處理身上的毒瘡，給除膿和洗傷口，小小心靈感到溫暖，沒有半點痛楚。有一回弟弟因耳疾需要使用特效藥，付不起五元藥費，林修女也酌情處理，這樣貧苦大眾不會『無錢無藥醫』」。即使她們姐弟沒有病時，也愛到診所周邊玩耍，因

為那裡像一個安樂窩。「林修女全心地照顧窮人、憐憫病人和體恤貧困者，那份愛正是天主對人類的愛。她默默耕耘，在我們這些求診者身上播下天主愛的種子。」因著這份愛的種子，多年後郭秀英姊弟三人相繼領洗。

另一位求診者郭麗珠女士撰文形容林修女溫和誠摯、細心照顧傷患。「一次小腿燙傷，長了個極大水泡，林修女為我刺穿水泡後，塗上敷料。整個護理過程溫柔細緻，不會有絲毫痛楚，並且很快痊癒，心裡十分感激。」後來郭麗珠在堅道會院重遇林修女，分享信仰；她覺得林修女是信友的榜樣，最後在修女的鼓勵下受洗入教。<sup>83</sup>

### 3.5 香港仔漁民探訪

除了在西營盤區，嘉諾撒會的《紀事報》提及早在 1897 年修女們已在香港仔設立聖家會院，到了 1905 年修會獲政府撥地興建一間屋和一所學校，彼此相連，有學生五十人，同時間她們又開設了一間施藥所，以便派藥給那些窮苦的漁民。<sup>84</sup> 雖然施藥所和診所服務不像醫院服務那樣具規模，但對當時的窮苦大眾來說，這些免費的醫療服務和真誠的關懷是非常珍貴的。

談到漁民，他們無論出海捕魚或是回港靠岸時，一家人都是住在漁船、舢板上，對岸上的生活習慣和社會服務資源不甚了解。當患病時，覺得上岸求醫不方便，通常醫治方法是求諸神佛或水上人的民間醫術，如不見效才肯上岸求醫。這情況令很多漁民延醫治理，輕則受病患之苦，重則因病情惡化而失救。<sup>85</sup> 他們的漁船、舢板停泊位置並不固定，加上語言障礙<sup>86</sup>，無論是他們要找人幫助，又或慈善團體想給他們提供服務也不容易。在這文化下，嘉諾撒會能成功發展漁民探訪工作，背後全賴一個有趣的故事。

1925 年，年過六旬、患有關節炎的依美利亞修女（Sr. De Emilia Figueiredo，1865-1956）被調任香港仔聖家會院院長。她種植草藥，

製成藥物，在診所派發。在她期望接觸漁民但不知道從何入手時，「一位漁民太太到診所求藥時，認出依美利亞修女曾在灣仔醫院（聖方濟各醫院）照顧她，還在她瀕死時給她付洗。後來她康復了，返回自己的漁船，繼續忠於信仰。當時，她樂意成為傳教修女的嚮導和翻譯，把修女帶到漁船，漁民探訪就這樣開始了」。<sup>87</sup>除了在診所服務漁民，依美利亞修女是第一位親身到舢板上探望漁民家庭的嘉諾撒修女。有些舢板彼此相連，她就帶著救濟物資在舢板間往來探訪、慰問。很多漁民將她視為母親、老師、安慰者和指導者，在艱苦的生活中隨時都會去找她。1938年因年事老邁，加上辛勞過度，這位深受漁民愛戴的修女才卸任院長職務，退休養病直至逝世，享年九十一歲。<sup>88</sup>依美利亞修女熱心探訪艇戶的行動成了榜樣，到了五十年代，在筲箕灣服務水上艇戶的修女，甚至租賃一艘小艇定期探望窮困艇戶。<sup>89</sup>

### 3.6 筲箕灣嘉諾撒診療所

談及筲箕灣，早在1891年嘉諾撒會已該區設立聖若瑟修院，其後開辦女童孤兒院和學校，在1933年加設了筲箕灣嘉諾撒診療所。<sup>90</sup>1941年12月筲箕灣修院大火，修院損毀得不能再住，修女帶着孤兒到赤柱加爾默羅隱修院那裡暫住。二戰期間，修院先後被英軍、日軍佔用，又被強盜搶掠一空，學校、診所服務被迫停止。1951年診療所和學校重開，學校並註冊為政府資助的津貼小學，名稱為嘉諾撒修院學校。1963年，嘉諾撒會為配合社會需要，決定關閉診療所，騰出地方發展學校，為學童提供更多空間。由於東區走廊及地鐵工程的發展，學校應教育署要求，於1984年遷移至鰂魚涌，更名為香港嘉諾撒學校。<sup>91</sup>



筲箕灣嘉諾撒修院學校和診療所建築群，左上角可見海邊有很多艇戶。  
(照片由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提供)

當年在筲箕灣嘉諾撒診療所服務的有高修女（Sr. Francesca Colombi，1916-1990），1940年她在意大利發願後，考取了護理文憑，二戰時期在意大利的軍人醫院工作。1946年她被派往湖北漢口同樣被戰事摧殘的一個地方服務，1949年因政局改變而來港，先後在嘉諾撒醫院、凌月仙會院、香港仔診所和筲箕灣診所從事醫療工作逾四十載，探訪病人和照顧貧苦大眾。高修女極富愛心，經常有窮人向她求助和徵求意見，從小販牌照續期，到家中親友患病住院，又或推薦工作、尋求學校等等。即使她已離開診所到嘉諾撒醫院擔任副會長，這種請求仍然不絕，而求助者亦會送上鮮魚、雞蛋、活雞或蔬菜來答謝。後來高修女被調任堅道聖心省會院和九龍聖瑪利修院，1990年於香港逝世。<sup>92</sup>

#### 4. 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

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 SPB），簡稱「寶血女修會」，原是嘉諾撒仁愛女修會的第三會，由未婚華人女性組成，主要是協助不諳華語的意大利籍修女服務。最早的兩位成員譚瑪大肋納修女（又稱譚瑪達肋納，1829-1913）和譚亞納修女（又稱譚晏拿，1845-1901）被視為寶血會始創人。她們是於 1861 年經由嘉諾撒會神師穆神父（Fr. Louis Burghignoli, MEM, 1833-1892）推薦，得到香港監牧高神父（1874 年成為代牧區主教）的批准入會，最初借用嘉諾撒會會院一角的房屋作為會址。<sup>93</sup> 翌年，嘉諾撒會修女見二人表現「忠誠勤謹」，准許她們「轉衣進入初學」，即換上會服標誌成為修女的第一步。從 1861 年開始至 1922 年獨立前的第三會，是寶血會的孕育期，歷時六十一年，先後入會者達七十三人，可見其時華人女性教徒已有熱切獻身修道之心。為嘉諾撒會而言，第三會修女的出現對她們瞭解中國人的風土人情，文化習慣，以至與本地人溝通，都有莫大的幫助。<sup>94</sup> 第三會的修女在十九世紀中後葉，更已越過香港邊境，到屬於香港監牧區轄區內的大陸農村服務，高神父在 1872 年視察過後，印象極深：「這些修女們所做的善事是無法估量的。她們謙虛、專注、虔誠，從一個村莊傳到另一個村莊，教導女孩和婦孺，為她們準備洗禮……她們總是遵守法規，並嚴格地遵行。」在十九世紀末的鼠疫中，嘉諾撒會和第三會修女都參與了照顧病患的工作，最終兩位嘉諾撒會修女和第三會的亞納修女（Sr. Anna Pereira, 1845-1894）不幸染疫死亡，而第二位入會的譚亞納修女亦因感染鼠疫病逝。<sup>95</sup>

1890 年時，高主教頒令批准嘉諾撒第三會之規章，讓華人修女遵行。二十世紀初，天主教會推動地方教會本地化，時任代牧師多敏主教（Bishop Dominic Pozzoni, MEM, 1861-1924）於 1922 年協助第三會的傳教姑娘脫離嘉諾撒會獨立，成為第一個在香港誕生的國籍女修會，也是本港唯一的教區女修會，並委任譚加辣修女（本名譚英細，1868-1929）為首任總會長（會祖）。第三會成立之初，全無教會的經濟援助，是由初期加入的修女「帶產入會，自立自給」，累積成基金，

支持修會的工作。成為獨立修會後，修女們的經濟仍異常拮据，除在主教處支取修會每月五十元的存款外，其餘都是由修女修生「做工，劈柴，拾蜆，打餅等勞力工作」來彌補生活開銷。<sup>96</sup> 修會一直至 1929 年，才在深水埗元洲街有了自己的第一所修院，現稱為母院，以區別現時位於粉嶺的修會總部。

#### 4.1 寶血會的醫療服務傳統

在寶血會修女成立三十年後，修會起草的歷史中，明言其目標是使每位修女成聖和具有完美人格，致力從事教區的傳教工作，從而助人拯救和聖化自己的靈魂，而它們的達成是通過「教授要理、兒童教育、在醫院和診所照顧病人，以及在孤兒院中照顧孤兒的福利和教育等」。<sup>97</sup> 修會的精神是「自己是窮苦人（在知識、生活上都是）也與窮苦人密切生活在一起」。<sup>98</sup> 故此，修會為當時劃入「新九龍」的深水埗區為貧苦大眾提供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於 1931 年在元洲街母院樓下開設嬰兒醫院，收容貧苦患病的兒童，翌年又增設診療所，專為各區來就醫的貧苦家庭病童贈醫施藥。<sup>99</sup>



深水埗母院的兒童診所（照片由寶血女修會提供）

寶血會醫療事業的規模在短短數年間已接受達八千三百多名病人。她們服務人群眾多，不少金錢是用於嬰兒診所，卻受經費短缺之苦。會長譚德肋撒修女（本名譚小姑，1870-1957）於1933年致信給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Archbishop 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任期1922-1933）提到她們的艱難境況：「一九三一年又增設撫育嬰兒院一所施藥贈醫年中經費不少端賴在港修女平日工作並每年開辦慈善會一次所得二三千金。」<sup>100</sup> 因應居民的迫切需要，即使面對重重困難，譚德肋撒修女和後來接任會長的譚若翰納修女（本名譚賢姑，1876-1950）仍組成值理會，推動醫院的擴充計畫，於1934年開始籌款，同時向政府申請土地，終於1937年7月在母院旁邊建成寶血醫院。醫院規模雖小，只有約二百多張病床，仍提供了八張免費床位。在二戰期間即使情況繼續惡化，修女們仍堅持免費的醫療服務和藥物，不懈地為病人和傷患服務。<sup>101</sup> 當傳染病在1939年蔓延，醫務衛生署署長請求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altorta, PIME, 1883-1951）派出會英語的修女護士在九龍協助義務醫護工作，寶血會的華人修女、嘉諾撒會和瑪利諾會的修女都欣然答應。<sup>102</sup>



求醫者在寶血醫院門外大排長龍（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在 1941 年 12 月 8 日攻防戰首日，深水埗遭空襲，寶血會修院多處中彈但幸保安全。持續十餘天的轟炸，寶血醫院終究也被數枚砲彈擊中，「大門前外行人路中一彈，聖堂外騎樓底下中一彈，連大柱也削去一半」；戰亂中，傷者都被送往寶血醫院。<sup>103</sup> 12 月 21 日，醫院嬰兒部也中彈，二十名嬰兒失去性命。日軍轉移上百名修女、學生、修生及工友到聖德肋撒堂，醫院和修院由兩位老修女及一些工友留守。<sup>104</sup> 寶血會修女除了面對戰爭的壓力，還要應付數百名意圖掠奪的歹徒，又要繼續照顧無家可歸者和受戰爭所傷人士。在生計幾乎斷絕的情況下，修女們靠養豬種菜等勞動生產勉強維持。日佔時期，醫院被日軍徵用，同樣遭到破壞，待佔領結束歸還醫院時，全院已「面目全非，只留下空樓一座，都是破門爛窗和頹垣敗弄瓦」。<sup>105</sup> 與香港社會和天主教會一樣，寶血會的修女只有努力在戰爭殘局中重新站起來。

## 5. 瑪利諾女修會

早在美國的瑪利諾男修會成立之前，年輕的瑪利·若瑟芬·羅澤斯（Sr. Mary Josephine Rogers, 1882-1955）為想成立一個傳教學會，便向傳信會主任華爾實神父（Fr. James Anthony Walsh, MM, 1867-1936）請教而成為好友。華爾實神父就是瑪利諾會兩位創辦人之一。在男修會於 1911 年 6 月成立後，羅澤斯和另外三位女士成為了這個外方傳教會的首批義務秘書，協助編輯和翻譯《遠方》（*The Field Afar*）雜誌等傳教工作。約半年後的 1912 年 1 月 6 日，這批有時被稱為「瑪利諾的女士們」（the Ladies of Maryknoll）的女性，也組成了瑪利諾女修會（Maryknoll Sisters, MM），由華爾實神父委任羅澤斯為這些女青年的「家長」，並給她取教名：瑪利·若瑟（Mary Joseph）。她們不久後亦遷往紐約奧塞寧，即現今的瑪利諾會總部。1913 年，這個秘書團正式起名為「瑪利諾的德蘭秘書團」。經過三次申請，羅馬於 1920 年終於承認她們為教區修會，名為「聖道明傳教女修會」（Foreign Mission Sisters of St. Dominic），是美國首個修女團體從事海外傳教。1921 年 2 月，瑪利·若瑟與二十二位修女一起宣發初願，同年 9 月，第一批六位修女便啟程到中國。<sup>106</sup>

她們的目的地是廣東和廣西，協助已在當地傳教的瑪利諾會士。瑪利諾男女修會相比其他源自歐洲的修會更遲起步到海外傳教，一方面是美國國內基督新教的影響巨大，美國人「對於任何涉及『教宗制度』的事物都十分懷疑」<sup>107</sup>，這亦使外界對美國的天主教會有所懷疑；即使在美國教會內部，在梵二前的保守思想下，修女離開修道院圍牆的保護，直接走出去福傳也不為人接受。另一方面，到中國傳教的天主教修會以歐洲為主，教廷是遲至 1908 年才把美國從傳教地區的名單剔除。<sup>108</sup> 此舉意味美國不再是接受傳教士，而是可以派出傳教士的一個地方教會。即使如此，許多人尤其是梵蒂岡裡的人，懷疑美國女性能否承受東方的嚴酷生活。不過，1939 年，教廷傳信部伯多祿·富馬索尼-比昂迪樞機（Cardinal Pietro Fumasoni-Biondi，任期 1933-1960）致函總會長，讚揚修女們「表現了勇氣和奉獻精神」，激勵了她們。<sup>109</sup> 她們的

努力也沒有白費；1954年，修會獲批准成為宗座機構，名為「聖道明瑪利諾女修會」（Maryknoll Sisters of St. Dominic），通常稱為瑪利諾女修會。

## 5.1 廣傳福音人人有責

會祖瑪利·若瑟修女認為到海外傳揚天主教信仰的責任，男性和女性是一樣的。對此一任務，修會的願景是聚焦於女性賦權、團體建設，以及正義和平的行動，並且堅持認為自己「不是初代的女性主義者，而是信仰的尖兵」。<sup>110</sup> 為達成這個使命，瑪利諾修女都受過高等教育，她們要麼在入會之前已擁有高等學歷，要麼是在培育期接受學位教育；在服務多年後，亦會重返校園攻讀更高學位，因為修會認為傳教士應對傳教地區的人民有幫助，能提供本地人所需的服務和專業技能。<sup>111</sup>

秉持著女性也可宣揚福音的信念，瑪利諾修女踏上了首個海外傳教征途，於1921年來到香港。不過，她們起初並沒打算在香港開展工作，只計畫開設總務處和一個落腳點，讓進入內地各個傳教區的修女有個地方好作準備，亦因此總會沒有提供她們在港的生活津貼。由於各傳教區空缺有限，為解決在香港生活的燃眉之急，她們開始了教育事業和製作祭衣的工業部，因為教育是她們的「其中一項主要傳教事業」，而工業部則可讓她們與其他婦女接觸。<sup>112</sup>

雖然傳教是首要任務，「有形哀矜」（corporal works of mercy，可見到的善行）的醫療工作一直是、且仍然是她們傳教的「一個重要策略」。<sup>113</sup> 歷史學者蘇珊·瑟曼（Suzanne Thurman）指出，這策略或可從瑪利諾男修會去理解，他們的傳教士接受基本醫學訓練有三重理由：1）醫學知識可讓傳教士注意到自己的健康；2）醫療照護可為他們與華人建立良好關係，最終打開皈依大門；3）與早已在中國建立根基的基督新教傳教士競爭。

此外，在下一章瑪利諾男修會一節會提到，當時修會醫療事業的重要推手帕呂埃爾·弗拉格醫生（Dr. Paluel Flagg）。他本身也希望成為傳教士，雖然被勸打消念頭，可是他的動力深深影響了自己的女兒，後來加入了瑪利諾女修會。<sup>114</sup> 當時《遠方》雜誌亦經常提及基督教醫療傳教的成功，提倡需要在中國開設醫院和施藥所，所以第二批來華的修女之中就有了護士。1923年，會祖瑪利·若瑟修女首次訪問中國大陸，看到民眾的苦難後，深信更多修女應該接受先進的醫療訓練，護理學自此成為瑪利諾修女的一項重要專業，因為相對於成為醫生，護士訓練期較短也沒那麼昂貴，在當時來說女性成為護士也相對為社會接受。<sup>115</sup> 這解釋了修會在港踏足醫療系統的背景，不過她們的第一次嘗試卻是失敗而回。

## 5.2 首度嘗試踏足香港醫療系統

1924年10月16日，立法局討論到九龍醫院可於翌年7月啟用之時，首次提到已撥出部分經費作為聘用由瑪利諾會提供的職員。<sup>116</sup> 天主教修女在公立醫院服務一事，有說是宗座代牧師多敏主教幾年前向政府提出的。<sup>117</sup> 在1924年10月，本地會長馬保祿修女（Sr. Mary Paul McKenna, 1888-1984）將政府與修會未簽訂的合同寄送給美國的總會長過目，細節包括醫院需八名護士，由修會派出修女，政府發月薪聘用；醫院不是傳教地方，修會要對修女的行為負責等。<sup>118</sup> 然而，此事一經報道，收到大量關乎「宗派和愛國」的反對聲音，使聘用之事成為「整個殖民地而不再只是關乎九龍區的問題」。<sup>119</sup> 雖然政府事前曾諮詢過主要是由外籍精英組成的早期政治組織「九龍居民協會」，得其同意，僅要求不能在醫院傳教。然而，事件曝光後，九龍居民協會向政府提交六百一十名英籍居民的請願書，要求收回成命。在《南華早報》讀者來函中，可看到不少讀者認為，當英國有數以千計女性失業，她們同樣有能力和意願去管理一間醫院，港英政府卻聘用美國的修女，引起「憤慨是很正常」。<sup>120</sup> 政府最終於12月立法局會議上，表明取消聘用計畫。在事件落幕後，馬保祿修女一直至1925年3月19日才在報章上作出回應，顯然委屈地指出，雙方還未簽訂合約之下，政府要撤回邀請是符

合正當程序，但認為僱主和僱員的義務不盡相同，修會是犧牲原本的意願來提供服務，卻被指懷有「幻想的野心」，故此認為要表明她們的立場「顯然並非多餘」。<sup>121</sup>

### 5.3 初次投入診所服務

可幸，九龍醫院事件沒有讓修女們在醫療服務上或與政府的合作上止步。從早年的報道可見，修女們在戰前曾服務於九龍城隔坑村道防癆診所。隔坑村道是位於九龍城石鼓壟道右邊的一條馬路（約現今石鼓龍道遊樂場位置），天主教會在 1937 年也曾在該路段上建有聖方濟亞西西堂。

該診所是首間由華民政務司署及九龍城華人公立醫局在貧民區開辦的防癆診所，每天下午應診，周三和周日除外。在戰前，政府在九龍區只營辦一間九龍公立醫局，其餘的醫局皆由華人士紳組成的華人公立醫局成立和資助。<sup>122</sup> 九龍城華人公立醫局本身於 1905 年成立，1932 年遷往隔坑村道。當時因居住環境擠迫、衛生意識欠佳，加上生活艱苦，人們普遍營養不良，香港正經歷一波肺癆疫症蔓延。1936 年因結核病死亡者達二千四百多人，佔整體死亡人數 9%，1938 年死亡人數已差不多翻倍至近五千人，約佔整體死亡人數 13%。<sup>123</sup>

由於當時沒有藥物可治癒肺癆，診所得藥商捐贈魚肝油，以增強病人的抵抗力。<sup>124</sup> 單是 1940 年 4 月底至 6 月中，診所診治了一百五十八名病人，但三份之二的個案並非肺癆。病人中一百三十七人為成人，其餘為小孩，而性別方面，女性九十七人，男性六十一人；<sup>125</sup> 1941 年，單是 8 月便診治了一百三十二宗肺癆個案，四十三宗為新症，部分病人甚至來自新界。<sup>126</sup> 除了診治，兩位醫生陳可安修女（Sr. Maria Corazon Jaramillo, 1909-1998）和黎安德修女（Sr. Antonia Maria Guerrieri, 1907-2008）會做預防教育，平日還會去探望那些病人。由於肺癆會傳染，陳修女指出：「我們看到他們嘗試與家人隔離，但這經常造成誤會和增加開支，最終形成日常的壓力。」<sup>127</sup>

陳修女 1938 年宣發初願後派到中國服務，她先來港作準備之時，便擔起此一診所的運作，直至戰爭爆發，因為菲律賓人的身份不用關押到赤柱拘留營，而轉移至澳門。黎修女於 1938 年宣發永願後到港，為進入內地福傳學習兩年中文，於這段時間在診所服務。

上述提到 1940 年的統計是診所第一次提交報告的內容，故診所開辦時間應為 1940 年 4 月。戰時陳修女被迫離港，九龍城醫局以及聖方濟亞西西堂皆被日軍炸毀，隔坑村道在日軍擴建機場時亦遭夷平，修女主理防癆診所的時間可能只有一年左右。除了上述兩位修女，戰爭的開始為整個女修會的安全和運作都帶來了嚴重的挑戰。

## 6. 戰時及日佔時期的教會醫療服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及日本佔領時期（1941-1945），香港天主教會因傳教士的不同國籍而變得複雜，來自意大利、美國、愛爾蘭、法國等地的傳教士，因自己所屬國家為敵對參戰國而受到牽連。醫療設施也受戰火波及，不是被摧毀就是被迫關閉和被掠奪，服務大受影響。在淪陷前夕，從部分修會留存的珍貴記錄，可了解到當時非常緊張的形勢。

在 1939 年備戰前夕，政府在港九兩地提供居家護理和急救的密集課程，十六名瑪利諾修女登記在九龍區上課，3 月 23 日是首晚的課程，其中五人在半年後被傳召穿好制服到瑪利諾修院急救站作演練。同年 7 月，政府原本打算將她們的學校闢作軍事用地，但修女致函港督提出將之作為戰時醫院，由修女擔任醫生和護士，有關建議獲得採納。<sup>128</sup> 1941 年 12 月 8 日，香港攻防戰開打當天，亦是教會隆重的聖母無原罪瞻禮日，許多人聽到轟炸消息之時，還在猜想是否在備戰演習，「不知道該是驚訝還是害怕」。<sup>129</sup> 在持續的十八日戰事至 25 日港督楊慕琦簽署投降書為止，氣氛最為緊張。

據瑪利諾修女的記載：「急救設施已拿出來和安裝好……輔助護士（約二十人）陸續來到，到了中午，我們的急救站已準備好接受病人。一隊軍人把床鋪搬到一樓兩間有木門的房間作為修女的宿舍，而一樓的其他房間則分配給輔助護士、聖約翰救傷隊、（男）醫生等人。每位修女把必需品放好在行李箱，準備在必要時離開，當不穿制服和白帽時，便穿上灰色綿質會衣。我們以八小時一更輪值，但就只有兩名病人，因為沒有提供救護車把送傷者前來」。<sup>130</sup> 這個急救站隨英軍退出九龍，於 12 月 11 日解散。在 1939 年已被政府徵用作醫院的喇沙書院，此時仍有逾二百名外籍和華人醫護人員及工人駐守，但沒多久便被日軍佔據，將校舍變為倉庫。在 12 月 21 日，日軍帶來了七百名大多受了傷和患了病的戰俘，瑪利諾修女中的兩位護士和一位醫生獲准照料他們。<sup>131</sup>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營辦的聖保祿醫院在備戰期前已被政府徵用，當戰事一開始，位於銅鑼灣的整個聖保祿機構建築群變成了醫院和難民中心，甚至學校課室也成了手術室。由於聖保祿機構建築群處於軍事區域中心，曾受日軍和英軍二百多枚砲彈襲擊。日軍佔領後，醫院被接管，以華人護士取代英籍護士，除了三名歐籍醫生和護士，其餘人等被囚禁於赤柱拘留營。<sup>132</sup> 修會在薄扶林太古樓的診所和學校則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被迫關閉，學校和診所的服務也隨之終止。<sup>133</sup>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亦被召喚作好準備，到被徵用作醫院的喇沙書院照料傷者。同樣被英軍徵用的嘉諾撒醫院，被砲彈擊中不下十六次，在 12 月 22 日更是遭到嚴重損毀，是嘉諾撒會第一個遭到破壞的建築物。此外，其筲箕灣會院因火災不能再居住，修女離開後，會院、診所和學校的物資被搶掠一空；在紅磡連同聖德學校及診所的會院被炸後，亦遭搶掠的命運。<sup>134</sup>

在攻防戰期間，受邀來港辦教育的愛爾蘭耶穌會士在民間組織中擔起一些異於平常的任務：有醫生資格的紀啟智神父（又稱簡力達，Fr. Gerald Kennedy, 1889-1949）擔任聖德肋撒醫院的專職司鐸，而四名會士則被派登上救護車，與駕駛員同行，以安定他們的心神。<sup>135</sup> 紀神父加入耶穌會之前是在愛爾蘭行醫，後來在廣州方便醫院任主管，並發明醫治傷寒病人的藥物。<sup>136</sup>

## 6.1 日佔時期的醫療環境

日軍在佔領第二天便提出衛生防疫由第二十三軍特務機關掌管，又將瑪麗醫院、東華東院及日人開設的馬島醫院改為戰地醫院，此舉純粹出於軍事考量，民眾的醫療需求並非其關心之事。<sup>137</sup> 在艱難環境中繼續服務患病和受傷的普羅大眾的責任，便落在聖保祿醫院、嘉諾撒醫院等天主教醫療機構和其他團體興辦的醫院和診所身上。但它們亦非自由運作，像聖保祿醫院，日佔政府只允許院方接收少量華裔平民，加上物

源短缺，物價飛升，院方曾兩度向虎標藥廠申請貸款來購買糧食，維持日常運作。<sup>138</sup>

1942年，日佔政府才基於「國家權力有必要介入個人衛生範疇以建設社會國家」的想法，採取由上而下的管控方式，從醫療管理、防疫運動及環境衛生三方面實施明確的醫療衛生制度。<sup>139</sup> 其採取的措施包括：開放了十五間公立醫院及醫局讓市民就醫，提供內外科診治；又在一些區政所設置由義務醫生當值的義診所。例如在當時稱為 **Aobadani District Bureau** 的跑馬地區政所，就有由有錢居民捐助藥物經費的義診所；由銅鑼灣區政所開辦的免費診所，有八名西醫及六名中醫讓市民憑票看病，並可獲免費配方藥物。<sup>140</sup> 不過，到了戰事後期，為節省成本，日佔政府於 1944 年 8 月改推公醫制度，將醫療責任推給地方醫生。<sup>141</sup>

此外，1942 年 8 月推出的〈醫師、齒科醫師令〉，西醫和牙醫執業須向香港日華醫師公會登記；此制度亦推廣至中醫，要求他們須向總督部香港中醫學會登記，「開香港規範中醫師之先例」，不合資格者須立即停業。<sup>142</sup> 但由於外籍西醫因戰爭離開，執業醫師實際已不多；登記中醫雖約有千餘人，苦無藥品可用，診金亦隨之上漲，即使是救護車，全港也只有兩輛。為付擔不起診金的市民，保濟丸、七星茶、止痛散熱片、奎寧片（金雞納霜）等中西成藥便成為救命藥。<sup>143</sup> 不過，自歐洲 1939 年戰火爆發，而內地同樣風火不息，軍民受傷者眾，紅藥水、金雞納霜等有求過於供之勢，藥物售價得以水漲船高，媒體形容是本港西藥生意的「黃金時代」，六七間大型西藥行每家獲利二十萬元以上，小型行號也獲利數萬，更何況到了物資各樣都短缺的日佔時期。<sup>144</sup>

在防疫運動及環境衛生方面，其時，市民大多患有營養不良，流行病主要為傷寒、霍亂、瘧疾。為防止疫病流行，日佔政府在各處設有注射站，不能出示注射證書者，會被迫接種疫苗。此外，在口岸亦設有驗便站，男女老少必須脫褲驗糞，連憲兵隊也沒有特權。<sup>145</sup>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日佔時期醫療管理的李威成指出，日佔政府對霍亂的防疫是先寬後嚴，後來推行至流動性高的艇戶，並以全民注射為目標；加上日方

曾在調查中知道普遍嚴重的病情是與營養不良相關的腳氣病，卻特意重視霍亂，「背後應該存在其他原因多於醫學實際上的考慮」。<sup>146</sup>另外，因為傳染病流行，專業人員流失，醫療需求有增無減，日佔政府不得不開設護士培訓班，以增加人手。<sup>147</sup>

戰時的苦難往往使社會大眾比較齊心，大大小小的組織團體紛紛出錢出力為市民服務。例如，作為香港最大慈善醫療系統，東華三院當時因缺乏經費，組成「突擊勸捐隊」晝夜出動，在大商號和大型娛樂場所外募捐。<sup>148</sup>本地人可能甚少注意的「香港紅卍字會」也在港島和九龍營辦兩間贈診所，每天平均照顧二百名病患。即使在戰後，這個發源於內地、於 1931 在香港成立的分會，基於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的宗旨，仍維持其在天后皇龍道會址的義診服務。據 1948 年 1-7 月的統計，贈診所治理近八千人，其中包括近四千名小童。<sup>149</sup>今天，該會仍提供普通科、眼科和牙科義診服務，作為永久志業。

值得一提的是，據資深報人謝永光指出，戰前的西醫像中醫一樣，只收診金，由病人自行到藥房配藥，所以有些稍具規模的藥房都配有藥劑師。香港淪陷後，盟軍將日本佔領區列為禁運的敵區，導致西藥缺乏，醫生得自行配藥給病人，改變了往昔的做法，至今亦然。<sup>150</sup>

## 6.2 拘留營中照顧病人

至於香港天主教會，代牧區內有不同國籍的傳教士，在戰前及日佔時期的際遇都各有不同，教會活動幾乎完全停頓。當時教會領導層為意大利籍的宗座外方傳教會士，由於意大利與日本是同盟國而得以有活動的自由，繼續在包括醫療等方面服務。至於英美傳教士，就大多被關押在拘留營。不過，即使在拘留營內，他們沒有忘記自己使命和方向，用僅有的物資，照顧營內病人。

作為代牧區最高負責人，意大利籍的恩理覺主教沒有被拘押，並

受命於教廷繼續留在香港，盡量爭取避免教產落入日軍手中。<sup>151</sup> 1942年，恩主教致函日本外務部，表示收到教廷駐日公使指示如何使用教廷匯款救濟戰爭受害者，問及可否給予戰爭受害者分發醫療及物質援助，並以宗座代表身份探望拘留於赤柱的人士，贈予每人一份包裹作禮物。雖然他收到的回信列明款項分配給英籍日籍傷者、戰俘和赤柱拘留者，但《香港日報》卻報道，該四萬五千元救濟金是梵蒂岡專為日本傷兵的援助，日方代表佯裝不知情，經恩主教抗議才作更正。受惠者除了直接分發給不同種族和宗教的人，「很多為貧病者而設開設的診所亦得到資助」。隨著日元於 1943 年開始貶值，物價飛升，貨幣兌換太低，恩主教通知教廷不值得再匯款到港，本地教會只得變賣資產維生和還債，其後幸得印度祆教恩人捐助二十五萬日圓債券，方可繼續幫助貧苦大眾和診所。<sup>152</sup>

香港淪陷之時，同盟國約有三千公民在港，二千五百人被關在赤柱由懲教人員宿舍、學校、會所、大樓改成的拘留營。他們當中四百五十人是天主教徒，包括近六十名神父、修士和修女。雖然恩主教出面請求日軍不要拘留他們，但不得要領。由於美國人稍早已被拘留，可以佔用到較舒適的懲教人員宿舍，並有會所可開彌撒和作其他宗教和消閒活動。原本住在擠迫臨時營房的修女，後來也搬到此類宿舍，居住情況得以改善，甚至有房間可作小聖堂，並在下午對外開放，使拘留者有堅持下去的精神力量。<sup>153</sup>

這些外籍神父修女大多在一年內，以交換被拘押日本人的方式，獲遣返本國或回到香港的傳教單位。當中，瑪利諾會的蕭神父（Fr. Donald Hessler, MM, 1912-1995）和馬奕猷神父（Fr. Bernald Meyer, MM, 1891-1975）卻自願留下照顧營內的其他人，一直生活至 1945 年 8 月佔領結束，並對營內生活作出詳盡紀錄。其時，瑪利諾會已下令，所有會士一律要離開佔領地區，馬神父在自述中指出，二人是自意大利傳教士不准入營後，「自行決定暫時放棄自由」，認為教會的命令是可視乎牧靈需要而應變。<sup>154</sup>

在營內的日子尚算自由，可以每天開彌撒，組織聖詠團、教道理，但物資短缺令生活艱苦，尤其是極需要營養的病人。初期恩主教可以把梵蒂岡匯款寄來，讓馬奕猷神父購買雞蛋給病人。隨著善款越來越少，後來日方不准外間送來津貼和善款，神父們便在營內籌款，甚至把物品賣出，用來購買雞蛋粉，或把錢分給比較窮困的人去購買食物。在這期間，他們有一年沒有魚肉供應，有半年缺乏麵包。在艱難的情況下，女教友義務把雞蛋粉加入米漿使其黏稠，以海水代替食鹽，煎成卷蛋送給病人。病人之中，有十四名肺癆病人，住在一間大院裡療養，能獲得一塊卷蛋就成了他們每日的頭等大事。孕婦亦因吃了雞蛋粉，營養得以補充，誕下健康寶寶，一改之前一些孕婦因紅血球過低，又沒有藥物可用之下，作出墮胎的決定。這些舉措使「馬神父的雞蛋粉」在營中成為佳話，而他和蕭神父都同意，拘留營的生活「是天主給我們的一大恩賜，是彼此都不願意忘懷的一份經驗」。對於營內受患者，從天主教聖多默謨爾會主席麥法迪恩先生（Mr. MacFadyen）戰後在致恩主教的信函附上的致謝人士名單，可看到大家對兩位神父在營中花很多時間和精力以不同形式「為準媽媽、癆病患者，與其他病人購買營養食物」等服務，感激不盡。<sup>155</sup> 這段特殊的服務，雖非專設診所來治療病人身軀，但卻仍然是教會關懷病人的體現。

### 6.3 在拘留營外的教會

對比上述拘留營能舉辦的不同活動，營外的教會人士和平民的生活一點都不容易。或許正如布雷恩·埃德加（Brian Edgar）所說，在日軍佔領下，「拘押相比自由反而更為有利」。<sup>156</sup> 確實，起初市區的情況較赤柱為佳，不過，隨著食物短缺惡化和憲兵隊翌年開始的恐怖統治，赤柱的不自由反而比在市區的自由更加安全，起碼「配給供應較為肯定，無理拘捕的可能性很小」。<sup>157</sup>

正如前述，外籍傳教士的國籍令他們的處境變得複雜。日佔政府將民眾分為三類，與日本結盟的軸心國國民是友人，交戰國家的國民是敵人，而沒有參戰的國家公民是第三國國民。這種複雜處境在備戰時期其

實已顯露出來：宗座外方傳教會士因為他們的意大利國籍曾被英軍短暫拘留，後來在日佔時期則因意大利是軸心國而享有行動自由。同樣來自意大利的嘉諾撒會修女雖然也享有這樣的方便，仍經常擔驚受怕，尤其法西斯意大利政府被推翻後，又隨時變回日本的敵人。後來她們得到恩主教保證，神父修女不會被送去拘留營才安心下來。<sup>158</sup>

在日佔時期，約有百人聲稱自己的愛爾蘭身份而免受拘留，其中六十人是修會會士，以耶穌會士佔最多。然而，他們因為是白種人又屬於英聯邦國家，並非一開始便獲得日本人承認他們作為中立的第三國國民身份；即使承認，也被要求答允不做出對日本不利之事。<sup>159</sup> 整體而言，特殊的第三國地位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好處，因為他們同樣要忍受漫長的饑餓、憲兵隊經常的監視和對所有人施加的恐懼，以及對少數人的拘捕，包括蔡伯德（Fr. Patrick Joy，1892-1970）及祁祖堯（Fr Gerard Casey，1905-1989）兩位耶穌會神父不停地接受盤問。<sup>160</sup> 據說，蔡神父因為以希臘文寫日記被懷疑是間諜。<sup>161</sup> 不過，身歷其境的一些耶穌會士認為，相對起來，「大多數中國人所遭受的恐懼，比歐洲人所感受到的恐懼要嚴重得多」。<sup>162</sup>

雖然日本總督部宣稱的方針是尊重宗教以安定民心，但日軍大多對基督教有保留甚至有敵意，未能真正落實。佔領時期被派來港兩年半的日籍基督教牧師鮫島盛隆在回憶中提及，宗教聖堂被用作辦公室或俱樂部，早已不以為然，但彩色玻璃被嫌礙眼而要拆除，禮拜堂改作馬廄，甚至九龍城浸信會也險些成為慰安所，使他痛心，幸而此事令參謀長震怒而被制止。<sup>163</sup>

至於一般民眾的生活就更不在話下，即使砲火已停止，幾十萬人口面對生活物資短缺，在 1942 年 5 月時平均每天有七百人餓死，使得「民面有饑色，野有餓殍，街巷且常見有無人照顧的遺屍」，死者不僅是無家可歸者，連沒錢埋葬親人的家庭也會暗地遺棄等「屍體搬運車」來免費處理。<sup>164</sup> 物價騰漲，民眾三餐不繼，連身為日本人的鮫島牧師也「時常感到腹饑難忍」；在佔領後期，甚至有人見到日本軍人在街上撿起蕉

皮來吃。<sup>165</sup> 後來更出現謠言說，有些窮人「已餓到搜捕犬、貓、或鼠類而食，更有甚者，還吃人肉」；這個謠言在嘉諾撒會黎義德修女（Sr. Ida Sala，1922-2014）為修會所撰的歷史中亦有提及。<sup>166</sup> 她記載的日佔時期歷史，也經常提及修會面對無米之炊的困境，畢竟除了修女本身的團體，她們還有一大群孤兒和避難民眾需要照顧。可幸，她們與聖保祿修女會及其他慈善團體一樣，得到虎標藥廠多次幫助，以低於市價出售或免費送贈白米，又捐出可觀善款，使她們能持維生計和服務。<sup>167</sup>

行動相對自由的嘉諾撒會修女沒有完全停止為基層而設的診所醫療服務。修女們為逃避戰火，帶同她們照料的小孤兒到赤柱加爾默羅隱修會暫避，其間嘉諾撒修女於 1942 年 6 月在赤柱興辦起一所診所，有大量的民眾求醫，日人亦尊重這位「歐洲醫生」。<sup>168</sup> 至於修會在上水古洞擁有的聖依西多祿農場（St. Isidore's Farm），附近華人鄉民稱之為「意大利農場」，用來種植食物供應給修會照顧的幾百名住宿者。修會於 1942 年 8 月在該處開設聖依西多祿會院，日軍政府把鄰近的公立何東夫人醫局委託給修女主理，並為她們準備好床、櫃及椅子。<sup>169</sup>

此外，聖保祿女修會在九龍的聖德肋撒醫院被日軍接管，修女們在醫院附近的窩打老道將一個私人住宅權充臨時醫院。<sup>170</sup> 在日佔初期，日軍「八島」部隊徵用了寶血醫院作臨時軍用救護中心，至 1943 年交回時，「只得一毀爛之屋殼」。<sup>171</sup> 寶血會由於修女人口眾多，並因不忍坐視棄嬰不救而在母院臨時設置收容所，使得她們的生活同樣掙扎求存，唯有靠變賣物資及養豬種菜來幫補生活費用。恩理覺主教在戰後憶述會長當時告訴他：「主教，我最多只有三個星期的糧餉，可供三百人用；米價差不多要二百日圓一斤，而我只有二萬日圓」，他唯有請她「變賣所有能變賣的東西，借錢，或將修院按揭，總之，要繼續下去，主會供給我們所需的」。他承認心裡當刻其實是「看不到甚麼轉機」。<sup>172</sup>

## 6.4 戰事結束再次動盪

盟軍反攻之際，前三年相對的平靜在 1945 年再次動盪起來，1 月中便有砲彈不停落下，惶恐的嘉諾撒會修女為堅道會院的各個服務點和建築，選取一位聖人作守護者，並祈求會祖真福守護嘉諾撒醫院寄宿學校等。<sup>173</sup> 聖保祿機構建築群又再次被誤炸，只有醫院主翼大樓和聖堂倖免於難。<sup>174</sup> 兩年前獲釋的瑪利諾古如秀修女（Sr. Mary Eucharista Coupe, 1905-1997）憶述港島區街上的光景時指出，越是「接近聖保祿醫院和北角海傍，即日軍首次登陸香港的地方，越多戰爭損毀的痕跡」。<sup>175</sup> 到了 2 月中，英美軍機每十五分鐘空襲一次，寶血會母院對面菜田中彈爆炸，震裂修院、聖堂及醫院的所有窗戶，是戰事中「最受驚惶的一幕，損失又是最慘重的一次」。<sup>176</sup>

據耶穌會賴詒恩神父在《一百年的故事：宗座外方傳教會在香港 1858-1958》（*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Foreign Missions, (P.I.M.E.), in Hong Kong, 1858-1958*）一書中指出，在日軍侵略內地和香港期間，代牧區裡的傳教士「看著他們的建築物被搶掠和摧毀，個人財物被拿走。逾三十座教堂和教會建築物完全摧毀，只剩下幾面牆，其他的遭受嚴重的損壞」，傳教士亦成為唯一可把救援藥物帶到內地村落的人，使他們獲得村民甚至強盜的尊重。<sup>177</sup>

1941-1947 年擔任耶穌會香港省會長的蔡伯德神父 1945 年 8 月致函耶穌會總會長時提到：「戰後是一個充滿壓力和焦慮的時期——主要是對食物和金錢的焦慮，兩者都非常匱乏。銀行只允許很少額的提取，而食物價格卻是正常的七倍、八倍、十倍」，當時全部會士體重「平均掉了三英石」。<sup>178</sup> 由此可見戰後初期，社會仍然艱難萬分，而天主教會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與香港社會一起開始艱鉅的重建工作。

## 小結

天主教自立足香港便已投入醫療服務，作為一種傳教使命，並且秉承教宗的訓示，投身醫療工作。因為教會清楚意識到，遵從救主耶穌先醫治病人的善行，最能贏得人心。然而，礙於神父肩負司祭職責，未能同時兼顧繁重的醫療工作。將醫療服務交由女修會負責，成為這段時期最簡單和最好的選擇。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華人居住環境擠迫，衛生情況惡劣，華人婦女的健康不受重視，連帶嬰兒的死亡率也很高，當 1894 年鼠疫爆發，便成為了極為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這場疫情雖然導致許多人的死亡，亦同時促進了對西醫的發展。除了政府主導的發展，以排擠中醫，華人公立醫局的配合，基督宗教與西式醫療的密切關係，間接也成為了重要推手。

在 1890-1946 年間，共有四個女修會提供西式醫療服務，計有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嘉諾撒仁愛女修會、耶穌寶血女修會及瑪利諾女修會。在 1975 年名為《香港教區修女狀況調查報告》的調查中，撰寫報告的瑪利諾會德蘭寧修女（Sr. Joan Delaney, 1930-2022）將前三個修會歸類為「通才」（generalist），因為她們一開始便從事當時有最迫切需要的工作，而非經過詳細規劃。<sup>179</sup> 例如，聖保祿女修會最初是開設聖童之家照顧孤兒，因為鼠疫的爆發，「修女即時作出反應，在毫無計劃下」正式踏入醫療事業。<sup>180</sup> 這三個修會是本港女修道人中的主力，即使時至 1975 年仍有共三百七十七人，佔全港修女近 50%。<sup>181</sup> 她們也是天主教醫療服務的主力，以興辦醫院為主，在醫院附有診療所，以及在個別會院附設學校及小型診所，所以對診所的紀錄相較醫院為少，只有片言隻語。

聖保祿修女來港初期，更因與宗座監牧就業權產生爭議，一度撤出香港，只維持有限服務，極大地影響了修會在十九世紀的發展，所以她

們的服務和地理分佈都集中在港島區，要到 1930 年代才擴展至九龍區。稍遲至 1860 年到港的嘉諾撒會，因與管理香港天主教會的宗座外方傳教會同樣來自意大利，被視為有先天優勢。所以她們接手管理聖方濟各醫院和興辦自己的醫院之外，比較早在港九沿海的不同地區設置診所。至於寶血會，1922 年脫離嘉諾撒會獨立後，與原來的團體一樣，從事照顧孤兒、病患和開辦學校等服務，診所亦是依附在醫院。三個修會的服務反映了天主教講求身、心、靈的關顧，所以除了信仰活動，醫療對身體照顧，教育對心腦智力的照顧，成了「通才」服務的重點。

在 1920 年代至戰前來港的瑪利諾女修會、安貧小姊妹會、天神之后傳教女修會、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加拿大）、加爾默羅赤足女修會當中，只有 1921 年到港的瑪利諾女修會，從事醫療服務，並基於傳教策略，派遣前來的修女都擁有本地所急需的醫療技能。可惜她們到九龍醫院聘任之事告吹，這一時期未有在香港的醫療服務上有多大的發展，只協助一間肺癆診所。

及至戰時及日佔時期，莫說天主教診所，連天主教醫院也大受影響，部分服務被迫終止，可以持續運作的機構，又要面對巧婦難為無米炊的困境。來自不同國家的教會人士更受本身的國籍連累，部分人被拘押。在生存都受到威脅之下，這段時間的紀錄更為零碎。

在這段時間，聖雲先會作為信友善會在醫療服務上的角色，實際上也出現了，不過只是以金錢捐助醫療機構及病患。

## 註釋

1. Tom Solomon, "Hong Kong's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Vol. 31, No. 4 (July/August, 1997): p.458.
2. 鄭寶鴻：《香港華洋行業百年——工業與服務業篇》（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及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附圖。
3. Dr. G.H. Chao,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Hong Kong," in *The Medical Direc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Medical Societies of Hong Kong, 1970), p.21.
4.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2018），頁24。
5. 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1841-190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6期（2015年12月）：頁82-83。
6. 〈香港第一位華人西醫〉，《基督教週報》，2004年2月29日，頁4；及〈中國第一位西醫誕生記〉，《中國青年報》，2015年12月2日。
7. 胡哲翰：〈黃寬（1828-1878）〉，見《基督教史人物傳記》網站，<<https://bdconline.net/zh-hant/stories/huang-kuan>>
8. 胡哲翰：〈黃寬（1828-1878）〉。
9. 梁卓偉：《大醫精誠：香港醫學發展一百三十年》（香港：三聯書店，2017），頁192-193。
10.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頁11。
11. 梁卓偉：《大醫精誠：香港醫學發展一百三十年》，頁192-193。
12.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頁25。
13. 田英傑著，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1983），頁52-53。
14.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294。
15.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30。
16.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53。
17.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294-295。
18. 聖母聖衣堂編：《天主足跡在灣仔》（香港：聖母聖衣堂），頁7。
19. 夏其龍：《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294-295。
20. "Despatch Respecting the Payment of a Roman Catholic Chaplain for the Gaol and Civil Hospital," in *Sessional Papers for the Year 1884-1885*, pp.91-92.
21. 1895年醫療報告中雅麗氏醫院代表鍾本初醫生證詞：CO131/24，April 1895, 21-22, TNA。

22.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頁 11。
23. Dr. G.H. Chao,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Hong Kong," p.20.
24. 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 年）〉（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7），頁 59。
25. 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頁 118。
26. 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頁 67-132。
27. 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頁 85。
28. 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頁 90。
29.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8），頁 17；及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頁 113。
30. 蕭國健：《舊日足跡：香港地區與民生尋蹤》（香港：三聯書店，2023），頁 73。
31.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21), pp.13-14.
32. "Medical Committee's Report," *Sessional Papers for the Year 1895*, pp.5-6.
33. "Medical Committee's Report," *Sessional Papers for the Year 1895*, pp.5-6.
34.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頁 181。
35. 蕭國健：《舊日足跡：香港地區與民生尋蹤》，頁 72。
36. "Chinese Public Dispensaries: An Outline of Their History. Opening Ceremony of New Hospit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Oct 18, 1922;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7.
37. "Chinese Public Dispensaries: An Outline of Their History," p.7.
38. 蕭國健：《舊日足跡：香港地區與民生尋蹤》，頁 72-80。
39.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pp.16-17.
40. 〈油蔴地及水上公立醫局開幕〉，《華字日報》，1916 年 1 月 27 日；及 "Yaumati's New Dispensary: Opening Ceremony By H. E. The Governo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Jan 26, 1916;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6.
41. "Chinese Public Dispensary: Inauguration Ceremony at Shamsuipo,"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Apr 21, 191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3.
42. "In New Home: Public Dispensary at Kowloon City Opened Yesterda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Jun 29, 1932;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9.

43.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p.34;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 Sept 6, 1967.
44. 〈何東夫人醫局活化料年中完工〉，政府新聞網，2021年4月4日：<[https://www.news.gov.hk/chi/2021/04/20210404/20210404\\_123222\\_717.html](https://www.news.gov.hk/chi/2021/04/20210404/20210404_123222_717.html)>
45.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頁 226-228。
46. 楊祥銀：〈試論香港殖民政府的早期醫療服務〉，《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2期，頁 120。
47. 申頌詩著，馮彩華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1848-1998）〉，收於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25-26；及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 11、191。
48.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 16-27。
49.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 31。
50. 申頌詩著，馮彩華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1848-1998）〉，頁 41-44。
51.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Sr. Renee de Marie Boulestreau，<<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RM-Boulestreau.htm>>
52.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呂妙金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G-Lui.htm>>
53.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葉漢英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MA-Yip.htm>>
54. 何兆煒醫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年6月23日。
55.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1860-2000）〉，收於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80。
56. "Canossian Centenary," *Sunday Examiner*, May 13, 1960; and Thomas Ryan,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pp.31-32.
57. The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Servants of the Poor, "The Servant of God—Sr. Luigia Grassi," <<http://kanosjanki.org.pl/en/zgromadzenie/swieci-i-s-luigia-grassi/>>
58. The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Servants of the Poor, "The Servant of God—Sr. Luigia Grassi."
59. Gianni Criveller, "A Quiet Arrival with a Huge Impact: The Canossian Sisters in Hong Kong," *Sunday Examiner*, April 20, 2020.

60. 培貞學校很快被改建為孤兒院學校，為孤兒提供教育、起居飲食。
61. Gianni Criveller, "The Canossian Sisters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Protection, Education, and Emancipation of Women", in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Bible, and Evangelization in China*, ed. Cindy Yik-Yi Chu,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2), p.21.
62. 招群英修女：〈寶血會修會歷史（初期階段之草稿）〉，頁 8。手稿由寶血會檔案館提供。
63.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109-111。
64.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59。按：1911 年，由於當時從事中英文學校教育比其他服務有更迫切需要，修會結束了這項服務失足少女四十二年的工作。
65. 肖喜學：《香港城市探微》（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 317-318。
66. 港聖雲先會：《香港聖雲先會百週年紀念（一八六三——一九六三）特刊》（香港：香港聖雲先會，1963），頁 7。
67.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李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A-Rivetta.htm>>
68. 嘉諾撒會檔案處資料。
69.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63-64。
70. 陳天權：〈灣仔進教團的百年變遷〉，《灼見名家》2016 年 12 月 28 日，<<https://shorturl.at/kxB29>>
71.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89。
72. 首兩間會院分別是堅道總會院和灣仔會院。
73.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s—Hong Kong 1860-1910*, Vol. Three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1997), p.294.
74. 張明佳：〈傳教工作與社會服務——香港嘉諾撒仁愛會的個案研究（1860-1941 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1），頁 71，112。
75. 施其樂著，宋鴻耀譯：《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頁 239。
76. 討論和收集歷史的《古老》網站（Gwulo）對紅磡聖德學校及診療所的討論：<[https://gwulo.com/node/57389#17~22.30857~114.18500~Map\\_by\\_GovHK-Markers~100](https://gwulo.com/node/57389#17~22.30857~114.18500~Map_by_GovHK-Markers~100)>
77.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86、115、123、134、138，及嘉諾撒會檔案處資料。
78.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德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E-Dall%27Acqua.htm>>
79.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138，及嘉諾撒會檔案

處資料。

80. 張明佳：《傳教工作與社會服務》，頁 77-79。
81. 不同年份的《香港天主教手冊》記載的診所中文名稱有所不同：凌月仙小兒調養所、凌月仙小嬰兒院、凌月仙嬰兒診療所、凌月仙診療所等等。五十年代的《手冊》記錄診所的英文名稱是 Ling Yue Sin Infant's Hospital & Dispensary，六十年代後的英文名稱是 Ling Yue Sin Dispensary，估計是停止了嬰兒醫院運作。
82.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林瑞玲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l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T-Lam%20SL.htm>>
83. 嘉諾撒會檔案處資料。
84.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87、115。按：這所小型私塾就是後來嘉諾撒培德學校之前身，見嘉諾撒培德學校網站：<<https://shorturl.at/dfAJ7>>
85. 鄭興：《香港漁民辛酸史》，第二版（香港：鄭興，2022），頁 99-100。
86. 除了中西方語言不同，當時漁民通常使用的是客家話、鶴佬話等方言，住在岸上的人多數使用廣州話，溝通出現困難。
87.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123。
88.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依美利亞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l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E-De%20Figueiredo.htm>>
89.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s—Hong Kong 1910-2000*, Vol. Three, p.152.
90. 嘉諾撒會檔案處資料。
91.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126、135、153 及嘉諾撒會檔案處資料。
92.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高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l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F-Colombi.htm>>
93. 戴遐齡：《香港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簡史》（香港：Victoria Press，1952），頁 1-21。
94. 招群英修女：〈寶血會修會歷史（初期階段之草稿）〉，頁 1-10。
95. 〈修會歷史〉，寶血女修會網站。
96. 戴遐齡：《香港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簡史》，頁 2，5。
97. 朱益宜著，寶血女修會譯：《國籍寶血女修會與天主教會的演進》（香港：原道出版有限公司，2019），頁 57-58。
98. 招群英修女：〈寶血會修會歷史（初期階段之草稿）〉，頁 1。
99. 〈寶血會修女談日佔時期的日子〉，《公教報》，2015 年 9 月 20 日。
100. 朱益宜：《國籍寶血女修會與天主教會的演進》，頁 81。
101. 朱益宜：《國籍寶血女修會與天主教會的演進》，頁 90。

102. 朱益宜：《國籍寶血女修會與天主教會的演進》，頁 93。
103. 〈寶血會修女談日佔時期的日子〉，《公教報》，2015 年 9 月 20 日。
104. 〈寶血會修女談日佔時期的日子〉，《公教報》，2015 年 9 月 20 日。
105. 朱益宜：《國籍寶血女修會與天主教會的演進》，頁 111-113。
106. 安貝蒂著，陳愛潔譯：〈彰顯天主的愛：瑪利諾女修會百年慶〉，《鼎》第 32 卷總第 164 期，頁 16-20；及“Meet Our Founders,”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website: <<https://maryknollsociety.org/about/maryknoll-history/founders/>>
107. 安貝蒂：〈彰顯天主的愛：瑪利諾女修會百年慶〉，頁 16-17。
108. 安貝蒂：〈彰顯天主的愛：瑪利諾女修會百年慶〉，頁 16-17。
109. Mary Ellen Manz, “China Bound and Beyond,” *Maryknoll Magazine*, Sept 1, 2019, <<https://www.maryknollmagazine.org/2021/09/maryknoll-sisters-centennial-china-bound-and-beyond/>>
110. Jane Gordon, “For Maryknoll Sisters, Some Memories Don’t Fade,”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6, 2000, p.6.
111. Cindy Yik-yi Chu,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7.
112. Jean-Paul Wiest, *Maryknoll in China: A History (1918-1955)*, (Armonk, NY: M.E. Sharpe, 1988), pp.60-61.
113. Suzanne R. Thurman, “The Medical Mission Strategy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Missionar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XXX, No. 3 (July 2002): pp.361-362.
114. Jean-Paul Wiest, *Maryknoll in China: A History (1918-1955)*, p.134.
115. 關於瑪利諾會更詳細的醫療策略，見 Suzanne R. Thurman, “The Medical Mission Strategy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pp. 361-373.
116. LegCo Hansard, Oct 16, 1924.
117. 朱益宜著，周玉鳳譯：《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1921-1969）》（香港：中華書局，2007），頁 44-45。但另一說法是政府接觸瑪利諾女修會，見 Jim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18-1975* (1978), p.5。
118.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44-45。
119. “Kowloon Hospit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Nov 20, 1924;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8.
120. “To the Editor, S.C.M. Post: Charity Begins at Ho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Nov 13, 1924;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10.
121. Sister Mary Paul, “To the Editor, S.C.M. Post: Staffing of Kowloon Hospit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March 23, 192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8.

122.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p.43, 64.
123.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資料：IV-09-02，〈醫務總監暨何甘棠先生之先後三次演講肺癆症刊詞〉，1939年12月29日、1940年1月6日及13日。
124. “Anti-T.B. Campaign: Clinic Opened in Kowloon City District Educating the Publ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May 16, 1940;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8.
125. “Tuberculosis Cases: Report on Working of Free Clinic Incidence of Diseas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July 5, 1940;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4.
126. “Anti-T.B. Work: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Kowloon Clinic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Sept 26, 194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7.
127. “Anti-T.B. Work: Report on Activities of Kowloon Clinics,” p.7.
128. Cindy Yik-yi Chu,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pp.81-82, 87.
129. Sr.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 Hong Kong 1910-2000*, Vol. 3, p.87.
130. Cindy Yik-yi Chu,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p.100.
131.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70。
132.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35-36。
133.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檔案處資料。
134. Sr.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 Hong Kong 1910-2000*, Vol. 3, p.89, 98, 104-105.
135. Brian Edgar, “Steering Neutral? The Un-interred Irish Community in Occupied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57 (2017): p.72.
136. 張學明：〈香港的耶穌會士〉，收於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174。
137. 李威成：〈日佔時期香港醫療衛生的管理模式，以香港日報為主要參考〉，《台大文史哲學報》第88期2017年11月，頁119-155。
138.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35，49。
139. 李威成：〈日佔時期香港醫療衛生的管理模式〉，頁119-155。
140. The Hong Kong News Online, Feb 27, March 17, and March 25, 1943.

141. 李威成：〈日佔時期香港醫療衛生的管理模式〉，頁 119-155。
142. 李威成：〈日佔時期香港醫療衛生的管理模式〉，頁 119-155。
143. 謝永光：〈日據時期的醫療衛生〉，收於《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頁 204-211。
144. 〈本港西藥行 今年營業可觀〉，《工商日報》，1939 年 12 月 27 日。
145. 謝永光：〈日據時期的醫療衛生〉，頁 214。
146. 李威成：〈日佔時期香港醫療衛生的管理模式〉，頁 119-155。
147. 曹紹釗：〈不尋常的文憑〉，收於香港醫學博物館：《杏林鴻爪：香港醫學博物館藏品選》（香港：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2016），頁 62。
148. 謝永光：〈日據時期的醫療衛生〉，頁 214。
149. "Social Welfare: The Hong Kong Red Swastika Society Wartime Clinic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Sept 5, 1948;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3.
150. 謝永光：〈日據時期的醫療衛生〉頁 207-209。
151. "Hong Kong's Valiant Bishop Arrives in U.S. For Rest," *N.C.W.C. News Service*, July 16, 1946.
152.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36-239。
153.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73-75。
154.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40，244。
155.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41-245。
156. Brian Edgar, "Steering Neutral?", p.67.
157. Brian Edgar, "Steering Neutral?", p.82.
158. Sr.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 Hong Kong 1910-2000*, Vol 3, p.111-112.
159. Brian Edgar, "Steering Neutral?", p.72.
160. Thomas J. Morrissey, *Jesuit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and Beyond: Irish Jesuit Mission: Its Development 1926-2006* (Hong Kong: Xavier Publishing Association, 2008), pp.209-211.
161. 張學明：〈香港耶穌會士的「沈默」事工〉，《香港 01》，2017 年 4 月 3 日。
162. Brian Edgar, "Steering Neutral?", p.81.
163. 鮫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1），頁 94-96。
164.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 99-101；Sr.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 Vol 3, p.106.

165.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 99-101；Thomas J. Morissey, *Jesuit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and Beyond*, p.222.
166. 鮫島盛隆：《香港回想記》，頁 99-101；Sr.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 Vol 3, p.107.
167. Sr.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 Vol 3, pp.114-115.
168. Sr.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 Vol 3, pp.106-107.
169. Sr.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 Vol 3, pp.106-107.
170. Thomas Ryan,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p.216.
171. 〈寶血會修女談日佔時期的日子〉，《公教報》，2015 年 9 月 20 日。
172.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52。
173. Sr.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 Vol 3, p.118.
174.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 35-36。
175.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81。
176. 〈寶血會修女談日佔時期的日子〉，《公教報》，2015 年 9 月 20 日。
177. Thomas Ryan,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p.216.
178. Thomas J. Morissey, *Jesuit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and Beyond*, pp.200, 224. 英石是英制重量單位，三石約相等於五十二磅。
179. 《香港教區修女狀況調查報告》調查報告當年備有中英文版本，本研究是基於能獲取的英文版本作分析。見：Sister Joan Delaney, *A Survey on Religious Women in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Major Superiors of Religious Women, 1975), p.9.
180.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 10。
181. Sister Joan Delaney, *A Survey on Religious Women in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p.7.

〔1946-1969〕

## 偶然的歷史時空創造發展的機會

第三章

1946-1969

偶然的歷史時空創造發展的機會

## 1. 五十年代的社會及醫療概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對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佔領，香港重新落入英國的殖民管治。英國首先在同年9月份成立軍政府，接管和恢復政府機關的運作，釋放盟國戰俘和被囚公民，恢復水電等公共設施的供應，以重建治安和秩序。1946年5月1日由楊慕琦復任港督，結束八個月的軍政府統治。

在戰爭和日佔時期，醫療機構受到破壞和干擾，藥品價格飛升。由於有些英籍醫官在戰後提早退休返國，有些本地醫官則選擇私人執業，政府開始起用更多華人醫官以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而以往以治療和預防為主的政策，改為控制傳染病的流行。<sup>1</sup> 嬰兒死亡率雖然比戰前至少三百的驚人數字減低至差不多一百，如1947年出年不足一年的死亡率達102.3%，但比率仍偏高，故此政府亦加強對嬰兒及兒童健康的關注，成功地在十年後把死亡率降低逾半。此外，還有防疫注射、健康教育的推行，以及興建新醫院。

然而，本以為可以休養生息的香港社會，很快便受到內地接連的政治事件波及而面對很大的挑戰。戰前受日佔政府因糧食不足而鼓吹回內地生活的香港市民，此時從內地回歸的同時，因著1945年第二次國共內戰的影響，1949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等因素，又有大量民眾不斷外逃，與深

圳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便成為了他們首選之地。據估計，香港從戰前逾百萬人口，在 1945 年 9 月只剩少於六十萬。然而，在 1946 年已回升至一百五十萬，增長一倍多。<sup>2</sup> 據 1949 年聯合國估計，香港二百萬居民中，每兩人即有一名為難民。他們遭遇各有不同，大部分依自助自理原則生活，當局「素主訓練彼等自立，故並不特別干與彼等生活及管理」。<sup>3</sup> 與此同時，戰後生活趨向安定的生活提高了市民的生育意欲，為香港帶來一波嬰兒潮。時至 1955 年，香港人口已達二百五十五萬，並持續 升至 1960 年的三百一十二萬。<sup>4</sup>

據 1961 年的人口普查，港九、新界和水上人才佔整體人口 8.32%，約二十六萬人，其餘絕大部分是來自內地。他們來港後，舉目無親，自行在山坡上搭建木屋。醫務衛生署的報告指出，1948 年頭半年，全港約有三萬間木屋，並預計在同年年底增加一倍，可見其增加速度。<sup>5</sup> 這些木屋居民要面對三大敵人「水、火、風」：刮颱風時木屋可能會被吹走，下大雨很容易水浸，火警就更不用說，很多屋都被燒光，很危險；而且木屋很密集，「路不成路，全都是窄窄的小巷」。<sup>6</sup>

政府於 1952 年才開始木屋區徙置計畫。但當時的官員認為木屋區居民並非全是窮人，有部分「霸王屋」<sup>7</sup>，即遷居木屋以圖謀利，故此徙置目的「並非為解決房荒問題」，而是為清除木屋區後，供興建住宅，預防火災，以及易於控制公共衛生與公共秩序等其他用意。<sup>8</sup> 初代的徙置房屋是兩層石屋，稱為徙置區（resettlement areas），不少是由慈善團體和宗教組織所籌劃，如牛頭角和何文田的石屋就是由瑪利諾男女修會建造，及後為免與政府興建的徙置區混淆，改稱為平房區（cottage area）。<sup>9</sup> 1955 年，由漢布茹博士（Edvard Hambro）向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提交的調查報告《香港中國難民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提到當時全職工人平均月薪只有一百零五至一百五十元，僅夠糊口，「難民中的苦難和痛苦仍然更為普遍」。<sup>10</sup> 截至 1954 年底，這些徙置區中，有十四所學校、十四間診所、十一座教堂、一百六十二間商舖及八十六間工廠。<sup>11</sup> 1953 年聖誕節石硤尾木屋區大災，五萬多人一夜之間痛失

家園，催生了遲來的公共房屋政策。平房區安置的人數甚少，為免浪費土地，政府成立徙置事務處，開始興建多幢多層的徙置大廈，合組成徙置區，於六十年代末期改稱新區。<sup>12</sup> 這些 H 型徙置大廈雖然仍要整層共用廁浴空間，但相比於衛生環境惡劣、易於發生火警的木屋區，已改善不少。

至於醫療救助方面，不斷增加的人口，使得公立醫院門診和住院的需求持續上升。漢布茹的調查報告指出，香港醫藥設施極為缺乏的情況雖已大為改善，主要缺陷在於病床短缺，但醫院、診所及醫生數量「不足應付實際需要」，且不諱言香港的衛生問題乃社會及經濟問題，「一言以蔽之，即貧窮」。<sup>13</sup> 根據 1950-51 年的《醫務衛生署署長年度報告》（*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九龍區的醫療需要尤其巨大，除了性病、肺癆、產檢及嬰兒診所，政府向所有門診所收取一元診症費，企圖減低需求壓力，但卻因夜診時間由六時延長至凌晨十二時，方便了勞動階層不用請假看病，求診人數不降反升。<sup>14</sup> 自 1950 年 9 月開始，八間華人公立醫局亦由以往免費診症，同樣改收一元診金，除非是緊急狀況或是無力支付者可獲豁免。自收費後，主要是輕微病症的求診者有所下降，而免費診所的求診者亦未見有很明顯的上升；整個年度的成人和兒童新症，分別達九萬及十二萬餘宗。<sup>15</sup> 在五十年代間，政府增加夜診時段應付需要之外，在 1959 年中開始更在周日及公眾假期在港九各兩間市區診所加開服務。<sup>16</sup>

在新界方面，政府五十年代初在大埔、粉嶺、沙頭角、元朗、新墟、西貢、離島的坪洲、銀鑛灣和大澳設有九間醫局，提供免費治療。這些醫局有助產士，並設有幾張產床。另外，政府有兩部流動醫療車照顧小村落的需要，有醫療船定期到離島服務，又與聖約翰救傷隊及警方合作，由醫務署提供器材和藥物，救傷隊提供技術人員，隨警方到偏遠村落診症。<sup>17</sup> 時至五十年代末，新界區共有十四間醫務中心提供門診，其中七間有一或更多名醫生固定駐診。

雖然政府在這十年間一直改善和增加服務，不過根據五十年代中後期的不完全統計，每天求診者至少達二萬人，「有百份之七十五以上向港九各區慈善團體、半慈善性的私人組織的診療所求診」，反映了公營醫療體系不足以承受所有需求。<sup>18</sup>

## 1.1 肺癆傳染猖獗

從十九世紀香港的醫療歷史教訓中，擠迫的居住環境是傳染病的溫床。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本港此時寮屋處處，公共衛生成為另一大問題。1950-51 年的《醫務署署長年度報告》顯示，肺癆是所有年齡層的第二大死因，是成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sup>19</sup> 實際上，肺癆在三十年代已是香港其中一種嚴重的傳染病；1939 年，每千宗死亡有九十宗為肺癆病，翌年增至每千宗有一百二十七宗。所以政府在戰後積極進行防癆工作，除了公立醫院有肺癆病房，還有香港夏慤道健康院和九龍胸肺診療所兩間公立診所。民間組織香港防癆會（現稱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又於 1949 年開辦律敦治療養院，由聖高龐隆會的天主教修女主理。在 1956 年防癆會又成立傅麗儀療養院，專為肺癆康復者提供療養服務，同樣由該女修會負責。1957 年建成第三所醫療機構——葛量洪醫院，初期主要提供癆病治療。

肺癆病的死亡率經歷 1949-1951 年的高峰後，慢慢逐步下降，但至 1957 年仍佔逾 13%，使香港有「全球最高肺癆感染率的稱號」，是本港的最大公共衛生問題。<sup>20</sup> 1952 年《工人醫療所通訊》就曾出現香港是「肺癆埠」的形容，並解釋了其成因和問題：除了擠迫環境居所如「住鴿籠」，「食粗糲，營養不良，抗癆力弱」也是肺癆滋長的因素。李崧醫生在回憶錄中提及曾去診治一名肺癆女病人，目睹一家八口共睡一床，床上和床邊放著衣物、米缸碗碟和風爐沙煲的情景，「心想不患肺病都幾難了。這樣的居住條件，還談得上什麼衛生呢？簡直是非人生活」；他亦開始覺得「肺病不是病菌作怪」，而是一個社會問題，若不改善工人生活，根本無法戰勝它。<sup>21</sup>

因為治療肺癆病時間相當長，故當局著重發現病症，<sup>22</sup>不過病人「要療養，沒有錢，要休息，不忍見妻兒號寒啼飢，老板知道了連飯碗也會打破」<sup>23</sup>，使得許多病人為了生活，多會繼續上班，有些甚至隱瞞病情，加上住院設施不足，後期政府利用診所提供非臥床治療。<sup>24</sup>就如本研究其中一位受訪者鍾炳基憶述，自己在五十年代十多歲時，「家裡有親戚有肺癆病還上班，他便叫我走路到廣華醫院取一些肺癆病的藥丸回家。我記得用了兩個月餅盒裝得滿滿」。<sup>25</sup>此外，政府又引入卡介苗注射，減低致病率，同時加強宣傳教育，從飲食營養、家居衛生教導市民知識，並以罰款禁止隨地吐痰的陋習。<sup>26</sup>

在各方的努力下，遏止肺癆傳播和治療最終取得不俗的成效，七十年代經濟慢慢向好，生活條件普遍改善，也減少了疾病的傳播。1970-1974年在鑽石山服務時，曾兩度患上肺癆的恩保德神父得到負責律敦治療養院的聖高隆龐會修女醫治，「到了後期修女向恩神父說笑，她們要失業了」，因為香港不再受肺癆病威脅。<sup>27</sup>隨著肺癆威脅消退，律敦治療養院1991年重建為律敦治普通科醫院，葛量洪醫院於1982年改為心肺科醫療服務中心，傅麗儀療養院則於1999年改建為護理安老院。

## 1.2 《醫生註冊條例》<sup>28</sup>

1957年的《醫生註冊條例》是五十年代最重要的醫務法例之一。它重新制定並更新了原有《醫生註冊條例》（第161章）對醫療專業的規管，主要變化是醫務委員會（Medical Council）取代了醫務局（Medical Board），引入強制性的預先註冊實習，以及根據第27條，全面禁止未具有可註冊醫療資格的人員從事西醫工作，無論是否從中獲利。<sup>29</sup>由於本港的慈善診療所或廉價診療所許多是由未經註冊的醫生主理，診症費用即使最貧窮的市民也能應付，第27條勢必使這些有價值及急需的診所關閉，故引起了極大的迴響，要求暫緩的聲音此起彼落，包括聖公會主教何明華會督（Bishop Ronald Owen Hall, 1895-1975）、部分立法局議員、逾二百個華人團體等。<sup>30</sup>故該法案在二讀時提出修訂，由港督酌情決定暫停第27條的實施，直到有令人滿意的安排，讓未註冊醫生有機會參加專業資格的考試。<sup>31</sup>

《醫生註冊條例》曾於 1958 年 6 月修訂，列明未註冊西醫不可治療眼疾。醫務衛生署署長麥敬時（Dr. David James Masterton MacKenzie，任期 1958-1963）修訂動議時，引用 1953 年《香港失明問題報告》指出，越來越多證據表明，很大一部分完全失明的人之所以失明，是「被誤導性廣告所欺騙」，尋求「江湖術士和庸醫」的幫助，從而對自己造成可怕的傷害。該報告還指出，每一百隻失明的眼睛中，有七十八隻不一定會失明，意即如果能防止這些「自封的眼科醫生」的活動，那麼十歲以下兒童的失明，七成是可以預防的。他又指出，在香港無論走到哪裡，都會看到一些招牌，宣傳這些聲稱能治癒眼疾的不合格人士的活動。除了醫術問題，庸醫將磨料和受感染的溶液放入患者眼中，導致兒童因眼睛嚴重發炎而失明。光是 1957 年，就有二百人被登記為盲人，其中有一百四十人是接受江湖術士的治療，在十歲之前已失明；若由合格醫生治療，這本該可以避免的。由於《條例》第 30 條為不合資格人士的醫療活動提供了保障，不符合立法精神或意圖，故此當局提出修訂。<sup>32</sup>

### 1.3 《不良廣告（醫藥）條例》

正如《醫生註冊條例》修訂案中所提出的因由，在眾多醫療歷史事件中，1953 年的《不良廣告（醫藥）條例》或許並未如《醫生註冊條例》般重要，卻與市民息息相關。上了年紀的市民應該都不會忘記當時報章上充斥著各種醫藥廣告。由於五十年代市民大多生活清貧，教育程度較低，患病後各施各法，要麼花時間去公立醫局排長龍，要麼接受免費或廉價的慈善西醫診所，有些則選擇飲用中草藥，還有些為了省錢省時間，自行購買成藥服用，使得報章上出現大量藥品廣告。為了保障公眾免受錯誤和無效治療的風險及被不法分子剝削，立法局於 1953 年通過《不良廣告（醫藥）條例》，限制包括發布與促成墮胎有關的廣告。醫務衛生署署長動議時指出，英國禁止宣傳聲稱可有效治療癌症、結核病和某些其他嚴重疾病的藥品和手術器具的廣告，因為它們會造成各種濫用行為，而這些疾病應由合格的醫生治療。然而，這種「成分未公開的藥物和由不合格人士進行治療的廣告在香港很常見」，它們利用了人

們「輕信和對健康狀況不佳的恐懼」；而延遲適當的治療意味著病發到某個階段才尋求治療，可能無法達到效果，甚至生命堪虞。<sup>33</sup> 不過，從五十到八十年代的新聞報道可見，不時仍有報刊負責人因觸犯此法而被告上法庭，抗辯理由包括初級職員犯錯，出於無知等。在 1973 年更有多達十二家報社同時挨告罰款。<sup>34</sup>

## 2. 六十年代面對的另一艱難時期

六十年代天災特別多，既有 1962 年溫黛颱風造成逾百人死亡，七萬多人無家可歸；1963 和 1967 年也經歷嚴重旱災，雨水比正常少四成，需每四日供水四小時。小時候住黃大仙警署附近的李偉達先生仍記得 1967 年每四日供水一次，雖然政府有水車供水，但是該區有八萬居民，人口太多，故十歲的他要跟街坊一起前往鑽石山木屋區的一口井擔水回家。<sup>35</sup>

此時，內地的「大躍進」（1958-1960）及文化大革命（1966-1976）連場政治和社會運動引發逃亡潮，使未有機會獲得真正喘息的香港社會又要面對另一段艱苦歲月。香港人口在 1966 年錄得三百七十八萬人，比前一年增加約六萬；1967 年再增加九萬，達三百八十七萬人，兩年間就增加了十五萬。<sup>36</sup> 人口急增對公營醫療服務產生巨大壓力，即使從 1958 年開始，政府醫療衛生開支已增加至整體預算中逾一成<sup>37</sup>，也不能完全涵蓋所有需求，診所和醫院的地理分佈又未能追上需要，每天有大量市民排隊候診。<sup>38</sup> 這成為了天主教診所和其他宗教或慈善組織更多地介入醫療服務的契機。

在經濟方面，雖然製造業已見長足的發展，除了紡織業，塑膠和電子業崛起成為新興工業，但勞動人口的生活仍只是勉強得到溫飽。1966 年的天星小輪船票加價騷動和 1967 年由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演變為抵抗港英政府的六七暴亂，在在顯示廣大的勞工階層生活不容易。兩次的本地政治事件，讓港英政府痛定思痛，一改五十年代的不干預政策，開始從管治、民生及經濟多方面改善施政及社會福利，包括在教育 and 住屋方面。後者對改善因擠迫環境而產生的公共衛生問題，起了很大的作用。

### 2.1 世界難民年與難民醫生

香港迅速增長的難民人口，受到國際關注。聯合國 1958 年通過決議案，訂定 1959 年 7 月 1 日至 1960 年 6 月 30 日為「世界難民年」，並指定四類人士為難民年的救助對象，其中包括「居留於香港之中國難

民」。<sup>39</sup> 實際上，早在世界難民年開始之前，教宗庇護十二世於 1958 年 1 月捐出二千美元給聯合國，指定用於從大陸逃港的難民身上。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奧古斯特·林特（Auguste Lindt）當時指出，正當其他政府對香港龐大的難民問題似乎束手無策的時候，教廷的這筆捐贈是獨一無二的。<sup>40</sup>

在這些大陸難民中，有不少是知識分子。此前的《香港中國難民問題》調查報告曾提及對知識分子的就業安置，作為救濟難民的解決方法之一。港府 1950 年的《醫務署署長年度報告》也顯示，醫務署與英國醫學會及香港中華醫學會討論的最重要問題之一，是關於來自內地的「難民醫生」，當局認為「有需要非常認真考慮利用他們的服務的可能性」，並已聘任部分難民醫生為政府工作。<sup>41</sup> 這些難民醫生當中有許多人原本在內地是行內領袖，但絕大多數並非英國聯邦醫學院畢業，唯有修訂法例他們才有資格在香港註冊執業。正如前述，戰後不久，部分政府醫官離職，即使調整薪金從本地和英國招聘，也沒有多大成效，幸得難民醫生的出現，否則醫務署的工作可能會停擺。1949 年，政府聘用三十六人，佔該署四分之一的醫生人手。當時有三十位難民醫生更義務在西營盤夜間診所服務，每晚有三人在六時至八時為約四十名病人看診，診金三元。<sup>42</sup> 1955 年的《香港中國難民問題》顯示，醫務署其時已招攬二百多名難民醫生。<sup>43</sup>

## 2.2 《診療所條例》

正如醫務衛生署署長麥敬時 1963 年在立法局首讀解釋《診療所條例》草案時說：「這項法案具有長遠而複雜的歷史」，要追溯到 1957 年《醫生註冊條例》。當時政府意圖借法例解決無牌行醫的情況，但其中第 27 條受到社會強烈反對而擱置。為讓無牌醫生取得註冊資格，政府與倫敦藥劑學會和香港大學在 1958-1960 間舉行過三次資格甄審試。當局所知的五百六十三名未註冊醫生中，有一百七十七人應考，其中一百二十八人取得註冊資格。其餘未註冊者，部分繼續在慈善或廉價診所工作。這些診所由街坊福利會、工會、商會、天主教及基督教等組織開辦，又稱作「社團醫生」。<sup>44</sup>

由於一些打著慈善旗號、盈利為實的診所魚目混珠，港督柏立基（Sir Robert Black，任期 1958-1964）在 1961 年出席英國醫學會及香港中華醫學會晚宴上，承認政府難獨力解決整個醫療問題，希望兩醫學會可合力以最可能的相宜價格為窮人提供醫療服務之餘，表示會立法規管「真的和所謂的」慈善診所。<sup>45</sup>至於難民醫生，政府擬承認他們的執業資格，卻遭兩醫學會反對，認為會構成醫學上的兩個標準。不過此論調遭外界非議，因戰前時已分兩類醫生，至 1950 年才合併，第二組是那些非英國或本港畢業經政府認可的醫生，只是受訓練上之區別，其他國家亦有此做法。論者又認為，醫務署當時聘用難民醫生都沒有強迫他們考試，全港註冊醫生才六百多人，一人平均服務約五千人，不足以應付三百多萬人口，將他們列為第二組醫生可服務於社團診所。<sup>46</sup>

政府考慮到若執意實施《醫生註冊法例》第 27 條，連帶真正的慈善診所都要結業，故建議立法要求所有慈善或廉價診所註冊，並設立有牌執業醫生名冊作為補充辦法，把考試合格但未註冊的醫生列入，唯不准私人行醫，而需受僱於慈善或義務團體的診所，在註冊醫生的監督下工作，使慈善醫療得以繼續。醫學會強烈反對設立名冊，但贊成登記診療所的建議。為維持積極需要的醫療服務和保持西醫水平起見，政府最終只出台《診療所條例》。這條例具規管作用之外，同時可讓政府統計診所對低收入人士的服務範圍，以及估量出能正當使用西法行醫的非註冊醫生到底有多少人，因為政府在 1962 年草擬法案時所作的非正式調查中得知，在三百一十間廉價診所中，逾半由是非註冊醫生擔任，但卻未知他們的工作情況。有關條例既可確保慈善診所繼續營運，又避免市民受江湖術士所危害，同時亦保障依《醫生註冊法例》登記的醫生的利益。<sup>47</sup>

《診療所條例》要求診所要有最低限度的合理設備，保證有適當水平來診治病人，從而不會遭拒絕註冊。它又容許若干擔任真正慈善工作的非註冊醫生，可以繼續在那些豁免登記的診療所內執業，三年期告滿後，診所需要全部僱用合法註冊醫生。至於在條例通過後的所有新登記診所，均只准聘用註冊醫生，不會獲得豁免待遇。政府亦準備在條例實施半年後，即 1964 年中，正式實施《醫生註冊法例》第 27 條。

此後任何非註冊醫生在本港執業，不論是否謀利都屬違法。<sup>48</sup>《診療所條例》於1964年1月1日實施後，共收到七百三十個申請或豁免申請，而截止1966年底，其中八十二間診所已登記及聘用註冊醫生，三百九十三間豁免登記，大部分由非註冊醫生主理。這四百七十五間診所包括五十四部流動醫療車。<sup>49</sup>

在條例實施十八個月後，當局委任顧問委員會進行檢討。委員會指出每年向慈善和廉價診所求診者人達三百七十多萬，認同社會對之仍有需要。<sup>50</sup>當局除了加強巡查，亦要求非註冊醫生接受專家評審的面試，通過者可在豁免登記的診所行醫。此外，又為所有在豁免登記診所工作的非註冊醫生制定行為守則，規限他們的專業活動，若有違犯便成為拒絕診所豁免或取消登記的充份理由。與此同時，原定只給予醫務衛生署署長權力批准三年豁免期，獲再延長三年至1967年1月，而所有此類診所必須每年重新登記。至於流動醫療診所則全部需於1967年12月取消，不接受重新登記，改由在各屋邨中設置固定診所，並優先分配給註冊醫生。<sup>51</sup>截止1973年3月底，仍有七十五個登記靜止診所及三部由註冊醫生負責的登記流動醫療車在提供服務，以及三百四十四間豁免診所。<sup>52</sup>

## 2.3 首份醫療白皮書

1964年，醫務衛生署向立法局提交首份針對香港醫療服務的白皮書《香港醫療服務發展》（*Develop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in Hong Kong*），勾劃出醫療上的即時需要，及從五個範疇為未來發展做出規劃：醫療機構的發展；此等機構的人員配置；改善現有醫療設施的使用率；對政府資助機構的補貼，以及收費問題。<sup>53</sup>相比於五十年代，政府主要提供預防性的醫療護理服務，1964年的白皮書是當局「首次對醫療服務定下目標」。<sup>54</sup>當局的政策目的是，「直接或間接向不能從其他途徑獲得醫療服務的廣大市民提供低廉或免費的醫療及個人健康服務」<sup>55</sup>，而施行方針包括

- 1) 防治傳染病工作與門診服務的發展必須同步進行，
- 2) 加強兒童健康教育，及早防治疾病的傳染，
- 3) 增加醫院的病床數目，尤其是九龍區，以及
- 4) 增加精神病院、療養院、護老院的病床數目，以配合人口變化。<sup>56</sup>

在基層醫療方面，當局規劃為每十萬名市區居民設置一間標準門診診所，每五萬名郊區居民有一間鄉郊診所，每五十萬人一間綜合診所，以期為近半無法負擔非資助門診服務的市民提供免費醫療。<sup>57</sup> 此白皮書在歷史意義上，「宣示港府承擔公共醫療及健康服務的決心，改變以往保守消極的態度」。<sup>58</sup> 雖然當局有此鴻圖大志，但在立法局的討論中，議員提醒有關措施在經濟上所帶來的負擔，「明智的做法只能是將報告視為未來發展的整體指南，而不是詳細而僵化的藍圖」。<sup>59</sup> 故此，六十年代，政府仍需倚重慈善和傳教團體的醫療服務。

### 3 挑戰與機會兼備的天主教醫療服務

賴詒恩神父稱戰後十年是耶穌會的「擴張」年代<sup>60</sup>，同一境況或許可借用於整個香港天主教會。天主教會與本地社會一樣，在戰後破敗的環境中奮力站起。在戰爭後期，因日元貶值，物價飛升，即使以往有梵蒂岡的匯款幫助維持本地教會的生存，已沒有多大作用，恩理覺主教當時為了清還教會的債務，已變賣三間房子，他自己和前輩的金鍊和戒指、鍍金的明供聖體座、聖母像上的后冠，以及教堂的大鐘。戰後的教會，仍然是一貧如洗，總務處既要償還戰時的債項，也要張羅款項作傳教工作。第一章提到本地教會在1949年之前的轄區包括廣東的新安、歸善及海豐三縣，故此教會當局戰後除了要「照顧本港的教友，同時亦照顧廣東省內達七百萬的人民」，例如馬俊賢神父（1887-1957）因劇烈通脹，惠州的醫院面臨結束，物品完全缺貨，窮人要挨飢抵餓，多次乞求主教撥款<sup>61</sup>；再加上戰爭期間，「財產損失重大，某些地方的聖堂及寓所全部被毀，傳教士很多都無在他們的地區內居住或傳教」，只能於1946年的《香港天主教手冊》內刊登募捐呼籲。<sup>62</sup>各個修會團體亦努力恢復往昔的服務，如寶血醫院除了增添儀器，繼續為貧苦病人服務，亦有鑑於修院和醫院門前常有棄嬰，修女均抱回醫院照顧，以致嬰兒部不敷應用，促使修院在粉嶺興建孤兒院。<sup>63</sup>

雖然戰時香港的天主教人口一度「由二萬銳減至三千，使聖堂顯得冷清清」<sup>64</sup>，這樣的情況隨著國共內戰爆發，許多難民外逃，很快又轉變過來。他們有些本身是天主教徒，有些是來港後受到教會在糧食、醫療、教育方面的救濟而領洗入教，從而出現「麵粉教友」、「吃教基督徒」等稱號。陶成章神父（1926-2018）曾與大力參與救濟事業的瑪利諾會神父共事，他認為在艱難年代，以福利為吸引人人入教的傳教方法很特別，同時指出領洗的人裡面有部分是為了物質，但也有很多十分熱心於信仰。<sup>65</sup>

從內地南下的人群當中，還有來自各省市的中外籍男女傳教士。正如前兩章提到，早年的傳教士一心是到幅員更廣闊、更多靈魂需要拯

救的中國大陸傳教，此時他們卻面對政治環境突變，被迫離開或被驅逐出境而大多先來到香港落腳。據資料顯示，截止 1955 年，已有來自二十七個國家，七十個傳教或修道團體的三千一百二十五名神父修女到了香港。<sup>66</sup> 他們有些隨後依修會指派，到其他國家或回到祖國服務，但留在香港的傳教士仍為數不少。這些傳教士在大陸之時，基於對民眾的心身靈照顧，除了建造聖堂作禮儀之用和聚集信徒，還開辦教育及醫療機構。他們來港後把一技之長和經驗，應用在本港教會的服務上。在這偶然的時空交疊下，為香港天主教會帶來蓬勃的發展，使之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華人教區，截止 2022 年 8 月的統計，在永久居民當中，天主教徒已接近四十萬人。

在醫療工作方面，五六十年代同樣是蓬勃的時期。除了前一章介紹的四個修會自開埠至戰前已提供醫務，接下來看到更多男女修會、信友組織和天主教福利會（香港明愛前身）開辦的診所。雖然本章將這三大類別的組織分開逐一介紹，事實上，他們之間是緊密合作，表現出教會「全身都結構緊湊，藉著各關節的互相補助，按照各肢體的功用，各盡其職，使身體不斷增長，在愛德中將它建立起來」（弗 4:16）。例如，明愛除了自己的醫療系統，也居中協調，為修會主理的診所尋找運作資金；有信友團體自己興辦診所之餘，又與修會合作，由天主教徒醫護人員提供義診，彼此又互相配合，把流動醫療車物盡其用。

為團結這種合作關係，而非各行其是，白英奇主教（Bishop Lorenzo Bianchi, PIME, 1899-1983）在六十年代中亦在福利委員會之下為從事醫院及診所工作的修女成立了一個小組委員會（sub-committee）。這個小組委員會決定維持非正式形式，每兩個月開會一次，免得加重醫護修女的擔子。第一次會議在 1966 年 1 月在堅道教區公署舉行，第二次會議的時間為同年 3 月 2 日，兩次都有明愛的兩位高層代表及五個女修會的代表出席，包括瑪利諾女修會、寶血女修會、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及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從會議紀錄中，可見最初只是在醫院服務的修女參與，成立小組委員會除了討論明愛醫院的護士學校為天主教醫院培訓人才的可行性，亦希望通過

經常的交流「促進女修會和香港教會的相互進步和福祉」。既然是促進進步和福祉，在第二次會議中，小組委員會認為小組應包括在教區內從事醫護工作的修會代表，亦即「在診所服務的修女將成為小組委員會的一份子」，並於會後由教區發信邀請營辦荃灣啟明診所的拯望會及在馬鞍山服務的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加入。至第三次會議時，共有七個修會十五位代表出席。<sup>67</sup>

此外，在六十年代，教會內部召開至今仍被視為重要的全球會議之一——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這會議的成果為教會帶來許多重大更新，翻轉了很多往昔的觀念，給全球教會帶來震撼。除了促進基督徒合一，不再視基督新教為天國「禾場」的競爭對象，是宗教改革幾百年後兩教修和的一大進步，教會救贖觀也有所修正，由以往直觀地理解「教會之外無救恩」，傳教士熱切向其他未信的民族傳福音，使他們同享得救，轉而意識到人的得救未必要經由教會，因為「天主總有方法救一切人」<sup>68</sup>。至於很長時期只為垂死者作臨終傅油的聖事，恢復原來「病人傅油」的名稱，只要病人開始有死亡的危險，便可以領受此聖事。<sup>69</sup> 這些大轉變也反映在醫療工作上。

### 3.1 診所大幅增長的二十年

從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網站的公開資料，在 1931-1949 年間，天主教醫院及診所服務約佔教會所有社會福利服務份額近六成，單是診所佔整體的四成，最少的一年有八間（1948），最多一年有十四間（1932 及 1933）；至於其他社會服務包括孤兒院、安老院及盲女院。<sup>70</sup>

五六十年代是天主教醫療服務大幅增長的二十個年頭（表一）。在五十年代，醫療服務仍佔社會福利服務最大份額，超過六成。其他社會服務包括孤兒院、安老院及盲女院，不過由 1955 年開始，社會福利工作項目增加了「善牧會住宿服務」及「聖貞德服務」兩項宿舍服務。在這十年間，最多診所運作的一年有二十四間（1957），最少一年也有八間（1950）。<sup>71</sup> 教區統計在 1958 至 1961 年曾分開「免費」及「收費」

兩個類別，1958 年診治病人為五十年代中最高紀錄，516,298 名病人中，其中 401,351 人獲免費就診，其餘屬收費服務。

表一：天主教診所數目統計（1950-1969）<sup>72</sup>

| 年份   | 診所數目<br>(《香港天主教手冊》統計數字)   | 門診病人                      |
|------|---------------------------|---------------------------|
| 1950 | 8                         | 61,260                    |
| 1951 | 9                         | 69,530                    |
| 1952 | 10                        | 98,651                    |
| 1953 | 10                        | 59,960                    |
| 1956 | 13                        | 1,654,430                 |
| 1956 | 17                        | 314,015                   |
| 1957 | 24                        | 426,501                   |
| 1958 | 24                        | 516,298<br>(401,351 人次免費) |
| 1959 | 16                        | 472,765<br>(349,356 人次免費) |
| 1960 | 16                        | 472,805<br>(349,356 人次免費) |
| 1961 | 18                        | 527,390<br>(400,936 人次免費) |
| 1962 | 30                        | 598,246                   |
| 1963 | 30                        | 662,228                   |
| 1964 | 31 (包括門診、牙科診所、流動醫療所)      | 639,919                   |
| 1965 | 31 包括門診、牙科診所、流動醫療所)       | 約 690,000                 |
| 1966 | 32 (包括牙科診所，不再包括醫院門診)      | 沒有數據                      |
| 1967 | 31 (包括牙科診所，不再包括醫院門診)      | 沒有數據                      |
| 1968 | 28 (包括 4 間牙科診所及 3 部流動醫療車) | 沒有數據                      |
| 1969 | 31 (包括 6 間牙科診所及 3 部流動醫療車) | 沒有數據                      |

由於綜合教務統計中沒有列明所有診所的名稱，成為本研究的難題。例如，在運作最多診所的 1957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羅列的「免費診療所及施藥所」只有十間，包括福主教診療所、嘉諾撒診療所、聖家診療所、雷鳴遠診療所、啟明診療所、慈母診療所、庇護十二世診療所、培德診療所、聖耀漢診療所、聖若瑟診療所。然而，凌月仙小兒調養所，其英文名稱是 Ling Yuet Sin Infants' Hospital & Dispensary，實則上也包含施藥所功能，卻沒有列在「免費診療所」欄目。而據 1955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一篇關於〈香港天主教會的福利事業〉的介紹，當時有十二個「公所」（又稱作福利站），設於難民區的中心地帶，方便分配衣服、藥品和奶粉，公所內的施藥所每月診治病人約五千人，同樣沒有列在「免費診療所」欄目。這些沒有列入的診所和施藥所，是否已計入綜合教務統計中，或有沒有遺漏或重覆，無從得知。

在六十年代，天主教會更顯著地增加了社會福利工作，除了本著宗教慈善精神，亦是對世界難民年的回應。在世界難民年期間，教區於 1960 年 5 月 15-21 日舉辦「難民周」的活動，15 日當天的主日彌撒除了為全球難民祈禱，所有捐獻都用於「本教區為協助難民的天主教事工上」。<sup>73</sup> 據報道介紹，當時天主教會在難民區中，有十六間固定診所，而流動醫療車則在七個難民區服務，單是這些地方 1959 年就診治三十三萬九千宗病症。其他福利工作還包括已成立六個難民中心，另外三個在建造中；設立多間製麵工場，每月製作麵條達十九萬磅，並投入新機器以達生產三十萬磅的目標；截至 1959 年，在建屋的慈善團體中，八成平房是由天主教會建造，其中三千多間平房交由社會福利署不分宗教地分配給難民；以及在難民區為逾萬學生提供教育，又為兒童成立康樂會及遊戲中心。<sup>74</sup>

天主教社會福利服務種類是自 1963 年起大幅增加，包括堂區救濟小組、個案工作服務部、兒童膳食供應處、製奶廠、麵包廠等。<sup>75</sup> 除了已沒有了五十年代的兩項宿舍服務，孤兒院服務亦因應社會需求改變和政府政策，於 1965 年之後全面停辦，反而托兒所則由原來兩三所，大幅增加至 1967 年的十八所。由於種類增加，診所在整體社會福利項目

的份額比例下降，不過其數目實則從 1961 年十八間增長至 1966 年最高峰的三十二間，即使六十年代末有所回落，仍有三十一間，包括三個流動診療所。

### 3.2 兼具留產所的診所

有別於現今診所是沒有留宿的醫療機構此一簡單定義，五六十年代的部分天主教診所設有產床，具備留產所功能。這尤其在領有助產士資格的修女主理的診所，因為生孩子不等人，像打鼓嶺、馬鞍山、坑口等偏僻地區，產婦一旦作動未必能趕得及到公營醫局、醫院或預訂的留產所生產。

華人原本習慣在家中由俗稱「執媽」的接生婆上門接生，但在五六十年代的市民普通貧窮，一間屋住上數戶人家，且一家數口可能共睡一床，在家分娩自然不太方便。1952 年的《香港年鑑》顯示，公營產科床位才三百個，一年出生的嬰孩逾七萬個。1954 年出現的「產床荒」更迫使當局以抽籤形式來分配，每一百名產婦中，只有五六人能抽中。這情況至五十年代末，更惡化至只收頭胎產婦。<sup>76</sup> 五十年代的公營產科床位根本不足以應付所需，坊間從而出現形形色式的留產所，包括私營的和慈善社團開辦的。不過，私營留產所並非人人都能夠負擔得起，天主教慈善診所裡的留產服務就變得極為重要。在接下來的介紹中，我們會看到修女們與產婦和病人的互動。

在 1946-1969 年間，參與醫療服務的女修會有嘉諾撒仁愛傳教女修會，方濟各瑪利亞傳教女修會，拯望會，瑪利諾女修會，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聖母無原罪女修會，聖母聖心傳教女修會，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及耶穌寶血女修會；男修會則有瑪利諾會、聖母聖心會、耀漢小兄弟會。<sup>77</sup> 由《公教報》1970 年刊登的〈香港男女修會一覽表〉中，上述女修會均列出醫療為其中一項專門服務，而男修會卻沒有列出，相信只視其開辦的醫療服務為「傳教」或「社會工作」。這主要是神父修士們即使有醫療背景，他們往往是在外間聘請醫生或找來義務醫護看診，

而不像修女們，多有醫護甚至助產士資格，可直接應對病人。本章基於耀漢小兄弟會是第一個投入難民服務修會而先作介紹，而由於瑪利諾男女修會的緊密合作關係，當時美國天主教福利會在港的難民救濟工作交由瑪利諾會鄭濟民神父（Fr. Paul Duchesne，1910-1983）負責，為免內容重覆，將先行介紹瑪利諾男修會，其餘修會則無先後之分；然後是信徒組織，最後是負責總協調的天主教福利會（香港明愛）。

#### 4. 與調景嶺相關的診療所

調景嶺可說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地區。該處海灣最早可考稱為「照鏡環」<sup>78</sup>，陸上山岡則稱「照鏡嶺」。二十世紀初加拿大商人連尼（Alfred Herbert Rennie）在調景嶺設立麵粉廠，因而得英文地名 Rennie's Mill。連尼因經營失敗投海自殺，坊間誤將其死亡與自縊連結，照鏡嶺遂被諧音取代變為「吊頸嶺」。<sup>79</sup>五十年代難民遷入時，由於地名不雅，取其諧音改為調景嶺。此其時連尼的麵粉廠已成廢墟，但因有平整的地基且靠近海傍，成為調景嶺難民營裡俗稱「大坪」的中樞位置。

一般人記憶中的調景嶺，可能就是這個地方聚集了大量難民，他們大部分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時，逃到香港的國民黨官兵及家眷。這些難民原聚居於港島摩星嶺，因為 1950 年東華醫院開始登記施飯，吸引了大批難民聚集在施飯處四周就近居住。由於政治上左右兩派居民的衝突，政府便計畫將主要是國民黨的右派人士遷離。政府起初計畫將他們遷往梅窩，唯遭到離島鄉民反對而作罷。過往常去調景嶺狩獵而熟悉地形的耶穌會士向政府官員建言，在該處安置難民。<sup>80</sup>1950 年 6 月，政府分批將近七千名難民送到調景嶺。當時的港英政府認為這些難民最終會遷居台灣，只需暫時給予照顧。然而，台灣當局不願接收老弱殘兵，有些人亦不願遷台，加上香港人口不斷增加，貧無立錐之地的非難民也遷至，使得調景嶺不斷拓大，自成一個社區。不過，摻雜的人口沒有多大改變調景嶺的政治色彩，在九十年代全面清拆發展之前，每年「雙十節」街頭巷尾掛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因此有「小台灣」之稱。



調景嶺村雖已全部清拆，但沿路牌狹窄小路前行  
可到達由舊調景嶺警署活化的將軍澳風物汛（攝於 2023 年）

本節記述與調景嶺相關的三間診所，都與最早投身於難民服務的天主教團體、以調景嶺為服務基地的耀漢小兄弟會有關，兩間是在調景嶺第十區，另一間是在港島區筲箕灣的鳴遠醫務所。

#### 4.1 雷鳴遠的子弟兵與調景嶺

天主教會在調景嶺的臨在，始於耀漢小兄弟會（Congregation of St. John the Baptist, CSJB）會長曹立珊神父（1913-2011），而他開辦醫療服務，正正與修會會祖雷鳴遠神父（Fr. Vincent Lebbe, CM, 1877-1940）及修會本身的歷史密不可分。

耀漢小兄弟會是由雷鳴遠神父於 1928 年在河北省創立的國籍男修會，當時稱為「若翰小兄弟會」，以聖若翰洗者為主保，彼此互稱「小兄弟」，兩者均是謙遜的注重；至 1934 年經過一段抗戰經歷，更名為「耀漢小兄弟會」，取「榮耀中華」之意。<sup>81</sup> 與小兄弟會同時創辦的，還有為女性修道人而設的德來小姊妹會。雷鳴遠神父也是《益世報》創辦人。這份 1915 年發行的天主教刊物，是民國時期四大報刊之一，與《大公報》、《申報》及《民國日期》齊名，經營長達三十餘年。耀漢

會於六十年代已差不多完全撤出香港，遷往台灣，至 1970 年時仍留在港服務的會士只剩一人，故耀漢會的名字為教外人可能更為陌生。<sup>82</sup> 至於以「鳴遠」二字為服務機構命名，是為了紀念會祖；相對地，更為外界熟知的相信是鳴遠中學，而非為基層服務的鳴遠醫務所。

雷神父是比利時人，少時讀過在中國殉道的遣使會士聖董文學神父（Fr. Jean-Gabriel Perboyre, CM, 1802-1840）<sup>83</sup> 的生平後，產生了到中國傳教的念頭，毅然於 1895 年加入巴黎的遣使會。他於 1901 年獲派遣來華時，中國沒有一位國籍主教或由中國人管理的國籍教區，這樣的「殖民特點」和「外國宗教」，使雷神父產生了「中國歸中國人」和「培養本地神職」的想法，甚至常常說：「如果我能親吻第二位中國主教的權戒，我寧願付出生命的代價」。<sup>84</sup> 然而，他因推行國籍教區運動開罪了長上，被調派回歐洲，直至 1927 年才能再度返回中國。不過，這個本地化運動並沒有徒勞，因為它產生的效果和影響，導致後來教宗本篤十五世（Pope Benedict XV, 任期 1914-1922）發表的《夫至大》宗座牧函，強調教會本地化的需要，以及教宗庇護十一世於 1926 年祝聖六位國籍主教。



雷鳴遠神父及其創辦的《益世報》  
（照片由 Whitworth Digital Commons 提供）

雷神父回中國時，已進入軍閥混戰和北伐軍事行動的政治動盪時期。由於缺乏醫護人員，軍民均得不到及時救援，河北宣化代牧區趙懷義主教（1880-1927）於是組織信徒從事護理工作，雷神父亦參與其中，擔任志工隊隊長，救護對象沒有限於特定軍隊，而是「基於天主教博愛之大原則」，是其「醫療福傳行動的開端」。<sup>85</sup>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雷神父與同伴決定成立以照顧戰爭傷患為目標的醫療團隊，由耀漢會和德來小姊妹會的成員為班底，再招募其他志願者加入，五天內組成一支二百二十人的醫療隊，又為傷兵成立「殘廢軍人療養院」。<sup>86</sup> 在紅十字會協助下，由雷神父負責指揮救護工作。耀漢會會士訓練新成員之餘，不忘傳教，「醫療隊亦受到軍隊尊敬，甚至修士的修道服裝也成為受歡迎的衣著」，他們的表率亦促使很多非教友的隊員和官兵入教。<sup>87</sup>

1949年與十位會士從華北來到香港的曹立珊神父，他於1930年加入耀漢會，曾擔任雷鳴遠神父的秘書，兩人被指「情同父子」。<sup>88</sup> 曹神父與會士們先在筲箕灣會院落腳，並開設醫務所。1950年，恩理覺主教希望調景嶺難民營能有天主教傳教點，幫助難民之餘，亦為該處的七十二位信徒提供牧靈照顧。當時的難民來自五湖四海，本地神職在語言上未能應付，這便成了從華北而來的耀漢會扎根調景嶺的契機。<sup>89</sup>



曹立珊神父（左一）與裴效遠神父（右二），  
背景可見到調景嶺密密麻麻的寮屋  
（照片由 Whitworth Digital Commons 提供）

來到調景嶺後的曹神父「剪大兵式的光頭，穿上黑大長袍」，在遠離大坪的第五區親自開山闢石，設立聖堂、學校、醫務所、福利救濟工作，包括給幼稚園學生設飲奶站，每天早上向中小學生派發營內自製的麵包作早餐，向難民派發衣服、米麵等食糧。<sup>90</sup> 難民中大批殘障退伍軍人的需求，亦使得曹神父經常要到市區為他們奔走。曹神父如此胼手胝足地服務，大概是受到當年瘦小的雷神父與修士們一起搬床板，又為其他小兄弟盛飯的謙卑精神影響。1954年，曹神父赴台管理修會事務。雖則曹神父是要遵從修會長上的調派而到台灣，但在後期接手調景嶺堂區的聖母聖心會相關歷史記載中，提及曹神父為「不快樂的人的種種煩惱而感到精疲力盡」，或許也是他需要離開的原因。<sup>91</sup> 調景嶺的教務遂交由裴效遠神父（Fr. Albert Palmers, 1915-1991）接手。裴神父也是雷鳴遠神父的門生，屬於傳教輔助會（Society of Auxiliaries of the Missions, SAM），這是雷神父在比利時創立的修會，宗旨是推動中國教會本地化，會士們以輔助角色協助國籍主教傳教，不接受主教權位或教內的高位。裴神父原在南京服務，曾擔任于斌樞機（1901-1978）的秘書，1951年來港時才三十六歲。曹神父的身心俱疲情況，後來同樣發生在裴神父身上，人們的爭執及有人散發傳單並組織簽名運動公開指控他，使他渴望離開，遂於1958年把調景嶺的教務交由聖母聖心會負責。<sup>92</sup>

## 4.2 鳴遠醫務所

本節把鳴遠醫務所（Vincent Lebbe Dispensary）歸為與調景嶺相關，因為診所是由主力在調景嶺服務的耀漢會最早開設。診所位於港島筲箕灣南安街61號。六十年代的南安街位於海傍，離電車總站不遠，除了服務筲箕灣的漁民和木屋居民，亦有調景嶺居民前來看病<sup>93</sup>，皆因筲箕灣在地理上與在九龍和新界邊緣的調景嶺僅一海之隔，船程約三十分鐘。在六十年代初乘船的票價為港幣三毫，視乎船隻型號可接載三十至六十人不等，對接碼頭位於筲箕灣海寧街與興寧街交界的海傍，是調景嶺居民及運送物資更常用的交通工具，比之從山頭徒步到鯉魚門或乘坐巴士到九龍，更為快捷。<sup>94</sup>

筲箕灣在殖民統治剛開始時，是本港其中一條大漁村，流動的艇戶人口隨著漁船靠岸和鄰近石礦場運輸的需要而增減。它與香港仔在十九世紀已是天主教會在港島兩個最早發展和最重要的傳教中心，嘉諾撒女修會戰前就曾於筲箕灣開設診所。後來有船塢在筲箕灣建成，流動人口便逐漸穩定下來，其中有不少還是天主教徒。<sup>95</sup>

由於耀漢會早已遷出香港，在本地可找到的相關資料不多。眾位曾在本地服務的神父修士中，香港教區檔案處的亡者名單僅有張斐理修士（1920-1973）及閔方鮑修士（1918-1964）。張斐理修士又名張文生，原籍河北省完縣人，二十歲加入耀漢會，五十年代中後期在調景嶺的聖耀漢診療所服務，1969年開始主持鳴遠醫務所，至1973年去世止。<sup>96</sup>在他逝世時《公教報》刊登了何若庸的一首詩可讓我們略為了解張修士的工作及他與其服務對象的關係。作者寫到：

「在嶺上老朋友的心理，那個沒有你的影子呢？  
.....

在香港對窮人服務，都有鳴遠精神的活現。

主的愛德，在你身上也找到證明了。

你走了，再不能聽到你喚『大哥』的親熱聲音了。

同時，筲箕灣的漁民艇窩裡，相信也再難有你這個褓姆了」。<sup>97</sup>

閔方鮑修士是河北寧晉縣人，在抗戰時期跟隨雷鳴遠神父從事救護工作，1949年來港後在鳴遠醫務所司理藥物，在六十年代初積勞成疾，「油鹽俱不得食，然依然照常工作，拒絕休養」，直至1964年因病情惡化辭世。<sup>98</sup>

曾管理或協助鳴遠醫務所工作的會士，還有李文南修士，1955至1968年均由他擔任診所主任。至於醫生大多是兼職之身，有鮑漢勛、陳復生、黃廣洪、梁淑安、潘錫貴、葉偉貞，以及從1969至1973年，成為最後一位主任醫生的林濟中。由於醫務所部分員工是兼職的，一度有多達四位姑娘，一位負責協助醫生、兩位為病人打針和一位配藥員，顯示當時對廉價醫療需要之大。<sup>99</sup>

### 4.2.1 診所姑娘的回憶

現年八十三歲旅居澳洲的張寶英女士是於 1957-1962 年在鳴遠醫務所任職的姑娘，其時才十六歲。<sup>100</sup>

張寶英有七兄弟姊妹，排行第六，十三歲從大陸來港，只有小學程度，不懂英文，由兄姊照顧。由於家境不好，沒有機會讀書，年紀太小又不能工作，後來有一位住在調景嶺的同鄉前來探望時，提議姊姊讓她和妹妹去調景嶺免費讀書。

「我在調景嶺寄宿，當時要乘船才能到達調景嶺，每次收費好像是兩毫，所以大部分學生都是寄宿的，每周回家一次。我們的宿舍在調景嶺山頂，是修女管理的；上課地點是在山腳，並且提供三餐『伙食』，每天用過晚餐後便回山頂宿舍，第二天再下山上課。」

十五歲的張寶英與妹妹一起到鳴遠中學讀書，並領洗入教，可惜因家境困難，一年後決定停學外出打工，讓妹妹繼續學業。家人擔心工廠環境複雜，不准張寶英到工廠工作，當時一位住在調景嶺學校的修士告訴她，診所需要人手。診所是由修士管理，加上已有一位同級同學在那裡服務，家人便同意讓她去工作。

「開始時因為什麼也不懂，他們讓我『跟醫生』，即是為病人探熱、安排病人排隊候診、在診症室詢問病人狀況，讓醫生知道後作檢查和處方藥物。半年後修士安排我在藥房學習配藥、打針，之後幾年便在藥房工作。」

醫生處方書寫比較潦草，修士和醫生又沒有教導她藥物名稱，她生怕自己出錯，唯有「多看、多問和記憶，做了一個多月就學會了」。而且醫生在當年社會地位較高，「感覺比較『大牌』，很少和我們傾談，只會安排工作。修士也差不多，比較嚴肅，只跟我們打招呼和安排工作而已……他們真的很少說話，除非是『講道理』<sup>101</sup>，但他們不會向我們『講道理』」。

當時藥房由閔方鮑修士管理，李文南修士負責探熱和登記。兩人是北方人，廣東話口音不純正，張寶英是廣東人，但在調景嶺一年多，讀書授課都是用國語，所以聽他們講話沒有太大困難。

雖然雷鳴遠神父當初以耀漢會為志願醫療隊的班底，但在醫務所的修士並沒有受過正規醫學訓練，不懂得治病。「在藥房服務的那位修士，是到了診所後才學配藥，他根本不懂藥物的。至於另一位修士，他什麼也不懂。原先診所請了一位教友負責登記，我們教他（修士）為病人登記、探熱，好分擔工作。後來他學懂了，就把那位教友辭退了。他除非看見很多病人在排隊登記，我們應接不暇，否則很少從樓上下來幫忙。」



「在藥房服務的那位修士有肝病，可能是這個原因，他們安排我在藥房受訓工作，減輕他的工作量。如果他病情嚴重，就不會前來。我向負責登記的修士反映，有太多病人，配藥工作繁重，又要配藥、加上用藥標貼（見圖）、派發藥物，我一個人真的應付不了。後來負責登記的修士也過來藥房幫忙，但他不認識藥物，看不懂醫生的處方，我只好先調校藥物和預備標貼再交給他注滿和貼上，由他派發給病人。可是他的廣東話不純正，病人聽不懂他呼喊的名字，不來取藥，使得候診大廳人山人海。」

診所是固定的建築，佔地面整層，面積大約一千平方呎，有大廳、藥房、注射室、診症室，甚至後期的手術室，還有廚房、洗手間和雜物房。大廳設有三張長凳，讓病人候診。每周應診六天，每天有逾百人求醫，工作十分忙碌。全職在診所服務的兩位修士住在上層會院，台灣來的神父修士也會在此短期居留；而在調景嶺管理學校的修士只會偶爾去南安街巡視和開會。



醫務所內部掛有十字架及對雷鸣遠神父的介紹

（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每天八時上班時，門外已大排長龍。因為人數太多而候診空間有限，我們開診後便先為病人登記，較遲登記的病人可以稍後再來。如果上午未能求診，已登記的病人下午可以再來。」求診者多是父母帶來的小朋友，症狀主要是傷風感冒。如果是成人，多是血壓高和勞損。若醫生診斷後覺得病情嚴重，便會轉介病人至政府醫院或到專科求診。曾經小朋友在接受注射後，對藥物有反應，當場抽筋，醫生急救無效，召喚救護車，可惜最後救不活。



鳴遠醫務所外大排長龍（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張寶英女士在鳴遠醫務所配藥室工作（照片由張寶英女士提供）

張寶英工作時期的醫生是鮑漢勛。他九時會到鳴遠醫務所看診，十一時左右完成上午的診症後，便回自己在北角的診所。診所姑娘則工作到中午，下午二時再回來做調校藥物等準備功夫，三時開門應診，但醫生實則四時才回來。每天診症約六小時，至傍晚六時停止服務，收拾完成後已是晚上七時。

為了工作方便，張寶英與診所工作的同學在筲箕灣半山以月租四十元向一位教友合租一間小石屋，距離診所約半小時路程。石屋沒有食水供應，需要僱人「擔水」，每天「一擔水」費用是一毫；洗滌就使用山水。

在她工作的時候，鳴遠診所「已經很出名，柴灣徙置區、筲箕灣漁民區的居民和調景嶺難民全都知道。越多人求診，加上有物資派發，就越多知道」。張寶英對這家天主教診所的印象不錯，因為它服務貧民之餘，還派發物資，對民眾幫助很大。「那時普遍工資不高，一般公務員的工資才約二百多元，很多家庭經濟還是比較困難。」

筲箕灣當時已有公立醫局，收費和鳴遠一樣是一元，而普通私家醫生收費大約八至十元。五十年代末，一元診金相等於兩條方包，或一頓晚餐的食材，牛肉、豬肉等肉類約三毫，青菜一毫。政府診所每天診症

名額有限，鳴遠則接受所有當天求診的病人，在取藥後還可領取物資，像白米、奶粉、麵粉、衣服等。張寶英直言：「有時候分不清楚病人是來求診還是為了拿物資。如果有物資派發時，修士也會讓我們取四、五斤一包的白米。」

張寶英入職時每月只有一百元工資，但診所提供早餐，且好處是沒有夜診，使她可以到聖十字徑村教堂的學校進修英文，每個學期學費十元。「後來遇上一個女病人，好像是學校校長，學校為老師『包伙食』，提供午餐和晚餐，她讓我們跟老師一起『搭食』，每餐收費八毫，我們就參加了。算一算，工資一百元，租金佔了二十元，午餐晚餐花了五六十元，還有食水費、學費，加上每個星期六回九龍哥哥姊姊家坐電車、船和巴士的交通費用，要很節儉才能應付生活，沒什麼積蓄。當時沒有什麼娛樂，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機，偶然只會看看工餘場，票價兩毫。」



鳴遠醫務所為張寶英開出的離職證明（照片由張寶英女士提供）

張寶英一直工作至 1962 年，以求學深造為理由辭職。她解釋：「因為修士病了，藥房工作量太大，我每天工作得筋疲力倦，真的不想幹下去。當時負責打針的姑娘，她丈夫在民政司署工作，他聯絡柴灣街坊福利會理事長，建議他們開辦日間托兒所。那位姑娘問我有沒有興趣轉職。我細心一想，在鳴遠診所工作了五年，真的很累，看不到前途有多大發展，加上工資不高，只有一百五十元，就決定嘗試一下。當時托兒所聘用條件是月薪一百八十元，並提供膳食和住宿，晚上還有空閒進修英文。」

怎料托兒所營運一年便倒閉。托兒所所長後來轉到橫頭磡另一家托兒所，也邀請張寶英去工作。那裡剛好是張寶英後來居住的地區，便答應了，工作了兩年直至結婚為止。在 1975-1978 年間，張寶英有感子女都已入學，便重操故業，在一家私家診所兼職半天，這也是她最後一次在診所工作。當時工作時間由二時至七時，負責配藥房和打針，隨著社會生活水平提高，工資已跳升至五百元。診所每天只有約二、三十位病人，遠沒有鳴遠的年代那麼多，而每次診金約十多元。

在七十年代，聘用診所姑娘仍沒什麼學歷要求，大多是中學畢業；注射針藥也不需要專業資格。張寶英第二次到診所工作時，能負責藥物注射，便要提起在鳴遠的年代所接受的訓練：「我們有空時，就找姑娘教我們打針。當時診所每天都有很多病人，只有在颱風的日子，病人比較少，我們有空就學習打針。起初為病人打針時有點害怕，後來工多藝熟，就不害怕了。」

### 4.3 聖耀漢診療所

位於調景嶺的聖耀漢診療所（St. John Baptist Dispensary）是曹立珊神父於 1952 年開辦，無分宗教地診治病人，有指它一度是調景嶺唯一提供醫療的地方，每周求診者達數百人。<sup>102</sup> 診療所設於鳴遠中學與聖母升天堂範圍內，「初由中國籍之張修士主持」，備有普通科藥物

及急救用品；「如遇有重病者，由會方介送本港法國醫院免費治療，是否收容，則視病情及院方床位有無空額而定。病者之運送，常由鳴遠中學年齡較大學生志願抬運至碼頭及協助上落船車。」<sup>103</sup>

診療所一周六天上下午應診，由聖堂副本堂裴效遠神父管理，前述的張修士應是指張斐理，他在 1956-1960 年為診療所的職員。1959 年，診所交由聖母聖心會負責，所長為聖母聖心會雷振東神父（Fr. Octaaf De Vreese, CICM, 1900-1996），張修士仍然任職該處，至 1961 年職員改由李金泉先生出任，翌年出現護士一職。1963 年的所長為范普厚神父（Fr. Alphonse Van Buggenhout, CICM, 1906-1983），1965-1966 年的所長為原籍河北的張振中神父（又名張震中，CICM, 1923-2005），有李醫生（Lee Kam Tsuen）及一位護士派駐。<sup>104</sup>



修女們與學生在戶外活動，從照片可見到天主教建築群<sup>105</sup>

（照片由 Whitworth Digital Commons 提供）

1. 五十年代天主教小學飯堂； 2. 空地原是鳴遠中學操場，後來建成小學校舍；
3. 聖堂及學校位置，診所位於附近； 4. 鳴遠中學校舍； 5. 幼稚園校舍
6. 橋位置伸延向海，後建成鄉下式公廁，公廁下面是海邊
7. 鍾紹華家人第一間居所的位置

#### 4.4 由修女主辦的聖若瑟護理站

聖母聖心傳教女修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ICM），原稱「聖奧斯定女修會」（Canonesses of St. Augustine）<sup>106</sup>。會祖是比利時籍梅師德修女（Sr. Marie Louise de Meester, 1857-1928），她於 1881 年加入 Canonesses Regular 修會，適值修會受印度一位神父邀請到當地服務，梅修女請纓與其他修女前往，接手當地的孤兒院。梅師德修女為使想進入修會的本地候選人不用長途跋涉到歐洲接受培育，認為需要脫離比利時的修會，最終於 1897 年成立新的聖奧斯定女修會。1910 年，教宗庇護十世（Pope Pius X, 任期 1903-1914）批准修會與比利時傳教士合作，在菲律賓一起服務。修會與比利時男修會「聖母聖心會」合作多時，協助傳教和牧靈活動，最終修女們在 1963 年的全體大會上，通過更名為「聖母聖心傳教女修會」。

聖母聖心傳教女修會早於 1923 年已來華，與聖母聖心會合作，故此主要也是在華北塞外地區服務。她們在內蒙、寧夏、河北、北京、江西等地的每個傳教點均設有施藥所，甚至醫院和護理學校。對於回應內地主教要求派修女來華的決定，會祖梅師德修女曾在信中向其他修女解釋：「各地都要求派遣修女……這個可憐的中國主教常縈繞我心頭。三千七百萬不認識主的人；十四位神父，卻沒有一個修女。如果修女們見到這位可憐主教的哀傷神情，她們便不會驚訝，我會因為沒有修女，即使孤身也應該去那裡。」<sup>107</sup>

聖母聖心會修女 1954 年從內地被驅逐出境來到香港。裴效遠神父在抗日戰爭期間，在俘虜營已認識修女們，知道她們會說北方話，便邀請她們到調景嶺服務；修女的通訊處則為耀漢會的南安街會址。與當年聖母聖心會留在香港情況一樣，主教只允許修女們在難民營內服務。<sup>108</sup>她們首次到調景嶺時，下船後走了約一個小時的山路，才到達用油紙、石和草搭建的聖堂和學校，再走十分鐘的山路，才到達由一位英籍婦人為她們搭建的茅屋會院。她們的工作主要是教育，並設有可容納六十人

的宿舍。由於修會在內地的醫療工作經驗，她們亦協助診所和救濟活動，同時亦向兒童講授教理。<sup>109</sup>

與耀漢會一樣，聖母聖心傳教女修會現已撤出香港，不過時間和原因都不盡相同。隨著印度籍甘美雅修女（Sr. Benedict Amutha）於2022年12月回國，標誌著該會在香港的服務正式結束。據她解釋，她們的修女在2012年時都已達七八十歲，原來在東頭邨仍然營辦的溥仁學校也要交由另一辦學團體繼續；如今十年後只剩她一個人在香港，即使萬般不情願，基於聽命精神，只能遵從修會的決定而離開。

能操廣東話的甘修女1994年獲派遣來港。甘修女憶述自己當年9月到港，修會在調景嶺辦的學校已結束，女宿舍亦空置，其他修女已遷到將軍澳的魷魚灣和其他地區的會院，她只是陪會長去執拾剩餘物資，所以對調景嶺只有零碎的認識，包括曾有三位修女在調景嶺服務。她們是羅貞德修女（Sr. Lea Rotty，教名 Sr. Marie-Aubain，1899-1984），胡慧姑修女（又稱胡惠姑，Sr. Maria D'Hondt，教名 M. Arnoldina，1906-1986），兩人是最先到該處開展工作；此外是蘇濟姑修女（Sr. Maria Somers，教名 M. Perboyre，1904-1988）。「學校管理得很嚴格，在宿舍晚上是不能講話，但很多女孩子長大後，做了社工、校長、醫生等職業，都多謝我們」。<sup>110</sup> 甘修女分享其中一位舊生的感謝函：

「我記得，當我還很小的時候，我有時生病，媽媽沒有錢讓我  
看醫生。但在修女院裡，有一個醫務室，當我摔倒了或者發燒，  
我喜歡去那裡看醫生，實際上，有一個修女是護士。診治後，那  
個修女便會發糖果。

另一方面，我的內心也有些矛盾。你剛才在照片上看到，  
修女穿著會衣，都是白色的。但在我的記憶中，它是黑色的且  
很長；<sup>111</sup> 我的第一印象是我只能看到修女們部分的臉，因為她們  
全部都戴著大頭紗，讓我很害怕。

但修女們是那麼充滿愛心和熱情，我卻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我就問媽媽：『那是英語嗎？』我媽媽是廣東人，她猜：也許是的，有可能。其實修女都來自華北，而調景嶺那裡有很多北方人，我無法理解他們的話。直到上了小學，我才知道那些是北方話。」<sup>112</sup>

據《香港天主教手冊》資料顯示，修女辦的診所名為聖若瑟護理站（St. Joseph Nursing Aid Post），於1964年設立，但只有1966年登記在冊，地址為調景嶺十一區62號，負責人是胡慧姑修女。胡修女是護士兼助產士，於1932年到中國，1954年來港，四年後因修會在台灣開展工作而離開，1964年重回調景嶺。

比利時籍羅貞德修女曾兩度來港。她最先於1929年到華北從事牧靈工作達二十五年，1954年被逐離開大陸後來港在調景嶺難民營服務，同樣於1959年調往台灣，1964年再重臨調景嶺繼續牧靈、教育及護理工作，至1978年因健康欠佳回國休養。<sup>113</sup>蘇濟姑修女1932年到中國，1948年離開，1962年來港，兩年後調往台灣，在港時間比較短暫。



1933年胡慧姑修女（中）在內地醫院與病人及家屬合照<sup>114</sup>

1965年，修會在港的隊伍擴大，服務拓展至在市區辦學。同年3月，得到公教婦女會捐助，由修會管理的鳴遠中學新女生宿舍和新診所啟用。兩年後，曾在內地服務的護士修女費守義（亦稱費守禮，Sr. Gaby Van de Vijver，教名Sr. M. Amelberga，1905-1995）也從台灣調來

協助診所工作。修女們的藥物由比利時、德國和美國捐贈，病人只需付少許藥費，而鳴遠的學生則全部可獲免費診治。

關於聖若瑟護理站，可說是聖耀漢診療所的分支。修女們 1954 年初抵達調景嶺時，聖耀漢診療所已運作幾年，修士們便把照顧婦孺的任務交給了胡修女，他們則繼續照料男性病人。修女們很快便融入社區，並提供了所需的接生服務。胡修女不論早晚，經常以她僅有的工具被請去接生。在 1955 年，修女們共接生了七十二個嬰兒。修女亦為產婦提供起碼四、五次產後護理家訪，後來因人手不足，不能到家接生，使得居民大感失望。但她們的護理站每天仍為四、五十人看診。逢周三，胡修女和羅修女又坐舢舨到坑口村和附近村落看診，有些病人是她們在調景嶺診所認識的。去坑口的路程殊不容易，調景嶺一天有兩班街渡去坑口，可坑口沒有碼頭，所以要另外以一兩毫的價格坐小艇接駁上岸。此外，羅修女亦協助有需要送院的病人爭取減免醫療費用。<sup>115</sup>

#### 4.5 教友夫婦的記憶

1960 年，當年四歲的鍾紹華先生隨家人搬到調景嶺，最初居於聖堂下坡方向，街坊稱為「舊五區」的寮屋（十區 141 號），後來再在山上購置更大的石屋。他太太陳婉貞是八十年代從灣仔嫁到調景嶺的教友。他們的回憶為本研究補充一些資料。

1962 年 9 月，颱風溫黛吹襲，許多房屋被毀，教堂及診所都遭到破壞。<sup>116</sup> 六十年代中期，聖母聖心會修女在為女生而設的聖母宿舍旁邊開設了一間新診所，但只維持一段短時間，至 1971、72 年左右便關閉了。

鍾紹華指出，颱風溫黛之前，張修士——張振中神父的侄兒，在診所駐診，他也懂得醫術。當時的調景嶺已由政府房屋署管理，改稱調景嶺村，不再是難民營。與後期遷入的許多居民一樣，他的父母「知道調景嶺的房子很便宜，地方又自由自在，便搬到這裡來。當時是租房子住，只需幾塊錢一個月，買一間屋也只是數十元」。<sup>117</sup>

陳婉貞說：「這是他們的天堂，因為他們住在這『山旮兒』（偏僻地方），全部都是自己搭建的寮屋區。後來有水有電，什麼設施也有，從前沒有衛生設備，每一家都可以建造自己的廁所。」<sup>118</sup>

調景嶺除了政治色彩令其顯得特殊，它在地理劃分上——不管是天主教會還是政府——也頗為有趣。陳婉貞指出：「香港教區編排這個地域，曾經是屬於新界區，最終變成東九龍總鐸區。而我們的電話，以前九龍電話是3字或0字開頭，調景嶺也是3字開頭，即是電話機樓屬於九龍，但我們的水費電費就屬於新界，選民選區就屬於新界東，我們是在這個很有趣的地方，地理環境和所有設施因着政府部門和不同機構都有不同的分野，所以是很特別的。」

聖母升天堂由最初的草棚建築，改建成穩固的石磚樓房，見證著調景嶺的演變。鍾紹華 1965 年開始在彌撒中做輔祭，其時聖堂已轉交聖母聖心會管理。常到聖堂玩樂的他，已沒見過耀漢會的神父和修士，只有從鳴遠中學的學長口中聽到他們的往事。至於所謂診所，陳婉貞表示：「其實並不是正規的。那是在鳴遠中、小學和聖堂範圍裡面的一個地方，方便照顧」。

鍾紹華小時候可說是診所的「常客」，每當打球受傷，「損手爛腳，小小發燒的時候，就會自己去給她們看看。不用家人帶去的，我們十歲八歲已經是通山跑」。教會診所的診金很便宜，「看一次醫生只收費一兩毫子。有時還請我們吃糖果。當時五六毫子就可以買一斤米」。

教會診所的病人不算多，都是鄰近的街坊，因為大坪相對較遠，生病時修士和修女的診所便成首選。大坪的醫療設施是屬於靈實醫院的，每天都有醫生進駐大坪。陳婉貞補充：「如果是重病，就會出去大坪，再嚴重些就會去靈實醫院，到外面留醫的也有。靈實是防癆醫院，香港當時有兩間防癆療養院，九龍是基督教的靈實醫院，港島就是天主教修女主理的律敦治，都是與宗教團體有關。」

雖然相關診所的資料或受訪者都沒有提及，但一篇關於瑪利諾會在

港的歷史的文章卻提到雙十節過後，通常會有人因放鞭炮被火藥燒傷而需要醫<sup>119</sup>，相信這情況在有「小台灣」之稱的調景嶺在雙十節過後也是常見的求診原因。

## 4.6 小說中的原型

即使天主教會很早已在調景嶺設置診療所，輔助了當局早期在該處所設的醫療設施，這些服務相對於基督新教的陣容，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基督新教最初由不同差會各自提供服務，包括原於湖南從事醫療傳教的美國復初會，另有蘇格蘭教會差會、挪威聖約教會差會、中國內地會等；後來差會之間決定結集力量，於1953年成立了「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辦會」，四年後更名為「將軍澳區醫援會」，1990年再更名為「基督教靈實協會」，新的人手也不斷加入，兩年後更成立了地標性的醫療機構——靈實肺病療養院（1976年更名為靈實醫院，九十年代初納入醫院管理局）。<sup>120</sup> 在1971-1975年間，基督新教在調景嶺的普通科醫療設施每年診治逾一萬三千人次，婦產科產後服務每年也有數百宗。<sup>121</sup>

不過，由於修女的衣飾獨特，成為了林蔭先生（原名林志英，1936-2011）在其小說《日落調景嶺》中的人物——「蘇菲亞修女」。雖然作者已逝世，無法確認「洋修女」蘇菲亞修女的原型人物為誰，但作者在小說後記中提到自己曾三次到訪調景嶺，除了參觀和陪伴親友旅遊，第三次是1994年為其小說實地去搜集資料，與仍未遷離的老人聊天，並由他們帶領四處參觀。我們或許也可從中作者筆下想像到修女們的服務。

故事中，這位「身材高挑、穿著黑色袍子」的蘇菲亞修女重遇在東華醫院認識的難民夫婦高弘和趙傖，又從另一難民白如露口中得知趙傖已懷孕，歡喜地承諾：「將來我為你接生」，並解釋自己是合資格的護士兼助產士，是她要求教會派她到調景嶺難民手手營「進行傳道和搞醫療工作」，而社會局則應要求撥出土地，讓教會「搭建一個三角葵棚，日間作醫療之所，晚上作傳播福音之用」。<sup>122</sup> 趙傖在小說中就是在葵棚一角用木板搭成的產房生產。在這簡陋小房間，只

有必需的助產儀器和藥物，卻曾有幾個產婦在此生產過，而醫療站平常亦會為兒童注射針藥。<sup>123</sup>

#### 4.7 修會隨調景嶺發展而遷出

時至七十年代，聖母聖心會女修會仍有新成員派來香港，但派遣到調景嶺的，以教育工作為主。有護士資格的，已沒有到診所工作，如 1968-1971 年在港的馬德信修女（Sr. Julia Matthijsen，教名 Sr. M. Louisa，1937-2007），她在聖母醫院擔任護士不到一年因健康原因離開；1971 年來港的蘇益生修女（Sr. Therese Sohier，教名 Sr. M. Werenfrieda），初期在聖母醫院任職護士，後來為了對基督徒合一作出貢獻，轉往基督教聯合醫院工作。此外，又有修女從事智障人士照顧和醫院牧靈工作。八十年代，政府發展將軍澳，在坑口及調景嶺之間填海。鳴遠中小學獲得新校舍而遷離原址，修女們亦開始撤出調景嶺，最後一位留守者於 1991 年搬離。

105

第三章 1946-1969 偶然的歷史時空創造發展的機會

## 5.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社區診所

自二戰以後，大量移民南下來港，加上高出生率，為香港在各方面帶來很多挑戰。聖保祿女修會六十年代的香港省會長（任期 1960-1968）是納德·貝克維姆姆（Sr. Bernard de Marie de Broqueville，1919-2000）<sup>124</sup>，她在 1948 年完成護理訓練課程後，翌年便被派來香港服務。到了 1954 年成為九龍聖德肋撒醫院院長，致力擴展醫院，提供更多醫療服務。在 1960 年獲委任為省會長後，她改革會省組織，整個團體按照修女從事的宗徒工作：醫療、孤兒服務、學校及修院等四大範疇，分為四個會院，增設會院院長，這樣團體服務能夠更專注發展和迅速回應社會的各種需求。

### 5.1 社區診所推手——納德·貝克維修女

納德·貝克維姆姆除了派遣修女往難民中心和堂區服務，教授要理和探訪家庭，亦於 1961 年在大埔區開辦傳教所和獨立的診療所，服務大埔居民。到了 1964 年她又應邀與天主教社會福利會<sup>125</sup>合作，支援在大坑道和堅尼地城開辦診所，服務窮人。會長任期完結後，貝克維姆姆仍然留在香港服務，直至 1977 年當選為羅馬總會助理才離開。可以說，在六十年代困難的時刻中，充滿傳教熱忱、熱心關愛受苦者、勇於改革和行動的貝克維姆姆連同整個修會為當時的貧困者帶來支援、希望和慰藉。<sup>126</sup>



隆巴第診所揭幕（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 5.2 大坑天主教福利會隆巴第診所



隆巴第診所外觀，左邊可見到兩位白衣修女與候診人群  
(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自五十年代開始，許多無家可歸的難民，依山搭建寮屋、木屋，從而引發很多衛生問題。當時銅鑼灣、大坑山邊一帶有很多寮屋，形成大坑村、芽菜坑村、馬山村及蓮花宮村四大區域。區內衛生欠佳，沒有民生設施配套，居民面對沉重的醫療壓力。在六十年代，天主教福利會的一個工作重點是協調不同修會的醫療服務；貝克維姆姆為回應人口劇增、醫療不足的困境，應跑馬地聖瑪加利大堂容達榮神父（Fr. Giovanni Pittavino, PIME, 1914-1997）的邀請，與天主教福利會合作，在銅鑼灣大坑金文泰道的木屋區開設診所，服務居民。1964年2月，診所正式成立，名為「天主教福利會隆巴第診所」（Caritas Lombardi Clinic），以紀念當時剛去世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總會長隆巴第神父（Fr. Augusto Lombardi, PIME, 1898-1964），建築費用一萬五千港元，其中一萬二千元由西德教友捐助，餘款由聖瑪加利大堂籌集。<sup>127</sup> 在籌備過程中，聖保祿醫院為診所提供傢具和藥物，甚至借出醫生和配藥員。按1965及1966年的《香港天主教手冊》，隆巴第診所的所長是容達榮神父，主要職員初期都是聖保祿修女。診所提供普通科診療和派藥服務；初期是星期一、三、五上午有醫生值班診症，下午有修女當值，1966年診症人數約一千人。<sup>128</sup> 由於大坑接近聖保祿醫院及修會會院，即使身為會長，貝克維姆姆有時候也會偷空溜出修院，前往隆巴第診所照顧貧困病人。另外一位在大坑服務過的是李金玉修女（1914-2007）。原籍福州的她於1935年入會，初學後便派到聖保祿

醫院服務，在大戰開始前，剛完成急救及護理課程，在 1960 年接受委派負責大坑診所的開設工作。<sup>129</sup> 李修女被形容是一位「可愛而勤力的修女」，全心為病人服務，「很受尊重和愛戴」，修會孤兒院的院童都會很親切地稱她為「姆姆」。<sup>130</sup>

香港明愛社會服務部前部長陳秀嫻博士談及隆巴第診療所時，指省會長貝克維姆姆和修女們把診所當作聖保祿醫院門診部的伸延，低調地服務木屋區居民。<sup>131</sup> 隨後幾年政府逐漸遷拆大坑木屋區，居民人數和相應的醫療需求減少，隆巴第診所在 1968 年終止營運。<sup>132</sup>

### 5.3 堅尼地城若望二十三世診療所

在隆巴第診所投入服務的同年（1964 年），天主教福利會在堅尼地城蒲飛路 27 號開設社會服務中心。據《華僑日報》1965 年 2 月的報道，該中心在 1964 年尾已啟用，能為四百名青年提供職業訓練，還能有容納八十人的日間托兒所，以及門診部和牙科保健中心。這所「天主教福利會若望二十三世診療所」（Pope John XXIII Clinic）由侯奕純神父（Fr. Patrick Joseph Howatson, SJ, 1910-1972）監督，有一位醫生及兩位修女任職，這些醫療支援人員正正是由聖保祿修會派出。按《香港明愛年報》1965-66 記載，若望二十三世診療所在 1966 年門診人數達三千一百零三人。<sup>133</sup> 其後由於社會服務中心把發展計畫的重點放在照顧青年和兒童的需要，診所服務在 1968 年 12 月停辦。<sup>134</sup>

### 5.4 新界區服務的落腳點——大埔

早在 1861 年天主教傳教工作已在大埔開展，在碗窰和汀角設有小聖堂，並有奉教者領洗，主要為客家村落居民。自 1875 年起，由於傳教資源有限，傳教中心由大埔改為西貢，加上小聖堂破舊和距離大埔市集太遠，未能有效運作，導致在大埔的傳教事業沒有多大進展。到了 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翌年港英政府在大埔旗桿山成立北區理民府處理新界事務，並設有醫官辦事處及診所。當時在大埔服務的首位醫官

是華人何乃合，是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首批的畢業生。他在大埔負責照顧駐紮的警察及其他政府公僕的健康、向尋求協助的村民提供服務。不過，村民當時普遍會選擇向中醫求診。此外，醫官亦為居民接種天花疫苗，尤其是初生嬰兒。<sup>135</sup> 在 1899 年以前，天花是小孩夭折的主因，在 1920 年代開始的龐大疫苗接種人口，對區內的健康狀況產生重大的影響。大埔墟亦是其中一個最早獲派駐助產士的墟鎮，助產士在家中設置三四張產床，產婦在適切的照料和確保衛生的環境下生產，夭折率下降至少四份之三，新界人的平均壽命也從二十多歲大幅延長至超過四十歲。大埔又設有一輛手推的救護車，把行動不便的病人送到醫局。自公路開放給機動車輛後，村民要求正式機動救護車，當局有感要設立一間茅草建造的醫院使救護車能載送鄉郊助產士沒法處理的難產孕婦到該處治理，奈何沒有足夠資金提供此項服務。在三十年代，聖約翰救傷隊在整個新界區提供志願救傷車服務，並在每區設立診所，「目的是使政府蒙羞，逼使其改善施政」，而當局直至戰後才採取措施。<sup>136</sup>

在基建設施方面，政府建造道路（大埔公路）、九廣鐵路、填海工程等，令大埔市集迅速發展。有見及此，教會當局認為確實有需要在大埔墟內購買土地興建大型聖堂，發展傳教事業。由於墟鎮的鄉紳父老不希望有任何基督宗教的聖堂在市集內出現，所以天主教代牧區未能購買接近墟市的官地作聖堂之用。1923 年，教會當局在這些限制下，只能買下錦山一幅土地興建聖堂，三年後祝聖啟用，取名聖安德肋聖堂，可以容納一百二十人。這所新聖堂位於山頂，位置空曠，建築物容易受颱風吹襲，沒有水電供應，在開展慕道或教育服務時，令人裹足不前。

1937 年，聖安德肋聖堂受猛烈颱風吹襲，嚴重受損。主任司鐸區鴻慈神父（Fr. Diego D'Ayala-Valva, PIME, 1900-1989）租用大埔公路<sup>137</sup> 附近兩棟大樓作臨時聖堂，位置即今天廣福道 135 及 137 號，因為原址曾用作鴨場，所以那地方被稱為「鴨毛寮」。那兩棟建築物有三層，區神父把最上層用作宿舍，中層作為聖堂，地下用作貯存救濟米糧的士多房和教授道理、堂區善會及小組開會之用，其他空間作為學校教學用途。鴨毛寮臨時聖堂細小，只可容納六十人，而三十年代大

埔教友人數約八十人，還未計算在同一傳教區內的粉嶺和沙田信眾，所以聖堂很多時候不敷應用。由於它位於大埔墟附近，更適合傳教和照顧教友，最終取代了被關閉的錦山聖堂。直至戰後 1945 年，主教批准這臨時聖堂為大埔地區的正式聖堂。因為理民府仍然以墟鎮的鄉紳父老意願為由，拒絕主教申請以錦山聖堂土地交換大埔墟土地興建正式聖堂，教會當局只好在 1947 年購入鴨毛寮一地。由於申請官地阻力甚大，教區於 1958 年改為向私人購買運頭街地段興建堂。最終，可以容納四百四十人的聖母無玷之心堂在 1961 年 6 月由白英奇主教祝聖啟用，鴨毛寮臨時聖堂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sup>138</sup>

大埔和香港其他地區一樣，需要面對大量移民南下來港的問題。不同的是，遷往大埔的多是客家漁民，原因是過往一直有渡輪來往大埔和大鵬鯊魚涌作商品貿易，所以鯊魚涌的居民（漁民）對大埔很熟悉，與他們同來的亦有很多來自大鵬灣的漁民。這些移民當中很多是天主教徒。他們來到大埔後，聚居於大埔墟東部吐露港海濱一個小島附近的海灣，形成一個大規模的艇戶寮區元洲仔<sup>139</sup>，即現今廣福邨、宏福苑位置，接近鴨毛寮聖堂。當聖堂派發救濟米、麵粉和其他物資時，大部份救濟品都是分發給艇戶人家和送往區內非常貧窮的村落。

九十多歲的教徒廖馮麗屏在鴨毛寮聖堂時代領洗並開始作傳道員，由海澤黎神父（Fr. Domenico Maringelli, PIME, 1913-1989）教她道理。她說：「我在 1954 年領洗後便服務教會，當時我只得二十多歲。……在大埔傳教要四處探訪，跟神父去村落教道理，去西貢、白沙灣、高流灣、塔門、小塘等。」她提到以前沒有甚麼交通工具可以到達，只可以坐船，村民多數是耕田的，但很虔誠。「一講到領聖體，怎樣艱難也會來的……我時常跟神父到大埔的元洲仔探訪，那裡很多孩子沒有機會讀書。」廖太兒子廖偉盈也憶述廖太出外傳教的光景：「我小時候，媽媽出外傳道，要花很多時間，有時候甚至要過夜，一兩天不在家。當天去了一些村，未必有船回來，要第二天才有回程的船。當時傳教全部都是靠腳行的，上山落山，很艱難的。……媽媽一星期做足七日，除了出外傳教，還負責主日學。」在 1960 年間，大埔墟市人口比五十年代已增

加一倍，天主教徒的增長比率更高。廖偉盈指出當時的大埔墟市範圍集中在懷仁街、懷義街等十多條街，由寶鄉街以南往聖堂方向是西洋菜地，他們要經過田畿，即現在運頭街，才可以到達聖堂。<sup>140</sup>



鴨毛寮海星教理室及診所建築上仍保留「Catholic Mission 天主堂」字樣。  
（照片由聖保祿女修會提供）



昔日鴨毛寮「天主堂」今天的位置（攝於 2023 年）

1961年省會長貝克維姆姆在鴨毛寮原來的天主堂建立會院，派遣梁志修修女（1909-1980）<sup>141</sup>和鄭瑞琮修女（1907-1977）<sup>142</sup>來大埔服務，幫助有需要及不幸的人。<sup>143</sup>修女們起初居住在一間曾是店鋪的房間，附近環境半是郊區，半是沿海地區，並排著的舢舨就是居住的地方。當聖母無玷之心堂落成啟用後，同年10月，聖保祿修女就使用原鴨毛寮臨時聖堂的地方作為會院，在那裡居住。她們時常探訪居住在木屋區及舢舨裡的貧民，教授他們要理。<sup>144</sup>就在這墟市人口和信徒人數增長迅速、艇戶寮屋居民極需援助的時期，聖保祿修女開辦了教授要理地方和一所診所，名為「海星教理室及診所」（Stella Maris Catechumenate and Dispensary）。<sup>145</sup>

## 5.5 第一期海星診所

修女使用鴨毛寮舊聖堂開設海星教理室及診所時，仍然保留中層作聖堂。大埔教友李鴻恩一家約在1960年受洗，他的媽媽和姐姐曾在海星診所工作，診所建築是當時普遍的建築式樣，和附近的建築沒有大分別。「記憶中診所沒有什麼明顯的天主教標記。診所樓上是小聖堂，隔壁是修女住宿的地方，樓下是修女傳教的房間，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是天主教診所。……我們可以去診所樓上的小聖堂，而學習道理就在修女傳教的房間；在那裡主要是教導小朋友。」<sup>146</sup>廖偉盈也有類似記憶：「當聖堂搬遷騰出地方後，地下改作海星診所，二樓有一些課室，我們年紀小時在那裡補習，桑德嵐神父<sup>147</sup>就在二樓為我們補習。……診所面積約七百至八百尺，即現在一個鋪位大小，有兩排當時比較流行的白色長木凳，加上一張白色枱，幾支探熱針，擺設很簡單。」<sup>148</sup>

成立診所初期，除了聖保祿醫院駐院李醫生（Dr. H.C. Li）從港島前來診症外，診所的兩三名工作人員都是聖保祿修女，包括有護理背景的主管鄭瑞琮修女。<sup>149</sup>後期修女的角色主要是作監督和探訪，沒有再在診所作全職工作。李鴻恩回想求診時：「因為我媽媽在診所做登記員，所以我們患病時都是去診所求診。……在診所工作的人員都不是修女……最主要是醫生、配藥員和登記員，和現在的診所沒有大分

別。……媽媽到診所工作，我覺得是修女介紹的，因為職責是登記，所以不需要醫學知識。當時可能很多人不懂得書寫，而媽媽會讀寫，所以找她到診所工作。」

在 1961 年申請開設海星診所時，聖保祿女修會與政府的往來公函提到，應診的醫生是聖保祿醫院的駐院醫生，每星期二、四去大埔應診。<sup>150</sup> 後來診所聘請的醫生每天應診，廖太表示她們一家和醫生「好 friend 的」；這位「好 friend 的醫生」是孔慶儀醫生<sup>151</sup>。廖偉盈補充說：「據我所知，孔醫生每日從九龍搭火車來的，診所每天都開，一星期最少開六天。以前政府醫生『十問九唔應』（不理睬），孔醫生很好的，我們是小朋友，對他的印象很好。……孔醫生離開之後還有幾個醫生來服務，好像有三四位醫生，但是我們不大清楚了。」在分開的訪問中，求診時年紀還小的李鴻恩仍然記得醫生沒有架子，印象是仁慈的。

## 5.6 六十年代大埔的醫療服務

在廖偉盈記憶中，六十年代大埔有一所政府診所，居民叫它「大埔醫局」，就在省躬草堂附近（汀角路近美新里）。那裡二樓有留產所，以前沒有產檢，「大肚婆」就會去醫局生產。他說：「醫局地下有 A&E（按：Accident and Emergency 即急診室），有普通門診。那裡有很多病人，但我們從小到大沒有去那裡看過醫生。大埔醫局收費一元，海星診所收費五元，私家診所可能要十元以上。……以前大埔很窮，很多人去大埔醫局求診。」據 1957 年《華僑日報》報道，大埔診所由賽馬會捐款五十六萬元興建，土地則由大埔鄉紳捐贈，設有門診部、產婦及嬰兒健康部、急症病床兩張及小手術室一間，在 5 月底已開始投入服務。<sup>152</sup> 診所的確切位置在大埔舊墟天后廟旁，當時的名稱是「大埔公立香港賽馬會診療所」，即今天汀角路的「大埔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

廖偉盈年幼時經常搬遷，最遠住在桃源洞，即現在馬窩附近，距離大埔墟市路程頗遠。他說：「當時從桃源洞去大埔墟，走的路是窄窄的泥路，沒有公共巴士，但有『豬籠車』<sup>153</sup>。如果我們再從大埔墟往大埔醫局，要過廣福橋再繞彎走去，很遠的。……當年看病不普遍，『頂唔住』，發燒得厲害才會去看醫生。因為我們有海星診所，所以沒有去政

府診所求診。……為何會去海星診所？肯定母親有折扣，否則以當時家庭收入一定去大埔醫局。海星診所五元診金已算貴，我們學費一個月八元。……那時候大埔算起來最多有五個認可的醫生，合法的最多是五間診所。葉保文診所就在現今廣福道匯豐銀行隔鄰，還有一位鄧仲偉醫生……大埔還有無牌醫生，非英聯邦醫生，居民稱之為大陸醫生。我認識的也有幾位，一位張醫生、一位呂醫生，呂醫生就是我同學的爸爸，住豪宅，好有錢。我契爺常常去張醫生診所求診的，他相信西醫，但沒有去海星診所求診。無牌醫生收費多少我就不知道。……還有一種是『白牌醫生』（按：診所醫生），在診所才有資格行醫，不能外出看診。這些醫生由社團註冊的診所聘請，有事由社團負責。那年代香港大學醫科一年才三百個醫生畢業，後來才多起來。」<sup>154</sup> 他小時候從沒有試過往私家診所求診，因為收費貴，差不多到了初中時才去私家診所求診，推算時間，已是七十年代的事。

## 5.7 海星診所的病人和修女

李鴻恩記得年幼時看醫生的次數不太多，求診時遇到的主要是成年人，沒有碰過熟悉的鄰居或同學。他覺得當年看病的可能是教友，人數不太多，而看西醫不太普遍，估計原因是當時西醫費用比中醫費用高。廖偉盈去海星診所的經驗卻不同：「我記得當時診所有很多檔案的。現在有電腦，以前是每個病人一張病歷卡，病人求診時，姑娘從抽屜找出記錄來。診所有很多病歷卡，估計有一千多張。……求診流程和現在私家診所差不多，需要輪候，很快的。……當時有很多漁民求診，現在萬四長園、王少清診所後面是海邊、元洲仔<sup>155</sup>。那裡很臭，因為漁民在曬咸魚，又有他們的『米田共』<sup>156</sup>。漁民多是海陸豐人，很惡的，我們會避開，不敢惹他們，但治安很好。」廖偉盈指出，海星診所除了接近海邊棚屋，因為在運頭街那邊有一家專賣漁民用具的大新帆布，所以很多元洲仔漁民，無論是平日居住在棚屋或是出海捕魚回來的，都慣常在那裡出入。當身體不適時便去海星診所求診，而不去大埔醫局。

大埔墟市人口從 1950 到 1960 年短短十年間增加了一倍，還未計算附近村落人口。從上述報章和訪問內容可以看到，人口增加，加上

經濟因素和交通不便，醫療服務極度不足，當時窮苦病患必然面對極大困難。海星診所的設立，對大埔居民特別是貧困者帶來很大程度的幫助。按修會 1966 年的記錄，海星診所當年治療的病人數目是二萬四千六百三十五人，醫護探訪的家庭多達六百六十二個。<sup>157</sup>

當初省會長貝克維姆姆在大埔建立會院，為的是服務大埔地區，幫助有需要及不幸的人。最早期來大埔的是梁志修修女和鄭瑞琮修女，她們的工作包括教理講授、診所服務、教育事功和支援堂區。1962 年堂區開辦「聖母聖心小學」，有教學資格的梁修女出任首位校長。其他服務方面，有醫護背景的鄭修女擔任診所管理和教授要理。後來專責在診所服務的還有陳方善修女（1911-1976）<sup>158</sup>、梁伯望修女（又名梁蓮潔，1912-2000），中期的有在菲律賓出生，在香港入會的衛愛霞修女（Sr. Dorothee Way，1915-1974）<sup>159</sup>，還有後期出任主管和護士職務的馬玉芳修女（1917-2011）<sup>160</sup>，以及在診所和其後的大埔聖保祿幼兒園服務的陳保祿修女（1912-2010）等。

聖保祿個別修女在大埔默默耕耘的服務事跡，在香港沒有太多公開的記錄，但從馬玉芳修女在台灣服務受到群眾和官方的讚許，可以從中看到一眾修女服務背後的愛心和犧牲。1944 年馬修女在香港發願後，曾在九龍聖德撒醫院服務十一年，1960 年被派往台灣傳教和發展醫療服務。她在桃園創立保祿診所，即後來的聖保祿醫院，服務弱勢社群。建院過程中挑戰重重，後來的院務亦十分繁重，導致她在 1968 年嚴重胃出血，診治醫生甚至認為她只有六個月生命。同年她回港休養，康復後又投入工作，包括到大埔海星診所服務。1978 她再回台灣，先後服務醫院、牧靈中心和從事不同的傳道工作。她在 1998 年獲得台灣衛生署頒發「第八屆醫療奉獻獎」，在 2004 年又獲得第一屆桃園奉獻獎，被譽為「桃園醫療的台灣德雷莎修女」（按：香港譯作德蘭修女）。<sup>161</sup>至於梁伯望修女，她出生於一個熱心的天主教家庭，除了她本人，另有四位姊妹分別成為聖保祿女修會、寶血會及安貧小姊妹會、聖衣會的修女。她的兩位堂弟亦是方濟會的神父。梁修女於 1938 年加入聖保祿女修會，剛發願時獲派往聖保祿醫院擔任護理工作，隨後在大埔診所服務數年，又再調回聖保祿醫院服務，直至 1998 年中風需臥床養病，幾乎

一生都奉獻給醫療工作。<sup>162</sup> 陳保祿修女出生於西貢天主教村鹽田梓，同樣是來自熱心公教家庭，1933 年加入修會，是聖德肋撒醫院 1940 年啟用時，首批二十一位進駐服務的修女之一，直至日佔時期與其他修女一起被迫離開。修會在日佔時期難以維持眾多人口的生活，陳修女和其他修女被派往越南，直至戰後回港。她除了在海星診所和幼兒園服務，有二十八年時間在聖保祿醫院工作。<sup>163</sup>

## 5.8 服務的演變、海星診所服務落幕

由於大埔墟市人口不斷增加，新生嬰兒越來越多，聖保祿女修會計畫在大埔購買物業，用作幼稚園和診所服務。這計畫獲得批准後，首位國籍省會長（任期 1969-1978）張佩瓊修女（1920-2018）於 1970 年 11 月在大埔墟運頭街買了一幢兩層高的樓房，前身是「大埔幼稚園」。1971 年修女們由鴨毛寮天主堂會院遷入新址，地面一層闢作診所，名為「海星診所」（Star of the Sea Clinic）。<sup>164</sup> 廖偉盈稱這新的診所為第二期海星診所，「第二期在運頭街，門口一邊寫着聖保祿修會，一邊寫着海星診所……面積大很多，佈局平均。建築物一旁有樓梯往二樓，可能是修女生活起居空間，我們沒有去過，另一邊是診所。……估計建築物面積有一千多呎，等如現在幼稚園一樣。……現在的聖保祿修會和幼稚園位置，是拆卸原址後重建的。」



大埔運頭街拆卸前的舊會院及第二期海星診所。（照片由聖保祿女修會提供）

隨著香港整體經濟發展良好，就業機會充足，交通、公共及私人醫療服務有所改善，大埔居民對海星診所服務的需求已不像六十年代那樣迫切。聖保祿女修會在 1974 年的周年報告中記錄「診所以前每天診治的病人超過一百人，現在每天病人少了很多，只有二十到三十人。其中主要原因是原本在海星診所服務的醫生離任，開設自己的私人診所，加上現在大埔政府診所和私人診所的服務增加，修女們覺得她們不夠忙碌。此外，一些婦女多次請求我們的修女，在她們出外工作時幫忙照顧她們年幼的子女。現在我們可以騰出一個大房間用於這個目的，嘗試照顧幾個二至三歲的幼童。」<sup>165</sup> 當時大埔居民多屬勞工階層，很多父母要外出工作，子女乏人照顧。托兒建議在 1975 年 9 月得到落實：修女把部分診所地方轉為日間托兒中心，照顧十多名二至四歲的兒童。後來兒童人數增加，原先的地方不敷應用，修會遂於 1976 年 4 月結束海星診所，騰出地方，同時把托兒中心改為幼兒園，名為「天主教聖保祿日間托兒所」，為二至六歲的幼兒準備學前教育。<sup>166</sup>

## 5.9 對一切人，就成為一切

回看聖保祿修女的診所服務，從十九世紀主要依附於育嬰院和醫院的診所，到與天主教福利會合作的大坑隆巴第診所和堅尼地城若望二十三世診所，再到修會獨立開辦營運的大埔海星診所，這些都是修女們默默努力和付出的成果。幾位大埔受訪者提到，診所只掛著十字架，沒有其他宗教標記，但病人無論是甚麼信仰背景，診所都接納和幫助所有有需要的人。她們專注治療、慰問和關心病人，讓病人得到最好的照顧和醫治。這些無言的行動，呼應了修會在堂區和學校的福傳工作，改善當時社會福利和醫療不足狀況，對窮苦病患的人帶來了極大的幫助。

香港聖保祿修女們一直致力於關懷貧窮受苦的人，幫助他們脫離無知和困難。百多年來，她們根據時代需要，不眷戀以往成功的經驗，不斷調整服務內容：關閉孤兒院、庇護所、診所服務，轉為不斷提升私家醫院和教育事業的發展。這種靈活性和敏捷性體現了修會對人的關懷和愛心，對教會傳教事業發展的支持和幫助，而聖保祿女修會的格言「對一切人，就成為一切」（格前 4:22）更體現在修女們對所有人的關心和無私奉獻精神。

## 6.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自十九世紀，嘉諾撒修女已在港九兩地營辦診所，部分更延續至戰後，或在戰後再改變服務，如在前一章已作介紹的筲箕灣嘉諾撒診療所是於 1951 年重開，西營盤凌月仙診療所是聖心育嬰堂服務需求減少而由診療所替代，香港仔的診所更經歷搬遷，並最終由明愛接手。

### 6.1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仔漁村

香港仔，常常使人聯想到美味的海鮮、寧靜的漁村和「水上人家」的生活面貌，但是香港仔實際的生活和發展卻不是這樣平靜。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多次的戰亂和政局變化，香港仔這個「寧靜漁村」也不例外地受到影響。當時一些大陸漁民連同他們的漁船舉家遷徙到香港落戶，香港仔就是他們最多人選擇的漁港。<sup>167</sup> 根據 1964 年的統計，香港仔漁民人口有一萬七千多人，是香港漁民最多的港口。捕魚業是勞力密集工業，一家人在船上起居生活和工作，兒童也需要工作，如清潔、修補漁網，甚少機會得到正規教育。他們捕魚時出海，泊岸時漁船停靠岸邊。隨著漁業機械化普及，婦孺參與捕魚的需求減少，對兒童教育觀念也漸漸改變，很多漁民婦孺選擇留在香港仔避風塘內生活。住的就是一些舊船，漸漸演變成爲「住家艇」。隨著人口增加和新移民增多，漁民在淺灘以木板和鋅鐵片搭建簡陋居所，一般稱爲「棚屋」。初期住家艇和棚屋集中在涌尾，即今香港仔工業學校對出，其後數量越來越多，延伸至今天香港仔警署、逸港居一帶。<sup>168</sup>

自幼在鴨脷洲島上居住的阮少林先生和太太蔡錦妹女士（Kammy）憶述鴨脷洲大橋 1980 年通車前，並無陸路途徑連貫外間，只能依賴「街渡」往返香港仔，接駁陸上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地區。「五十年代鴨脷洲人口幾千人，大多數都很窮，大部分人住在木屋，從山邊伸展開去，連綿不斷。現在海怡半島的位置，以前是木屋區、發電廠、電油庫，還有養豬的、養白鴿的、務農的。山坡上還有一間天主教小聖堂，後來收了

土地作發展，就沒有了。」<sup>169</sup> 據他們的記憶，當時鴨脷洲有兩間小學：即基督教海面傳道會辦的漁民學校，還有一間鴨脷洲街坊小學，是街坊福利會辦的。另外，還有一間位於鴨脷洲大街的唐樓內，僅有兩個教室的街坊「義學」。五十年代初，出入鴨脷洲都多是依靠舢舨（「艇仔」），搖櫓的、不用機器推動。五十年代中期起才有「電船仔哇啦哇啦」作為渡輪。渡輪收費成人兩毫，小童一毫，而舢舨是五仙。在香港仔那邊，渡輪碼頭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蒲窩」或舊香港仔警局座落的山坡斜路口，位於馬路臨海的另一邊，岸邊有人賣雜貨的。若由該渡輪碼頭步行往涌尾，必經過「十五間」<sup>170</sup> 及由其岸邊伸延至海面的紅燈橋碼頭。該處海面直到涌尾均有很多、很密集的住家艇和棚屋，即水上木屋。現在鴨脷洲大橋旁的大廈——逸港居，就是拆了棚屋興建的。這些住家艇和棚屋普遍面積細小，環境擠迫，沒有食水和電力供應，而垃圾和排泄物卻直接排入水裡，衛生條件惡劣，為漁民和社區帶來不少病患問題。

如果說鴨脷洲交通不便，那個年代香港仔對外交通狀況也不遑多讓。幼年從國內來港，曾在鴨脷洲、香港仔居住多年的前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校長劉超賢先生指出，當時香港仔幾乎自成一角，居民的生活非常簡樸。「當年服務中環與香港仔之間，只得一條巴士路線，無論你去甚麼地方，乘坐7號巴士是唯一方法，成人收費五毫，小童半價。例如我每天到灣仔上學，一定要乘坐7號巴士，經薄扶林村、瑪麗醫院、西環，到西營盤正街才下車轉乘10號巴士，經皇后大道東才到達灣仔。當時一般文員收入大約每月三百元，船費和車資加起來六七毫了。由於交通時間長、費用高，我發現鴨脷洲、香港仔的居民對往來中環、灣仔一帶的概念是『出香港』或『去香港』。其實他們已立足於香港島，但前往其他地區要付出的時間和金錢，令他們概念上、感受上覺得香港彷彿有如另外一個地方。」<sup>171</sup>

## 6.2 五十年代香港仔的醫療服務

劉超賢回想五十年代中期住在鴨脷洲，當時島上只有一兩位西醫，但不肯定他們是否都在香港醫務委員會正式註冊。他說：「那些醫生可能來自國內，我並非說他們的醫術有差別，只不過他們並未依照本港的規定註冊，故未獲得當局認可其資格。他們對居民的幫助仍很大，譬如診斷病人發燒之外，亦可能憑經驗判別病人有機會患上肺炎，及時督促他們到醫院求醫。如果病情比較簡單，他們也會開藥為病人治病。最早在香港仔那邊開設診所的註冊西醫是二戰前畢業於香港大學，曾服務該區的唯一註冊西醫。他可能是當時香港仔最享負盛名的醫生。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兩名兒子亦先後畢業於港大醫學院，成為本港名醫。我當年年紀還小，卻已體會到早年服務鴨脷洲的醫生，都曾在國內學習西方醫術，但他們的地位卻未如本地註冊西醫那麼高。」

劉超賢提到的這位名醫，就是一直在香港仔行醫的梁金齡醫生。據港大醫學院前院長梁卓偉教授的記述，梁金齡醫生畢業於1938年，由政府派往香港仔，「看病配藥、探熱打針，他都要一腳踢。村裡沒有藥房，必須背著藥箱去應診。當時漁民普遍窮困，他幾乎沒有受過診金，但病人為表示心意往往以魚蝦作為回報，逢年過節贈送活雞已可算是厚禮。長年與漁民打交道為他贏得綽號『蜆家佬』，但收穫更多的是漁民的敬愛和幾十年的情誼」。<sup>172</sup>

劉超賢年少時身體很少不適，記憶中較少接觸中、西醫。就讀三四年級時如遇上身體不適，多數到香港仔舊警局的斜坡路口，與早已名聞香港仔的山隆（窄巷）魚蛋粉檔為鄰的香港仔政府診所求診。「那診所很簡陋，只有一位醫生駐診，可能是政府委派的醫生。我曾到過這診所兩三次，輪候的人很多。醫生有點微胖和禿頭，一直默不作聲。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天在診症室有一個座地暖爐，是最傳統的輻射式設計，靠亮起了橙紅色發熱燈管來反射熱力。當時家裡並沒有暖爐，我看見後感到好奇。醫生不會和你『傾偈』，只會簡單地詢問你的病情，一邊低頭書寫，沒有對話。大多數街坊會記起，如果你咳嗽，醫生一定會處方一種

俗稱『馬尿』的咳藥水，深啡色、略甜、味道怪怪的，能化痰止咳，好像很有效。診金連藥費不算貴，收費好像只要一兩元。」在他升讀五六年級時，水塘道香港仔賽馬會診療所<sup>173</sup>落成，政府診所亦遷入其內，為居民提供服務，而他亦很少前往求診。

Kammy 回想年幼家人有病時，多數服用成藥、「涼茶」，沒有效時才看醫生。當時中醫收費比西醫便宜很多，但有時候有些人可能連中醫診金也未能支付。她說：「那時候有些鴨脷洲居居沒錢付診金，俾一斤米就『搞掂』。」阮少林說那時候最廉價的米叫作「米碌」（即碎米），兩毫一斤，中醫收取一斤米作診金只是形式，差不多是免收診金了。Kammy 指出很少去賽馬會診所求診，因為「要俾錢」和「排隊耐」。她說：「成藥有效就不用看醫生，無效時我們『最叻』就是乘船過海，去我們稱作『姑娘堂』那裡找修女幫忙，姑娘堂就是嘉諾撒修會贈醫施藥的地方。以前不懂得怎樣稱呼修女，因為她們全穿着會衣，又有一條三角巾披在身上，所以大家便叫她們作姑娘，好像稱呼護士一樣，那地方叫作姑娘堂。」

從以上受訪者的經驗，可以看到早期社會很多人有病時依靠的多是成藥，很少去診所求診。一方面源於公共醫療服務遠遠未能應付人口暴增帶來的挑戰，另一方面私人診所不普及而且收費高昂，如果不是慈善團體開辦的西醫診所，普羅大眾未能負擔。當中看到病患者的困苦、一些行醫者的善心，以至慈善機構和教會的醫療援助是何等重要。

### 6.3 診所、會院集於一身的姑娘堂

如前一章所述，嘉諾撒修會早於 1897 年在香港仔設立聖家會院，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按 1942 年修會港島總修院日誌記載，香港仔會院受到日軍和盜賊搶掠破壞，相關修女需要遷往黃竹坑華南總修院暫避。



香港仔舊大街姑娘堂（相片由嘉諾撒會提供）

Kammy 回想五十年代末她去姑娘堂時，看到有一半的求診者都是「洗爛肉」（即清洗傷口）和塗藥膏。她解釋說：「求診的最多是『撻魚的人』（即漁民），另外就是做工廠的人，很多機會受傷。那時候環境污糟，不懂得怎樣處理，有少少受傷、發炎不處理、不洗手，就變成爛肉、膿瘡，於是就去清洗傷口。發燒的人會自己『搞掂』，會買保濟丸、成藥，比較少去姑娘堂。當然，修女那裡也有藥，有些人比較嚴重、不退熱，也會在那裡取藥的。我是媽媽帶去的，其實去的次數不太頻密。我印象中不收費的，因為我們沒有錢，應該沒有付錢。」除了免費，Kammy 指出在姑娘堂求診不用取籌，輪候時間不會太長，處理傷口後就可以離開。

談到醫護人員，她說洗傷口、搽藥膏、派藥等工作，全都是修女執行，有三四個修女，大多是外國人。溝通方面，修女們說的是「唔鹹唔淡」的廣東話，但大家會明白的。因為家住鴨脷洲，除了求診，她沒有接觸修女，所以對修女認識不多。阮少林補充說：「記憶中我可能因為沒有傷口、爛肉，所以沒有去姑娘堂求診。但因為我五十年代末就讀聖伯多祿小學時，小學還未蓋好，頭兩年要借用姑娘堂作校舍。我們使用

二樓，診所在地下，我上學或放學時看到修女工作的。……病人會把傷口給修女看，修女們為他們量體溫，看看有沒有『發燒』。不用說話的。不用派籌，基本上按大家坐的位置已經知道誰先誰後。個個都喊『姑娘、姑娘』，修女們都叫人等等，知道做完這個，就做下一個。她們很忙，不會講道理的。……看見她們給病人最多的藥物是碘酒，用來消毒。碘酒包裝很有趣，整支包着粗麻布，扭開後只用一次，出來的顏色是深咖啡色，用來消毒。有時候求診時修女會多給幾支，讓你回家後自己料理傷口。」

為很多香港仔居民來說，姑娘堂遠遠多於一家診所。一眾聖伯多祿堂教友接受訪問時指出，那是嘉諾撒會的會院，是「修女住的地方」<sup>174</sup>，在香港仔舊大街，位置就是現今培德小學附近的兆群大廈。修女們有的穿白色會衣，戴著白色帽子，所以被稱為「白頭姑」。

受訪者當中，有幾位出自漁民家庭，其中陳玉英女士（李太）清楚記得：「修女們在姑娘堂教導教友子女學習道理，我和何送妹（另一位受訪者）兩個都在姑娘堂住的，我們是同學嘛。」

一起接受訪問的何瑪利女士是何送妹的堂妹，她補充說：「那時候所有街坊教友都稱呼那裡做姑娘堂，其實它是嘉諾撒修女的修院。建築是石屋，樓梯是木造的，診所在地下。我們是漁民，家人出外捕魚。當時香港仔聖伯多祿堂主任司鐸（任期 1955-1960）理雅各神父（Fr. James Zilioli, PIME, 1898-1960）<sup>175</sup>覺得李太和何送妹太年幼，向她們的父母建議，讓她們留在姑娘堂讀書寄宿，不要出海。」

回想往事，李太和何送妹兩位都面露感激和喜悅之情。李太說：「剛剛去姑娘堂居住時，因為家裡不夠水，很污糟、頭髮『生虱』，姑娘幫我們洗頭，把我們弄得乾乾。我們沒鞋穿，姑娘給我們鞋穿。開始寄宿時沒有正規讀書的，修女買一些幼兒園的書來教我們，那時候還未有培德學校。後來到了 1957 年左右，培德學校校舍完成，曾玉卿修女叫我們去讀書。當時窮，要九元學費，冇錢讀書，曾修女收我們半

價。……修女們不是醫生、也沒有甚麼儀器，但有探熱、檢查，知道你有沒有發燒。如果有，就給你退燒藥吃。那時候很多人爛頭、生膿瘡，就去姑娘堂，姑娘幫他們洗傷口，之後給藥他們搽。姑娘堂對外開放的，甚麼人也照顧、治理的，不局限教友，免費的，也不用『掛號』。一星期除了星期日外，修女們都在那裡服務的。」另一位受訪者姚秀卿女士和何瑪利不約而同提到，如果修女看見病人環境不好，無論是否教友，都會派發一些物資，例如奶粉、麵粉等。

李太提及的培德學校，於1956年2月由白英奇主教奠基，1957年完成，取代使用已久的兵營般校舍。建築物四樓是修會會院，供修女住宿，以及診所和慕道班服務。1957年《香港天主教手冊》記載，這所由嘉諾撒修女獨立運作、為香港仔居民，特別是窮苦的漁民，提供免費醫療的診所正式名稱是培德診療所，與培德女校和會院同一地址，會院院長和學校校長分別是嘉撒諦修女（Sr. Giuseppina Casati, 1909-1957）和曾玉卿修女。<sup>176</sup>到了1961年9月1日，修會接受白英奇主教的建議，負責管理香港天主教福利會在田灣服務中心開辦的一家職業學校，同時幫助管理和運作設於中心內的聖高弗烈普通科和牙科診所，取代培德診療所的服務。初期三位修女每天不辭勞苦從香港仔往來田灣，在診所服務，同時負責中心大型廚房的運作，為超過五百名窮苦小孩提供免費膳食。至此，姑娘堂的診所服務和艇戶探訪從香港仔轉移到田灣，修女在香港仔的服務，只剩下培德學校。<sup>177</sup>

### 6.3.1 姑娘堂的修女團體

李太記憶中姑娘堂有幾位修女服務和住宿，當中有外國人、有中國人。李太說：「其中一個西人修女，我們叫她「當家姑娘」（意思是院長），她不懂中文的。還有彭姑娘、曾姑娘，她們是中國人，曾姑娘後來去了培德做校長。還有一個外國人，我已記不起她的名字。」



穿白色會衣的修女與求診病人在培德診療所門前（相片由嘉諾撒修會提供）

姚秀卿指出這些外國修女都是意大利人，還提到有一位姆姆（即年紀大的修女）。當問及對修女的觀感時，曾在田灣診所服務的林少芳女士回應說：「做修女個個都好好嘅。」，李太則和應說：「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好過自己阿媽，非常之好！」

受訪者口中讚不絕口的姑娘堂修女，包括勸導李太上學的曾玉卿修女（1912-1991）。曾修女戰時曾在紅磡會院擔任護士，其後她主要從事教育工作，曾在不同學校任教和擔任校長一職，包括香港仔培德學校。她特別關注貧困學生，不僅是那些家裡經濟較差的學生，還有那些缺乏愛和能力的學生。每當颱風吹向漁民的船隻或窮人的棚屋區時，學校的大門也隨時為有需要的人敞開。她退休後奉派在九龍玫瑰堂服務，直至 1991 年病逝。<sup>178</sup>

雖然沒有文件記載六十年代初每天來往香港仔和田灣中心服務的三位修女姓名，但估計其中一位是與曾修女同期在香港仔服務的彭愛金修女（1914-2008）。彭修女出生於順德，在香港仔培德會院服務時（1948-1964），除了應付繁重的團體工作，常常前往東華東院、大口

環療養院和瑪麗醫院等地區探病。李太記得她和何送妹住在姑娘堂時，當家姑娘不懂中文，有甚麼要說的，都是告訴彭修女。另外的受訪者鄧耀華先生和廖幼冰女士也記起彭修女負責教道理，因為意大利修女「廣東話唔得」。1964年，彭修女轉往不同的團體服務，包括灣仔會院、香港仔明愛社區中心等，負責講授要理和內務工作。<sup>179</sup>

在診所服務的白修女（Sr. Maria Bertola，1909-1994）雖然不懂得英語和中文，但憑藉她的微笑、謙遜和對人真摯的關懷，語言問題並不阻礙她服務病人和探訪困苦的人，而她也成為大家敬重的白姆姆。她在家鄉意大利發願後，1937年開始在鄭州、洛陽等地作醫院服務，後來被迫告別中國，1947年底到港。數年後她被派往香港仔，除了培德診療所和田灣聖高弗烈診所的服務，她也四出探訪香港仔的貧困艇戶；1975年被調往凌月仙會院。曾在田灣明愛服務的姚秀卿記起白姆姆是最後一位在田灣診所作前線服務的修女，而廖幼冰提到年邁的白姆姆即使放下診所工作，仍然去瑪麗醫院探望病人，特別是那些沒人理會的病人，買東西給他們吃，為擁擠病房裡的受苦人帶來一線希望。1994年這位一生在謙遜中行仁愛的姆姆在港病逝。<sup>180</sup>

另外一位在診所前線服務的是埃米莉亞·青巴迪修女（Sr. Emilia Zimbaldi，1908-1996），三十年代開始在河南省鄭州作護理工作，1949年被逐到港後，先在凌月仙育嬰院照顧兒童，到了1954年轉到香港仔，擔任診所護士，直到1964年。之後，她被派往澳門路環診所工作，並常常到患者家中探訪病人，得到「路環醫生」的稱號。1982年，年過七十的青巴迪修女回到香港，再次被分配到凌月仙，服務診所和幼稚園。後來因年紀老邁轉居嘉諾撒安老院，直至1996年病逝。<sup>181</sup>

## 6.4 瑪道納海上診療所

在香港仔的醫療服務，除了培德診療所，在1961年更增加了由公教婦女聯誼會（現稱公教婦女會）負責運作的瑪道納海上診療所。<sup>182</sup> 海上診療所初期的服務人員，包括護士、社會工作者和助理員，由公教婦女

聯誼會會員及嘉諾撒會修女擔任，事前的配藥工作則由在田灣明愛配藥處的修女負責。<sup>183</sup> 直至 1966 年，修女在醫療船上的服務才由醫生取代。

何送妹憶述往醫療船求診的經驗：「唔舒服就自己搖隻艇去，我們知道它停在那裡。我們的艇四處停泊，但醫療船『泊梗』一個位置，就在香港仔船塢，好容易搵。」她說白天去求診時都有醫護服務，不用登記，不收費，很快完成的。李太補充說：「醫療船固定停泊在船塢外的海面，船塢位置就是現在香港仔中心。<sup>184</sup> 醫療船跟我們的船不同形狀的，我們叫它『鬼板船』。醫療船的姑娘（修女）衣服和姑娘堂的不同，帽子不一樣。有『女仔』幫助姑娘，她們有華人、有西人。<sup>185</sup> 求診時我們會在自己的艇等候，醫治時會上船給她們看傷口。如果你有玻璃『搥腳』，她們會幫你挑去，如果傷口發炎潰爛，她們幫你洗傷口。以前我們有甚麼病也不會去看私家醫生，因為貴，只會去找姑娘。有時候去醫療船，有時候去姑娘堂，兩邊都喜歡去。」

從上述的訪問和幼童求診經歷，可以看到當時香港仔漁民和艇戶面對沉重的病苦和經濟壓力。海上診療所帶來的不單單是治療小病痛苦，背後更帶著信仰團體對受苦者的關懷。1960 年初香港仔涌尾大火，政府決心清拆南區艇棚。隨後幾年政府大力填海發展市區，興建屋邨，遷徙艇戶、棚屋居民。<sup>186</sup> 加上六十年代末期，香港製造業開始發展，需要大量勞工，促使更多漁民和水上居民轉往岸上工作和居住，到了七十年代初，這艘海上診療所的服務才告終結。<sup>187</sup>

## 6.5 田灣聖高弗烈服務中心

對於政府的房屋及工業土地發展，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預期陸上人口會不斷增加，教育和社會服務需求將會日益增長，因此於 1960 年 7 月在田灣設立聖高弗烈服務中心。<sup>188</sup> 該中心是德國天主教福利會捐贈，故此以德國聖人聖高弗烈命名，於 1962 年 5 月由港督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rown Black，任期 1958-1964）主持開幕禮，主要的發展方向是幫助居民提升教育程度、學習一技之長，擺脫貧困。

福利會服務中心成立後，立刻開設一所職業學校，「照顧 12 至 15 歲完成小學而未能升讀主流學校的女孩子，按她們的愛好和能力，教導她們英文、中文、針黹、編織、打字和速記」。<sup>189</sup> 1961 年服務中心設立普通科診所、牙科診所和 X 光檢查服務。福利會邀請了嘉諾撒會幫助管理中心、學校和診所運作，由盧修女（Sr. Romilde Bescape，1913-2004）<sup>190</sup> 擔任中心主任。這所新的診所取代香港仔舊大街培德診療所，有醫生應診，藥物由一些德國藥廠捐贈。在培德會院居住的三位修女初期每天往來服務，其後修會在服務中心四樓頂層設立會院，才免卻了她們舟車勞頓。<sup>191</sup>

姚秀卿講述中心最早期只有一座建築物，後來獲得德國教會捐款資助，買了毗連同樣四層高的建築，服務得以擴展。學校加設男校部，教授中文、英文、數學，以及機械、電工、印刷和汽車維修等文理科目，由明愛管理，之前的女校部仍然由嘉諾撒會負責。後期陸續設立成人日校、夜校，讓田灣居民提升就業能力和進修的機會。<sup>192</sup> 廖幼冰和何瑪利在聖高弗烈讀書，想起當時學校由兩幢建築物組成，一邊是男校部、一邊是女校部，各自使用不同課室。兩座建築物之間每層有通道相連，學校設在二樓、三樓，修女會院在四樓，診所在女校部的二樓。<sup>193</sup> 早上集會時男女生要上四樓，女生走的樓梯經過診所門口，男生走的是另一邊的樓梯，不會看見診所。



圖中清楚看到服務中心由兩座毗連建築構成  
（《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十週年特刊》由姚秀卿女士提供）

## 6.6 香港明愛聖高弗烈診療所

這間診所的名字曾多次修改：早期英文名字為 **Caritas Clinic**，後來定名為 **Caritas St. Godfrey's Clinic**。中文名稱最初名為「福利會中心診療所」，1965 年改為「天主教福利會聖葛菲診療所」，1966 年改為「天主教聖高弗烈診療所」，最後到了 1976 年改為「香港明愛聖高弗烈診療所」。由於香港仔居民對嘉諾撒修女早有認識，這間診所很受歡迎；為很多人看來，它只是搬到田灣的培德診所。早期只有兼職醫生應診，每周兩個早上。其餘的配藥、換藥和注射等工作，由修女和護士負責在平日下午照顧病人，收費約為三至五元。牙科服務方面，初期每周有三節時段，為居民提供脫牙、補牙和洗牙服務，收費一至五元。

阮少林和太太 **Kammy** 曾有在聖高弗烈診所求診的經驗：「很有趣，在那裡可以看見姑娘堂原先的姑娘，她們會叫你等候醫生，好像在做分流工作。見醫生要排另一條隊。有時候如果單單洗傷口、取藥，不見醫生，仍然是免費的。」

林少芳提到服務中心除了有學校和診所，修會在四樓小聖堂有平日彌撒。到了星期日，學校禮堂就開放舉行彌撒，田灣的教友都會參加。「我是教友，去聖堂時認識了修女，她們很好的。當時我在工廠工作，白姆姆說：『你不要在工廠工作，來我們明愛做。』就這樣，我去了診所工作。」她記得診所有十字架和聖高弗烈的聖像，初期病人求診時只需要排隊看醫生，後來才規範登記。因為只有一個醫生，輪候時間頗長。何瑪利補充：聖高弗烈診療所開設初期，她不舒服就找修女取藥和維他命，免費的；有規範的運作已經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了。

早期普通科診所依靠兼職醫生，鄧耀華記得其中一位是林肇真醫生，服務長達二十年。「林醫生不是全職在香港仔診所應診的，他六十多歲，幾和藹，每逢星期一、三、五由司機載他來田灣診症，十點至十一點半。他象徵式收回少少明愛車馬費，好像義工一樣貢獻。」

曾在聖高弗烈診療所求診的鍾炳基先生提及，在診療所有兩位醫生輪流看症，除了林醫生，還有聖保祿醫院首任醫務總監羅理基爵士（Sir

Albert Maria Rodrigues, 1911-2006)<sup>194</sup>。「樓下是神父宿舍、服務中心。人們上樓梯就是看醫生、醫務所。……因為實在很多人，看病的不可能談十、十五分鐘那麼長，只是問一問什麼事，例如頭痛，便可以離開。速戰速決，速度很快。」<sup>195</sup>

在六十年代末期，普通科診所每天診治人數達二百多人，而牙科診所每星期也可以為六十個病人治理牙患。<sup>196</sup>到了七十年代末，普通科診所服務增至每天早上，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中心獲得何東基金資助，診所得以翻新，並提供全天服務。牙科診所方面，七十年代末服務時間已增加至每周兩天，到了八十年代初開始有全職牙科醫生，增加假牙製作、根管治療（「杜牙根」）等服務。1985年，中心在隔鄰建築擴充牙科診所，由一名全職牙醫負責。除了一般市民，診所亦同時為香港仔復康中心住宿院友和黃竹坑啟智兒童中心的兒童提供牙科服務，並為聖高弗烈幼稚園提供關於牙齦健康的教育服務。<sup>197</sup>

### 6.6.1 在聖高弗烈中心的修女

當培德診療所服務搬遷到田灣後，原先在香港仔作前線醫護服務的青巴迪修女和白姆姆外一如既往，在聖高弗烈診療所繼續關懷、治理病人和探望艇戶。到了1964年，青巴迪修女轉往澳門服務。至於白姆姆，幾位受訪者不約而同指出她是最後一位在診所服務的醫護修女，直至八十年代中期因年老體弱，才不得不停止服務。



在香港仔田灣聖高弗烈診療所服務的修女帶同藥物探訪艇戶。  
（照片由嘉諾撒會提供）

此外，按姚秀卿在訪問後補充的資料，從 1960 年開始至八十年中期，先後由三位嘉諾撒修女擔任聖高弗烈服務中心主任一職，管理中心所有事務，同時兼任診所主任。她們是盧修女、周寶琮修女（1932-1989）<sup>198</sup> 和譚麗瓊修女。外籍的盧修女是首位主任，卸任後返回意大利服務。從七十年代初開始，周修女先後三次獲委任在聖高弗烈中心服務社區，除了主理行政工作，她還親自教授要理。後期因病住院，期間常去探望其他癌症病人，幫助他們面對困難。周修女在 1989 年於香港病逝，去世前一周，還回到田灣跟同事話別。至於譚修女，她在 1976-1982 年間任聖高弗烈主任，後來轉往澳門從事教育服務。按《香港天主教手冊》記錄，聖高弗烈診所主任一職從 1984 年開始由平信徒擔任。

六十年代初，嘉諾撒會願意在聖高弗烈服務中心設立會院，委派修女擔任中心不同職位，是為了支援解決難民、艇戶等問題。隨著前述問題獲得解決，社會經濟、醫療和社會福利服務有所改善，加上修會在教育和堂區工作方面的職務日益繁重，人手緊張，1985 年省會長李永援修女（任期 1985-1991）向時任教區主教胡振中樞機（1925-2002）以及香港明愛總裁力理得神父（Fr. Francesco Lerda, PIME，1926-2003）提請，讓修女撤離田灣中心宿舍和免除眾多的職務。在獲得兩人接納後，修女們遷離服務中心宿舍，正式結束了嘉諾撒會在香港仔的醫療服務。

## 6.7 延續的服務精神

八十年代中期，翻新過的聖高弗烈普通科診所，聘請了專業醫護全職工作，故此當嘉諾撒會修女在 1985 年遷離時，診所運作維持不變。九十年代末，香港明愛因應社區服務需求的改變，決定重建服務中心，增加空間和資源、更新服務範疇。1999 年原先在田灣街 20 號的普通科診所搬往隔隣 22 號，與牙科診所一起，服務維持至 2002 年。<sup>199</sup> 至此，嘉諾撒會和香港天主教會在香港仔的診所服務（普通科）正式告一段落。到了 2006 年，舊有田灣街 20 號的服務中心完成清拆重建，成為現在的明愛賽馬會香港仔服務中心和明愛張奧偉國際賓館，22 號則維持是明愛社區中心，保留牙科診所服務。



昔日聖高弗烈服務中心已成為明愛賽馬會香港仔服務中心和明愛社區中心。  
(攝於 2023 年)

嘉諾撒會會祖聖嘉諾撒瑪大肋納訓練她的姊妹「要以敏銳的觸覺留意時代的徵兆，以最恰當的方式來回應當時當地人的需要」<sup>200</sup>。在早期香港華人社會，甚或二十世紀的漁民家庭中，重男輕女的文化甚為普遍。在香港超過一百六十年的服務中，嘉諾撒會的貢獻不僅僅是醫療身體疾苦，提供生活需要；它更透過教育，為女性帶來生命的希望和解放，影響無與倫比。<sup>201</sup>無怪當說起姑娘堂的修女時，李太連續三次說：「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好過自己阿媽，非常之好！」雖然沒有了前線的診所服務，嘉諾撒修女們對病患者的關懷精神，從沒退減。她們繼續透過直接的病人牧民工作，以及教育、傳福音、堂區服務、及退省神操等事工，培育更多人關心社會、陪伴和幫助受苦的人。同樣地，香港明愛成立之初，從住宿、食物、醫療等需要作起點，致力解決難民問題。隨著社會需要變化，香港明愛也「由一個以救濟為主的福利機構演變成為多元化的志願團體，照顧市民成長過程中各個不同階段的需要，並特別關注社會上最末後無靠、最卑微無助和最失落無救的一群」。<sup>202</sup>這呼應了香港明愛機構的格言「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也許，透過這「沉默的、非語言的」天主教診所服務，讓人得到援助、關懷和希望，同時間在他們的心中埋下美善的種子。

## 7. 拯望會

拯亡會 (Society of Helpers of the Holy Souls) 於 1856 年 1 月由歐日尼·斯買特 (Eugénie Smet)，即真福主顧瑪利亞 (Mother Mary of Providence, 1825-1871) 在法國創立，是一個國際性的傳教修會，使命是透過祈禱援助煉靈，並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務，特別是「那些被遺忘的人、那些人格尊嚴受到傷害的人以及那些最需要聽到福音的人」<sup>203</sup>，好能幫助所有生者與死者達到受造的目的。拯亡會於 1970 年改中文名為拯望會（下文統一稱為拯望會），英文名字改為 Society of The Helpers (S.H.)，目的是使修會的宗旨更能在其名稱上表達透徹。<sup>204</sup> 拯望會的工作後來擴展到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的各個地區，服務涵蓋各種事工，包括她們傳統的為亡者祈禱、奉獻彌撒、教理講授和照顧窮人、病人和無家可歸者的事工。

### 7.1 在中國的服務赫赫有名

由於拯望會接受依納爵靈修，與耶穌會稔熟，故此在 1867 年 8 月回應江南代牧區代牧、法籍耶穌會士郎懷仁主教 (Bishop Adrianus Languillat, 1808-1878) 的邀請，派出十位修女來華服務。抵達上海後，拯望會與耶穌會緊密合作，在江南（上海）和直隸東南（獻縣）兩個代牧區及北京等地工作。<sup>205</sup>

剛到上海徐家匯時，拯望會修女協助耶穌會管理「經言小學」，同時間也管理育嬰堂、孤女院和聾啞學校，收養和教育孤殘棄嬰，隨後又開辦了著名的曉明女子中學（1871）、崇德女校（1898）暨徐匯女中（1934）和啟明女校（1904）。崇德女校的學生是來自教友家庭，後來到港服務的拯望會華籍修女如朱兆娟（1918-2021）、袁引（1924-2007）兩位修女都是該校培養出來。除了辦學成績卓越，由於拯望會的會規模仿耶穌會，有「女耶穌會」之稱，加上因祝融之災在 1931 年重建後的會院佔地達九十畝，與耶穌會會院不遑多讓，是上海天主教會當時最大的女性教會團體。<sup>206</sup>

## 7.2 輾轉到港、落戶荃灣

因著局勢變化，拯望會在 1950 年開始陸續離開大陸，遷往印尼（1951）、香港（1954）和台灣（1960）等地服務。來港的修女在 1955 年受香港教區白英奇主教邀請，到荃灣協助牧民及傳教工作，當時的堂區歸耶穌聖心堂（現今綠楊新村位置）牧養，葛達二聖堂區還未成立。當年很多人從國內湧往香港，在短短三十年間，荃灣人口由 1931 年不足六千跳升至 1954 年約四萬人、1961 年的八萬多人<sup>207</sup>，加上政府在 1961 年刊憲要把荃灣發展為第一個衛星城市，人口不斷攀升。有見及此，白主教決定在該區興建另一聖堂，牧養教友和傳教。葛達二聖堂在 1969 年落成啟用，雖然叫作荃灣堂區，可是服務的範圍涵蓋現在荃灣、葵涌、石籬、梨木樹、青衣、大窩口、川龍、深井等地區。<sup>208</sup>

那時候整個香港面對最大的問題：大量難民南下，一切民生設施配套不全，醫療壓力沉重。很多人依山蓋建寮屋、木屋，衛生環境惡劣，飲用的大多是山水，加上瘧蚊為患，很多人患瘧疾。所以當年坊間流行說：「想發達去金山，想死去荃灣」、「十個荃灣人九個發冷」<sup>209</sup>。甚至有些學者報告提及：「荃灣很多人都得過瘧疾，過去常說『沒有得過瘧疾，就不是荃灣人』！」<sup>210</sup> 哪怕到了六十年代初政府決定發展荃灣為衛星城市時，每當有市民被分配往荃灣公共屋邨，都誠惶誠恐，既擔心交通、就業，也擔心衛生健康。《香港經濟日報》在 2019 年回顧昔日荃灣狀況時這樣描述：「荃灣長時間缺乏正統醫療，長時間靠唯一的青山公路送到九龍就醫，病危者隨時一命嗚呼。」<sup>211</sup>

從小到大在荃灣居住、工作的是谷穗先生憶述：「一九五幾年荃灣只有一間健康院——葛量洪母嬰健康院。大部分人都在留產所出世，比在母嬰院出世的多；因為不普及，西醫也不普及，怎會去看西醫？沒有西醫給你看的。當時最多留產所的地方就是楊屋道一帶位置……整條眾安街全都是矮小的樓宇，而河背街是在六十年代興建出來的。」<sup>212</sup>

現在楊屋道一帶高樓住宅、商場和酒店的位置以前是海，漁船泊在那裡。聖心堂是現在綠楊新邨後面天后廟附近位置，旁邊是德星小學，當時還未有荃灣天主教小學。1972年在葛達二聖堂領洗的教友曾太朱三妹這樣形容當時的環境：「很窮的。當時在聖堂周圍未有幼稚園、未有仁濟醫院，全都是木屋。你知道，有錢就不住木屋。後來政府遷拆木屋，那地方變成一個市場、街市，但那些人也不是有錢的。」<sup>213</sup>就是在這樣的境況中，拯望會修女走進荃灣社區，開始她們的工作。

### 7.3 第一代啟明診療所

除了在堂區協助牧民及傳教工作，拯望會修女看到荃灣居民在醫療和教育上的其他迫切需要，憑藉在上海服務的豐富經驗，她們於1955年在眾安街71號開辦第一代啟明診療所（Morning Star Clinic）。據《華僑日報》當時的報道，啟明診所開幕是由新界理民府理民官彭德（Kenneth Myer Arthur Barnett）親臨剪綵。他對拯望會修女在港開設診所表示歡迎，指出「啟明診所遂告開放，於是新界多一貧民診所，誠當地民眾之福音也」。<sup>214</sup>當時在荃灣區還沒有任何稍具規模的政府診所設施，遑論醫院服務。按《1962年香港天主教指南（重印）》（*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資料，診所剛開始服務，很短時間內每天要診治的病人已達一百二十人。<sup>215</sup>

據五十年代《香港天主教手冊》記載，診所的工作人員，由院長、主任到職員，都是拯望會修女，例如院長法比爾修女（Mother Marie de St. Aubain, 1889-1975）和主任奧第總修女（Sr. Marie Odette）等。因為不同資料有不同譯音，相信法比爾修女就是在中國和香港服務五十餘年的法平修女（Sr. Aubain Marguerite Frapier, 1889-1975）<sup>216</sup>，屬於第一批來港的拯望會修女。到了1958年，在印尼服務的朱兆娟修女和袁引修女因為排華原因，先後離開印尼來到香港，加入荃灣的服務。

## 7.4 第二代啟明診療所



第二代啟明診所施工中（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第二代的啟明診所座落於眾安街 140 號，取代了之前在同一條街 71 號的舊診所，名稱依舊，目標是每天為一百至一百五十名病人診症。按《華僑日報》1960 年的報道，診所是美國天主教福利會（Catholic Relief Services）獲得美國政府捐助六萬五千美元興建。建築物樓高三層半，地面是診療所與天佑幼稚園（1964 年開辦），二樓和三樓是修會會院，還有最高半層是衣物洗滌室和儲物室。與天佑小學一樣，建築物外牆是麻石，既堅固又醒目。經過六十年，這些麻石大門和外牆今天仍然伴隨著不同的服務。



現址已是荃灣明愛賽馬會社區書院，診所正門改建，麻石建築仍然保留。  
（攝於 2023 年）

曾太朱三妹在七十年代初曾在啟明診療所做兼職，工作是下午去診所清洗病人複診時帶回來的藥水樽。曾太說：「病人複診時，如果沒有拿回藥樽，配藥員就給你新藥樽，你就要給錢買。」因為病人大多是普通傷風感冒，所以都獲處方藥水。清洗後的藥水樽都放在盤子上待乾。「放藥水樽的盤子有枱面那麼大，裝得滿滿的。藥樽要反過來放，不能平放，否則不會乾的。……藥樽有大有小，清洗後待晾乾，第二天配藥員會使用，很環保的。每天都做，不記得每星期做五天或六天。」她估計當時每天清洗的藥水樽數量有一百多個。由此可見，當時診療所服務需求很大。

另一位在 1981-1984 年於拯望會會院服務的吳金桂女士憶述診所陳設：「建築物呈長方形，地下分為三個部分：診療所、幼稚園和荃灣明愛護理安老院……<sup>218</sup> 我每天早上八點上班時都是通過診所大門上會院的。診所九點開診，但上班時已看見很多病人在門外輪候登記。從診所大門一進去，旁邊就是登記台。登記台隔壁是診症室（醫生房），再隔鄰就是配藥室，醫生房背後就是老人院。」她說，診所內有一道門，穿過那道門經一條窄窄通道就可通往老人院，往上有一道樓梯，通往拯望會會院，即修女生活起居的地方，當時有六七位修女在那裡生活。至於幼稚園「有自己的出入口，和診所不同的。……醫生房對面有一排一排的長櫈讓已登記的病人坐下等候，大約有三四張，可以容納二十多人。」<sup>219</sup>

## 7.5 不同的稱謂：天佑學校診所、姑娘堂

在當時的荃灣，除了醫療服務，教育需求也很逼切。拯望會修女早於 1958 年開始籌建學校。排除各種困難後，學校於 1960 年正式授課，「以拯望會會祖之名命名，英文名 Mary of Providence 即蒙上主照顧之意，中文譯為天佑」<sup>220</sup>，初期袁引修女兼任校監與校長，1962 年朱兆娟修女擔任校監之職。因為啟明診療所與天佑小學毗鄰而建，同為拯望會修女創辦和管理，所以啟明診療所有時候被街坊稱為「天佑學校診所」。

經過多年的填海發展，今天的楊屋道兩邊有著不同年代興建的住宅、商場、店鋪，在六十年代初這條馬路卻是臨近海濱。漁民家庭都生活在艇上，婦孺多留在岸邊停泊處生活，其他出海捕魚的每當回港時也靠岸休息、辦事和為下一次出海作準備。從啟明診所的窗戶往外望，便可以看到很多舢板停泊在岸邊，所以有頗多求診者是漁民、水上人。曾老太講述她做清洗藥水樽時看到很多漁民求診，「求診什麼人都有，但有很多水上人……因為楊屋道對開就是海，診所好近避風塘。」



拯望會修女為病人探熱（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現在我們稱呼女修會會士為修女，但在七十年代以前，普遍稱呼修女為「姑娘」，所以一些當年曾往求診的人在社交媒體回憶那時候稱啟明診所為「姑娘堂」。更有趣的是，除了被喊作姑娘，修女有時候被喚作「白頭姑」。吳金桂想起「有一次我聽到診所護士回答病人：『我不是白頭姑，我是護士，白頭姑在樓上會院。』所以我知道白頭姑指修女。以前有病人找朱修女，因為我當時住在青衣，朱修女告訴我，那些病人是青衣保祿村的教友，即是從前荃灣艇戶遷往青衣的。現在我做義工，很多時候跟隨社區中心去保祿村探訪，有很多機會遇上以前求診的漁民。他們有些已經八九十歲，回想往事時會提起：『係呀，嗰陣時白頭姑好好，畀好多禮物我哋！』」

## 7.6 被撿回一命的病人

是谷穗來自中醫世家，家中有三個弟弟，一個姊姊，他排行第二。「那時候中醫比較流行，我舅公在荃灣是有名的中醫，我姨公在香港也是有名的中醫，很多西醫醫不好的病人就去找他。好像今天有名的中醫一樣，整天有人排隊。……我外婆也是中醫，在河背街三樓開診。我1958年出世，1962年懂事就開始去探阿婆。她住的大廈樓梯寫滿字，其中寫着「3樓區二姑」，我阿婆就是區二姑。」他記得探望外婆時，看見很多病人是水上人。「漁船一泊岸，很多水上人就帶小朋友去找她求診。通常食水不乾淨、還有其他小兒疾病：生積、生蟲、多病養不大等，就去找外婆治理。她會給他們杜蟲藥、用燈芯咁他們的肚和穴道治療鼓脹、把手割開挑出蟲來，小朋友就有胃口進食，快高長大。還有一種是把粉紅色石灰和其他藥混合成藥粉，煲水服用。這些都是傳統中醫醫治小朋友的方法。……收費很便宜的，『係咁意』（按：隨意付費，醫師都接受），可以負擔。漁民沒有什麼錢，很窮的。」

談到他與啟明的淵源，是谷穗說年幼時病得很厲害，是啟明診所醫生救了他。「我阿公在上環開藥材舖，我四五歲開始發病，每天在藥材舖睡，睡在『百子櫃』下面的床板，外公早晚煲藥給我吃。『睇唔到』（按：未能診斷出病因），嘗試開不同的藥給我吃，吃了很多藥、看了很多中醫也不好，連親屬中醫也認為這個小孩醫不好的。……當時中醫對cancer的認識不深。其實現在我們知道中藥不能殺死癌細胞，一定要化療、鏢靶藥，先殺死，再調理，這是現代人的理解。所以一直看中醫病情都不好，沒有辦法了，哪裡有醫生，我媽媽就帶我去。到後期醫不好，我從港島搬回來，住在外婆家。當時日夜也要臥床，不能起來，很容易會嘔血。後來有些街坊跟媽媽說：『聽人講啟明診所西醫幾好，你去試吓啦。』那時候我已經不能動彈，是家人抱我去診所的。」

當時是谷穗年紀小，又病得厲害，對診所陳設、醫生姓名等沒有印象，但清楚記得求診時間是下午，為他看病的是一位男性華人醫生，沒有看到修女服務。問及為什麼啟明診所，一家不算先進的診所、沒有甚

麼化驗設施，醫生可以這樣快診斷病症，救了他一命？是谷穗說：「醫生『叻』！因為我嘔血，醫生一看癥狀，血是一塊塊的。醫生指出『應該是血的組織受破壞。白血球侵蝕紅血球，破壞了紅血球，所以身體器官受破壞。……這個小朋友情況不理想、不妥當，我寫紙（轉介信）給你。……今天太晏，到伊利沙伯醫院他們已收工，你明天才去。』醫生『叻』！究竟這位醫生是不是宗教團體派來的，還是跟隨宗教團體來行醫，沒有人知，沒有稽考。總之他好『叻』！」

六十年代九龍只有廣華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當時從荃灣到九龍還沒有葵涌路，只有青山公路。第二天去到伊利沙伯醫院，是谷穗便立即被送進手術室。是谷穗說：「手術後我被推離手術室時，醫生告訴我們，如果遲半天不做手術、不處理，就會死。……當時我讀一年級，1965年入院，停了一年，1966年再讀一年級。」

如果是谷穗的求診是一件奇事，他的康復也絕對稱得上是另一件奇事。他在伊利沙伯醫院和荔枝角療養院（現為饒宗頤紀念館）前後住了六個月才出院，需要定期複診。到了八歲複診時，因為藥物難吃，問醫生能否換藥或不吃，得來的答覆是「你要吃。就算你吃藥，也未必活得過二十歲。」因為是血癌，是谷穗覺得反正要死，和母親商量後，從此就停止吃藥和複診。生命的無常沒有令他變得消極，反而推動他的學習、工作和事業發展。

翻查 1965 年的《香港天主教手冊》，當時診所的主任醫生是龐懷慈修女（Sr. M. Juliana Bender）。龐修女 1963 年來香港之前的一篇訪問提到，診所由一位美籍義務護士擔大旗，另有一位兼職的華人醫師。<sup>221</sup> 估計為是谷穗診症的男醫生，可能就是診所聘用的外援醫生。雖然不是信徒，是谷穗回想：「當我年紀越大，想起來越覺得那位醫生是神派來的。……二十歲沒有死，不會想為什麼不死，我想可能會明年死、後年死。這樣我反而會全心全力為目標打拼，希望可以完成。再過幾年沒有死，就定下新的計畫。……由於這樣，你沒有時間思考是否有奇蹟出現；是否有些事情發生了令到當時去啟明求診那件事發生？現在

到了六十五歲，我回想當時有街坊跟媽媽提及啟明診所、啟明醫生看出病症、伊利沙白醫生又懂得醫治，唔死真的是奇蹟。」

是谷穗這次的求診「奇蹟」是他唯一一次到啟明診所，之後他再沒有去過啟明。「當時荃灣西醫不多，眾安街只有兩位西醫，一個是在街尾的啟明診所，一個是在街頭的商會診所梅健周醫生<sup>222</sup>。因為有商會津貼，六十年代收幾塊錢。如果沒有團體支持，根本沒有人負擔得起看西醫。當時沒有意識介紹其他人去啟明求診，我住在山那邊，近眾安街尾，所以會去看梅健周。」

是谷穗多次提及當年人們不信任西醫，西醫不普遍。但從他的病發、求診經驗看到，很多人沒有向西醫求診，除了觀念問題，費用和西醫診所稀少也是重要因素。由於經濟困難，人們看病不普遍，多服用成藥。要是病得很厲害才去看中醫，而到中醫醫治不好時，才可能去看西醫。「我的好處是我們有中醫背景，有中藥調理。如果沒有調理，要病得很厲害才去看中醫，中醫醫不好的……排隊看西醫，不夠時間了（按：指病重太遲醫治）。」啟明診所的設立直接幫助求診病患減少這些延遲醫治的情況和帶來的傷痛，也幫助更多人認識和信任西醫治療。

## 7.7 以「聯合國修女」之稱為傲

在啟明診所服務的眾多修女中，最多人認識的國籍修女是朱兆娟修女。她自 1953 年從印尼來港後，與袁引修女在 1960 年創立天佑小學，並在 1964 年成立天佑幼稚園，出任校監；同時間朱修女在荃灣葛達二聖堂擔任教授教理、聖母軍神師等職務，直至 2010 年才停止服務。此外，從六十到八十年代的《香港天主教手冊》資料中，朱修女都列為診所所長、主任一職，作為診所負責人。

除了朱修女，1963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顯示，診所職員有一半（三至四人）是拯望會修女，而龐懷慈修女的名字是在 1965 年的《手冊》

開始出現。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如果說朱修女、袁修女是天佑小學的代表，那麼說龐懷慈這位「醫生修女」是啟明診療所的代表人物也不為過。龐修女是美國人，1951年加入拯望會前是一位執業十年的醫生，擁有私人診所，是拯望會當時全球兩位醫生修女之一。她畢業於美國耶穌會開辦的天主教馬凱特大學。據1966年一篇文章指出，該校共有十二名醫生傳教士投入服務，全都是修女，除了龐修女，有八位是瑪利諾會修女；而另有三位神父、修士則正在準備加入醫療傳教士的行列。<sup>223</sup>宣發修道聖願後，龐修女放下醫療專業，直至被派往香港的團體一起服務啟明診療所才重操故業，因為當時教會法規定修女醫生只可以在自己的修道團體內或到海外傳教時行醫，她在美國之時只能以護士身份在不同城市工作。在長達十年未有行醫的情況下，她來港前修讀了進修課程，更考取英國承認的執業資格。<sup>224</sup>

據美國新澤西天主教媒體 *The Catholic Advocate* 記載，龐修女早在1960年已到訪香港研究健康服務狀況和參與啟明診所的開幕典禮。<sup>225</sup>在1963年的報道中，龐修女提到她從啟明診所的窗戶往外看時，可以看到成群結隊的大舢舨泊在岸邊，很多漁民家庭都生活在艇上，包括患上疾病需要她們幫助的人。她讚歎在香港生活的難民：「那些人很了不起，他們能夠保持勇氣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他們已經失去了一切，還有勇氣繼續前行」。<sup>226</sup>

修女們在服務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例如語文限制、電力和食水供應不太穩定。很多求診者都是文盲，只能靠記憶記住服藥指示。龐修女說：「如果有幾種藥物，就變得很困難了。還有一點是，初時有些人的想法是，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便不會得到救助。職員嘗試說服他們不是這樣的，但他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幫他們。」<sup>227</sup>修女會向他們解釋，關於對他人的仁愛，從而帶出天主的仁愛。



龐懷慈修女在啟明診所服務

（照片由加拿大殉道聖人天主堂《証聲》雜誌提供）

在啟明診所服務過的 Teresa 曾在加拿大天主教殉道聖人天主堂刊物《証聲》撰文讚賞啟明診所的貢獻和懷念龐修女。「在 1964 年，當時的荃灣還未發展，極之落後。人民生活清苦，啟明診所對求診者只收取象徵式一元費用，已包括藥費在內，貧者則免。診所的經費全賴修女的家族成員鼎力相助，例如將生日或喜慶所得的禮物，全部折現供給診所。龐修女除了擁有豐富醫學經驗，更有關懷病者之愛心，她對病者照顧無微不至。凡有病者需要轉介專科服務，她必親身送病者前往政府醫院，並向相關醫生詳細陳述病者的病歷等等，因此她的謙遜得到醫院醫生的尊重及敬佩。」<sup>228</sup>

啟明診所除了服務荃灣居民，後來每星期還有一個下午派員為婚姻輔導會服務，教育婦女有關家庭生活的知識。在明愛服務多年的陳秀嫻接受訪問談及拯望會時，提及「低調」的龐修女「教導人們怎樣避孕，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教婦女要跟月曆畫，哪一天有月事，哪一天沒有，中間的日子就可以行房。她真的很能幹，最後當選了拯望會全球總會長」。<sup>229</sup> 此外，她還擔任香港天主教福利協會診療所工作委員會主席一職，協調與加強不同天主教診所之間的服務。<sup>230</sup>

六十年代拯望會服務荃灣時，修女來自不同地方，有中國大陸、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除了前述的修女，在 1964 年還有同樣來自美國的瑪利·若瑟·皮尼亞泰利（Sr. Mary Joseph Pignatelli）被派遣往香港啟明診所服務。<sup>231</sup> 龐修女放假回美國接受訪問時說：「當那些中國人叫我們『聯合國修女』（Sisters of All Nations）時，我們都引以為傲。」<sup>232</sup> 到了後期，還有印尼華僑林爾清修女服務診所。她 1976 年在台灣發初願後，被調回香港，在啟明診所服務了四年（1976-1979），負責登記、買藥，至 1980 年再被調往台灣新竹。<sup>233</sup>

## 7.8 夜夜無眠的修女

因應需求與變遷，到了八十年代初，拯望會把啟明診所交由香港明愛管理，在 1982 年診所更名為「荃灣明愛診所」，初期仍由拯望會朱修女掛名診所主任。<sup>234</sup> 其後香港明愛在建築物地面與診所相連的地方開辦及管理荃灣明愛護理安老院，照顧那些從明愛醫院出院而又不能自理的老人。住在樓上的拯望會修女，除了服務診所、荃灣堂區，也常常探望和陪伴老人院院友，直至 1989 年修會從眾安街搬走，明愛診所依然提供醫療服務。

陳秀嫻談及明愛在八十年代初能快速開辦荃灣明愛護理安老院，全賴胡振中樞機和拯望會修女的支持。「那時拯望會有個診所在荃灣，很厲害的。……我就在那裡開第一間老人院。那是 1980 年，我問胡樞機未來的長者服務都是交給安貧小姊妹管理的兩間老人院，還是明愛要計畫十年後要有老人院？因為 1980 年是聯合國呼籲各國照顧老人，不論是政策上、經濟上要為長者著想。因為往後會出現很多老人，所以要及早計畫。我 4 月去開會，回來香港後就把情況向胡樞機報告，詢問他的意見，教會應該怎樣辦。樞機回答要考慮，後來樞機給我電話，對我說『有老人院』，著我去會面。」

陳秀嫻還清楚記得修會為何慷慨讓出會院大樓：「有位現已過身的老修女說：『我們的修女有兩層樓，自己修女住一層，還有一層丟空了，

我們晚上睡不好，因為想起天氣冷，街上有很多人沒有地方睡覺。』她問我可以做些什麼？我回答現在最需要是老人院，我聽說過明愛醫院的老人，出院回家之後出了問題，沒有人理會，有些又行動不便，所以最需要開護理安老院。之後修女請我去看地方，我心裡就一直數著可以放多少張床，當時不需要很高的條件和要求，最後提出四十個床位，讓行動不便、需要護理的老人居住，只花了兩三個月便開了。」

## 7.9 日與夜的傳福音事工

在六十至七十年代，啟明診所白天是照顧求診病人的地方，到了晚上，它搖身一變成為拯望會修女傳福音的基地。曾太的女兒曾麗珊提到啟明診所時，說它是一個「好玩的地方」。那時候她和曾太一起清洗藥水樽，在晚上，她就在診所參加慕道班。「診所和修女住宿的地方在同一建築物，晚上完成應診後，修女會下來使用那一個地方。我也曾去過那裡，我不理會它叫作診所、幼稚園、還是多功能地方。……修女約了我們，我們便去。我們只管這個是修女的地方。……我就在那裡上慕道班。施修女和我們上慕道班，或者找人來傾談。」<sup>235</sup>

曾麗珊提及「單獨也會和我們講道理」的施修女，就是施德寶修女（1920-1986）。施修女於 1955-1977 及 1981-1986 年在香港服務，屬於早期從內地來港的拯望會修女，她與朱修女、袁修女在 1964 年協助修會成立了「希望之友」善會，邀請平信徒分享修會神恩與使命，以工作、祈禱、受苦協助煉靈早升天國。<sup>236</sup> 目前「希望之友」有四千多名成員，由林爾清修女負責會務，她是修會在香港的最後一位修女。

在診所白天的服務中，無論是拯望會修女或是診所員工，他們都不主動宣講，但受惠者從他們用心的服務中，感受到人的美善和醫療服務背後天主的慈悲和仁愛<sup>237</sup>，呼應著晚間以教理教授和生活分享的福傳事工。無怪 Teresa 在《證聲》的分享中，自覺「有幸服務該診所，在這位『醫生修女』（按：龐懷慈）身上學到了許多為人處世之道，就如她的座右銘 To give, to forget and to forgive（付出、忘記、寬恕），我至今仍牢記在心。」<sup>238</sup>

## 7.10 診所的演變和結束

第一代啟明診所成立於 1955 年，當時政府對荃灣區沒有完整發展構思，遑論生活配套設施。第二代啟明診所成立於 1960 年，翌年政府才敲定發展荃灣成為衛星城市的計畫，但醫療服務遠遠落後於需要。到了 1964 年，荃灣才有了一所由基督教興建的荃灣療養院（荃灣港安醫院前身）。2019 年，《香港經濟日報》回顧「荃灣療養院開業之初三等房（5 人房）每天收 5 元，另設 11 張免費病床，至 1965 年 3 月收費已升至 7.5 元，且取消免費床。荃灣當時有 20 多萬人口，住得起療養院的人不多。」<sup>239</sup> 可以想像當年荃灣居民的醫療服務何其短缺，啟明診所的服務何其珍貴。

按《工商晚報》的報道，直到 1966 年春季戴麟趾夫人診所正式開幕，收費一元。<sup>240</sup> 七年多之後仁濟醫院才落成，並設有門診部，門診包括藥物收費也是一元。<sup>241</sup> 這兩家政府診所要照顧的地區範圍，等同今天荃灣、青衣、葵涌、深井等。僧多粥少，居民若要去戴麟趾夫人診所求診，需要大清早排隊，而每次求診、複診差不多用上了大半天。

| 啟用   | 診所          |
|------|-------------|
| 1971 | 北葵涌診所       |
| 1972 | 南葵涌賽馬會分科診療所 |
| 1982 | 青衣市區普通科門診診所 |
| 1983 | 伍若瑜夫人健康院    |
| 1990 | 青衣長康普通科門診診所 |

表二：1970-1991 荃葵青診所成立一覽表

因為往政府診所求診需要花很長時間排隊，也不保證一定能獲得診治，即使收費比啟明診所便宜，仍然有很多人去啟明診所（1981 年易

名為明愛診所）求診。1981年，吳金桂開始在拯望會會院工作時，每天仍然看到大批求診者在明愛診所門外排隊等候。她說：「戴麟趾太多人，一早就排長龍，好難攞籌。去明愛診所因為方便，排隊不用這麼多時間。」後來政府將社區重新劃分，銳意興建更多診所：連同1973年建成的仁濟醫院門診部，不到二十年，有五間診所落成（表二）<sup>242</sup>。同時香港經濟發展良好，加上地下鐵路荃灣線在1982年通車，交通大大改善，荃灣居民求診情況才獲得改善。

隨著荃灣區的醫療服務情況有所改善，在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資助下，香港明愛於2010年調整醫療服務，把診所服務由原址遷移至隔鄰獨立小洋房，在原有普通科門診之外，增設牙科服務，在2011年9月重新投入服務。<sup>243</sup>騰出來的原址，改裝成為明愛賽馬會社區教育中心—荃灣（現稱為明愛賽馬會社區書院—荃灣），在同年12月相繼開幕運作。<sup>244</sup>到了2020年，隨著政府基礎診所醫療提升，明愛診所運作的成本不斷增加，在沒有政府資助下，荃灣明愛普通科診所於2020年底畫上了句號，牙科診所則仍然保留。<sup>245</sup>

雖然診所服務停止了，但正如龐修女指出，教會的醫療服務使命最終的目標是從最初治癒身體到贏得靈魂的使徒工作<sup>246</sup>，這份使命會在其他服務模式中傳承下去。

## 8. 瑪利諾男修會

美國天主教傳教會（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更廣為港人認識的別稱是瑪利諾會（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MM）<sup>247</sup>，由美國兩位教區神父華爾實（Fr. James Anthony Walsh, 1867-1936）及普瑞斯（Fr. Thomas Price, 1860-1919）於 1911 年成立，是美國首個以海外傳教為目標而成立的傳教修會。傳教會總部位於紐約奧塞寧一個小丘（knoll）上，因兩位會祖對聖母瑪利亞（Mary）的熱愛，稱該處為 Maryknoll，修會中文名「瑪利諾」即源於此。

美國天主教傳教士到海外傳教，有學者相信是受 1893 年的世界宗教會議帶來的覺醒，但這個全國性的外方傳教會要到教宗於 1908 年在《智慧計畫》（*Sapienti Consilio*）宗座憲章中，把美國從傳教地區名單除名之後三年才出現。<sup>248</sup> 傳教會確實得到傳教心火熱烈的美國教友支持，香港五六十年代難民潮時期的醫療和其他福利服務就是明證，而其雜誌《遠方》（*The Field Afar*）作為傳教刊物亦創造了很好的氛圍。

### 8.1 《遠方》的中國

在《遠方》1907 年 1 月創刊號中，有逾半稿件是關於遠東，十六頁新聞中有六頁是關於中國。當時擔任波士頓總教區傳教協會主任的華爾實神父顯然視中國是最能引起美國教友興趣和吸引聖召的「傳教禾田」，並且在請求教廷批准創辦瑪利諾會時，表明修會接受教廷派遣的所有使命，「但會優先考慮到中國傳教」。<sup>249</sup> 在八十歲高齡時撰寫瑪利諾會在香港歷史的高文神父（Fr. William Galvin, 1929-2016）指出，直至 1940 年後期，加入瑪利諾會的聖召有一個重要特色，是他們都渴

望到中國，而傳教會派遣會士到中國比到其他國家為多，使傳教會的名字在許多美國教友心目中「幾乎成了中國的代名詞」。<sup>250</sup>

瑪利諾會士 1918 年初踏足的香港是個怎樣的環境？當時仍未有公共巴士行走，連汽車也罕見，港島區有電車和纜車行走，九龍和新界則有九廣鐵路每天三班火車開往九十里外的廣州，兩種普遍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車和轎子。<sup>251</sup> 與很多修會一樣，他們最初只視這個小漁港是進入內地的踏腳石和成立總務處的方便之地，目標是到廣東和廣西傳教。修會初期在港的唯一工作是在 1921-1926 年短暫負責聖類斯工藝學院（今為聖類斯學校）。其與香港的關係，亦可從《香港天主教手冊》窺知：1923 年的手冊第一次出現瑪利諾會的名字，收錄在「總務處」欄目；1930-1950 年，歸類為「非香港神職人員」，意即他們是未與香港教區有服務合約的天主教神職人員；直至 1950 年才收錄於「香港神職人員」類別。事實上雙方於 1955 年才草擬出第一份合約，直至 1978 年才正式簽署。<sup>252</sup> 不過，正如書寫瑪利諾歷史的何心平博士指出，如果認為戰前至戰爭時期瑪利諾會與香港之間仍只是一個過路點，是「膚淺失實」，他以香港代牧區及恩理覺主教和瑪利諾會之間的密切關係，為後者的通行證、囚禁、釋放、擔保多番奔走，又一起到醫院探病作為論證。<sup>253</sup>

## 8.2 早期的醫療工作

對於醫療工作，瑪利諾會 1912 年在美國開辦自己的傳教修院後，已得到一批醫生幫助，每周以講座或課堂形式，向修生講解落後地區的衛生和醫療，又讓他們去醫院實習，盡量學會急救、針藥注射和普通科病症的治療。醫療工作的大力推手是年輕的帕呂埃爾·弗拉格醫生（Dr. Paluel Flagg）。他除了在《遠方》雜誌設有醫生專欄，甚至想投身成為醫生傳教士，但被華爾實神父勸阻，希望他留在美國推動一個醫療運動，像法國的聖雲先會。最終一個名為「天主教醫療傳教委員會」（Catholic Medical Mission Board）的組織成立，並因在中國多地開設施藥所的成果而受到極大的支持。當華爾實神父 1921 年視完修會在華南的傳教工作回國

後，要求弗拉格醫生加強修生和修士的醫學培訓；而瑪利諾會在中國的傳教區，幾乎每個堂區都有一間小型醫療設施。在弗拉格 1970 年逝世時，醫療傳教委員會已為五十七個國家、逾百個修會負責的三千多個醫療站提供超過二百萬磅的醫療物資，成就非凡。<sup>254</sup>

弗拉格醫生提出的一個建議，影響了瑪利諾會往後的醫療工作。他於醫療傳教委員會第一次全國大會中提出，「與其培訓醫療傳教士，不如從招募專業志願者開始，並發薪水讓他們實地工作」。<sup>255</sup> 不論在內地或香港，瑪利諾會士都並非親身從事醫療工作，而是招募平信徒的醫護人員協助，或訓練華人成為醫護人員，使神父可以履行其他人不能替代的神父本職。

瑪利諾會早期在港的罕有醫療服務實際上並非計畫之內，而是基於一次偶然的發現。涂挽靈神父（Fr. Howard Trube, 1913-1995）1940 年被派遣到嘉應教區（現梅州教區）服務，為做準備而先在瑪利諾會赤柱總部學習中文時，與同伴老楞佐·康利神父（Fr. Lawrence Conley, 1908-1947）注意到漁民很需要醫療服務。於是兩人「每天下午四時之後，帶同藥箱去給他們治療潰瘍、斷指，以及癰子、紅腫等」，一方面是為了去結識民眾，另一方面是練習客家話，這項醫療服務伴隨了他們語言學習一整年。<sup>256</sup>

從聖類斯工藝學院到為漁民治療，參與醫療、教育、慈善工作及社會活動等「有形哀矜」（*corporal work of mercy*，即有形可見的愛德行為）<sup>257</sup>，可視為教會內「普遍接受的梵二前策略」，為瑪利諾會亦是合乎邏輯的，因為這既是「基督宗教的本質」，也製造機會讓他們與人群接觸去實行基督的旨意，亦即走出去、施洗和宣講福音。<sup>258</sup>

日佔時期，瑪利諾會士因屬於敵國公民而成為戰俘，囚於赤柱拘留營。戰後，內地政局改變，絕大部分在內地的瑪利諾會士於 1951 年被迫離開大陸。同時間，大量大陸難民來港，香港人口暴增，促使瑪利諾會轉而在香港開展傳教工作，根據高文神父所言：這是瑪利諾會在香港的第二個階段。

### 8.3 難民救助及醫療工作

1952 年，經與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Archbishop Antonio Riberi，任期：1946-1959）及香港教區代表商議，瑪利諾神父在柴灣、東頭邨、九龍仔及牛頭角四地成立難民中心，參與救濟工作。隨著難民不繼增加，部分原有的難民中心又分出新的中心，像東頭邨劃分出新蒲崗難民中心、牛頭角分出佐敦谷等。<sup>259</sup> 這些難民中心提供醫療、食物、衣物，甚至房屋安置。包括藥物在內的物資，是由美國主教團天主教福利會（Catholic Welfare Services）提供。每次有物資到港便直接分送到各個福利中心，連倉庫都不需要，減少儲存費用。難民中心的施藥所，初期一年平均診治約五千名病人（表三）。藉著這些福利，受惠者認識到教會的「有形哀矜」，從而使許多人領洗入教。<sup>260</sup> 瑪利諾會的福利工作由鄭濟民神父負責統籌，他在 1951-1957 年亦是美國天主教福利會的香港代表。

這些診所和施藥所的收費是私人診所的四分之一，大大減輕了民眾的負擔。四間診所單單是 1958 年的開支便達十五萬美元，而很多醫生護士實際上是無償服務。這樣的援助成績得到美方援助機構認同，把撥款從 1957 年的四萬五千美元增至七萬五千美元。<sup>261</sup>

表三：1952-1956 年四間診所的診治人數<sup>262</sup>

| 年度                         | 牛頭角    | 九龍仔    | 東頭邨    | 柴灣     | 合計      |
|----------------------------|--------|--------|--------|--------|---------|
| 1952-07-01 至<br>1953-06-30 | 1,620  | 3,325  | 11,880 | 2,500  | 19,325  |
| 1953-07-01 至<br>1954-06-30 | 6,800  | 15,800 | 14,230 | 6,250  | 43,080  |
| 1954-07-01 至<br>1955-06-30 | 32,240 | 40,000 | 46,000 | 10,350 | 128,590 |
| 1955-07-01 至<br>1956-06-30 | 37,300 | 45,000 | 70,800 | 50,000 | 203,110 |

雖然瑪利諾會很重視「有形哀矜」的醫療服務，但這些神父大多只是受過醫學訓練並非專業醫生，又因香港對西式行醫有嚴格規管，只承認香港大學或英國大學醫學院的畢業生可在本地行醫，故此修會首先便得解決醫生的問題。瑪利諾神父「發現一個漏洞」，只要每間診所都有註冊護士充當職員，便可以運作；這些醫生和護士修女都是從大陸驅逐出境，十分符合資格。至於從大陸來的所謂「難民醫生」，診所聘用他們為診所技術員，讓他們作為跳板，直至考取到政府認可的執業試。當然，由於英語語文能力，並非所有醫生都能通過考試。<sup>263</sup>

此外，神父們亦聯繫一些醫生，請他們奉獻晚上幾個小時在診所義診，而與他們合作無間的瑪利諾修女也加快進行一些衛生和健康教育項目，以預防疾病的產生。這個項目曾有效阻截了一場霍亂疫情的爆發：1961年發生第七次霍亂全球大流行，疫情在廣東擴散導致三萬人死亡，雖然毗鄰的香港政府實施了禁止廣澳人士入境的政策，於8月中仍無法避免成為疫埠。在英美義工及公教婦女會的協助下，瑪利諾會和其他志願機構與政府合作，在三十六個小時內為八成的難民人口接種了一百二十萬劑疫苗，單是瑪利諾的七間診所接種了十萬劑，最終全年只有十五宗死亡個案，三百萬人口中只有一百二十九人染病。<sup>264</sup>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診所與當時的天主教堂建築的特色。<sup>265</sup> 在1945-1955年間興建的聖堂，逾半是在難民徙置區內的小聖堂，初期稱為天主教公所。當時香港政府認為這些大陸難民很快便會離開，不願提供過多的社會福利和教育服務給他們，援助難民便成了教會和慈善組織的工作。政府亦因此願意撥出土地讓教會興建小堂及其他福利設施，並承擔五成的建築費用及提供三至五成的免息貸款，其餘的建築成本和援助物資便由本地、美國和歐洲的教友及慈善組織捐贈。這些小堂很多時是多功能建築物，包括了診所、施藥所、幼稚園、神父宿舍，在小堂附近也會陸續興建學校、製麵廠、慈善廚房、工藝學校，可說難民的衣、食、住、行都關顧到。瑪利諾會負責的聖堂和診所，全都有這種特色。

## 8.4 福主教診療所

這診所屬於福德小堂福利中心一部分，坐落於往福德岡的斜路上。福德岡是在東頭邨道的一個小山丘，山丘盡頭是福德學校，山下的橫街已是九龍城寨。1952年，涂挽靈神父到那裡時，租住一個小棚屋，晚上是睡房，白天就成為多功能設施，包括小聖堂、社區中心、施藥所、閱讀室和救濟品派發中心。他逐步擴建，得到政府捐出土地和資助部分資金而開辦了福德學校，又建造天主教公所（後易名聖母聖誕堂）和福利中心。涂神父從中國被驅逐後，原本派往菲律賓服務，但經白英奇主教和瑪利諾會商協後，把會說客家話的涂神父留下來照顧不斷湧入的華南地區難民。這次更動讓涂神父得以一直在港服務長達四十三年，直至去世。

五十年代的福德岡，周圍全是木屋，學生很窮，多是來自九龍城寨的孩子。據五十年代後期在福德學校任教、還未加入寶血會的蘇衍慧修女憶述，她初去任教時，聽到其他老師說：「他們是今年才能穿鞋上學的啊！之前幾年還穿著拖鞋」，而她自己去山上木屋區家訪派成績表，見到學生家裡只有一張大床供一家七八口一起睡，床下邊則用來養豬，當年的貧窮狀況可想而知。<sup>266</sup>

福主教診療所的名稱是紀念瑪利諾會、嘉應教區福爾德主教（Bishop Francis Xavier Ford, 1892-1952）。他是瑪利諾會的第一位修生，也是第一批到中國傳教的四位會士之一，在共產黨掌權後，囚禁至死。診所早期由涂神父為主任，主任醫生是林肇真醫生，有一位護士及一位社工協助。除了有診所贈醫施藥，涂神父亦會協助有需要者住院。教友呂茱莉在悼念涂神父的文章中，便提到母親懷有雙胞胎後，父母親考慮到家裡的經濟狀況，本打算在留產所分娩，涂神父認為生雙胞胎風險較大，到醫院生產為妥，幸父母聽從他的建議，分娩過程果然不是很順利，有賴醫院的先進設備保住了兩個小生命，涂神父甚至代他們支付了醫院費用。<sup>267</sup>

這裡也被稱為「瑪利諾修女難民救濟工作的搖籃」。<sup>268</sup> 面對龍蛇混雜的九龍城寨，修女們 1952 年遷來時，住處對面是賭檔，賭檔後面是鴉片館，環境不比難民的居所好多少。曾在這裡服務的包修女（Sr. Katherine Byrne，教名 Sr. Philip Marie，1929-2017）指出，診所與她們講授教理的地方是分開的，候診室可容納五人，而候診長巷則畫上白色方格，當方格位置都站滿，人們便知道要去其他地方求診。修女會為病人開藥及先檢視症狀。當時的人很多患有眼疾、營養不良、染上毒癮和肺癆。修女傳教有三部，醫療和其他服務是第一部：照顧病人是修女接觸人群和介紹宗教的第一步，然後由聖母軍教導他們，最後由神父傳教，向他們解釋：「為何天主會關心我們？」<sup>269</sup>

除了教會診所，在瑪利諾修女 1955 年 3 月 14 日的一則日記中，曾提及政府的流動診所出現在東頭邨，「停泊在大街，所有人可前往打針，預防傷寒、霍亂、白喉等。幾位護士負責打針，一位男士用揚聲器指導人們如何照料針後反應。所有注射是免費的」。<sup>270</sup>

福主教診所在六十年代初，一度增設兒科、肺科、產科、眼耳鼻喉專科及牙科，又有設有護士探訪及衛生教育，有多達六位義務醫生、六位護士、兩位牙醫相助。1965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顯示，徙置大廈興建後，診所遷到東頭邨新區 K 座地下。1966 年，診所交由明愛管理，名稱變更為明愛東頭診療所，地址改稱 20 座<sup>271</sup>，先後由宗座外方傳教會覺法治神父（Fr. Fernando Galbiati，1932-2017）及達碑立神父（Fr. Eneas Tapella，1929-1977）擔任主任，主任醫生為謝承輝醫生，提供普通科及肺科診治。此區的居民比其他新區較為貧苦，貧血病最為普遍，其他常見病症有皮膚敏感、腸胃不適及胸肺問題。在七十年代，診所曾借予政府胸肺科每周四下午提供服務，患者平日也可接受免費注射。診所一周開診六天，但後期因缺乏醫生，只能縮短服務時間，加上沒有政府津貼，就診人數開始減少，每月出現約四千元赤字，最終於 1975 年 6 月停辦。<sup>272</sup>

## 8.5 聖伯多祿診療所

1952 年，瑪利諾會賴存忠神父（Fr. Peter Reilly，1912-1994）負責在大坑東龍華街建造九龍仔天主教公所時，一併成立診所、義校和分發救濟品的福利中心（現為南山邨範圍）。1955-1957 年間，公所易名為聖伯多祿受刑小堂，診所稱為聖伯多祿診療所，由瑪利諾修女及公教婦女會協助管理。除了贈醫施藥，賴神父亦為有經濟困難的病人和孕婦支付住院的費用。最初負責人是瑪利諾會趙寶寧修女（Sr. Pauline Gibbons，教名 Sr. Paul Marie，1922-2005）。趙修女於 1945 年在加拿大入會前修讀護理學，1951 年宣發永願，1960-1966 年在港服務，除了九龍仔，還曾在京士柏、聖母醫院及官塘服務。<sup>273</sup>

萬事起頭難，賴神父來到九龍仔木屋區時，那裡「缺乏所有文明設施，例如沒有路、衛生設施、水源、照明和警察的保護……難民窮得懷疑人生……甚至連我給他們藥丸或做什麼去幫他們時，都會聯想到我有什麼目的」。這情況直至他救活了一個掉進井裡遇溺的九歲小孩才轉變過來。小孩的父母把孩子抬進診所時，說他死了，由於沒有醫生在場，賴神父試著用人工呼吸施救，當周圍的人們都認為「無用」之時，孩子卻甦醒了。此事令大家對他改觀，孩子一家也成為了天主教徒。<sup>274</sup>

根據歷年《香港天主教手冊》，其他曾擔任診所主任和監督有陸伯仁神父（Fr. John Mc Loughlin，1909-1980），許士奎神父（Fr. C. V. Hirst, MM）、王超光神父（Fr. Michael McKeirnan，1914-2009），服務過的主任醫生則有林肇真及劉焯棠，另有一名護士及一位婦女會職工。

曾在東頭邨診所服務的瑪利諾會包修女 1964 年是這裡的診所主任。當時的難民以青年學生和工人居多，許多都患有肺癆和營養不良。由於求診者眾，包修女憑獨特的觀察方法，便知自己那天會有多忙碌：她參與早上六時的彌撒後，回到義診所門前，會先數一數門口的膠鞋和木

屨，「再乘以十，得出病人的大概總數，便知道自己又要忙一整天了」。在八時開門後，她會先花半小時在候診室為部分病人打針、敷藥，然後在十二時半之前完成看診工作，有些需要複診，有些則由夜診的義務醫生處理。下午就是診治嬰兒的時間。由於瑪利諾修女大多是外國人，年少的病人因語言障礙會害怕接觸。「曾有個十四歲的男孩，害怕得無法向我說出自己有什麼問題。」她於是著少年坐在一旁，看她診治四名病人後，他終於鼓起勇氣說自己腳部受傷。<sup>275</sup>

從 1957-1970 年的診治病例統計（表四）<sup>276</sup> 可見，診所成立之初，居民有極大的醫療需求，隨著社會環境轉趨安定，私人執業西醫盛行，於六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回落。此外，診所亦提供婦產科服務，並為一歲以下嬰兒提供牛奶。

表四：1957-1970 年的診治人數

| 年份      | 診治病例   |
|---------|--------|
| 1957-58 | 87,125 |
| 1959-60 | 55,700 |
| 1962-63 | 46,859 |
| 1965-66 | 23,989 |
| 1969-70 | 11,666 |

## 8.6 海星義診所

原海星義診所位於現時的柴灣興華邨，由文顯榮神父（Fr. Stephen Edmonds，1911-2005）於 1952 年設立。柴灣原是一個有三千居民的漁村，只有不多於三十名教友，是個「不起眼的地方連地圖都沒有標示」。<sup>277</sup> 但隨著難民不斷湧入，該區人口很快增長到一萬八千人，山坡上有不少隨意搭建的寮屋，而為便於管理，政府將之劃分為五段。由於品流複雜，此時的柴灣有「紅蕃區」之稱。文神父初到之時，寄身於第一段的「黑屋」（因屋頂鋪上瀝青），將之用作臨時小聖堂和福利中

心，直至同年年底才在第三段下坡建成新聖堂和福利中心。當時由於未有巴士直達柴灣，患病居民需走上大半天到筲箕灣的公立診所。文神父為減少病人舟車勞頓，請得林肇真醫生為柴灣居民提供醫療服務，收費兩毛錢，無力負擔的更是免費贈醫施藥。<sup>278</sup>

在廣西已認識文神父的陶成章神父於 1960 年調到海星堂。他曾提到文神父絕對信任他的決定，不用請示，若有錯才會告訴他。診所約在 1968 年停辦，就是由陶神父作主，因為此時政府已設立健康院，聖堂周圍的寮屋也清拆了，醫療需求已不大。<sup>279</sup>

此外，文神父於 1966 年在柴灣新區 12 座地下開設海星牙科診所，得到扶輪會贊助設備，每周運作三天，由祺天賜神父（Fr. C. Keeler）擔任主任，主任牙醫為林建勳醫生。<sup>280</sup> 1974 年更名為明愛柴灣牙科診療所，交由明愛管理，直至 1983 年停辦。該處連同明愛家庭服務部是向政府租用，佔地五百五十平方尺。

## 8.7 庇護十二診療所

牛頭角復華村（現樂華邨位置）是瑪利諾會最早照料的首四個難民徙置區之一。五十年代的牛頭角只不過是有幾戶農家的荒涼山野。1952 年，顧倫神父（Fr. Jack Curran，1918-1985）及國籍的謝鳴之神父（又名謝福星神父，1927-1987）在一間由豬廄改裝、無窗的租住房子首次與教友聚會。<sup>281</sup> 如同瑪利諾會負責的其他服務點一樣，神父首先在振華道第四區建立了臨時的牛頭角天主教公所（1954 年易名庇護十二公所小堂，1958 年第四度易名為天神之后小堂），然後陸續建成新教堂和學校、診所、工藝所和製麵廠等設施，均以教宗庇護十二世命名。

庇護十二診療所於 1954 年成立，由公教華人聯誼會每周派出兩名醫生和兩名護士應診。<sup>282</sup> 初時由顧倫神父擔任主任，兩年後由譚拔士神父（Fr. Arthur Dempsey，1903-1974）接手。服務過的醫生有梁順桓、陸敬忠及劉焯棠，有普通科、兒科及 X-光服務和設備。

復華村於 1978 年清拆發展，在五十至七十年代這個徙置區是怎樣一個環境？據 1972 年來港、第一個服務地點就是復華村的王美笑修女（Sr. Michelle Reynolds）憶述：「村裡一邊是慶祝雙十節，他們有自己的旗；再去第二個區有大陸的旗，慶祝 10 月 1 號」，所以她接觸的人群裡，可能「有家人是教友，但丈夫卻是共產黨」。居民普遍從事家庭工業，也有農場養豬。<sup>283</sup>

王修女現時為瑪利諾女修會香港團體負責委員會成員，她還記得村裡有一間長型的木屋，間隔成很多個單位，讓人臨時居住，而村民對這些臨時居住的人都很關心。例如，有些菜販會從山下上來，把菜便宜一點賣給他們。她又說，以前有一位老人家身體不好，需要其他人幫忙，有些太太會去幫他，但礙於他是男性，只能偶然拿些衣物送他。「我覺得村民很樂意一起合作。試過有一次村裡『舂山泥』，村民事後幫忙清理地方、幫手找失蹤的人。」

據說，由天主教公所組織的診所，由於為整個區域提供很大的幫助，服務表現出色，徙置事務署撥出位於復華村振華道一個更大更合適的建築供其使用（現今安基苑範圍），故較為靠近佐敦谷徙置區而相對遠離天神之后小堂及其他教會建築群。<sup>284</sup>

1968 年底，瑪利諾會宣佈神父的工作調動，譚拔士神父其時已在構思開設新的綜合診所，便遷到選址附近的一個地方，自己居於一個小房間，另外三個房間用作診所和教理講授，以準備再遷往新址。這所新的明愛牛頭角診所開設在牛頭角安德道 1 號明愛社區服務中心內。隨著牛頭角明愛社區中心於 1970 年正式啟用，庇護十二診療所的歷史角色同告完成。牛頭角診所是明愛轄下兩間最多人求醫的診所之一，另一是香港仔診所。它雖非美國政府的項目，但仍獲得七萬五千美元資助，另有香港獎卷基金及天主教福利會等資助，得以建成。瑪利諾會卜瑪利修女（Sr. Mary Edna Brophy, 1926-2017）六十年代末在診所工作，同時還得照顧身患帕金森症而日漸衰弱的譚拔士神父。譚神父於 1974 年在港逝世時，打破了神職人員一貫葬於跑馬地天主教聖彌額爾墳場的傳

統，葬於九龍區長沙灣天主教聖辣法厄爾墳場，達成了「他與『他的民眾』葬在一起的心願」。<sup>285</sup>

明愛牛頭角診所啟用後，求診者不斷增加，1970-1971 年度便有二萬八千多人求診，隨後兩個年度，病人平均維持在三萬餘人，若經社工或神父介紹，只收診金或免除費用，一般病人則收取一元診金，藥物或注射另計。診所在下午及晚上另有牙科治療，又為逾千名嬰兒提供兒童健康計畫，為他們作防疫注射，同時提供營養指導。<sup>286</sup>

王美笑修女指出，當時的教友若生病，他們會去牛頭角診所，有些則經修女介紹到黃大仙的聖母醫院。診所和醫院都有收費，但很便宜。如果有需要，修會會幫他們申請經濟援助來看醫生和買藥。這些錢來自恩人捐助，因為一些人明白香港的貧困環境和人們的需要。

## 8.8 六十年代的診療所

瑪利諾神父在六十年代開辦的診所，分別在新建成的橫頭磡、老虎岩和官塘。其中聖博德福利診所於 1962 年才設立，地址在橫頭磡徙置區 S 座（第十七座），主任是莫若翰神父（Fr. John D. Moore），主任醫生是謝大為，還有兩名義務醫生、一名護士及兩名助理員。

### 8.8.1 老虎岩診所

據資料顯示，葉欣榮神父（Fr. James Smith，1908-1996）也曾在離福德小堂不遠的老虎岩開辦診所，位置在老虎岩徙置區（後改稱樂富）。葉神父是於 1961 年被派遣到仍未有聖堂的老虎岩新堂區服務，但翌年已被調往赤柱負責語言學校。《香港天主教手冊》顯示的名稱為「瑪利諾神父診療所」，由林肇真擔任主任醫生，有診所、醫藥室及牙科設施。由於它與福德診所地理相近，相信是由同一批義務醫護人員兼顧。而其中兩份資料顯示的地址，一為 C 座，一為 14 座，是政府將徙置大廈由英文座數改為數字之故，未能確定是否在同一位置。<sup>287</sup>

## 8.8.2 瑪利諾神父診療所

正當政府打算發展官塘之際，賴存忠神父和萬金培神父（Fr. Edward Krumpelmann, 1909-1975）便進駐這個未來的衛星工業市鎮，制定傳教計畫。他們獲政府允許，在政府大廈內開設診所。兩人就租住在鄰近診所的一個房間，好能與附近居民打交道，這樣一住便兩年。經瑪利諾會與政府協商下，他們取得了位於俗稱「雞寮」的官塘徙置大廈第十八座整個地面樓層兩翼，提供不同的福利服務。

瑪利諾神父診療所由萬金培神父於 1961 年成立，並為之取得大量的藥物。萬神父原在廣東江門傳教，1947 年返回美國的修院中學教書，1958 年來港。他籌措醫療物資和捐款的能力可沒有誇大。1975 年，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擴建銅鑼灣聖保祿醫院新翼時，萬神父為醫院籌集捐款之餘，還捐贈了不少金屬病床和儀器，重達六十噸。只可惜他在完成安排寄出該批物資後便離世。對於他的功勞，聖保祿醫院在新翼牆上掛上感謝萬神父的牌匾。<sup>288</sup>

其他曾任所長包括賴存忠神父，主任醫生則有韓諱豐醫生。除了普通科診治，還有肺病所，每周五下午又提供地方給公教婚姻輔導會作生育指導所。由於六十年代，節育概念未流行，每個家庭都生好幾個孩子，孩子的教養使本身經濟環境不佳的貧民百上加斤，而這類指導所是教導民眾以合乎天主教教義的自然方式計畫生育。

1962 年那時，徙置區由英文字母來分座數，教會的地方在 F 座。據 Connie Leung 憶述，一進去分兩邊，有些像課室的房間，是工作人員辦公或活動的地方。她的姐姐 Annie Leung 記得那裡的義診所：「一進門口，右手邊就是診所，義診的，有位肥姑娘；有什麼事就跟姑娘說。左手邊最後那裡就做聖堂。」<sup>289</sup>

### 8.8.3 瑪利諾神父診所及教理中心

據《1962 年香港天主教指南（重印）》，瑪利諾會在牛頭角道 333 號也設有教理中心附設診所，與宜安街的聖若翰彌撒中心相距幾百碼。按教區檔案處網站資料，上址 1961 年時稱為官塘小堂（後易名聖約翰小堂），設於四樓，屬牛頭角天神之后堂區。關於診所沒有更詳盡資料，從《指南》上的地圖，該處為花園大廈範圍。1959 年萬金培神父向瑪利諾修女提出在官塘區協助「取代當時由瑪利諾神父管理，但快要關閉的診所」<sup>290</sup>，而瑪利諾修女亦先後在花園大廈玉蘭樓及百合樓設有診所，故 333 號的診所有可能是前述庇護十二世診所過渡至牛頭角明愛診所之間的設施，由瑪利諾修女主理，但確切事實尚待考究。

### 8.9 美國政府停止資助

除了美國教友的奉獻，瑪利諾會的醫療經費，部分是來自美國政府每年五萬美元的援助。怎料，在六十年代初，瑪利諾會和世界信義宗收到美國政府停止對香港資助的通知。修會在香港的區代表王超光神父（任期 1960-66）1962 年 2 月致函駐港總領使館，希望收回承命，信中顯示了社會對瑪利諾男女修會醫療服務的需求：

「去年有 258,700 宗個案在瑪利諾神父七間診所接受診治。這些人不能在其他地方獲得醫療幫助……除非他們以百分之三十五至五十的利息去借錢，而這樣他們就無法重過正常生活……（診所）就近他們居住的地方。他們無需要花錢坐巴士到市區，這為一個每天賺取六港元的人來說是個重大因素。……然而，如果錢是用在難民身上，我們希望見到為最多的難民帶來最大的好處。我們的醫療項目正正做到了這一點。」<sup>291</sup>

有論者指出，即使美國政府對其他國家逾百萬至千萬美元的巨額援助款項往往不知去向，香港的撥款只佔總額不到一成，但王神父的信未能扭轉於 1962 年底停止援助的決定，因為美國政府認為港英政府應像

對住屋問題一樣，支持和擴大現有的醫療項目。<sup>292</sup> 不過，美國政府仍有在其他方面提供援助。

時至七十年代，香港社會日趨穩定，而在教會內部亦因應梵二會議推動本地化的思潮，瑪利諾會認為是時候把堂區交回教區管理，由往昔主導某些堂區的發展，成為輔助角色繼續為教區服務；仍在運作的診所，則交予香港明愛繼續營辦。與此同時，美國天主教福利會於 1977 年亦決定結束其香港辦事處，將服務轉移至澳門。此辦事處 1949 年從上海轉移至香港，在中環公教進行社一個細小辦公室內運作。隨著大陸難民湧進香港，辦事處很快便擴張，其最初的工作是設立邊境巡視組去迎接從內地被驅逐出境的傳教士。鄭濟民神父 1951 年接任香港辦事處主任一職後，先是成立流動診療所，由瑪麗醫院、嘉諾撒修女和公教婦女會成員派出醫生和護士協助，兩年後開始食物計畫，救助五六十年代大量的難民人口。1957 年，羅民勞蒙席（**Monsignor John Angel Romaniello**）<sup>293</sup> 接任後，再擴大食物計畫，用美國送贈的麵粉在多區開設製麵廠，以適合華人的飲食習慣。這些製麵廠多數與教會的診所、福利中心相連，便於派發。此計畫獲得空前的成功，為羅蒙席贏得「麵條神父」的稱號。<sup>294</sup>

## 9. 瑪利諾女修會

瑪利諾女修會（Maryknoll Sisters, MM）在香港提供醫療服務的重要時刻，要數五十年代才正式開始。但要把瑪利諾男女修會的服務分開來介紹，其實是困難的，因為他們不但神恩相同，從成立伊始便合作無間，在瑪利諾會五十年代開設難民中心的地方，會見到瑪利諾修女的身影。但有兩間診所，明確是由修女們獨當一面地運作和管理，而她們成立的聖母醫院更是戰後第一間天主教醫院。此外，伴隨醫療服務，瑪利諾修女於 1951 年開展的住屋興建計畫，也同樣重要，是解決難民困境的另一環。在政府終於承認難民不會離開的這個事實之前，瑪利諾修女已在京士柏及何文田建造了七十一間石屋給難民家庭；修女們亦選擇在京士柏落腳，至今仍是其中一個會院的所在地。連同義診所的開辦，京士柏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可說是修女們胼手胝足的成果。

### 9.1 瑪利諾修女義診所

瑪利諾修女義診所又稱京士柏診所，位於何文田楠道（現公主道），開設於 1954 年。其時的京士柏「主要是一個墓地，在一處有幾間棚屋；沒有道路、沒有水，除了幾口井；周圍是山丘和荒地」。<sup>295</sup>

在診所建成前兩年，旁邊已建有京士柏小堂（1954 年更名為紀念恩理覺主教公所小堂），附設有社區中心，是首個在大型徙置區裡的類似設施。<sup>296</sup> 修女最初就住在小聖堂後面的幾個房間。瑪利諾修女計畫為何文田難民群體開展服務之時，美國天主教福利會香港辦事處代表鄭濟民神父已為她們安排流動診療車，每周兩次停泊在社區中心外應診。1955 年，一座新的福利社（現公主道 48 號）在小堂不遠處建成；修女便遷進新樓，作為會院、教理中心和處理福利工作的辦事處。診治服務由流動形式改在租用的地方進行。三年後，公主道 52 號的另一幢樓房在福利社旁建成，地面用作診所，一二樓則用來開辦日間托兒所。<sup>297</sup>



京士柏福利中心（照片由瑪利諾女修會提供）

據《香港天主教手冊》的紀錄，診所的工作人員一度多達十三人，但多是兼職人員，包括五名醫生、兩名牙醫，兩名護士，兩名工作人員及兩名助理員。每周五天上下午有普通科醫生看診，另有一個下午有兒科醫生看診。**1957**年的援助報告中，流動診所和京士柏診所共診治逾二萬名病人。<sup>298</sup>所謂預防勝於治療，修女們又指導學童和特別班的成人衛生知識。在**1953**年下半年的各項工作中，除了派發近五千磅奶粉，修女們協助了十五名產婦所需經費，又向六十二個家庭派發給維他命丸，並為其他病人開出三百多封醫生信。<sup>299</sup>

曾在診所服務過的，有石修女（Sr. Josephine Marie），她是診所主任，何威利是主任醫生。據一個訪問中顯示，包修女曾在京士柏診所和瑪利諾神父在大坑東開辦的診所工作。包修女於**1952**年加入瑪利諾女修會，**1956**年來港，**1961**年在香港宣發永願，並在港擔任教師、護士等職位，曾任聖母醫院護理部主管。她在美國總會和其他國家亦從事護理工作。她於**1976-1979**年第二度來港時，在明愛醫院服務。<sup>300</sup>除了本身職務，包修女更在香港大學進修，以了解東方人對西方醫學的看法。<sup>301</sup>

隨著伊利沙伯醫院於 1963 年啟用，與醫院只有十分鐘腳程的義診所於六十年代末關閉，完成其歷史使命。此時，在其他地方服務和居於聖母醫院宿舍的一些修女希望住在一個更有家的感覺的地方，故而於 1974 年把原來的診所改裝為會院。為善用空間，48 和 52 號兩幢樓房的其餘空間於 1978 年開始讓其他志趣相投的不同團體使用。<sup>302</sup>

## 9.2 花園大廈診所

在牛頭角花園大廈的診所與瑪利諾神父同樣有著淵源。1959 年萬金培神父向修女提出在官塘區協助「取代當時由瑪利諾神父管理，但快要關閉的診所」。<sup>303</sup> 其時聖母醫院還在規劃中，女修會於是派遣包茉妮修女（Sr. Monica Marie Boyle, 1903-1997）和祈愛蘭修女（Sr. Helen Marie Kenny, 1932-2020）作先頭部隊，於 1959 年在牛頭角道花園大廈第一期（已拆卸重建為今玉蓮臺）辦起診所來。包茉妮修女在 1931 年入會前，已接受護理學教育。她於 1934 年派遣到華南地區工作，1958 年正式來港服務。<sup>304</sup>

祈愛蘭修女自小立志做護士，可說是聖母醫院其中一位功臣。祈修女 1949 年入會，接受護理學培訓後於 1958 年來港，在官塘診所任職護士，直至 1961 年轉至聖母醫院從事護理工作，兩年後回國進修，取得護理管理碩士學位。她於 1970-1983 年再度來港服務，重回聖母醫院出任護理總監。這時香港對善終概念並未普及，她看到臨終病人在心靈關顧方面的需要，便推動善終服務，又試行推出為末期癌症病人而設的舒緩治療隊及家居寧養照顧計畫。1988-2012 年間第三度在港時，她認為一般醫院未能全面為臨終病人提供心靈治療，遂參與興建全港首間寧養醫院，即於 1992 年啟用的沙田「白普理寧養中心」。<sup>305</sup>

花園大廈第一期七幢大廈是以花卉命名，於 1958-1959 落成。香港政府於 1953 年計畫發展原是市區邊陲用來堆埋垃圾的官塘區時，向香港房屋協會撥出土地興建該區首個廉租屋邨，出租給由僱主提名的工人，讓他們成為鄰近工廠區的人力來源。因此，這診所的特別之處在於，

政府要求修女們特別為工傷的勞工提供緊急治療。診所最初座落於花園大廈玉蘭樓，「這座五層住宅大廈的一樓，在一號房間就是我們的新診所，房間頗細小，有一個廚房，後來交替的用作廚房和注射室」，病人每天由幾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由一位女教友幫助與不會廣東話的外省病人溝通。<sup>306</sup> 1960 年診所遷至百合樓地面舖位。

後來有再多的修女加入官塘區的工作，修女們便重新安排有限的空間，已遷至百合樓的診所在上午應診，下午用作教理講授課室，而地理位置相近的雞寮 F 座官塘瑪利諾神父診所則相反，上午用作教理講授，下午用作診所。兩間診所每月分別約有一千和三千病人求診，由白鐘安修女 (Sr. Joanne Bastien, 教名 M. Anne Noel, 1931-2023) 管理，其他醫生應診。<sup>307</sup> 白修女 1953 年入會前已修讀護理課程，1957 年來港，1961 年在港發永願。然而，悉心照顧病人的白修女，自己卻深受頑疾之苦。她於 1963 年開始受背傷及抑鬱症的身心煎熬長達半個世紀，曾寫道：「我那麼愛瑪利諾會，使我難以理解天主為何會對我有這樣的計畫。」<sup>308</sup>

與在其他診所服務的瑪利諾修女一樣，白修女也會用方法標記輪候人數，就是在地上寫上一百個號碼，方便排隊和維持秩序。百合樓診所於 1963 年關閉，病人都改往雞寮 F 座求診，早上是診治肺癆病人，下午開放給普通科；當年官塘的醫療服務，錄得六萬四千多人次求診。<sup>309</sup> 隨著社區發展，在徙置大廈的診所都由明愛牛頭角診所取代，卜瑪利修女此時擔任主管。加拿大出生的卜瑪利修女 1955 年在美國加入瑪利諾會，「只因為她喜愛修女的宗教服飾」。<sup>310</sup> 她入會前已是註冊護士，並曾在醫院短暫任職。她於 1958 年發初願後，便獲派到香港的診所服務，同時為護士助理提供在職培訓及管理嬰兒營養部和牙科診所。受修會的調派，她其後兩度來港，獲派的工作都與醫護相關，包括八十年代在聖母醫院、護理服務及牧靈等不同崗位，以及九十年代協助廣華醫院及九龍醫院成立牧靈部，至 2004 年回美服務直至退休。卜修女長年在醫護界服務，死後亦把軀體捐作研究用途。<sup>311</sup>

### 9.3 嬰兒診所

為應對當時新生兒的高死亡率，修女們在她們的診所或福利部附設嬰兒部，稱為嬰兒健康診所，由包修女於 1963 年在九龍仔首先開辦。在診所服務的頭十個月，每周約有三十五名六個月以下的嬰兒到診所接受體重和身體檢查，哺乳母親則獲派發鈣片、維他命丸和營養粉，又教導以豆奶補充營養。在京士柏，修女會向母親和初生嬰兒供應牛奶。<sup>312</sup>在官塘和牛頭角的嬰兒部，每天處理約二百個小病人，費用三毫半一天。這樣做有雙重目的，一是讓母親安心出外工作之餘，免得她們認為是要靠慈善施捨，二是在修女的照料下，除了給孩子們飽腹，同時亦可密切注意他們的成長健康。<sup>313</sup>

### 9.4 為貧民而設的聖母醫院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在華南地區工作的瑪利諾修女，實際上已僅限於香港和台灣，人數卻是歷來最多；在港服務的修女從 1952 年四十三人，在 1965 年達最高峰的八十六人，至 1982 年才回落至四十四人，此後一直下降至現在的個位數。除了診所，瑪利諾修女更重要的醫療服務當然是黃大仙沙田坳道的聖母醫院。據 1966-1967 年修會在華南地區的人力分布圖，京士柏、牛頭角、九龍仔大坑東的各間診所都只有一名修女，其餘絕大部分的醫護修女都在聖母醫院不同崗位上，包括一名負責行政和十二名醫務職員。<sup>314</sup>

瑪利諾女修會 1961 年在黃大仙徙置區啟用的聖母醫院，建築費由美國政府捐贈，達十九萬三千美元。修女們開設醫院之事，實際上已構思經年。1953 年，修會曾向港英政府提出在尖沙咀天文台道開設醫院，醫務衛生署雖感興趣，卻未成事。1957 年，美國海外服務遠東難民計畫終回覆修會，願意提供建院經費，而香港政府亦同意撥出土地。<sup>315</sup>初期的計畫是提供五十張病床，但在六十年代初黃大仙人口不斷膨脹下，已變得不符現實，需為綜合病房增設五十張病，另外五十張給兒科病房。由於病床有限，這使得醫院院長賴蘭玉修女（Sr. Maria

Rieckelman，教名 Sr Maria Fidelis，1927-2018）和其他醫生每當要決定「有多嚴重的病情才算是『急病』」都倍感為難。<sup>316</sup>

賴蘭玉修女 1945 年入會，1955 年醫科畢業，1958 年奉派到港監督聖母醫院的興建，1963-1967 年出任聖母醫院院長，2019 年去世，捐出遺體作科研用途。<sup>317</sup> 至於其他曾在聖母醫院服務的修女，包括門診部工作的艾清清修女（Sr. MaryLou Rajdl，教名 Sr. Ann David），臨床實驗室主管童樂賢修女（Sr. Miedal Stone），有護士背景的羅瑪麗修女（Sr. Marilyn Norris，教名 Sr. M. Deirdre，1933-2006），家庭護理服務及社區護理項目主管胡瑪利修女（Sr. Mary Louise Higa，1927-2023），以及營養師安瑪莉修女（Sr. Ann Marie Emdin）等。

本研究雖然不包括醫院門診部，但聖母醫院的門診部仍值得一提，因為在建造之時，修會已預計未能接收太多病人住院，故有意地附設一個大型門診部。甚至在 1961 年醫院啟用時，只有門診服務，直至 1962 年 8 月，在六位修女的努力下，才籌辦好住院服務。<sup>318</sup> 門診部每天上下午各看診二百人，這數字還未計算那些前來取藥的人。此外，醫院為一歲初生兒開設嬰兒診所，跟進他們出生後的情況，以及得到所有應有的防疫注射。門診部的藥物實際上都是「藥板」，即試用的新藥。賴修女說：「我們收到很多有用的藥板。如果沒有這些藥，我不知我們可以怎樣維持下去。」<sup>319</sup>

卜瑪利修女在一個口述歷史訪問中說，在早期的日子，很多病人因生活在惡劣的環境中，患了膿瘡和受到嚴重感染，由於用了傳統中草藥，傷口感染情況更為嚴重。政府的首要目標是防止傳染病的爆發，修女們「在人山人海的政府診所系統之外，為難民作疫苗注射」，並設法宣傳公眾衛生的重要性。<sup>320</sup> 她又憶述，在門診部，當診斷過和派了藥之後，常會有病人小聲說：「修女，很感激你，但請你給我一些奶粉和食物，我實在吃不飽。」更特別的是，當時寮屋區經常發生火災，每當有火災發生，聖母醫院門診部使用來暫時安置無家可歸者，他們只有很少隨身物品，那是他們在木搭的家「付諸一炬之前，能抓著到的壺壺罐罐」。<sup>321</sup>

## 9.5 醫院？診所？醫生的抉擇

聖母醫院另一個情況也與診所有關，是林鉅成醫生向修女勸說的結果。<sup>322</sup> 林醫生於 1972 年成為聖母醫院首任華人院長（任期 1972-1985）。他憶述 1962-63 年自己還是見習醫生的時候，很多從大陸到香港的人住在黃大仙、鑽石山一帶。大學時期同住在利瑪竇宿舍的學長告訴他，黃大仙區找不到醫生服務，問他可否去幫忙。即使林鉅成打算完成實習便到美國進修，因為實在太缺乏人手的緣故，學長仍請他在等候出國期間去幫忙。林鉅成於是去了聖母醫院面試，那時還見到醫院後面有人養豬。「修女對我說：一定要來，因為她請不到醫生。」林醫生口中的就是賴蘭玉修女。

林鉅成 1963 年入職聖母醫院時，連他在內只有三名醫生，包括有外科醫生資格的奉貝麗修女（Sr. Marie Patricia Fitzmaurice）。他一邊工作，一邊申請到外地進修，在聖母醫院做了一兩年，找了一些師弟來幫忙，豈知同區的佛教醫院投入服務後，六個醫生有四個離開了。「因為佛教醫院有宿舍，而且沒有修女管理得那麼嚴格。她們的要求高，佛教醫院的要求比較寬鬆。醫生下午十二點到兩點和下午時段比較方便外出，便到自己的診所看症。聖母醫院則要求醫生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都要在醫院內，不能離開。所以醫生走得八八九九，我只好留下來守住。」

「我對修女說，聖母醫院和政府醫院的條件相差很遠，她會很難請到醫生的，唯有醫生當值時間內留在醫院，朝八晚五，早上八點已經有手術，如果他下了班，做的是合法事情便可以。但若他 on call（當值）當然不能走。你要有這樣的條件才能吸引人，讓他們一邊做一邊學習，一邊在外邊掛牌。修女聽從我的意見，就聘請到一些醫生。」

為何醫院醫生想同時在診所執業？林鉅成解釋，「因為剛畢業的醫生沒有人認識，有些會先在醫院工作，累積經驗和名氣，當湊夠一定數量的病人便自行開業；有些是敬業樂業，有時間便看症。」他也是覺得自己精神還好，選擇繼續開診半天為病人看診，至今為基層服務已六十年。

## 9.6 合作與發展

聖母醫院於 1991 年加入醫院管理局，京士柏和花園大廈的診所早已關閉，雞寮徙置大廈 F 座拆卸重建，明愛牛頭角診所亦再不是由瑪利諾女修會主理。不過，所謂前人種樹後人遮蔭，瑪利諾的醫護修女可說已功成身退。正如現任瑪利諾女修會香港團體的負責委員會成員王美笑修女說：「雖然不是我親自為診所服務，但是我知道我們很多修女為香港的環境發展服務，無論在醫院還是其他範疇，並且與其他團體有合作關係。例如祈愛蘭修女和白普理寧養中心有關於 Palliative care（按：舒緩治療和寧養服務）的合作。修女們亦參與香港的醫療培育，教育其他人。」

如同其他女修會一樣，瑪利諾修女都已退出了直接的醫療工作，卻仍從事相關的服務，像醫院牧靈工作，借探病以接觸人群。王修女在聖斯德望堂服務時，每周會到瑪嘉烈醫院、葵涌醫院探訪。「我特別探訪教友，但也有些人問我可不可以和他們一起祈禱，所以我在醫院也試過教道理，有人領洗。探訪的目的不是傳教，但你會和護士、病人建立關係，有時候護士會問我，可不可以跟某個病人聊天，安慰他。」

王美笑修女說：「我知道很多病人會因為修女的服務而覺得她們有親切感和關心自己。我在醫院是做牧靈探訪，與病人一起祈禱，表達一份關心。我記得在醫院有一位年輕病人，見到我在隔鄰床祈禱，他問我可不可以一起祈禱。他的癌症已經擴散，知道自己是末期，他要求洗禮。我覺得我們的榜樣會影響其他人。」<sup>323</sup>

林鉅成醫生也說：「隨著神父與修女人數越來越少，能夠直接參與為市民醫療服務的神職人員數目也急劇下降，雖然我們的前線醫療服務隊伍中，可能已找不到修女或者神父了，但係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愛心仍然能夠繼續宣揚和維持下去。」

## 10.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FMM）是由真福苦難瑪利亞修女（Blessed Mary of Passion，1839-1904）於 1877 年成立的一個國際傳教修會。1999 年獲教廷宣為真福的修會會祖，原名夏波登的海倫（Helene de Chappotin），出身自法國貴族家庭。她早年加入聖母補脣會，在初學時期被派往印度傳教及培育當地修女。但因培育工作上的衝突，而歐洲與印度通信的延誤，最終苦難瑪利亞修女與十九位修女離開聖母補脣會。在當地主教的鼓勵下，她與另外幾位修女代表往見教宗庇護九世，得到批准成立新修會，名為「瑪利亞傳教女修會」。修會雖然在印度創建，但核心成員都是歐洲人。<sup>324</sup> 1885 年，苦難瑪利亞修女帶領修會加入「方濟大家庭」，更名為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方濟大家庭是指凡以聖方濟各的神恩及靈修為本，以不同形式合作和交流組成的不同修會及在俗會。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的神恩是「仿效基督承行天父的旨意，熱愛世人，自我奉獻，並如聖母瑪利亞和聖方濟一樣，以簡樸的生活，實踐福音，將基督帶到所到之處」。<sup>325</sup> 如今這個女修會有八百多個團體分佈在全球七十多個國家，勉力保持一個祈禱、團體生活和傳教三者兼顧的平衡生活，願意到最遠、最危險、教會較少在的地方回應福傳使命。<sup>326</sup>

### 10.1 澳門護士學校惠益香港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在十九世紀末已來華，由於修女會衣是白色的，所以又被稱為「白衣會」。她們中有七人在山西太原的教難中因信仰殉道，於 2000 年獲教廷宣為聖女。在醫療方面，1902 年，苦難瑪利亞修女接受剛上任的澳門教區鮑理諾主教（D. Joa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任期：1902-1918）的邀請，派了幾位不同國籍的修女到澳門，在四百多年前方濟會會士曾居住的故地上，建立團體，取名聖嘉辣會院。其後，又受下一任的主教高若瑟（D. Jose Da Costa Nunes，任期：1920-40）的邀請，派修女到澳門俗稱山頂醫院的仁伯爵醫院服務。從葡萄牙派來的修女都是護士，澳門政府便把醫院交了給修會負責，而修會於 1939 年亦在當地成立聖嘉辣護士學校。若香港有修女入會後有興趣從事醫護工作，便派往澳門接受訓練。

該天主教護士學校於 1958 年向澳葡政府正式註冊，改名為瑪利亞方濟傳教修會護士學校，直至 1979 年結束。時至九十年代，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已沒有多少成員從事護士工作，便把醫院交回給政府，只留下一兩位修女協助；至今已全部退出。護士學校除了培育修會本身的護理人才，與香港其他女修會也有密切關係，如寶血女修會及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就曾派成員到該處修讀課程，然後回港服務。

較諸內地和澳門，修會在香港的發展比較晚才起步。1938 年，金正中修女（Sr. M. Conleth）曾拜訪恩理覺主教探討開設會院的可能性，可惜因中日戰爭而擱置。至戰後 1947 年，修會才在港成立第一間會院，即界限街近基堤道的愛明會院，目的是設立小學和職業學校，同時接待過路的修女。當時在聖德肋撒堂擔任主任司鐸的和靈道神父（Fr. Carmelo Orlando, PIME，1907-1990）對該區需要較為熟悉，修會後來接納了他的意見，改為開辦聖羅撒小學及幼稚園。1954 年，修會開始在馬鞍山服務。<sup>327</sup>

## 10.2 來自五湖四海的馬鞍山居民

馬鞍山因形狀如馬鞍而得名，在《新安縣志》中便有描述：「馬鞍山在縣東八十里枕東洋形如馬鞍山腰有田數十畝舊村久廢今復有家居者。」<sup>328</sup> 在這個人煙稀少之地，山區上卻蘊藏了優質磁鐵礦和赤鐵礦，早於二十世紀初已被勘探到有鐵礦，蘊藏量達五百萬噸。<sup>329</sup> 香港早年

產礦的地點包括荃灣蓮花山的錫礦、沙頭角蓮麻坑的鉛礦、大嶼山的錫礦、青山的錫礦、大小磨刀洲的鉛礦等，以馬鞍山的產量和規模是全港眾多礦場之冠。<sup>330</sup>

在日治時代，日軍接管礦場，由工人露天採礦再運至碼頭。1949年初，大公洋行接手經營，礦場得以進一步發展。起初礦工主要是來自廣東五華縣的採石工和從粵北招募前來的客家人。戰後，大量難民湧港，馬鞍山的工作機會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前來謀生，當中「不乏知識分子，有飛機廠廠長、化學工程師、空軍管理層、軍人及政客等」；他們或有採礦經驗，或有駕駛大卡車的經驗。<sup>331</sup> 礦場二十四小時運作，採三班制，日薪由最初三毛錢到後來才漲至三元左右。單身前來的工人在礦場附近搭建工棚居住，每間住十多人。後來，由於不同工種的需要，有些維修技工、司機帶同家眷，轉到碼頭聚居。大公洋行經營接近三十年，在 1949-1971 年間，馬鞍山人口多達五六千人，自成一個小社區。七十年代通貨膨脹，港元貶值，國際礦砂價錢又追不上，加上政府落實發展馬鞍山，向大公洋行賠償收回土地，而至 1981 年五十年的採礦牌照屆滿，馬鞍山的礦業正式宣告結束。<sup>332</sup>

### 10.3 貧困社區的宗教團體

除了礦場，在這個新界東面西貢半島鄉野之地，鄰近烏溪沙一帶有幾條客家村落，地理上可從西貢北面徒步或從沙田何東樓乘二十分鐘船程前往，但五十年代的沙田本身也是隔涉之地，與九龍市區主要以鐵路連接。這裡既有從事農耕的原住民，也有逃難而至、聚居在馬鞍山尋找生計的難民礦工，很自然吸引了以仁愛和慈善為本的宗教團體前來服務，其中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信義會就為居民開辦幼稚園、小學，又派發文具、救濟品和提供簡單的醫療服務。雖然早於 1869 年，米蘭外方傳教會（1926 年改稱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已曾在烏溪沙村落傳教，並有鄉民接受信仰領洗入教，不過，如說到馬鞍山礦區，天主教團體則要數方濟會。

方濟會在十三世紀已來到中國；若按傳教士來港的時間順序，方濟會的「小兄弟會」分支（Friars Minor, OFM）更是香港被殖民統治後「首個到埠的大群體」。1842年1月，西班牙籍方濟會士陸懷仁神父（又名方來遠，Michael Navarro, 1809-1877）成為首位在香港居住及為香港信徒舉行主日彌撒的傳教士。<sup>333</sup> 同年，另一會士裴神父（又名傅安當，Fr. Anthonius Feliciani, 1804-1866）獲任命接替突然逝世的宗座監牧若瑟神父（Fr. Theodorus Joset, 1804-1842），成為代監牧（後成為正式的宗座監牧）。然而，方濟會為了集中在內地傳教的力量，且知道教廷傳信部對將香港教會交托給方濟會管理有所保留，修會在十九世紀只視香港為短暫停留的中轉站。<sup>334</sup> 其再度來臨香港時，已差不多到了二十世紀中葉，為的是內地政局的轉變被迫離開。1948年，原在湖北傳教的比利時籍胡文義神父（Fr. Eleutherius Van Hoyer, 1922-2010）與湖北宜昌教區王志遠（1914-1992）及李文峰兩位神父一起來港，三人於1952年來馬鞍山，在礦場附近建立小堂及義校。聖堂和學校皆以勞工主保聖若瑟命名，除了因聖若瑟是胡神父所屬會省的主保，也是作為汗水與收入不成比例的礦工的心靈安慰。胡神父在馬鞍山的牧職一點都不容易，他當時只有十美元作為起始經費，後來得到從國內被逐離境、在港短暫停留的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為他爭取到每月三百美元的津貼，才使他的工作能穩定地繼續。<sup>335</sup>

## 10.4 馬鞍山的兩間天主教診所

同屬「方濟大家庭」的瑪利亞方濟會傳教女修會於1954年應胡文義神父的邀請，由波蘭籍的文德華修女（Sister Maria Ann Wojtukiewicz, 1899-1992）<sup>336</sup> 最先帶同霍文璽、劉智英及沈惠月三位年輕國籍修女來到馬鞍山。<sup>337</sup> 修會在馬鞍山山頂和山下都設有會院：山頂的聖母聖心會院於1954年成立，由文修女和六位國籍修女組成，為交通不便的山頂居民開設幼稚園及診所，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翌年，當山下的聖方濟各小堂建立，修會再應方濟會神父的邀請，在碼頭區建立聖方濟會院（馬鞍山），為山下居民開設診所兼留產所，後來再開設幼稚園。

山上診所稱為聖若瑟診療所。山下的診所在五十年代，原稱為聖若瑟第二診療所（St. Joseph Clinic 2<sup>nd</sup> Section）<sup>338</sup>，但於1957年被豪雨引發的泥石流摧毀，後其獲英國救助兒童基金會捐助，連同幼稚園得以重建，稱為亞松大福利中心。1963年，白英奇主教為新福利中心奠基，在兩年後的1965年1月15日由何瑾夫人揭幕。<sup>339</sup>診所此時改稱亞松大診療所，以紀念修會意大利籍真福亞松大修女（或稱亞松達，Blessed Sr Maria Assunta Pallota, 1878-1905）。亞松大修女1904年到山西傳教，雖然只是負責會院的廚房工作，未能如願為中國的痲風病人服務，但她以純樸、神貧、謙卑和服從的態度面對，可惜翌年因瘟疫去世。1954年，教宗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任期1939-1958）列她為真福品。



1965年重建後的診所位於亞松大福利中心內  
（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據《香港天主教手冊》顯示，文德華修女早期兼任兩間聖若瑟診療所的主任，碼頭區診所更名為亞松大診療所後，兩診所主任之職開始分別有不同修女擔當。至1979年，碼頭區診所除了診所主任，更出現主任醫生韋金耀。山上的聖若瑟診療所於1981年已沒有在《手冊》上顯示，意味已經停辦；而亞松大診療所自1983年在《手冊》上標註為暫停，1985年也同樣沒有再顯示它的存在。

## 10.5 馬鞍山的診所修女

由於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在馬鞍山服務長達三十年，且分佈山上礦區及山下碼頭區，在那裡服務過的修女為數不少。此外，澳門 1966-1967 年爆發當地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澳葡政府動亂——「一二·三」事件，修會遂將十五名初學生從澳門轉移至山下會院，使得會院一時間容納了二十多人。<sup>340</sup> 不過，這些修女大多從事人力資源需求較大的教育工作，與診所明確相關的，從歷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顯示，只有文德華修女、畢維德修女（Sister Natividad Mugarza Mecalalde, 1922-2019）、姜明達修女（Mother Maria de St. Mandale）、美明修女（Mother Maria Dolores Albistur）、嚴艷嫻修女（1920-2015），王聰敏修女（1932-2022）及楊志碧修女。

文德華修女 1917 年加入修會，1921 年受派遣到中國傳教，先後在天津、煙台、青島等地服務，1954 年來港便被派往馬鞍山，直至 1985 年政府發展該處成新市鎮才離開。那時已是八十五歲的她，轉往澳門專務退休祈禱生活直至去世。文修女長時間擔任馬鞍山會院院長，以及兼任兩所診療所的主任，在霍文璽修女的記憶中，這位波蘭籍修女「見到小孩子總是壓低高高的身子，一口一個『小寶貝』、『小天使』、『小耶穌』地疼，藍眼睛裡漫溢著愛」。<sup>341</sup>

性格開朗，能歌善舞的畢維德修女是西班牙人，1944 年加入修會，三年後獲遣派來港澳地區工作，於 1949 年在澳門聖嘉辣會院宣發終身願，亦在當地首間提供西式治療的聖辣法厄醫院（Hospital de S. Rafael，俗稱「醫人廟」、「白馬行醫院」）工作過，在港澳區服務長達七十二年。<sup>342</sup>

香港出生的嚴艷嫻修女於 1944 年在澳門加入修會，兩年後年宣發初願，便隨即派往上海公濟醫院擔任護士，並於 1949 年在上海宣發終身願。1957，她回到澳門，除了在仁伯爵醫院任職護士，同時協助修院

的護理和財政工作。她於 1964 年轉往修會在馬鞍山的診所藥房工作，三年後開始從事教育工作直至 1985 年退休，期間於 1972-1976 年於聖德肋撒醫院擔任護士。<sup>343</sup>

王聰敏修女 1932 年出生於陝西三原教區通遠坊，當地是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在內地的一個重要傳教基地。王修女於 1951 年在澳門入會，1956 年宣發終身願，翌年在澳門護士學校就讀，之後在山頂醫院服務十年，至 1967 年來港任護士及助產士，1973 年再先後派往修會在台灣新竹的博愛醫院及澎湖從事護士工作，其後主要從事陪伴病人和長者的事工。<sup>344</sup>

楊志碧修女是在澳門仁伯爵醫院接受訓練和實習，來港後便派遣到馬鞍山，其時已是 1976 年，是山下亞松大診療所的最後一位主任，直至 1982 年。<sup>345</sup>

## 10.6 修女的回憶

在診所服務過的修女如今大多已息勞歸主，幸好有兩位曾在馬鞍山從事幼教工作的修女，以及其他機構曾經記錄的口述歷史，為我們勾勒出當時的境況。

八十多歲的官德儀修女現居於出生地澳門。她於 1964 年加入修會，1966 年被派往馬鞍山的幼稚園工作，直至 1972 年宣發終身願才離開。她在馬鞍山的時期，約有八位修女，其中兩位是西班牙人，一位是加拿大人。雖則是外籍人士，但她們都懂廣東話和普通話。官修女記得當時最近的公營醫療設施要到沙田，而馬鞍山礦場本身有醫療站，為礦工及家屬開設，所以「修會在碼頭區的診所主要是方便有少少發燒、不舒服的居民，由一位專業護士為他們服務」。<sup>346</sup>

由於礦場爆破容易造成工業意外，大公洋行於 1951 年分別在山頂、山下設置了醫務室，聘用註冊醫生駐診。在六十年代以前，孕

婦要生產最就近的留產所也要到現在的沙田排頭村附近，如以現今鐵路來說，也有六個站的距離。<sup>347</sup> 馬鞍山現今已有了鐵路行走，但直至八十年代，政府興建公營房屋之前，居民都是靠坐船出入。故此診所修女更重要的任務是作為助產士，免得孕婦途中產子而造成危險。

官修女說：「病人多數從烏溪沙過來，去沙田都頗遠的，我們那裡可以是一個歇腳站。至於我們的護士，她也是助產士，所以分娩的媽媽來不及到沙田的留產所生BB的時候，有些會在我們那裡接生，之後才去沙田辦理出生證件。」七十年代到馬鞍山服務的麥婉琚修女同樣說：「診所接生BB比較多，因為產婦趕不及出去市區。就算有產前檢查，到市區可能都已經生了，所以多數在我們那裡出世。除非是難產，便要立刻打電話求助。那時沒有直升機，由礦船送出去，十字車在馬料水那邊等，然後立刻送進醫院。」

馬鞍山的產婦在官修女眼中：「個個都是勞動份子來的。她們晚上來生BB，第二天清晨便離開。我最記得她們很有趣的，用媽媽的褲子包裹著BB，可能因為她們覺得污穢、『月婆』那些，所以用媽媽那條布包著。她們不會過夜的，過夜就『大吉利是』了，那些我們是不會收的。我們會立即打電話去沙田，送她們去，所以也感謝天主，有驚無險。」<sup>348</sup> 她指出，那些趕不及到沙田而前來診所的那些產婦，「我們每個都認識，不是貿貿然來的，她們已經在沙田那邊掛了號生BB」；而產婦誕下BB後，會給修女紅包以表答謝。麥修女亦表示：「生產後的孕婦不會在那裡住，都會立刻帶著嬰兒離走。我們步行到碼頭大概七分鐘左右，碼頭對上一點才是第一條村。如果是從山頂下來，還要坐礦車回去，所以生產後再上去是很辛苦的。為修女們是一個很大的經驗。」

雖則負責診所的都是專業護士，但設備有限，遇上特別事故，自必然要小心處理。官修女就記得一個驚險的緊急事故，與烏溪沙青年營有關。「有一次一群青年在那裡燒烤和玩樂，不知怎地，不小心把燒烤叉插到其中一人的大腿。他們好慌張，將這個青年送到我們的診所。但我

們修女也不敢胡亂處理，害怕如果拔出那支叉，這個青年的大腿會流血不止。我們知道海上有醫療船，就立刻打電話去通知，於是醫療船駛到碼頭接了那個青年去醫院。」

麥婉琬修女進修院時已是幼稚園教師，七十年代以初學生的身份分派到馬鞍山教書，目睹其他診所修女的工作，很欣賞她們全心地為村民服務。她說：「那時傷風感冒當然是由修女負責。有什麼意外，像斷了手指，也是由她們包紮。當時法例和社會的要求不是那麼嚴謹，而那裡都是礦工，所以她們都很大膽地做了醫生的角色，除非是很重病，連接生都是她們做的。」她續說：「當時民風純樸，各家各戶睡覺都不用鎖門。有時半夜三更在海邊聽到有人叫：楊姑娘，楊姑娘，我們便知道又有人有急診。」因為修女們這樣不分晝夜地服務，「當地居民都十分尊敬修女並視她們如同家人」。<sup>349</sup>

在馬鞍山那段時間，有兩個事件讓麥修女很感動和難忘，其中一個是一位比較年長的漁民，負責用自己的小船送運垃圾。他有一天救了一個投海自殺的女人，後來娶了她做太太，還生了四個孩子，都是楊志碧修女接生，並與那家庭很友好。另一個故事：「有個男士每逢農曆初幾，就會偏頭疼得很厲害，怎樣也查不出原因，到外面就醫也查不出來。但很奇怪他只痛一天，第二天就沒事。因為一整年都是這樣，楊修女便『膽粗粗』想到，過了那天就沒事，那不讓他過那天是否可行？在他未開始痛之前幫他打針，讓他睡一整天，第二天果然沒事，之後便一直這樣打針。那男士的兩個孩子都長大成人，現在去了英國。」

這樣「膽粗粗」地幫助病人排除痛楚也不是沒有壓力的。麥修女記得楊志碧修女當時經常說，「『靠天主保佑：我成日求天主不要醫死人，否則就大件事了。』但她真的是全心服務，一來沒有為錢，我們的藥物都是外國送來的，所以我們沒有收病人錢。二來當時的醫療，最近也要到九龍的伊利沙伯醫院，遠水不能救近火，所以也要做這些事。楊修女每星期有固定時間都會到山頂看症，但主力是在山下」。

由於這樣無形的壓力，麥婉琚修女指出，馬鞍山的修女們有個傳統：「我們每間修院都有一個聖母像。如果看到聖母像前點著了蠟燭，便代表：『楊修女有事，求聖母保佑！』因為她可能遇到急症的病人，又或是產婦難產生不出來。有一次有位西班牙神父，不知道是否感冒，楊修女為他打亞士匹靈的針藥。但他是不能用亞士匹靈的，結果『砰』一聲暈倒了。楊修女喊官修女協助。院長聽見了，立刻點蠟燭給聖母，我們便知道診所發生了事，要幫她祈禱，讓她渡過這個難關。這些難關每次都遇到，為我是很感動的，看到她們對天主的信心，所以只要我看到聖母腳跟前有蠟燭燃點著，會暗叫『死啦，死啦』，便立即祈禱。我覺得這是我們修會一個很好的傳統——對聖母的那份依靠。為楊修女那壓力是很大的、很慘的。有什麼事官修女也幫手打點，像打 999、等礦船過來送病人去醫院。病人也會很感恩，偶然買些水果，送些番薯，或做一些鄉下的菜式，例如做一些茶粿，送給我們修女吃。」<sup>350</sup>

## 10.7 馬鞍山和附近鄉村的生活

馬鞍山實則分為三部分，山上主要是外省人，多從事礦場工作，山腰也住有近二百人，原籍潮洲，從山頂分流出來；而山下住上逾千人，多是與礦場相關的技術人員和家眷，以及在該處經營商店者。<sup>351</sup> 交通工具就只有礦場的兩部交通車，接載礦工和居民上下山。在遠一點的烏溪沙和鄰近鄉村，有很多姓廖的鄉民，他們也會前來看病，但要走上半個小時的路。他們的小朋友也到修女辦的學校讀書。

山頂的診所是與學校相連的一間小石屋，約二百平方呎左右，有四個修女住在山上，其中「兩位修女，一個老人（按：張渤先生），負責在學校裡教書。她們早年教書都只是在馬鞍山教，並不是真正的註冊老師，因為沒有多少人願意去教，唯有修女去做。不過，有些科目是山下的一位老師，與山上的學校『夾』時間，亦即是他上五天課，有一天會到上面教書。主要是科目問題，因為資源不足。」即使可以坐礦場的交通車到山上的會院，麥修女說：「好慘的，因為走那些路會『拖下拖下』，那些車好像鐵車那樣，很快，十五分鐘左右便到山上，但路很崎嶇。有

些人是走上去的，年輕的可以走上去。那些車是不用錢的，因為住那裡的全都是礦工，住下面的也是，他們沒有到外面工作。如果要出去沙田，就要坐艇仔，但碼頭一旦掛三號風球便要關閉。」

雖然香港在七十年代經濟開始起飛，馬鞍山居民的生活仍舊艱苦；但麥修女對民風簡樸的生活卻甘之如飴：「我們的神恩是為貧苦者服務。所以去到馬鞍山那裡都知道是要為貧苦的人服務，而且那裡向著海，聽到海浪聲很舒服。學生很純品，修女說什麼就是什麼，很相信修女，很多人也信了教。教會有時也派些救濟品，為他們是很好的福利。」

修女們每天有固定的作息時間，早上五時便起床做神修，吃過早餐才各自去教書、探訪、到聖堂幫忙或到診所應診，所以村民知道一旦身體不適，可以等修女望完彌撒後到診所求醫。<sup>352</sup>

距離馬鞍山不遠的十四鄉，住著不少教友。由於該地處於另一山腳，當時又沒有公共交通可抵達，前往該地傳教只能步行。當時有修女每周或每月一次去那裡傳教，大清早便需要起行，抵達村口已是上午十一時；抵達後便立即給孩子講道、做家訪，午膳後便需要起程回馬鞍山，回到會院已是黃昏時分。<sup>353</sup> 至於聖若瑟學校，分為山上和山下，山上有四個教室給一至四年級的學童，每班大約三十人；山下有八個教室，住在山上的五六年級學生，要每天乘搭交通車來回。就讀的學生有些遠至距離礦場五公里的泥涌，要走路前來。除了前述提到有捐贈的文具，修女亦為學童找鞋商捐贈鞋子，因為那裡只有碎石路，沒有正式的馬路，得保護他們雙足。

官修女指出：「那些小朋友都是這樣來學校，放學又走回去。我們約三點多、四點鐘放學，他們回去太陽還未下山。小學生會帶弟妹來上課，再帶著回家。年紀再小一點的小朋友就多數是阿婆阿公阿爺阿嫲帶，爸爸媽媽全都去了英國或外出打工賺錢。雖說公公婆婆是老人家，實際上又不是太老，因為鄉村的人很早結婚。」

### 10.7.1 文物所反映的社會狀況

說到學校，現存在馬鞍山聖若瑟中學及馬鞍山聖方濟各堂的銅鐘，是由胡文義神父購置，可說是承載了當地信眾的集體回憶。這兩個銅鐘在馬鞍山除了慣常集召信徒參與彌撒及祈禱，亦用於宣佈公眾活動上，例如放映電影為這個偏遠社群帶來罕有的娛樂。<sup>354</sup>



馬鞍山診所曾使用的藥品（攝於 2023 年香港教區文物室）

現存的文物也反映了馬鞍山修女的生活和當時的社會狀況。除了在香港教區文物室保存了馬鞍山診療所遺留下的藥物，伍維烈修士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女修會會院發現的另一文物——一個自製的紙皮防塵套，上面有手寫的中文標題《慈母春暉》，估計這是修女每天默想時所用的靈修書，並因經常翻閱而用防塵套包封保護。防塵套實則是一袋乾小麥的包裝紙，上面印著「由美利堅合眾國人民捐贈」字樣的 CARE 救援物資。這防塵套既代表方濟大家庭男女會士效法聖人清貧不浪費的生活，同時亦反映了他們以窮人為優先的精神，願意到城市的邊緣去服務。CARE 這個機構是 1945 年二戰後成立的救援組織，至今天仍在逾百個國家工作。其名字最初是 **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mittances to Europe** 的縮寫，是匯送食物物資到歐洲，後來更名為 **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 Inc.**，以反

映該組織援助與救濟的目標已遍及世界各地。在五六十年代，約有逾億份 CARE 援救物資送到歐洲，之後送達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它不僅幫助了馬鞍山，還幫助了香港其他地區的許多其他難民。<sup>355</sup>

## 10.8 守護馬鞍山的軍醫天主教徒——張渤

在修女出現提供醫療服務以前，不得不提礦場守護者——張渤先生（1931-2001）。本籍山東的張渤原是國民黨的隨團軍醫，胡文義神父初到馬鞍山時，挑選了新領洗的張渤和幾名青年為其助手。因張渤過往是軍醫，為礦工家屬提供義診及挨家挨戶替病童打針的工作便落在他身上。他後來曾肩負教職，直至政府要求資助學校的教師需擁有專業文憑，便轉為打點神父的生活和教堂事務。礦場結束後，年青行軍時受過腳傷的張渤，儘管自己也要借助柺杖行走，仍留下來為沒有離開的老礦工成立「聖若瑟老人會」（後易名為馬鞍山村老人會），繼續照應這些年老體衰的老人。張渤有「一口濃重的山東口音，又夾雜了許多廣州話詞彙，一般人很難明白他在說什麼」，但這無損他無私服務村民而贏得的威望，甚至獲得社會認同，於 1991 及 1994 年獲政府頒發社會服務獎及榮譽獎章。與張渤接觸過的人都會認同，他在「馬鞍山的歷史中，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sup>356</sup>

張渤的事跡漸漸引起了更多社會關注，從而獲得更多外界捐贈的物資幫助老人，其中最大的助益是將以往的山路鋪成水泥路，以及得到一輛全新的交通車。更重要是，他的故事引起了另一位天主教徒歐耀佳醫生的注意，在八十年代後期成為馬鞍山礦場結束後的義診醫生，與當時的護士女友（後來的太太）一起到山頂天主堂義診。歐醫生接受《礦山記憶：鐵，不一般的故事》一書的訪問中，講述當時的老礦工很多患有肺積塵，加上大多有吸煙習慣，所以他要買很多哮喘藥：「我們那時平均一年要買三四次藥，每次給四五十人吃。肺部有關的藥就很貴，因為我會買噴的那種。當時是不便宜，每年都要兩三萬元藥費。」<sup>357</sup>

## 10.9 服務隨新市鎮發展而結束

隨著馬鞍山礦場的結束，政府於 1976 年探討沙田新市鎮第二期工作，並於 1979 年把馬鞍山納入發展為新市鎮的計畫中，相關的教會團體亦審視自身服務的存續需求。兩度離開馬鞍山到他處服務的胡文義神父，最終第三度離開，於 1981 年離開香港，定居於台灣的方濟會團體。新市鎮的發展計畫使碼頭區的聖方濟各小堂於 1984 年被拆卸，遷至馬鞍山的第一個公共屋邨——恆安邨，於 1996 年祝聖為聖方濟堂。學校此時交由方濟會作辦學團體。為迎合學生的升學需要，修會於 1996 年更成立了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與此同時，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亦認為，馬鞍山的服務可告一段落，於 1986 年正式結束在該處的傳教和社會服務，修會反而注意到社會整體發展，生活水平雖然提高，但精神生活卻相對地更趨貧乏，於是投入醫院牧靈工作，為垂危病人及家屬均提供身心靈的陪伴。<sup>358</sup>

山上的聖若瑟小堂於 1999 年已停用，如今已人去樓空。該處的天主堂建築群於 2016 年被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二級歷史建築。馬鞍山的往昔，於市區發展中和居民的老化中漸次消逝，不過在有心人的維護下，既有馬鞍山民康促進會、鞍山探索館等機構努力保存各種記憶。

## 11.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

源於愛爾蘭的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SSC）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已踏上華人土地，於 1926 年 11 月 15 日首批六位修女抵達湖北漢陽，成立她們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服務點，與早已在當地扎根的聖高隆龐傳教會（Missionary Society of St. Columban, SSC）並肩服務。這兩個修會之所以會通力合作，是因為 1917 年創立的聖高隆龐傳教會（原稱梅努斯對華傳教會 Maynooth Mission to China）同樣來自愛爾蘭，是一個為了到中國傳教而成立的男修會。教宗庇護十一世把漢陽宗座監牧區交託給聖高隆龐男修會牧養，並任命其聯合創辦人高爾文神父（Fr. Edward Galvin, 1882-1956）為宗座監牧。但高爾文主教發現男性傳教士很難打入華人婦女圈，認為如果有女性協助，牧民工作會來得容易，而有了婦女信徒，就會有孩子受洗，這樣的家庭模式，最終亦會對男性產生影響而入教。1917 年，男修會的另一創辦人若望·布洛威克神父（Fr. John Blowick, 1888-1972）提及極需要女性合作者為在中國新開始的傳教事業中一起工作，終於在 1920 年成立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以「從事任何有助於在中國傳播福音使徒工作」為己任。1924 年 9 月 29 日，首批修女發願，這個年輕的女性修道團體正式成為一個公開的傳教修會，這個日子也視為該會的成立日，明年（2024）將迎來一百周年。<sup>359</sup>

### 11.1 有助在中國傳播福音的使徒工作

聖高隆龐女修會的神恩是按時代的需要作服務，而那個時候民眾很需要醫療，孩子需要教育。抵達中國的聖高隆龐會修女首先在衡陽落腳，開始成立施藥所和傳教點。在三十年代時局混亂的中日戰爭中，有很多軍民受傷，修女們忙於照護傷患，只要是病的、受傷的都會救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女修會面對難以傳教的境況，有先見之明的總會長博德·莫洛妮姆姆（Mother M. Patrick Moloney）派遣年輕修女接受更多的教育，為將來傳教作準備。在戰事結束時，修女們已獲取了教師、護士、醫生等不同的專業技能，並且準備好再向遠東出發。1946年，聖高隆龐女修會召開了戰後的第一次全體大會，由瑪利·維安尼·沙克爾頓姆姆（Mother Mary Vianney Shackelton）當選新任總會長。她與其前任一樣，極力爭取時間，在翌年便進行戰後的首次外訪，到中國和菲律賓視察修會在當地的團體。在探訪期間，沙克爾頓姆姆已感覺到外國人遲早要離開中國，只是時間的問題。她於1947年底抵達香港，開始思考聖神會讓在中國的修女做什麼？就在此際，時任耶穌會香港區省會長蔡伯德神父致電給她，迫切地想與姆姆見面。原來這位愛爾蘭籍神父受託於醫務衛生署署長的請求，尋找合適的醫護人員管理本地一所專治肺癆的療養院。對於突如其來的邀約，沙克爾頓姆姆認為是天主的意思，因為這工作除了解決修會正面對的財務困境，讓她們能自給自足，修女們學成的醫護專業也正好派上用場。不過，她後期才透露，自己曾為這個決定有許多個晚上輾轉反側難以成眠，深怕年輕修女在工作中染上當時在港非常猖獗的肺癆病。<sup>360</sup>

## 11.2 初抵香江

1948年抵港，準備投入律敦治療養院服務的第一批成員，是從衡陽退守的兩位護士修女，其中瑪利·多洛羅撒·瑞安修女（Sr. Mary Dolorosa Ryan）在入會之前已是藥劑師，在上海和衡陽服務十六年，後來在律敦治療養院擔任藥劑師。<sup>361</sup>瑞安修女還記得1948年初那灰濛濛的一天，她和加大利肋·拉布萊修女（Sr. Catherine Laboure）前往這座位於繁華灣仔區的廢棄皇家海軍醫院時，陰暗的走廊和病房，尤其是日本人在二次大戰期間佔領該建築時所建造的奇特水泥浴室，令她感到不知所措。然而，拉布萊修女似乎一丁點兒沮喪也沒有，並有滿腦子想法，總看到可能性。任何聽到她讚嘆這座老建築的人，都不會猜到海軍是為了更好的地點而放棄它。<sup>362</sup>

之後，其他批次的修女陸續到來，她們部分是從內地遷移至此，有些則是從愛爾蘭前來，後者包括先後擔任律敦治療養院院長的區貴雅（Sr. Mary Aquinas Monahan，1919-1985）<sup>363</sup> 和 紀寶儀（Sr. Gabriel O'Mahony，1921-2006）兩位醫生修女，以及另外幾位護士修女。

### 11.3 深井的「陸洲」診所

1949年1月18日，就在這批修女抵埗的第二天，修會應律敦治先生（Mr 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1880-1960）的請求，接手在深井的醫局，這亦是她們在港主理的第一間診所。律敦治與聖高隆龐女修會，外界耳熟能詳的，可能是由修女們主理、由律敦治捐助興建的律敦治療養院。不過，在療養院於1949年2月24日正式啟用前，律敦治亦向修女們提出，希望她們能為原由他投資創辦的啤酒廠<sup>364</sup>的員工和附近居民提供醫療服務。若知道這位印度拜火教徒與高隆龐女修會的私人交情，這樣的請求實不足為奇。雙方除了經常有非正式的接觸，律敦治家族每年聖誕節也會探訪修女管理的律敦治療養院及為男性肺病康復者而設的傅麗儀療養院。他們為病人準備的幾百份聖誕禮物更不是隨意購買，而是貼心地先行問過每位病人想要什麼。<sup>365</sup>

深井醫局，又稱作律敦治醫局（Ruttonjee Dispensary），1932年由律敦治向政府建議並出資興建，建成後交由醫務衛生署管理，於1934年1月正式啟用，屬於香港啤酒廠建築群的一部分。<sup>366</sup>故此在1933年啤酒廠開幕時，律敦治在致謝詞中，感謝「醫務衛生署署長為深井及周邊鄉村設立醫局，以及在抗瘧疾措施方面所給予的善意合作」。<sup>367</sup>其時有兩名有護士資格的助產士及一位幫工常駐醫局。新界西區的華人醫官每周三次乘坐流動診療車前往醫局診症；1934及1935年分別診治一千五百四十九人及一千六百三十一個新症病人。<sup>368</sup>

戰後，政府決定於1949年1月將醫局交還律敦治<sup>369</sup>，而他則請來聖高隆龐修女幫忙，由伯爾納德·康諾利修女（Sr. M.

Bernadette Connolly，1907-2009）及加辣·法倫修女（Sr. M Clare Farren，?-2011）兩位護士修女負責。終年一百零二歲的康諾利修女曾在中國、菲律賓及美國服務。她一百歲壽辰時得到愛爾蘭總統的關注，她亦熱切地等待總統寄給她的二千歐元支票賀禮，「確保自己一領到支票便從速（把錢）匯到中國」。<sup>370</sup> 法倫修女起初在衡陽醫院服務，1939 年被修會派遣到菲律賓，於 1948 年 4 月到港。她原於緬甸服務，其後調派至香港，包括在律敦治療養院服務，五年後到美國為聖高隆龐男修會擔任醫護工作，再轉往韓國擔任聖高隆龐醫院院長。<sup>371</sup> 據知修女們在深井診所的時間不是很長，可找到的歷史資料非常有限，但這個遠離繁囂市區的近海處所卻曾是修女們假日的一個「陸洲」<sup>372</sup>。

除此之外，在律敦治療養院服務的修女也常會在工餘時間，匆忙吃過一些點心，便開著由美國天主教徒捐贈的流動醫療車，到一些偏遠的施藥所為沒有感染肺病的人士打預防針。<sup>373</sup>

## 11.4 修女進駐打鼓嶺

聖高隆龐女修會管理的第二間診所，是在更為偏僻的打鼓嶺。其時已是 1966 年。<sup>374</sup>

打鼓嶺是與深圳僅一河之隔的邊境地區，部分屬於禁區。隨著香園圍口岸 2020 年 8 月開通，邊境禁區用地才大為縮減。但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局為控制邊境人口以達至緩衝邊境事件、方便管理、監視滲透及非法活動等效果，沙頭角至蓮麻坑一帶一律禁止建屋，使該處發展停滯不前。<sup>375</sup> 在這個公共設施缺乏的邊陲地帶，當時每天上午只得一班公共汽車從坪輦開往粉嶺，故壯年男子大多到了俗稱「紅毛」的英國、德國、荷蘭等歐洲國家或到香港市區打工賺錢，村裡剩下老弱婦孺。

新界區的醫療設施，據《工商日報》1959 年 5 月對粉嶺醫院<sup>376</sup> 啟用時的報道，新界除了「元朗有一所私立醫院外，其他地區並未有醫院

設備，鄉民有病者，唯有來港就醫而已」。從報道用上「來港」二字，可知新界與四十公里外的市區是一個遙遠的概念。而且，這座新醫院只有五十張病床，門診名額只得二百，根本不足以應付粉嶺兩萬居民的需要。<sup>377</sup> 至於公營診所，則有位於上水古洞路的何東夫人醫局。

粉嶺時任堂區主任賴法禹神父（Fr Ambrogio Poletti, PIME，1905-1973）探訪打鼓嶺發現該處什麼設施也沒有，婦女們要揹著小孩在田裡工作，或讓他們在村裡四處走，沒有機會讀書。即使懷孕婦女仍需要落田。村民一旦生病，交通不便使得情況頗為狼狽及危急。<sup>378</sup> 賴神父有見及此，希望在打鼓嶺取得一幅土地開辦診所，特別是產婦一旦作動，往返上水既沒有車也路途遙遠，於是向教區提出為當地農民提供醫療服務。政府起初只想撥地設立小型急救站，但在賴神父極力爭取之下，最終成功開辦一間大一點連同留產設施的診所。<sup>379</sup>

#### 11.4.1 賴法禹何許人也？

這位宗座外方傳教會士，在意大利獲神學博士學位後，於 1930 來華，先在廣東省內當時仍屬於香港代牧區的範圍工作，1949 年轉派到新界，牧養沙田、大埔、粉嶺區的教友。他初到粉嶺的時候，教友只有二三十人，沒有教堂，要借用教友的地方舉行禮儀。這使他意識到要興建教堂、學校、醫療等設施。這些福利設施，使他深受新界鄉民的愛戴。其時，教會劃分的「粉嶺區」，範圍包括上水、粉嶺、沙頭角和打鼓嶺四地，是最接近邊境的區域，賴神父一旦收到警方通知，不論早晚，他都會趕往羅湖橋頭，迎接從大陸被驅逐出境的傳教士，包括過關時衣衫襤褸被誤當乞丐的白英奇主教，故此賴神父有中港邊境上的「看門人」（China's Doorman）之稱。此外，賴神父與鄉紳關係良好，與邊防軍警又有密切關係，獲准管有槍枝，使他在華人中有「新界之王」的綽號。<sup>380</sup>

### 11.4.2 診所的建造及起始

對於賴神父的要求，教區提議他到力理得神父那裡申請，由負責社會服務的力神父尋找資金。與此同時，賴神父到了灣仔接洽聖高隆龐會的修女，提出派遣起碼一個三人的小團體，這樣便開始了聖高隆龐會修女在打鼓嶺的服務。

此一項目由天主教福利會出資建造，包括有留產所的診所、幼稚園和員工宿舍。建築物樓高兩層，地面樓層是診所，另有床位可為十六名產婦提供住宿；一樓是修女和老師住宿的房間和廚房等設施，毗鄰是幼稚園。診所每天的開放時間與幼稚園相約，由於修女們要遵守教規，星期日早上需參與彌撒，只有星期日休息。

在建築期間，修女們便已爭取時間開展工作，每周六從律敦治療養院派出醫護人員，通常是一位醫生和一位護士，乘坐天主教福利會的流動醫療車到打鼓嶺為村民看診。<sup>381</sup> 診所建成後，由有醫護背景的修女負責，幾乎是二十四小時候命。另外有一個修女負責開車，遇到緊急情況就開車送病人到上水醫局，第三位則負責管理帳目。

本身對聖若瑟特別偏愛的賴神父認為這項社會服務要採用聖人的名字，因此把診所命名為「天主教福利會聖若瑟診所」（**Caritas Saint Joseph's Clinic**）<sup>382</sup>，於 1966 年正式開辦，位於坪輦非禁區的範圍，提供施藥所及普通科的服務，運作資金由明愛負責，並給予修女們微薄的薪水。



診所已改為安老院，左後方單層的幼稚園則仍在運作（攝於 2023 年）

## 11.5 打鼓嶺的修女團體

曾經在打鼓嶺服務的修女，包括有原為律敦治療養院秘書的麥德明修女（Sr. Philippe McDermott，1923-1985）。這位愛爾蘭籍修女於1945年入會，1956年來港，1966年調任打鼓嶺，直到1970年回國。她於八十年代初再度回港，其時已診斷患上癌症，仍如常服務，直至1985年在港逝世。<sup>383</sup>

一位六十年代末在幼稚園工作的退休教師說：「打鼓嶺對外交通非常不便，遇着要生產的婦女有時候來不及坐公共交通工具去醫院。Mother Philippe 曾經送一位作動的婦女到醫院，但在途中已經生了下來。我後來回去探訪的時候見過那女孩，她也會提起：『我是在 Mother Philippe 的車上出生的。』」<sup>384</sup> 她們口中的菲利伯姆姆，即麥德明修女，村民都愛稱她作 Mother（姆姆）。

該退休教師指出，診所的修女當時「幾乎是二十四小時 on call（當值）」。「禁區內當時只有私家車和警車行走，Mother Philippe 有一輛私家車，如果遇到緊急情況，她會開車送病人到公立醫局。如果有一些情況非常緊急，做助產士的 Sister Tierney 亦會接生。但後期政府醫療政策改變，要有醫生在場才可以接生，1969年便關閉產房。雖然產房關了，但仍放著數張產床。」

與麥修女同期的有阿特拉塔·伊根修女（Sr. Mary Attracta Egan，1902-1989）。這位護士修女1966年已到打鼓嶺，一直在這個團體至1986年退休回國。另外是上面提到有助產士資格的瑪加利大·蒂爾尼修女（Sr. Margaret Tierney），隨著醫務條例改變，留產所不能沒有醫生，她便於1968年離開。接替其位置的是白修女（Sr. Brigid Kingston，1938-2022），但只留了兩年便回到律敦治。

其後是護士出身的瓦萊麗·海特頓修女（Sr. Valery Hetheron，1934-2019）於1970-1974年擔任會院院長，與她同期的則是負責會

計的高隆龐·甘乃迪修女（Sr. Columban Kennedy，1899-1985）。到了 1974 年，白修女再度回來擔任會院院長，兩年後交棒具有護士及助產士資格的黎碧潔修女（Sr. Mary Fintan Ryan，1936-2013）。黎修女原本是要到緬甸一間診所服務，她到港等待簽證不果，於 1965 年正式奉派到律敦治療養院工作，1976 年調往打鼓嶺會院服務直至 1982 年。與她同期的是達米安·魯尼修女（Sr. Damien Rooney，1921-2016）。

除了在診所，黎修女每月都進入禁區的村落，為行動不便者免費治療，特別是婦女在田間工作有不同程度的腳患，她都為他們包紮和護理。<sup>385</sup> 據她在返回愛爾蘭之前的訪問中憶述，打鼓嶺那裡「大多數人都是農民。我們被整齊的田野包圍著，要在狹窄的路上騎單車出行」。她又說：這些農民「大多是老人或年輕人，中年人在海外工作，把錢寄回給他們的家人」。<sup>386</sup>



達米安·魯尼修女與鄉民（照片由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提供）

黎修女曾憶述自己與村民所建立的緊密關係：「享用他們以勞力種來的鮮果，他們簡樸、勤奮、友善的態度教人難忘。當時他們的小朋友，在日間會來到我們的托兒所，不少村民亦會到我們的診所求診，而我們也會上門幫助那些行動不便的長者，協助他們料理和包紮傷口」。<sup>387</sup>

現年八十歲的賀維珍修女（Sr. Nora Mary O'Driscoll）於 1960 年加入聖高隆龐會，她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護士，1972 年從愛爾蘭來港後，便被派到打鼓嶺來。因為要修讀語言課程，她第一年只有在周末才回打鼓嶺，直至 1973 年才正式開始在診所工作。她於 1978 年離開時，已是診所比較後期的日子。

在賀修女的記憶中，打鼓嶺診所每天早上有很多鄉民從田野間步行前來，有著各種問題。「如果很嚴重，我們會轉介到上水，那裡有政府診所，有固定醫生當值。如果是我們可處理的，都會處理。不過上水的政府醫生每個星期二和星期四也會到我們的診所來。」<sup>388</sup>

據天主教福利會的報告，政府醫生會每周兩次從上水到打鼓嶺診所看診，星期六就有律敦治的醫生負責，診所每月平均有六百人次的病人。<sup>389</sup> 其時，共有十八位聖高隆龐會修女在律敦治醫院工作，兩位是醫生，其餘是註冊護士、助產士、X 光放射技師、營養師等；而在修會的團體中，她們有一位是美籍、一位是澳洲籍、兩位華人，其餘是愛爾蘭籍。

「我們在律敦治醫院的醫生星期六會前來，換言之，我們一周有三天有醫生。其他時間，若是傷風咳嗽，敷藥，打針等，就由我們來處理。到了後期，我們與上水（政府診所）合作。我們和上水有很多接觸。我們覺得有問題時，會把病人開車送去上水。」他們使用的車輛都是來自明愛或由其他醫院捐贈的。

至於收費，賀修女說：「大概是兩元。如果他們沒有錢，也就讓他們走。沒問題的。」兩元診金在七十年代初到底是便宜還是貴？或許可與當時的學費比較。退休教師說：「『細蚊仔』讀書要付費。很早期五元，很便宜，明愛只是象徵式收費。那時未有社會福利署的資助，明愛的飯餐就給一大塊魚乾，又有一些菜。後來有了政府的資助，就要計營養，幾多安士的肉，幾多安士的菜。」

## 11.6 衛生教育和診所的小病人

雖說星期天是修女的休息日，但若村民有緊診，她們還是會安排人手。最主要是初期有產科，生孩子不能等，有這緊急需要；偶爾在晚上村民也會來按門鈴向修女求助。直至後期只有日診，公共交通又有所改善，才沒有這麼緊張。賀維珍修女解釋，那是因為「我們整個星期都住在那裡。我們住樓上，所有房間現在都是護老院……我們通常會盡量在傍晚五點左右關門，偶爾會有人之後才來，這可能是我們可以處理或我們無法處理的事。但我認為人們知道如果發生一些重大事故，他們是要去更遠的地方求助，我們也會叫他們趕快去醫院」。

診症之外，修女們有時候會和幼稚園家長聚會，策劃一些講座來教育家長公共衛生。退休教師說：「他們是赤腳落田。修女會提醒家長泥裡面有蟲，是有毒的或者是有細菌，提議他們穿上水靴，教他們防備，以及赤腳落田可能有的後果。」又或者指導家長教導小孩如廁衛生。「小孩子的婆婆、嫲嫲，叫做『姐婆』，不是太明白這道理，所以我們都希望是小孩的媽媽出席講座，在周末請家長來上課，教一些衛生知識。」

診所也有很多「小病人」。退休教師說：「我們會帶幼稚園的小朋友到空地玩耍，有時會遇到一些意外。花床是石造的，小朋友有可能會撞傷。操場是『石屎地』（水泥地），小朋友踩單車，不時會翻車，跌倒在地上流血，我們老師就要抱他們去診所。診所就是這樣照顧我們幼兒園的小朋友，很方便，不用去醫院，也不需要付錢。」

她又說：「村民踩單車很厲害的，那些女人載著三個小孩踩一輛單車，前後三個。如果懷有身孕，肚子裡還有一個，就是『四條命仔』。」退休老師說，那些媽媽都是這樣載她們的小孩來幼稚園，到了便先把兩個孩子送進去，第三個孩子就坐在單車上等，然後由媽媽載他回家。「所以很多時小朋友的腳是被單車輪子弄傷，便去診所敷藥。」

## 11.7 名醫拔刀相助

雖然打鼓嶺位處偏僻的邊境地區，但卻有不少名醫拔刀相助，在假日前來義務看診，而村民也很接受西醫治療。首先是世界知名的區貴雅和紀寶儀兩位修女。區修女的名氣有多大？有一次郵局派送一封寄給她的信，信封的地址只寫上 **Sister Aquinas, China** 也能收妥無誤，可想而知。兩位修女會輪流在星期六前來看一些比較複雜的病症。區貴雅修女出生於愛爾蘭，**1939** 年加入修會，之後修讀醫科，**1947** 年畢業時，是都柏林大學首四名獲醫生資格的修女之一，是教廷於 **1936** 年取消不准修女成為醫生或助產士的禁令之後，標誌性別平等的重要一步。她以三十歲之齡成為律敦治療養院的院長，任職更長達三十六年。她為香港抵抗肺癆傳染貢獻巨大，在死後仍會有當年被她治癒的市民到其墓前拜祭。<sup>390</sup> 紀寶儀修女亦是香港治療肺癆的先鋒人物，與區修女一樣曾在香港大學醫學院任教，亦是照顧臨終者的「善寧會」創會主席。紀修女曾於 **1955** 年協助港大骨外科教授侯信醫生（**Dr. Hodgson**）推行「前路清創及融合術」來治療脊柱結核，被西方稱譽為「香港手術」。<sup>391</sup> 其他友好的義務醫生，還包括曾任醫務衛生署署長及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蔡永業醫生。

當遇上複雜的病症，這些醫生會轉介病人到市區的醫院。據悉，大口環的骨科醫生偶然也會到打鼓嶺看症。小孩子若需要複診，就由父母帶他們去市區。退休教師說：「我記得有一個需要住院。小朋友的媽媽在托兒所做煮食的工作，她的女兒在家中發生意外，影響了骨骼，接着便去了大口環骨科醫院，複診的時候也需要回到大口環。」

## 11.8 在打鼓嶺的生活

**1964** 年，警務處處長根據公安條例開始簽發通行證（俗稱禁區紙）給予任何進入或離開禁區的人士。港英政府修訂邊境禁區令之時，香港與內地在沙頭角和打鼓嶺禁區之間有一小部分的田野，中間有一條河。出入禁區要出示證件。那時候，修女亦申請了禁區紙，方便進去禁區

探訪。據受訪者憶述，早期只有修女們有車，村裡還沒有「村車」。鄉民只能走路或騎單車到診所和托兒所。後來有人經營一輛小客車為托兒所接送孩子。生活現代化後，才有巴士和小巴的出現，甚至有市區巴士開到打鼓嶺、粉嶺等不同地方。據《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一書，禁區交通主要依靠巴士，1967年暴動期間，因村民連同紅衛兵在禁區內發生滋擾事件，以致巴士停運數年未恢復，導致非正規的「村車」（又稱街車）出現，由較富裕的村民出資將密斗貨車改裝載客，車費幾毛錢。<sup>392</sup> 退休老師說：「這些村車像貨車一樣，車斗內兩邊搭了長木板，人們就坐在木板上，並不像現在巴士那些座位。這些村車比菲律賓的Jeepy長一些，每邊都可以坐十個，很多時都會滿座。」

「村車」的運行方便了打鼓嶺的村民到上水、粉嶺購物。不過，即使在今天，由打鼓嶺驅車到粉嶺市中心也要十五分鐘車程。當年的偏僻可想而知。雖然打鼓嶺遠離修女會港島律敦治的主要會院，但這新環境沒有讓早期的修女感覺陌生，因為聖高隆龐會的神父、喇沙會在上水的修士，以及附近一些英籍居民有時會前來探訪。

至於她們住宿的地方，除了主樓，門前的田地有個小花園。花園後面是一座小樓房和一個塘池，晚上有青蛙發出很大的聲音。賀維珍修女和在那裡住宿的退休教師均表示：「牠們發出很多『音樂噪音』，就像管弦樂團。如果你習慣了，那是個好地方，否則會覺得太吵了。」

### 11.8.1 村民 vs 不速之客

外籍修女也會接觸本地人，和他們打成一片。除了每天看症，亦會主動探訪他們，遇到有人未前來取藥，就順便給他們帶去，送上問候。反過來，村民又會將自己種植的新鮮菜蔬給修女帶回去享用。退休老師指出：「若湊巧家長本人或者是媳婦、女兒生了小孩，她們就會盛一碗薑醋給客人吃。後期來服務的Sr. Valery很喜歡吃村民的薑醋蛋和豬腳，吃得很滋味。」現時身處愛爾蘭的賀維珍修女更在越洋視頻訪問中，重複了四次「非常好」來形容村民與她的關係。「他們都非常友善，非常熱

情。彼此的關係完全沒有問題。病人都是附近的農民。他們過去常常出門去診所。」

由此可見，村民很接受修女們，看到修女很照顧他們，大家的關係很要好。這些外籍修女會學習他們的方言，即圍頭話、客家話。雖然未必完全懂得講，但只要慢慢地也能聽得懂村民說什麼。賀修女表示：「基本的東西，我都能理解。我記不起有遇過大問題。如果是大問題，我會打電話給幼兒園的人，請他們過來翻譯一下。有時你可以看到是什麼問題。」

打鼓嶺離邊界非常近，只是一河之隔。診所的樓房後面有一座小山，在那裡服務過的 Sr. Attracta 由於當時仍未能再進入大陸境內，會帶一些客人到那裡的山頂遙看到大陸。賀修女說：「從診所出來，沿著馬路走很短的一段路，就有通往大陸和香港之間的『無人區』入口。所以，那時候，我們會見到很多人剛從大陸非法出來。他們只要越過邊界，便離開到大陸。」因為靠近禁區，在打鼓嶺的修女，只要看到地上有破爛的衣履，便知道有偷渡者曾出現。不過，賀修女表示：「他們突然出現，但沒有惡意的。他們會告訴你他們的故事，不是馬上，會到了某個時候才告訴你。這時候可看出他們是否信任你。」

### 11.8.2 非口頭的傳教

不同時期的修女都沒有很有目的地向村民或求醫者傳教講理道。黎碧潔修女說：「服務時我們不會傳教，只會陪伴病人，讓他們感覺到我們的臨在。」她在《公教報》的訪問中說，一位患肺癆的長者曾問她為何會離開自己家鄉來服務他們。當他知道是為了耶穌的緣故，便要求她多講關於耶穌的事跡，最後更領洗入教。「他讓我明白，語言在彼此的相處中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對病人的尊重及臨在。」<sup>393</sup>

賀修女同樣表示「完全不會」向村民傳教。她說：「你知道我之前還有其他前人……我起不記他們（村民）有直接問過我關於教會的任何

問題，但會問我『你來自哪個國家？』，其餘的，他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可能他們已知道比我先來的修女的身份。」

「他們則談論他們的孩子和生活等等。我自己早年就是一個來自農業社會的愛爾蘭年輕人。我經常認為，某些事情是一樣的，會與我在愛爾蘭時的情況相似，只是語言不同。這經歷給我的思考是，我們談論家庭、孩子和所遇到的問題，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常想到，大家都會有同樣的故事，只是不同的語言。」

### 11.9 不捨和延續

隨著時代演變，打鼓嶺的醫療服務首先取消了留產所。據《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68-69 年度年報書》指出，產科服務是於 1969 年初取消，而普通診所仍然十分繁忙，但福利會希望將餘下來的地方，用於加強扶幼工作方面，認為該區未及托兒所年齡的兒童特別需要日間照料。<sup>394</sup> 賀維珍修女解釋，取消留產所的有關決定「主要是沒有醫生，你需要醫生負責產科」。然而，賴法禹神父對這事卻大為傷感，不能接受此一決定。

關閉了地面樓層的產房後，原來的大房間仍有兩三張產床。聖高隆龐會的愛德華·凱利神父（Fr. Ned Kelly）周末會到打鼓嶺為修女開彌撒，若需要留宿，因為一樓是修女的宿舍，他便睡在原來的產房。賀修女說：「實際上它變成了睡房，很大的睡房。如果有神父留宿，他就會留在那裡。不過只是幾次。」原來的診所、留產所後來成為了老師的飯堂和做教材的地方；全部的修女離開後，如今連同一樓宿舍，已改變用途成為明愛馮黃鳳亭安老院。

不過，即使到了七十年代，正如天主教福利會的年報顯示，打鼓嶺醫療設施缺乏，並未改善。據 1976 年《第二十二屆新界鄉議局各委員會工作報告書》就指出：「當時該區目前並無醫療機構，過去曾設有婦

科診所，而現已結束，鄉民有病須往上水馬會醫局求診。」<sup>395</sup> 鄉議局對醫療服務的調查亦顯示，粉嶺等區的醫院仍未設有急症室。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部前部長陳秀嫻指出，診所最多可以容納十六名產婦，但一般只有數個婦女在該處生育。她說：「村裡的婦女喜歡在那裡生產，之後就回家。那個時代非常流行助產士，我記得最初的聖高隆龐會修女都是助產士出身，所以她們可以協助生產。其中有一位是年紀老邁很喜歡說笑的 Sr. Attracta。我雖然是 1969 年開始在明愛工作，但我當年常常去探望她們。我們以診所的地方去會見『有問題』的家庭。那時候不可能一個星期六天都有員工前往新界，唯有當修女看到很貧困的家庭，很需要他人幫忙的，就會把所有個案安排在同一天，社工就會去看個案。」由於鄉民忙著耕種，社工有時候甚至要到農地裡見村民。「我記得派過一個社工去打鼓嶺，他說每次從打鼓嶺探訪回來都很疲倦，我問為什麼。他回答說他見的婦女一邊在田裡工作，一面和他講自己的情況。他覺得如果站在田邊和她們講話，好像顯得高高在上，所以會坐或蹲在田邊。我覺得這位同事很偉大。那個時代做這些工作很有趣和具挑戰性。」<sup>396</sup>

即使賀維珍修女已離開打鼓嶺，甚至離開香港，她認為打鼓嶺那種地方真的需要有醫生和診所，並相信這亦是診所早年被大家廣為接納的原因。

到了八十年代，原在律敦治療養院當護士的麥潔妮修女（Sr Maureen McGinley），1981-1984 年在打鼓嶺服務，及後開始大埔瞭望台照顧末期愛滋病患。大埔瞭望台於 1996 年租給愛滋寧養服務協會，翌年開始服務，後來因與公立醫院服務重疊，得不到資助而於 2000 年結束。<sup>397</sup> 最後一批在打鼓嶺的修女有魯尼修女，白修女及新加入的游德肋撒修女。在大陸出生的游修女加入修會後，長期在美國從事教育工作，1974 年來港後，在打鼓嶺為小朋友開英語補習班，又為本地工人和農民開辦英語學習小組。<sup>398</sup> 此時修女的服務也開始轉變，推出 Meal from wheels 家居送飯服務。

由於時移勢易，明愛經過評估後，認為區內的診所及醫院數目已增多，應改為更切合當地需要的安老院。1986年，隨著三位修女遷離，打鼓嶺診所正式結束，標誌著一個時代的過去。

與此同時，修會於七十年代開始投入教育事業，至八十年代更為積極，但好幾位修女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專長，仍置身於醫療相關的服務，包括協助明愛醫院成為政府資助醫院，參與醫院牧靈和臨終寧養的工作、對吸毒者及愛滋病患的關顧。隨著本地修女老化，聖高隆龐女修會於2016年從香港撤出，回到愛爾蘭，真真正正的與香港市民道別。不過，她們都沒有忘記與香港市民建立的情誼，正如黎修女在2011年離港前，回顧自己在香港的醫療服務表示：「這為我並不是一份工作，我很享受，每位曾遇上的人都是我生命中的祝福。」<sup>399</sup>，又或是賀維珍修女重複四次的「非常好」。

## 12. 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



寶血會在深水埗之母院，寶血醫院就在其旁邊（攝於 2023 年）

寶血會除了營辦多所學校，醫護工作也是其主力服務。在 1952 年，寶血會有六十二名修女，而寶血醫院聘有五十九名護士，全年住院病人達一千七百多人，門診病人達一千六百人，從中可見其規模。<sup>400</sup> 在這服務的發展過程中，修會希望寶血醫院這家非牟利的私營天主教醫院有多一些修女服務，便安排她們到澳門山頂由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開辦的聖嘉辣護士學校學習。從 1966 年開始在寶血醫院工作直到 1990 年退下來的葉麗紅修女解釋這個安排，是因為那個年代很少修女會到政府的護士學校就讀。1964 年的畢業生張亦葵修女則指出，這與修女的英語水平也有關係，因為當時香港的課程以英語為主。在澳門的這所天主教護士學校，學護最多是來自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和寶血會的修女。

葉修女指出：「修會最高峰時，有十六位修女在醫院工作，每個部門都有修女，全都由修女做。往昔沒有說薪酬的規定，或說什麼職級。修女們都不受薪，只是一直埋頭做。」到了二十世紀末，已沒有幾個修女當醫護人員，主要是很少女青年進修院，即使有，澳門又已經沒有了護士學校。此外，時代已變，在香港考上任何一間護士學校都可以，聖保祿修會自己在香港也有護士學校。<sup>401</sup>

1993年，寶血醫院交由香港明愛管理，更名「寶血醫院（明愛）」，只有在管理委員會中，仍由修會派出代表出席會議。葉修女說，在交由明愛管理時，「感覺好像賣仔賣女一樣，很淒涼。修女們因不捨而為此哭了，但也很感謝力神父<sup>402</sup>當時肯承擔」。不過其時，修會實在不夠人手，修女們年齡上雖然不至於是退休年紀，但已不想肩負那麼重大的責任。

除了醫院及其附設的門診部，以及早年的嬰兒診所，寶血會的修女也在香港其他地方開辦或負責小型診所，一間是在坑口，另一間則在修會粉嶺會院內。修會投入醫療事業，從其《新建寶血醫院碑記》中：「本會同人體天地好生之德憫人類疾痛之苦」一句可見，雖然是為居民的需要而順應產生，但也有出自宗教的慈悲之心。<sup>403</sup>近年修會從醫療前線工作，逐漸轉為醫院牧民的工作，仍然本著基督仁愛之心，關懷病人及其家屬。

## 12.1 在診所服務的修女

曾經在診所服務過的有杜惠芬修女（1921-2011）、馬慕真修女（1921-2006）、黃惠霞修女（1929-2012），以及分別有護士及中醫師專業資格的張亦葵修女和陳素霞修女。

杜惠芬修女原於寶血醫院照顧病人，1957年前往英國進修兒童教育，學成回港後，被派往粉嶺修會營辦的孤兒院照顧孤兒，兼任義診所

醫護工作，時間為 1961 至 1965 年，以及 1967 至 1970 年。<sup>404</sup> 她其後也曾南朗醫院照顧癌病病人，以及到修會在澳門的清安醫所服務，直至 1998 年跌倒骨折不良於行，才退出服務，在粉嶺會院靜修。<sup>405</sup>

馬慕真修女自發願後初期已被派往清安醫所，至 1950 年往英國進修護士學，是寶血會首批出國深造的修女，顯示寶血會修女的「社會地位已攀升、教育水準和專業精神也有長足進步」。<sup>406</sup> 馬修女回港後曾在寶血醫院、大窩坪瑪利諾診所、粉嶺聖若瑟義診所（1966-1967）、坑口明愛診所為貧病者服務，曾出任寶血醫院及坑口會院院長之職。1979 年，馬修女到美國三藩市接受護理訓練一年後，便逗留當地服務，直至逝世前仍然去探訪獨居老人。<sup>407</sup>

黃惠霞修女發願後先後派往寶血醫院護理病人，及清安醫所照顧長者，直至 1961 年調派回港後，分別在寶血醫院、南朗醫院及坑口診所服務過，負責護理病人的工作。基於修會對服務事工專業的要求，她於 1974 年攻讀香港中文大學有關藥物的校外課程，再任職於寶血醫院藥房；直至 1995 年因健康關係，正式退出醫院服務。<sup>408</sup>

張亦葵修女於 1970 至 1973 年在粉嶺診所服務，而陳素霞修女則在七十年代末接手，轉為中醫診所，直至她遠赴加拿大。

## 12.2 粉嶺會院內的聖若瑟義診所

粉嶺區的天主教醫療設施，在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於 1966 年開辦打鼓嶺聖若瑟診療所之前，賴法禹神父已於 1961 年在寶血會位於龍躍頭一號橋的會院開設了「寶血會聖若瑟義診所」，由他擔任主任，修女為所長，每日上下午，提供普通科及施藥所功能。

龍躍頭這地方為人熟知的，除了石廬、崇謙堂及龍躍頭文物徑之外，相信還有就是寶血兒童村。1952 年，寶血會在二十八萬餘平方尺的會院內建成孤兒院（現稱「寶血兒童村」）<sup>409</sup> 為香港社會也是一個

重要設施，因為它給了许多孤兒和有家庭問題的兒童一個遮風擋雨的地方。孤兒院計畫興建之初，就因為粉嶺地區醫療設施缺乏，外界一度誤傳寶血會將要在該區興建醫院，從這段插曲可見，即使是診所這種最基層的醫療設施也極其需要。<sup>410</sup> 時至七十年代中期仍未見理想，新界鄉議局 1976 年的《工作報告書》中提到：「新界各區市民求醫要遠赴馬會診所……卻缺乏醫生，對市民深感不便；且往還需時，亦要輪候，非一般有病市民所能抵受。」<sup>411</sup>

聖若瑟義診所並沒有醫生駐診，日常只有一位護士修女負責，配藥給一般傷風感冒、頭痛肚痛的病人，若有嚴重病情，則會轉送到粉嶺醫院。診所的陳設「很簡單，沒有什麼，就好像一個客廳，裡面還有一個房間是配藥用的，因為只有一個人打理，不需要額外的診症室，有點家庭式」。<sup>412</sup> 後來由修院負責的南朗醫院人手不足，於 1973 年把負責診所的張亦葵修女調離，義診所便空置，直至習中醫的陳素霞修女從台灣回來重開。



粉嶺會院內原有的義診所

### 12.3 從害怕到終身服務<sup>413</sup>

現年九十四歲的張亦葵修女，小學時在寶血會德貞學校讀書，曾有受洗入教的念頭。雖然母親認為他們家是拜神的而不同意，但信仰的種

子已在她心田播下。她二十一歲時父親去世，十五歲已失去母親的她，與父親關係很好，父親的離去使她感到非常失落。此時剛巧有朋友想學道理，邀她相陪，她便答應了。在學道理的過程中，她覺得「天父讓爸爸那麼愛我，我不是孤獨的，有天父愛我」，慢慢地便接受了天主教信仰。她領洗之後亦影響了姊姊及妹妹加入教會的大家庭。至於她自己，「信了教之後，覺得天父很愛我，我便到處去尋求聖召。周圍每間聖堂去祈禱，求天主給我聖召。因為多數到寶血會這裡的聖堂祈禱，後來經由神父介紹」，於1956年加入了寶血會。

她為了堅持聖召，下過一番功夫：「我看很多聖人傳記，又規定自己，一聽到鐘聲便要聽命，正在做什麼也要放下來。還有，進修會不可以揀飲擇食，因為自己經常揀飲擇食，所以給了自己一些目標。」



張亦葵修女（攝於2023年）

在1965年宣發永願之前的四年，張亦葵修女被派去澳門山頂醫院旁的天主教護士學校邊讀書邊實習。當時有四個修女一起攻讀，包括她和同會的另一位修女，以及兩位來自聖保祿女修會。

在梵二會議之前的時代，教會比較保守，修女外出都要二人同行，又得聽從長上指派，絕少有異議。所以即使張修女「又怕黑，又怕血」，

仍聽命修讀護士課程。她記得第一年的時候，修女老師讓她們隔著玻璃看醫生做手術。「我看到面青唇白，臉色都變了。修女見到之後問：『你怎麼了？』你沒有試過在那個環境是會害怕的，慢慢、慢慢才習慣。起初很害怕的，有什麼緊急狀況便先劃十字聖號，希望沒有事。」所以，她認為是「聽命給你勇氣，給你力量。慢慢便克服了」。

張修女發願後曾在寶血醫院、澳門清安醫所及南朗醫院服務（1967）。她在粉嶺義診所的工作，則是 1970-1973 年，之後因南朗醫院人手不足，再次回去服務。南朗是一間慈善醫院，為末期癌症病人服務，由寶血會負責，直至 1982 年因醫院轉型而退出。張修女跟隨修會一起退出在該院的服務。除了在香港，張修女亦三度赴台灣服務，包括在宜蘭的南澳診所及台南的玉井診所。

她在台灣期間，領取了臨床牧靈培訓課程（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 CPE）的證書。故此在她 1989 年回港後，至 1996 年退休之間，全心做醫院牧靈的工作，探訪病人，甚至退休後仍繼續做半天的義工，直至 2009 年才真正退出工作。

## 12.4 病人減少反映時代轉變

聖若瑟義診所是為附近村民和貧人服務，履行修會與弱小者同行的宗旨，藥物只象徵式收取五毛錢，沒錢的病人則免費。每天應診時間是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在張修女主理的七十年代，對義診所的需求已跟六十年代馬修女和杜修女主理時大不相同。求診者「已不是太多。據說她們以前是很多病人。當時的鄉下地方還是比較貧窮。我的時候已經比較好，村民有時候會自己掏錢到外面看醫生。」

她的病人主要是婦女和小孩，男性多到外面打工，以改善生活環境。由於診所家庭式的陳設，村民有時候路過就會主動進去與張修女聊

天。「我跟他們聊聊天，算解一下悶，讓她們訴一訴苦水。」村民「種了植物會拿一些給你，雞蛋又拿幾隻給你，種的樹長了兩個番石榴又會拿過來給你」。與村民這種如朋友的關係，使她感到好親切。

新界村民多說客家話，張修女也是客家人。他們說客家，「我聽得懂，說就不太記得，偶爾會懂得說幾句」。在與村民傾談間，張修女偶然會觸及宗教信仰，但從不喜歡強迫別人領洗信教。

## 12.5 西式醫療轉為中醫診所<sup>414</sup>

粉嶺的義診所在 1973 年關閉後空置，陳素霞修女 1984 年從台灣學成回來，向修院提出復辦診所，一做便十年，直至修會調派她到加拿大滿地可。這個小磚屋診所位於修院門口側旁，旁邊有一棵很大的樹，是小朋友喜歡坐下休息的地方。此外，另一旁還有一塊小耕地，陳修女利用它來種番薯、蔬菜和一些花卉。但診所等用地現已全部清拆，不留痕跡，因此後輩修女對診所大多印象模糊。

陳修女自言與同樣從事醫療工作的馬慕真修女「很有緣份」，因為馬修女在西貢做院長時，自己剛發了暫願，便被派去西貢坑口那裡教幼兒園。西貢的修會團體只有三人，馬修女對其他修女「很好，非常好，很疼我們」。陳修女從台灣進修回來後，又接手馬修女曾經服務過的聖若瑟義診所，「但之前馬修女是西醫，而我是中醫」。

## 12.6 中醫世家出身的修女

現年八十六歲的陳素霞修女來自中醫世家，祖父是國醫，也是汕頭第一位受洗的天主教徒。因為祖父很虔誠，她全家「每天都望彌撒。自己出世三天便領洗，由 BB 開始每天望彌撒，一直到現在……所以我入修院很開心，因為每天都有彌撒，只有幾天沒有，就是住院施手術那幾天沒有」。即使在台灣接受甲狀腺手術，全身發黑不能動，莫說是參與

彌撒，連劃十字聖號也有困難的她，仍堅持在心裡唸《玫瑰經》。<sup>415</sup>因為祖父是大聖手，影響所及，「家姐、姑姐、爸爸、哥哥都是醫生。阿爺很嚴格的，我們每個人都要學會執藥，他教我們執藥和教我們寫字」。

陳修女小學六年級便隻身從汕頭來港，由表叔林澤民神父的協助下，幾經選擇，最終加入了寶血會。當時只有十二三歲的陳修女面試時向院長坦言，不知道入修院代表什麼，只知道自己童年時身體不好，母親把她獻給了聖母，既然獻了給聖母，便去做修女。她對這段經歷從沒害怕，「因為把一切都交給天主」。

### 12.6.1 在台灣領中醫證書

1958 加入修會後，陳素霞修女便被派到澳門接受備修生、保守及初學培育，在聖若瑟女子中學讀書，於 1965 及 1971 年先後宣發初願和永願。其後，她被派往台南教區傳教和讀書，一去便十幾年。台南教區當時由成世光主教（1915-2012）牧養，是寶血會修女在香港以外傳教服務的三個教區之一。<sup>416</sup>

「在台灣，我繼續讀書，讀神學。但很好玩的，成主教不知如何得知我的家族是行醫的。他說：『我告訴會長介紹你去讀中醫。你家裡都是中醫來的，做中醫教道理會有很多人領洗。』台灣幾十年前很少人領洗。我初學那時，從二樓掉了下來，跌傷了尾龍骨，戴腰箍戴了十六年。成主教便說：『你學中醫針灸幫你自己，身體也好一些。』」

陳修女與另一位大學畢業生一起師從一位本身教書的中醫，並要每年 8 月到台北考中醫試。「他教我們兩個。中醫配藥、磨藥，這些基本的我都已經懂。我去考試，還被人笑：『你看，還有一個修女來考試呢！』每年都要考，考了五年。考試畢業可拿中醫證書。」陳修女於 1983 年考取了中醫牌照後回港，得到會長的同意，申請了本地的中醫執照和診所牌照，在粉嶺行醫。

### 12.6.2 親手製藥令手指彎曲

「龍躍頭的病人不多，每天有兩三個。我自己做中藥丸，不配藥。弄好了藥丸，病人有什麼病，我就給藥丸，藥費一天十元。那是磨粉做的藥丸。我在汕頭時也有做，所以我做到一雙手這樣彎曲，就是從小做到大。」

不願意拍照的陳修女，攤開一雙手，十指全都彎曲，細述造藥過程：「磨藥粉，用蜂蜜，煮了之後就搞，搞完之後就搓，搓成藥丸。每個步驟要分開的，花上好幾天。從前我們家的藥鋪有西藥、有中藥、有西醫、有中醫。家裡有十幾個醫生，執藥的夥計有五六個。我們的藥店很大，在汕頭是最古老的，算是有名，因為我爺爺是國醫，是天主降福我爺爺做醫生。」

「病人中，有肺癆的，我便配肺癆的中藥給他們。有些還有肺癌、肝癌，我便開治癌症的藥，讓他們服用。」

「我家很特別，就是中藥也用藥丸藥粉，甚至有藥水。我大姐的藥房就是提煉藥水。七八十年前她已經在她的診所這樣做。我的診所就用藥丸藥粉。所以一包一包的給病人，一包就是一碗藥，真的很方便。服用完病好了就不用再服。」

陳修女通常會收一點點藥費。「以前馬修女是贈醫施藥。我就收一點兒成本的價格，用來買藥，還剩一點則用來交稅。」她很感激修會沒有認為這樣的服務帶來很大的財務負擔，反而給予了她「很多自由」。

### 12.6.3 遠近皆有的病人

不過，遇著窮人「我不會收錢。我每個月去聖神修院為神父和修生看病，我也不收錢」。陳修女本著修會的精神，贈醫施藥，同樣也是受

家人善心的影響：「在鄉下我們有田，但是我們沒有收人租金，一塊錢都沒有收。還好沒收，如果當時收了，就是地主，就麻煩了。我們不收人錢的，都是給其他人用，因為我們都不住在那裡，又不會過去。」

陳修女在行醫以外的餘下時間，會去粉嶺聖若瑟堂協助堂區的牧職工作，包括婦女會和為禮儀彈琴。堂區神父每有不適，也會請她看病。至於她怎會從粉嶺跑到黃竹坑去為修院師生看病呢？「關俊棠神父做院長的時候，我與他很熟。他就介紹很多病人給我。他就問我：『修女，有沒有空來為修生看病？』我說好，之後就每個月去聖神修院，看看修生有什麼需要。他們打籃球摔倒了就來找我，感冒了就來找我。我是讀全科的，跌打都會，這是我們家的遺傳。」

## 12.7 回望人生

回顧人生，張亦葵修女覺得自己是做到了修會的宗旨——與弱小者同行。她也覺得修會以醫療服務來照顧貧弱者卓有成效，因為「他們會覺得你天主教很好」。身體壯健的她，近年雙腳開始無力，甚少外出，但每天在四層高的母院內上樓下樓，到小聖堂整理祭台，為其他修女服務，秉持耶穌的教導——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她多虧自己的護理知識和腳底按摩，並有恆心地每天早上四時起床做運動，同時她最感謝天主的恩寵，讓她仍能自我照料。至於陳素霞修女，在受訪之後不久已從深水埗母院遷入修會粉嶺龍躍頭會院內的老人院。這兩位耄修女，奉獻了一生給醫療事業，來緊守修會的神恩，如今步入人生的晚年，已無遺憾。

### 13. 聖母聖心會的三間診所

在香港投入於醫療服務的天主教男修會並不多，除了前面已介紹過的耀漢小兄弟會（戰時在內地設立醫療救傷隊）及瑪利諾會（以邀請瑪利諾女修會和外聘醫生來提供服務），另一個是來自比利時的聖母聖心會（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ICM）。這個修會由比利時教區神父南懷義（Fr Theophiel Verbist, 1823-1868）<sup>417</sup> 創立。南懷義神父原負責宗座聖嬰善會，過程中接觸到關於中國的事，決心創辦一個專在中國傳教的神父團體，經教宗庇護九世批准，於 1862 年成立。這些傳教士來中國主要在塞外傳教，即長城以北的廣泛地區，包括現今的內蒙古、甘肅、寧夏、河北等省份。

#### 13.1 國家的規定成就醫療服務

聖母聖心會在本港提供醫療服務，有兩大歷史因素。修會早期八成是比利時人，兩成是荷蘭人。比利時當時規定十九歲男子要服役，或到外國服務替代兵役，並規定服役軍人要接受為期六個月的急救及醫療知識訓練。另一方面，在蒼茫的塞外地區相較內地其他地區更缺少醫生和醫藥物資，所以聖母聖心會在綏遠（今呼和浩特）、西灣子等地設有醫院、多間診療所，甚至護士學校。對於聖母聖心會的醫療服務，顧厚德神父（Fr. Ferdinand Bouckhout）指出：「有時候是傳教士自己做，有時候是迫著要學，有些甚至做得很出色。曾經有傳教士自學成眼科醫生，一直做到 1951 年轉到海地，繼續做醫生，做醫生（的角色）多過做神父。」顧神父認識的幾位年長同道就是讀醫科的。<sup>418</sup>

在二十世紀初，斑疹傷寒是華北和內蒙最常見疾病，對北方人民和傳教士威脅很大，在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修會有一百三十位會士逝

世，八十八人死於傷寒，其中七十八位尚未滿四十五歲。會祖南懷義神父也是感染此病，來華兩年後死於承德老虎溝。其後，比利時籍呂登岸神父在教會刊物推廣波蘭魏格發明的傷寒疫苗，在北平天主教輔仁大學成功試制疫苗，又積極培育華人醫師，於 1931 年成功抑制了該病害，使得在華的會士再也沒有因傷寒致命。<sup>419</sup>

五十年代，內地驅逐傳教士出境，這些有基本醫療知識的傳教士，在塞外開辦診所是他們的傳統，自然亦會關注到香港貧困民眾的生活狀況，認為有需要為他們開辦醫療服務。不過，他們也是外聘醫生來提供服務。此外，聖母聖心會當時還有一個做法，大大降低了他們在港開辦醫療服務的成本，那就是他們治感冒、咳嗽的普通科藥物，在比利時一直有專人負責。顧神父說：「你生病去看醫生，他給你十粒藥，你可能只吃了三粒，其餘七粒就沒有用了。那時候聖母聖心會是比利時有名的修會，你有剩下的藥可以送給它，修會有懂醫療知識的專人把藥物分類，然後寄去其他地方的會院，多數是寄往非洲，二十年前還有這樣的做法。香港也收到一些，大部份就是這樣送來。」

### 13.2 三位診所推手

聖母聖心會三間診所和施藥所分別位於紅磡寶其利街一幢唐樓、坑口聖雲先堂旁邊及鯉魚門。紅磡愛德診所由杜志明神父（又稱杜君武，Fr. *George Albert Dopchie*，1916-1987）開辦。在同道眼中，杜神父是一個「非常固執」的人，亦因為他的執著，卻使聖母聖心會能夠在香港落地生根。

杜志明神父執著的一生可見於其弟為他出版的紀念刊物的記載：杜神父 1934 年加入聖母聖心會後，「再沒有事物可阻擋他把傳教聖召付諸行動了」。當二次大戰於 1940 年波及比利時，杜志明正修讀神學第四年。當時所有修院已被關閉，修生等待回家，他卻騎著腳踏車，穿越比利時和法國整個佔領區，以借來的軍服，登上一艘前往倫敦的軍艦，在倫敦完成他最後一年的神學課程，好能祝聖為神父。由於去中國服務

的梦想變得遙不可及，為實現傳教夢，他輾轉到了扎伊爾（今剛果民主共和國於 1971-1997 年間所用的國名），除了當上傘兵，還學習熱帶醫學。就這樣他便成為了戰時唯一可以離國傳教的比利時傳教士，而且是「他的長上和家人全不知情之下！」<sup>420</sup> 這為講求聽命的天主教會，實在是匪夷所思！

戰爭結束，他於 1946 年返回比利時要求總會長讓他成為戰後首批到中國的傳教士，並且真的得償所願。但不久中國國內政治風雲變色，杜神父（圖）堅持不離開，變相被軟禁。由於他懂得醫學，他請教友佯裝生病前來就醫，使他能為他們聽告解和講授要理，而教友則為他帶來食物，及至 1953 年他被驅逐來港，在本地服務三十四載，直至離世。



在五十年代，很多外籍傳教士因被驅逐離開大陸，許多都先到香港落腳，再轉往他處或返回原居地。聖母聖心會本計畫讓會士們回國，並在短時間把香港的總務處關閉。但修會在香港的新任會計林存愛神父（Fr. Arthur Van den Bossche, 1903-1989）向白英奇主教表示，修會願意重新考慮關閉的決定，前提是留下兩三位會士在香港作使徒或愛德工作。不過，由於聖母聖心會長期在東北服務，當時又已有大量內地前來的神父，遭白主教婉拒，明言懂得「廣東話和南方省份方言才是重要的」，「你們從未在華南有傳教點，難以在短時間內提供」會說廣東話的神父。<sup>421</sup>

然而，杜神父怎樣也不願離開，「說自己過兩個月便回去內地」。即使白主教已婉拒了聖母聖心會留下，固執的杜神父到尖沙咀「玫瑰堂詢問本堂神父可不可以來幫忙，那神父說可以」，就這樣聖母聖心會便非正式地落地生根。<sup>422</sup>

1954 年，白主教批准四名聖母聖心會會士留港，讓他們在調景嶺為來自五湖四海、說著不同方言的大陸難民服務。兩年後，聖母聖心會

成立中華會省，範圍包括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並接受從九龍聖德肋撒堂分出來、有十五萬居民的紅磡區作為服務點。三年後，紅磡聖母堂建成，由杜志明神父擔任本堂神父。<sup>423</sup> 他除了 1957 年在大環山七層徙置大廈天台成立愛德幼稚園和愛德平民學校，以及連著新聖堂於 1959 年建成的普愛學校，還開辦了愛德診所。



左上角徙置大廈天台為愛德幼稚園（照片由聖母聖心會提供）<sup>424</sup>

除了醫學知識，杜志明神父十五歲時身患重病，得到一位護士修女的悉心照顧，不單種下他成為神父的聖召種子，關顧病人亦常常寄掛在他的心頭。<sup>425</sup> 作為傳教士，杜神父從不放假，也沒有回過比利時。即使他後來成為海員宗會專職司鐸，需要到羅馬開會，九十多歲的父親叫他回家探望，也遭他拒絕說：「我是傳教士，我要回香港」。

至於另一診所推手是萬默思神父（Fr. Willibrord Wammes，1907-1973）。他於 1925 年入會，1931 年晉鐸成為神父後，翌年到蒙古開展長達十六年的傳教生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他曾回國為修會做宣傳工作，到了很多國家並結識了不少朋友。他於 1958 年抵達香港，起初在調景嶺鳴遠學校教英文，三個月後調往坑口小堂服務，牧養清水灣區的教友，並在坑口聖堂旁邊成立診所。

WAMMES  
Willibrord

萬默思

HONG KONG  
1957-1973

萬神父被指是「老派傳教士」，「把一生完全獻給他的羊群的精神和物質福祉」，自己過著祈禱和極度神貧的簡樸生活，被形容為「天生的乞丐」。他於 1973 年 3 月 21 日在聖母醫院逝世的那一刻，他已身無分文。不過他對民眾的奉獻從不吝嗇，為他們建造小房子、搭橋築路，並僱用窮人挖井。他經常為窮人的境況發聲，以至於他較富有的朋友會同情這個「可憐的威利神父」，願意解囊相助。<sup>426</sup>

第三間診所的創辦人是雷震東神父（Fr. Octaaf De Vreese，1900-1996）。這位比利時籍神父因為嚮往中國文化，在求學時期已許下來華傳教的宏願。他 1926 年晉鐸後便往中國東北傳教達二十九年之久，經歷不同政治變故也無畏無懼，贏得「法蘭德斯之獅」（Lion of Flanders）的稱號。<sup>427</sup> 他於 1956 年來港，是最後一位從大陸被驅逐出境的聖母聖心會會士。他因為會普通話，而被派往調景嶺服務。1962 年，他被派往鯉魚門和油塘一帶傳教，成立後來的聖雅各伯堂區。



現於美國三藩市總教區服務的李定豪神父，1963年與家人搬往仍未開發的油塘區後，每個主日都要沿著山路到鯉魚門參與彌撒。他曾憶述對雷神父的印象說：「我在心裡仍然可以清楚記得雷震東神父：一個壯健的男人，一把迷人的鬍子和在講道時的一把聲音，讓你記得他那永遠雷動的名字（他的中文姓氏：雷）……他混合使用粵語和梵二前的拉丁文舉行彌撒，我還記得一些我年輕時做輔祭所學的拉丁文。彌撒後，我們與一些更需要幫助的人會得到麵包和食水。他的克己精神使他備受尊重。」<sup>428</sup>

### 13.3 紅磡愛德診所

愛德診所以聖母堂聖母聖心福利會名義主辦，成立於1959年，提供普通科門診，每日上午九時至晚上九時應診。由開業至1978年，黃仲禧醫生一直擔任主任醫生。據了解，在診所結束前，還有另一位醫生在診所兼職。



杜志明神父（右二）與來訪者在愛德診所門外合照  
（照片由聖母聖心會提供）

現已退休的天主教徒古美蓮，出生後便住在紅磡寶其利街約三十年，其中只有三數年曾短暫遷離該區。由於愛德診所就在她居住的同一條街上，純粹因便利緣故而到過診所求醫。她記得內裡陳設簡單，「就一排檯，一排一排的，有一位姑娘和一位配藥的」。醫生是華人，但印象不深，「因為以前的心態，醫生是比較高尚的。你祇不過是平民。醫生說什麼就什麼，看完就算」。<sup>429</sup>

她指出：「因為附近沒有幾間醫療所。每次求診都很多人，要等的，有時要等上一個小時。以前沒有現在方便，掛了號你祇有坐在那裡等，除非你住得很近。就算我住得很近，我也在那裡坐下來等叫名。」



原診所位於右邊第三個舖位樓上（攝於 2023 年）

當年古美蓮其實也不知道愛德診所是天主教辦的。「雖然我們是天主教，但那時候我們不知道它是天主教還是基督教，搞不清楚，就算現在的人也不一定搞得清楚。只不過那裡有一間診所，有病便去看。若不去看中醫，便肯定去看西醫。」她指出，以前看醫生費用相對貴，不是很不舒服都不會去看。如果母親說沒有大問題，一般便會「執山草藥食、煲個湯喝便算，沒有現在搞那麼多，現在才那麼緊張。始終執藥才幾塊錢，不一定要去看醫生，藥房執藥的說 OK 便 OK，就是這樣，以前窮嘛！」

對愛德診所印象模糊的古美蓮，反而記得另外兩家非天主教會的診所。「小時候在土瓜灣有一間聖馬可診所。那間診所在樓上的，很大的，佔兩個鋪位。而黃埔街有另外一間利民診所，那個醫生不錯，你等多久多晚，只要你願意等，他也會給你看病，掛了號他就一定會幫你看，就算做到十一點才關門，看完所有病人為止。」

聖馬可診療所是聖公會李求恩會吏長於五十年代初期於馬頭圍道租用半層樓開辦的平民診所。開設診療所是他生平四大計畫與理想之一。由於求診者眾，原來的地方很快不敷應用，於 1953 年遷往紅磡鶴園街一幢唐樓轉角位置，提供義診，以三樓為候診室兼佈道所，並有傳教士向候診病人及陪伴的親友講道。1961 年診療所之佈道所正式改稱為聖馬可堂，診所現已停辦多年。<sup>430</sup>

至於利民診所，於 1964 年成立，目前仍以非常低廉價錢診症，診金連藥費才收六十至七十五元不等，一星期開業六天半，半個世紀以來對社會貢獻良多，於 2004 年獲民政事務局頒發嘉許獎。<sup>431</sup>

### 13.4 診所轉讓完成歷史任務

杜志明神父於 1969 年卸任聖母堂本堂之職，回修會擔任駐港辦事處院長及司庫。後來再調任為位於尖沙咀的海員宗會神師。由於牧職工作與以往不同，加上七十年代西醫診所已越來越多，最後決定將診所賣盤。

愛德診所結束前，是由羅煦英醫生及另一位醫生兩人兼職負責。接手的岑紹裘醫生現在仍於紅磡區內行醫。他當時剛從瑪嘉烈醫院麻醉科實習完畢，於 1978 年接手診所原址，成為其個人醫務所。岑醫生說：「我想出來掛牌，不想做麻醉科醫生，覺得自己不是那種材料。有同學說：『不如你出來吧。』」那同學又認識愛德診所的羅煦英醫生，便介紹了我們認識。羅醫生說：『你有興趣我便介紹神父給你認識。』就這樣成交了。」

他憶述：「我接手診所可說是半賣半送。記得當時是神父負責這個交易，三千元把整個診所賣給我，包括病歷卡和剩下的藥物。神父住在尖沙咀的宿舍或是什麼地方，我上去他家裡簽約。」<sup>432</sup> 岑醫生記憶中，原來的愛德診所陳設「很簡陋，就算診症室的間隔也不是密封到天花板，外邊可以聽到裡面講話。那時就是這樣，沒有什麼私隱。雖然它是教會的醫療中心，但據我所知，病人中不是很多教友。診所內也沒有什麼宗教氣氛。換句話說，沒有說一起祈禱或派一些單張介紹天主教，就好像是一間非牟利的診所，叫愛德診所。沒有什麼宗教意識，人們只知道這診所是神父的。」

「以前在樓上的診所也很『爆棚』的（按：人很多），很好生意，現在才一定要開地舖。那個時代只要你開便成了。所以當時也是『膽粗粗』，沒有什麼經驗便出來做，一邊做一邊學，又一邊回醫院向前輩請教。」

這位天主教徒醫生在寶其利街行醫時，與當時大多數同行一樣，每天應診時間由早上九時至一時，下午三時至八時。起初每周開業六天半，後來才改為五天半，來求醫者「多數是傷風感冒」。在寶其利街營業不多久，岑醫生便把診所搬到於 1979 年開始入伙的紅磡灣中心。

「當時已經有很多有名的診所在附近。後面街也有一間很多人去看的所謂福利診所，叫『利民』，很厲害的，一天看幾百人，很長龍的……長到不得了，但總之收費很便宜，只是幾塊錢。如果我沒有記錯，愛德診所他們收五元左右，到我的時候好像是收十元。」

他認為七八十年代越來越多人看西醫而非中醫，「是因為快，主要原因是打工的不能隨便請病假，打完針便可以立刻回去上班」。

### 13.5 坑口明愛法俾洛診療所

另一間在坑口清水灣道的診所，稱為法俾洛診療所。坑口在五十年代仍是一個小漁村，聖母聖心會傳教士於 1955 年開始在該處為居民服

務。兩年後聖雲仙堂區成立之時，只有五十七名教友。<sup>433</sup> 翌年，新來港的萬默思神父被派來服務，教友人數逐漸增加，在萬神父 1973 年去世之時的統計，已達五百七十五人。

萬默思神父除了興建聖雲仙小堂和小學、大赤沙的聖彌額爾小堂，亦為附近村民建造一些小平房。位於聖雲仙堂旁邊、又曾稱作「清輝診所」的法俾洛診所也是由他創辦，是「他幫助患病窮人的願望的成果」。診所於 1967 年 7 月 16 日由訪港的比利時天主教福利會考魏蒙席（Monsignor Albert Cauve）揭幕。<sup>434</sup> 診所英文名稱 Caritas Queen Fabiola Clinic 標示其與明愛有關，是他建成後交給明愛主理，並且以比利時女皇法比奧拉（Queen Fabiola, 1928-2014）名命，以吸引比利時民眾捐款。

從《香港天主教手冊》資料可見，除了普通科門診，診所還提供產前產後檢查，設有十二張病床，開放時間為每周三及五的下午三至四時。診所主任一直是寶血會馬慕真修女。1980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的負責人欄目為空缺，1981 年已沒有列出。由於公教真理學會一般是在前一年年中收集各教會機構的資訊更新，至年底印行新年的手冊，故此馬修女有可能在 1979 年中已離開，診所則可能是在 1980 年結束。



前面提到萬默思神父（圖）有著很突出的個性，一生為窮人服務。他的車子「是真的多用途車：運載水泥和建築材料的卡車，將患病堂區教友送往醫院的救護車，甚至是為那些負擔不起商用靈車的家屬運送棺材的靈車」。<sup>435</sup> 在他猝逝前一天，據醫生修女說，他還自己開車從西貢坑口送病人到黃大仙的聖母醫院。這是他的習慣，見到病人就想方法送他們到醫生，一生都是這樣做。<sup>436</sup>

### 13.6 鯉魚門派藥所

鯉魚門本是客家人為主的小鄉村，人口不多。據《慶祝雷震東神父來華四十週年特刊 1967》編輯梁遇年先生的記述，鯉魚門與調景嶺只是一山之隔，後者於五十年代成為難民營後，由於鯉魚門是調景嶺居民陸路出入必經之路，使該處的面貌亦隨之改變。當時聖母聖心會已在調景嶺服務，部分鯉魚門居民曾向天主教會請求救濟及派神父前來服務，惟修會沒有額外人手可指派。<sup>437</sup>

1962 年，鯉魚門村民拿著四百九十三個貧民家庭的名單，再度向教會提出請求，修會派遣時為調景嶺主任司鐸的雷震東神父負責。當初雷神父願意到鯉魚門開展工作，多少有點是出於與基督教的競爭心態。他曾「注意到一間基督教堂矗立在鯉魚門村山上後，感到痛心，他完全不能想像基督教徒會比天主教徒更虔誠」<sup>438</sup>，所以渴望在當地建設一座小堂和相鄰的聖母岩。

經視察後，雷神父指示教友羅君：「第一從救濟貧民著手；第二設立救濟性質的診療所，第三辦理學校。」<sup>439</sup> 鯉魚門居民亦互助合作，由羅平鄉長把自己的居所借予教會，闢作分發救濟品的福利站。德基學校的校長也將空置教室借出，作為晚間講道的地方。雷神父於同年 8 月正式常駐鯉魚門。翌年，雷神父建成一座小聖堂，奉聖雅各伯為主保，在 1963 年 8 月 15 日聖母升天節舉行隆重的開堂典禮。

雖然從不同資料可以確定鯉魚門派藥所的存在，卻都沒有其實際運作的描述，連在《香港天主教手冊》上也找不到該設施的紀錄。它的確切地點也有兩種說法，一說是由羅平「給與設立診療所的地點」<sup>440</sup>，另一說是「校長撥出地方興建派藥所及一間房間作教理講授之用」<sup>441</sup>。由於此醫療服務紀錄不多，故推測有可能只是派藥所規格，並非正式診所。即使這樣，正如在中學任教的梁遇年所說，雷神父「每日為學童免費供給牛乳及午餐，並且為貧苦居民免費治療」，這些惠民服務使他得到教內外人士的愛戴。

## 14.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來自加拿大的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MIC）由「可敬者」戴麗雅修女（會名聖神瑪利亞，Venerable Delia Tetreault，1865-1841）創辦。當時的加拿大沒有到外方傳教的修會，戴麗雅修女起初也不敢奢望成為傳教士。不過，經過長期的祈禱和等待，教會終於批准她在蒙特利爾開辦傳教學校，更在兩年後的 1904 年聖母無原罪信理五十周年，得到教宗庇護十世認可，升格為傳教修會。

修會的精神和目標是成為「一個感恩以及具有聖母特質的傳教修會」，與天上諸聖和聖母相結合，在無信仰者中間傳福音。<sup>442</sup> 1909 年，第一批六位傳教修女便遠赴廣州傳教，於 1928 年派員來港，主要在教育方面為年輕人服務。修會現今著名的德望學校是一所女子學校，但 1930 年其最早創辦的則是一所私立男女子小學——德信學校（現為男校）。至於診所和醫療並非修會在香港的主力工作，純粹是原在內地服務、護士出身的趙蘊玉修女（Sr. Jeanne Bouchard，1913-2006）來港後，成為修會唯一在港從事醫療服務的修女。加拿大籍的趙修女曾在長沙灣及鑽石山的施藥所工作，以後者的時間最長。<sup>443</sup>

### 14.1 慈母診療所

長沙灣的慈母診療所（Mother of Mercy Dispensary）是眾多天主教診所中，資料最為混亂的一間。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天主教手冊》中，慈母診療所只列出其位於青山道，而沒有確切地址。1955 年中英對照的《香港天主教手冊》，中文部分稱診所為「長沙灣公教贈衣所」，有可能是「衣」與「醫」發音相近而出錯；其由趙蘊玉修女擔任「護士

長」，英文則列出診所名稱為 Dispensary Our Lady of Mary，「修女負責人」（Sister-in-charge）是 Sr. Charles di Milan，與趙修女的外文名字相異。不過，中英文《公教報》不同時期的兩則新聞提供了少許的信息。1953 年的報道指，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在長沙灣墳場附近「開設一間施診所，到來求診的每日平均五十人至八十人」。<sup>444</sup> 在 1999 年趙修女退休回國的報道中，更確實地提及她於 1952 年來港，之後在長沙灣一間診所為難民服務。<sup>445</sup>

另一方面，青山道福華村曾有一間同樣以「慈母」（Mother of Mercy）為名的私立慈母學校（現址南華中學），由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開辦，顯主女修會負責打理。經向宗教外方傳教會教會史學家田英傑神父（Fr. Sergio Ticozzi）查詢，慈母學校由宗座外方傳教會高牧靈神父（Fr. Amelio Crotti，1913-2004）開辦。<sup>446</sup> 二戰結束後，長沙灣天主教墳場下方有很多大陸難民聚居。1952 年，曾在河南工作的高牧靈神父開辦了一座聖母諸寵中保小堂和慈母學校，開始對難民的牧靈事工。兩年後，高神父被召回意大利，由海澤黎神父接任，於 1954 年開設了一家診療所。1955 年 2 月，馬迪理神父（Fr. Pietro Martinelli，1921-2008）被派遣接替調往大埔的海澤黎神父。馬神父一直在聖母諸寵中保小堂服務，至 1960 年遷往李鄭屋邨剛建好的聖老楞佐堂。此時，諸寵中保小堂交由夏敏達神父（Fr. Antonio Garaventa，1928-2012）管理。夏神父於 1962 年調離，由海澤黎神父再次接手。1970 年，政府徵用了該地區土地並拆除了小聖堂。

基於診所與慈母學校（善導小學前身）同以慈母為名，以及早年很多教會學校和教會診所是開設在一起，有理由相信海澤黎神父開辦的慈母診療所就在福華村的慈母學校附近。至於診所何時關閉，據前述關於趙蘊玉修女退休的報道指，診所於 1956 年遷往鑽石山，她便繼續在鑽石山診所服務，直至 1984 年。<sup>447</sup>

## 14.2 中西融匯、互助友愛的鑽石山

現已改頭換面的鑽石山，可能在不少人印象中以前不過是一個大型寮屋區。然而，鑽石山既非只有寮屋，鑽石山亦非其原名。鑽石山原名元嶺，是元嶺山下的鄉村，九龍早期十三鄉之一，可細分為上元嶺、下元嶺及大磡村。<sup>448</sup> 鑽石山之名的出現，一說主要是二次大戰後有大量建屋築路的需要，元嶺又是花崗岩山體，因「鑽石取山」而得名，但錯將動詞變名詞。<sup>449</sup> 另有一說是，舊有一石礦出產閃爍白色花崗岩，故以鑽石為名。在四十年代，由於大觀電影公司座落於鑽石山，吸引了不少演藝和編導人員，甚至一些外國人在該區買地，建造獨立小洋房。五十年代，不少內地難民逃港，較為富裕者亦選擇到鑽石山頭蓋建小石屋。這些小石屋洋房「四面單邊，屋前屋後都有鐵絲網圍起來，種上一些花草樹木」，故鑽石山又被稱為「小九龍塘」。<sup>450</sup>



花崗岩建造的聖則濟利亞堂

陳永超神父一家自他 1967 年出生以前，已住在這樣的一所獨立屋，直至八十年代初獲派入住公屋，才搬離該區。他原來的居所是「原業主分拆了一半出來，給我家人住。房東是一個老人家，他自己就住在主客廳和主人房。為什麼叫『小九龍塘』，因為早期有很多是石屋。一直到後期五十年代，國家政局改變，很多難民來了，開始很多人住在這裡，

便蓋了很多木屋。」<sup>451</sup> 小時候的他也很奇怪為什麼該區會有外國人，後來才知道他們是住在那裡，但有的年紀已很大，估計他們是在更早時期落戶該處。這些特點也反映在鑽石山的天主教團體中：原稱聖家小堂的聖則濟利亞堂<sup>452</sup> 是以俗稱大麻石的花崗岩興建，並且很早期已有中英語的聖言宣讀組，每個主日的講道均以廣東話、國語及英文進行，是九龍區早年少有的東西文化融匯之地。<sup>453</sup>

當然，更多平民是住在密密麻麻的木屋裡。1958 年來港後曾在鑽石山服務約五年的恩保德神父（Fr.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1934-2023）憶述當時的居住環境說，自己曾在天災後探訪受災者時，一些青年驚訝地對他說：「這兒有聖堂？這麼多年我沒有看見過。」恩神父解釋：「原來住在木屋的人，看不見遠處，因為木屋很密集，路不成路，全都是窄窄的『巷仔』。聖堂就在十九巷，當時沒有街道名稱」。他又說，由於小巷太窄，「救護車不能進入，我試過看見有人揹著小朋友穿過巷仔出外坐車求診」，亦會「有人把病人搬到聖堂」，尋求協助轉往醫院。雖然一般人生活條件不佳，不過恩神父很欣賞鑽石山居民之間的守望相助，形容「那時候互助、互信是 good 的」，大家會一起面對「三個共同敵人：水、火、風」，因為下大雨時很容易水浸，刮颱風時木屋可能會被吹走，「火警就更不用說了，很多東西都被燒光。我在那裡感覺很深，特別是火災時，轉瞬間所有木屋都消失了。」<sup>454</sup>

### 14.3 聖家施藥所

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營辦的聖家施藥所就是處身於這樣的一個環境；在可查考到的紀錄中，施藥所的位置落座於鑽石山西二巷二號，即靠近彩虹道明渠、現已清拆的下元嶺範圍，與位於十九巷靠近中原酒廠的原聖則濟利亞堂相距約十分鐘腳程。

不過，聖家施藥所最初的落腳處並非在西二巷，而是在牛池灣村。居於牛池灣村的謝修明女士在 1957 年已在牛池灣的施藥所工作。她憶述自己有一天生病不適，有街坊告訴她，可以去修女的診所看病。「我

排隊的時候，有一位先生問我：『你不用上學嗎？』我說：『對，我感到不舒服，我讀下午特別班的。<sup>455</sup>』因為當時的生活條件，我是讀特別班的，沒有正式去上學。那時上課時間是四點到六點。他便說：『這樣你早上便有空了？你能不能過來幫忙。』<sup>456</sup>

施藥所本身有兩位診所姑娘，當時有一位姑娘剛好懷孕，經常頭暈不能上班；另一位是林雪卿，後來成為謝修明領洗入教的代母（Godmother）。由於修女那裡有很多病人，需要人手，就這樣十五歲的謝修明便開始到施藥所幫忙，最初是負責維持秩序，後來那位懷孕同事離職，她便正式成為診所姑娘，並見證施藥所於六十年代初搬到西二巷。

謝修明於 1963 年離職時，趙修女請她介紹人來接替工作，她便把母親帶去見修女。謝母本身沒有工作，也沒有信仰，是接觸了趙修女之後才領洗入教。謝母在診所主要是負責登記和簡單的醫務工作，在診所每天關門後，有時候下午也陪伴趙修女到各處探訪教友。

本研究沒有找到聖家施藥所外貌的相關照片，根據陳永超神父的形容，它也是類似的石屋平房。陳神父小時候住在下元嶺，與他姊姊一起在施藥所學道理，由華人傳道員講授。他憶述那是一座一層的平房，有部分是麻石建築，比較多是木做的延伸。平房外有一個很大的花園，「所有小朋友都喜歡到那裡玩耍，彈波子也好，捉迷藏也好。因為小的時候，那個環境相對就很大，可以捉迷藏，有時又可以在那裡摘一些野果」。<sup>457</sup>

雖然聖家施藥所門外沒有天主教標記，陳神父認為街坊「應該知道那是天主教辦的診所，所以他們叫那裡做『姑娘堂』，因為以前的人都叫修女做姑娘」。

施藥所由于先生負責管理，即邀請謝修明到診所幫忙的那位男士。閤門是「長期虛掩。你自己推門便可以進去。熟路的人都知道可以進去

的。我們最初不知道，去學道理後才知道平時都是開著的，便與其他小朋友一起進去玩，只要不打破東西，把東西弄亂便可以」。<sup>458</sup>

平房外有個大庭園，亦是人們領取奶粉、麵粉、大米等救濟品的地方，裡面有一座用石頭堆砌而成的聖母山，恭奉一座露德聖母像。陳神父指出：「我們小時候因為都是天主教徒，會在聖母像前面祈禱。我們去玩的時候，沒有人會阻攔，因為我們會先祈禱。他們知道這一群是『自己友』，就讓我們在那裡玩。現在回想，我們有這個習慣，所以人家知道我們是教友。」

至於平房內部是相通的兩邊，一邊是德娟清修女（Sr. Laura Therrien, 1910-1991）<sup>459</sup> 平日讓貧苦兒童讀書的地方，只有一兩班約二三十個學生，可讀到小學三年級的程度。這地方周六和假日則用來教道理，由黃幗雄（1926-2016）及劉桂娥兩位女士負責。另一邊則是趙修女看病的施藥所。另外還有于先生辦公的地方，以及洗手間和廚房。

施藥所是免費看診的，陳神父因年紀小並不知道收費多少，反而「印象最深刻是飲咳藥水，覺得好好味」。他記憶中，看診室裡面有一些櫃子，用來放藥物，也有一些瓶子，陳設「很整齊，很簡單。修會現在的會院也是很簡潔，可能是她們的傳統訓練」。

#### 14.4 講「唔鹹唔淡」廣東話的護士修女

趙蘊玉修女於 1934 年二十一歲加入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是該修會唯一在外方傳教長達六十年的修女，直至 1999 年從香港退休回國。她在宣發修道聖願後考取護士資格，於 1939 年前往中國瀋陽，在四平街開辦診所，及後於 1947 年被總會長派遣至廣州石龍照料麻風病人，1952 年來港。<sup>460</sup>

陳永超神父與趙修女見面和聊天的機會不多，但有兩事讓他難忘。首先，他和其他街坊小朋友不太會英文，所以他記得趙修女「會講些『唔

鹹唔淡』的廣東話。因為小時候鑽石山有外國人出入，對於外國人講廣東話不覺得奇怪。所以也能聽得懂她說什麼」。

此外，在他八九歲準備初領聖體的時候，趙修女因為知道他是教友，「送了一支原子筆給我。小時候覺得這是很名貴，是Parker（派克筆）來的。我們小時候只用鉛筆，第一次收到原子筆就是她送給我的」。



趙蘊玉修女（前排右一）、謝修明及其母（後排右一及左一）和其他教友於1998年聚會。（照片由謝修明提供）

與趙蘊玉修女有更多接觸的謝修明眼中，趙修女是個仁慈、有原則的人，很願意教人，是她的良師。「她對病人很好，很關心他們，又會叫他們去聽道理慕道，好慈祥。」診所下午關門後，趙修女便到各區做探訪工作。「我也有跟她去何文田山頂，還被狗追……石硤尾那些『火燭』的地方<sup>461</sup>，我們也去過。九龍城寨也去，成條街都是白粉那些，但修女不害怕。」

至於修女的原則，她舉例說：「就算有一天沒太多病人，你拿書出來溫習，拿功課出來做，都是不可以的。總之你只可做診所裡的事，但不可以做自己的私事。」另外，趙蘊玉修女和德娟清修女都很嚴格要求她們，裙子要蓋過膝蓋，頭髮不能擋住自己的眼，「好執著我們的禮、我們的儀容，但也是好事」。

## 14.5 忙碌的每一天

謝修明記得 1957-1963 年在施藥所工作期間，雖然只是義診半天，但求醫者眾，「每天約有四五十人，由早上八點做到一點多，一直做過不停。趙修女一個人負責打針和幫病人看診。」

作為診所姑娘，謝修明早上回去就要預備和消毒好所有用具。當年都是用玻璃瓶做藥水樽，而且是回收再用，需要消毒。所以她每天要把回收來的玻璃瓶「浸甩 label 紙，浸甩咗先，之後還要清洗，又要『過水』，再用熱水『焗』，然後晾乾水，再入藥水進去，所以很多功夫，很忙」。<sup>462</sup>「焗」玻璃瓶是用火水爐。「火水爐就要加火水，又要換芯。試過一次用電爐，好開心，一插電便可以用。」



謝修明在聖家施藥所內準備各種醫藥用品（照片由謝修明提供）

她又要「焗」針咀、針筒來消毒，棉花也要剪好。此外是檢查注射針的針咀，「看看有沒有鈍了，還要勾棉花，看有沒有把棉花勾起，如果勾到，即代表那個針咀要磨」。磨完針咀之後，再用紗布包著在沸水中煮四十分鐘，因為用的是火水爐，所以要看著爐火，然後用鉗子夾上來，把針和針筒分開放好。

然而，讓她覺得「最經典的」是製作膠囊藥丸，當時只有 Amoxil 一種特效藥，而它「是沒有 capsule，是粉來的」<sup>463</sup>。製作的方法是把藥粉放在盤裡，用一枝小棒將藥粉撥進長身的半邊殼，裝滿了再用短身的半邊殼蓋上。

施藥所每天僅應診半天，但從上述的一系列準備工作和所用的時間，可以想像當時施藥所的忙碌程度，以及趙修女對預備醫療設備的嚴謹要求。

## 14.6 診所內的難忘場面

在聖家施藥所短短幾年，謝修明經歷過三次難忘的場面。第一次是有病人正在看病的時候，突然在她們身邊猝死。「那次真的好害怕、好緊張，因為真的不知道怎樣去救他。我連打 999 都手震，因為第一次發生，從未發生過。在講話時突然爆血管便『走了』。我打 999 講西二巷也差一點講不出來。你知以前的電話是要用撥的，我的手震到撥不到。最害怕就是這一次。」另一次是有病人暈倒。有病人耳朵流膿要來清洗耳朵，「清洗時，他突然『呼啲』倒地，把我嚇得要死。他是耳水不平衡，你把東西沖進去他便暈了，因為我很集中精神幫他清洗，不知道他會暈。後來由趙修女幫他診治，又給他水喝，休息一會就好了」。

讓她最難過的是為一位有糖尿腳的病人做護理清洗傷口。「他來洗腳，我一邊洗一邊哭，因為好臭、好爛。他每一天都來，我每一天都要幫他拆開紗布，現在想起來都會流眼淚。他腳的傷口把紗布竊實，好臭、好多膿，最後要截肢，後來也『走了』，所以糖尿是很嚴重的病。」

## 14.7 診所姑娘成為終身事業

因生病機緣巧合成為聖家施藥所的診所姑娘，謝修明自言在趙修女身上學到很多，為病人打針也是趙修女教的，使她一輩子都以診所姑娘為業，直至 1996 年因先生健康轉差才停止。

她初到施藥所的時候，工資由二十元一直增加至六十元，後因為找到工人診所的工作，工資翻倍，便離開施藥所。即使這樣，十九歲已成為新媽媽的謝修明仍感到難以維持生計，所以她利用在診所學到的技巧掙外快——為病人打針和為初生嬰兒沐浴。

這兩種兼職機會，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謝修明說：「以前不像現在，現在已經沒有了，因為怕有危險。以前醫生會開藥給病人回家打針。譬如要打補血針，開十枝給你。你找人打就可以了，但有些病人不會打，所以我以前會有很多錢是從兼職掙來的。如果靠我正職的薪水是沒有辦法維持生活的，因為我先生做公務員，你知道當時做公務員是『餓你唔死、飽你唔親』，家裡好多小孩，不做一些兼職是維持不了的。」

香港三十年代肺結核肆虐，奪去很多人的生命，戰後此病更居死亡率首位，並因醫治期長，使人聞之色變，直至七十年代醫學取得更大的進步才逐漸緩解。在六十年代這樣的大環境下，謝修明為掙取外快，「連肺癆針也打。肺癆針也照開給你回家打。這病會傳染的，但做的時候就不會想到害怕。肺癆和肝炎都很厲害的，肝炎到現在還是很厲害，肝炎帶菌者很多。」

除了打針，她有時候也替初生嬰兒沐浴，直至他們「甩臍帶」為止。嬰兒出生後，臍帶一般在五至十天後自動脫落，在未脫落之前需要小心護理，否則有可能會出血或受感染等情況。往昔政府母嬰健康院提供初生嬰兒護理臍帶服務，現已取消。「有些媽媽生完 BB 每天要去健康院給 BB 洗肚臍，沒有時間休息，覺得每天去好煩，所以情願給一點點錢，不是很貴，十幾元那時候已經是很多錢，為我已經很好……我幫 BB 沖涼（按：洗澡）也沖大了有十幾個。現在屯門醫院有一位很高級的醫生小時候也是我幫他沖涼，沖到三四個月大，交回他媽媽自己沖，所以好結實，一百天的 BB 很結實的。」

## 14.8 醫療服務需求轉變

上述的兩項兼職工作，反映了主要在六十年代衍生出來的非規範醫療需求，而施藥所的結束也見證了社會和時代的演進。在六七十年代，鑽石山附近已有好幾位中西醫，而元嶺街坊福利會也附設診所<sup>464</sup>可供選擇，所以來施藥所求診的病人開始逐漸減少。與其他人一樣，陳永超神父一家也同樣會到外面看其他西醫，「媽媽說如果只是傷風感冒，去修女那邊看就行」。

從歷年的《香港天主教手冊》亦可看出居民對修女會提供的醫療和福利需求的轉變。趙修女初期周一至周六每日上午義診，提供普通科診療，六十年代中期施藥所的地點增設福利站，由德修女、兩位助理和兩位社會工作人員協助，「為新移民提供物質及神形上的支援」<sup>465</sup>，但至七十年代初再度只有趙修女一人逢星期一、二、三、四、六義診半天，且服務日數減少了一天。自1976年起，《香港天主教手冊》再沒有列出相關負責人的資料。據悉是業主要收回土地，所以只好結束施藥所的歷史任務。

隨著經濟開始發展，更多公營房屋落成，「後來看病的人沒多少，西醫診所也多了，人們也開始搬走」，所以趙修女七十年代開始，更多是與謝修明的母親到各區探訪教友。<sup>466</sup>施藥所正式結束後，來自加拿大法語區的趙修女也回到由修會興辦的德望學校教書，為學生補習，教她們法文，直至1999年退休回修會加拿大總部終老，為她來華傳教的使命畫上句點。

## 15. 公教信徒善會及組織

### 15.1 公教婦女會

公教婦女會（Catholic Women's League）舊稱「公教婦女聯誼會」，是一個國際性的天主教婦女組織，香港會址位於中環公教進行社大樓內，由「各國凡能操英語」的天主教婦女組成，從事公教活動。<sup>467</sup>它是本港天主教信徒善會中，在歷史上最大力投身於醫療服務的一個團體。

對於公教婦女會在港成立的歷史，擔任該善會神師的耶穌會劉勝義神父（Fr John Russell）在 2017 年婦女會八十周年特刊中指出，善會本身對戰前的活動所知甚少，並且承認保存歷史非婦女會的強項，只知道戰後的第一任主席是莉蓮·佩里夫人（Mrs. Lilian Perry）。<sup>468</sup>保存歷史的問題正正反映在該會成立時間上的不同說法。據婦女會網站，她們是於 1937 年由兩位愛爾蘭婦女成立，聯同其他操英語的不同國籍婦女幫助有需要人士，無分種族或信仰。然而，英文的《1962 年香港天主教指南（重印）》一書中提到公教婦女會最先成立於 1913 年，於 1948 年在戰後重組，並隸屬英國總會。<sup>469</sup>同一作者另一本講述宗座外方傳教會 1858-1958 年的歷史《一百年的故事》（*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甚至確切給出婦女會是於 1913 年 6 月成立，第一次會議是在傳教會內舉行。書中又提到，當時主教希望看到天主教生活在教會群體的各個部分得到發展，婦女會起初的工作包括濟貧及為貧窮的天主教女童提供圖書館和聚會點。<sup>470</sup>

據本研究發現，公教婦女會於 1910 年代已出版英文通訊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Ladies' Union*。原稱為 Catholic Ladies Union 的

善會是於 1913 年底更名為 *Catholic Women's League of Hong Kong*，該英文通訊亦同時改名。在 1913 及 1914 年的英文通訊，正好講及更名的緣由及善會的目的和目標。

1913 年 12 月 1 日的通訊指出，更名之事是在 11 月 14 日的特別會議上通過，標示該會「充滿活力和力量的象徵」，並已向國際公教婦女會申請為從屬機構。她們的會址位於當時的堅道 26 號，成員僅限於天主教徒，即使非香港居民；而非教徒可以選為名譽會員，會費為每月五毫。例會定於每月第一個星期一，善會職員每年通過選舉產生。該通訊進一步解釋，更名是基於會員「渴望」成為國際公教婦女會的一員，目睹世界其他地方的婦女會充滿活力的存在，「為教會和社會做著亮麗的工作」，感覺是時候「加入這個偉大的世界運動，將遠東和西方連結起來，從事令婦女進步的崇高工作」。<sup>471</sup>

在翌年 4 月 6 日已更名為《公教婦女會通訊》（*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Women's League*）的英文通訊中，則列出其目的和目標，包括形成強大的團結紐帶，使這個由不同種族人士組成的團體可以互相幫助和支持；為了本港教友的福利，會進行任何適合女性的工作，並會研究當今社會的需要，鼓勵參與社會工作；又為社會的普遍利益而努力，除了友善的討論，並在可行之時付諸實行，同時透過出版通訊傳播美好的想法，引起教友關注影響自己福利的所有事物。她們又成立小組，以進一步提升婦女的福祉，提供健康的娛樂和強化團結共融。<sup>472</sup>

### 15.1.1 時代巨輪之下的變與不變

那麼早年的婦女會與 1937 年至今的婦女會中間的差異為何？除了戰時的因素，據悉，在 1910 年代的婦女會是屬於蘇格蘭公教婦女會的分會。重新組織的婦女會，希望成為獨立的本地團體，並且依從香港法例對公司登記的規定來註冊，故此成立年份以 1937 年開始計算，至今八十六年。

該會由成立初期至三十年代重組，成員方面沒有太大的變化，以外籍人士為主，反而與今天多了華人的參與不同。香港明愛前社會服務部部長陳秀嫻博士因工作關係，在八十年代開始每年為明愛籌款都與婦女會接觸，從而建立起良好關係，並於 1998 年加入了婦女會。她說，這個組織「只要是天主教女教友就可以參加，早期多是外籍人士。因為需要以英語溝通，很少中國人」。<sup>473</sup> 婦女會早年以外籍成員居多，可能是與家人因工作暫居香港有關，因此會員流動率頗高。例如《公教報》1968 年 3 月 15 日有新聞圖片顯示聯誼會惜別「該會功臣郵政司高旭夫人退休榮歸」，又 1969 年 2 月 28 日的新聞圖片是「歡送前任主席溫納夫人往比利時」。

### 15.1.2 戰後活躍提供醫療服務

雖然善會的存續因戰事而中斷，但她們應對社會需要，戰前戰後都沒有很大的改變。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該會其中一項主力工作是到四間醫院探訪傷病的海員。<sup>474</sup> 在重組後的五六十年代，可說是公教婦女會服務的黃金歲月，同樣以醫療為主。

作為信徒組織，婦女會在醫療方面貢獻良多，名符其實的「出錢出力」。在六十年代初，本港人口急速膨脹，政府的社會福利及醫療衛生設施仍未完備，在《1962 年天主教指南（重印）》中已顯示婦女會在港九各地營辦的診所多達七間。在 1963-1964 年間，受醫人士近四萬人，協助填補了公營服務的缺口。<sup>475</sup> 可追溯的診療服務，包括聖伯多祿診療所、摩星嶺診療所，兩間流動醫療所。後者包括與天主教福利會合作的醫療車，以及與嘉諾撒修女合作的醫療船。她們又捐贈一萬八千港元給打鼓嶺的聖若瑟診所增添設備之用。婦女會在不同診所工作的員工，曾多達七人。

除了醫療方面，她們亦提供獎學金，派發糧食包，捐贈汽車給教會作流動醫療車和流動食堂，在西貢大埔坳村區興建一幢平房贈予兩戶清

寒家庭。她們又捐助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在調景嶺的中學建築女生宿舍。在聖誕節等教會大節慶，她們會舉辦活動招待逾千兒童和病童。

### 15.1.3 不同形式籌募經費

為支持其免費醫療及濟貧等愛德工作，以及聘用合資格的醫療人員，公教婦女會每年亦以不同形式籌募經費，並提出口號：「請幫助我們去幫助香港的貧窮人。」單是 1960 年的服務支出達四十萬元，其中三十二萬元來自英國總會作為難民基金。<sup>476</sup>

在六十年代，婦女會以慈善餐舞會、畫展等活動籌款。據《公教報》六十年代的報道，慈善畫展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邀得該會贊助人何謹爵士夫人主持開幕剪綵，而餐舞會是在半島酒店舉辦，年度抽獎的頭獎禮物更是「凱旋牌」汽車一輛。<sup>477</sup> 從這些細節可見，婦女會成員主要是社會的上層和專業人士，部分外籍成員更是「系出名門，得以向富裕階層籌募善款」，她們為窮人建房籌得四十至六十萬港元不等，「相當於今天的數千萬港元」。<sup>478</sup> 時至八十年代，婦女會獲准在中環聖若瑟堂進行每小時一次的抽獎活動。每台彌撒前會出售抽獎卷，彌撒後就為中獎者敲響鐘聲。這些獎品都是由會員或她們的朋友捐出。

據 1983 年入會的 Rosemary Ho 指出，婦女會起初只在外籍教友集中的中環聖若瑟堂舉行賣物會，是她母親 Bella Sun 想到辦抽獎活動，因此拉她入會來幫忙。她母親憑一己之力申請政府牌照許可，又與印刷商聯繫，其他成員就協助找獎品贊助人。一年一度的抽獎，使得 Rosemary 最怕就是每年的 4 月，並曾向母親抱怨為什麼要為婦女會搞那麼多事情？在溫哥華出生，年輕時回流香港的 Bella 總會解釋，天主恩賜她很好的辦事能力，她有責任回饋答謝。<sup>479</sup>

## 15.2 定點及流動診所

婦女會組織內部設有醫療小組，由醫療所主席監督轄下診所，曾由

馬超常夫人 (Mrs. Vivian Rafeek)、黃李煜英夫人、陳李登美夫人、Wyn Lo 夫人等擔任。婦女會在 1971 年有多達二百名成員，於五十至七十年代在醫療服務方面最為活躍，初期主要是以流動形式提供服務，之後才設立定點診所，到後期由於經費不足，把它們都交給明愛管理。診所的醫護人員全是義工，流動性很大，有些一旦要回醫院工作，便不能繼續，有些則是退休後才擔任義工。據該會的八十周年特刊介紹，公教婦女會開設的都是小型診所，首間是在 1951 年。在《南華早報》1957 年的報道中，婦女會指她們已開設有五間診所，兩間在九龍仔，一間在薄扶林的固定診所，每周運作兩天，其餘為流動診所，每周到天后廟、南朗山及石澳服務一次。這些服務由逾二十位成員義務提供，每季診症人數約一萬二千五百人次；<sup>480</sup> 1959 年的報道則指將會在老虎岩（現今樂富）安置區再開辦另一間診所。<sup>481</sup> 不過，《香港天主教手冊》是到了 1963 年才列出冠有婦女會名稱的診療所，查證不易。

### 15.2.1 摩星嶺診療所

據劉勝義神父所言，摩星嶺診所應該是婦女會 1951 年營運的第一間免費診所。<sup>482</sup> 為住在薄扶林利瑪竇宿舍後面、卑路乍砲台（今西環寶翠園）的木屋居民服務。最初由兩位護士成員提供服務，後來有其他成員加入，並同時向窮人派發大米、牛奶和衣服。但醫療服務翌年因木屋區遷徙至安置區而停頓。

### 15.2.2 聖伯多祿（公教婦女聯誼會）診所

聖伯多祿（公教婦女聯誼會）診所位於薄扶林村 106 號 A。1963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列出是於 1952 年成立<sup>483</sup>，監督為明之剛神父 (Fr. Rene Chevalier, MEP, 1909-1981)，職員包括三名護士及三名社會工作者，都是婦女會的成員。診症時間是周二及周五上午時段。

明之剛神父熱心待人，身體力行，深受薄扶林區村民愛戴，他在七十年代擔任聖神修院神師。現在的神父中不少由他授教，他們無不景

仰明神父和論及他當年對他們的影響。<sup>484</sup> 屬於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明之剛神父原服務於廣州石室教堂和石龍痲風病院，他於 1952 年被驅逐出境，到港後隨即分派到薄扶林露德聖母堂服務。雖然巴黎外方傳教會很早已在薄扶林區擁有建築群，由於主要功能是對外出版及作為修士的療養院，修會在該區的「傳教態度是被動的」。<sup>485</sup> 剛上任的明神父為打破這樣的局面，爭取興建診所及學校，服務太古樓教友村和以外教人為主且歷史更長的薄扶林村，冀透過這兩種福利事業去接觸人群，並減少薄扶林村居民對「天主教信仰與文化的張力」，有效「打破兩處村民的隔膜」。<sup>486</sup>

然而，為何《公教報》1967 年 4 月 28 日卻報道該診所於「七天前」開幕，由露德聖母堂明之剛神父「祝聖該區新建之診所一間」？<sup>487</sup> 原來最初期的診所非常簡陋，起初只是「伙同婦女教友在村內空地為村民進行簡單診療工作」<sup>488</sup>，環境更像是一個收容中心，使用的是鐵床，到了 1967 年建成的兩層高小樓房，內裡格局才說得上是正規的診所。<sup>489</sup>

實際上，五十年代的聖伯多祿診療所並非薄扶林區第一間天主教診所，早於 1937 年聖保祿女修會曾在此區開辦學校及診所，後因戰爭於 1941 年結束。<sup>490</sup> 1953 年，巴黎外方傳教女修會除了在太古樓興辦聖華學校，為太古樓的天主教學童提供教育，亦招收附近村落的非天主教徒學生逾百人。她們亦應明之剛神父的號召，在太古樓開設一間小型施藥所。不過施藥所很快便不敷應用，明神父便請求教區向政府申請土地興建新診所。<sup>491</sup>



現已廢置的診所（天主教研究中心資料圖片）

政府批出的新診所土地，位於薄扶林村，毗鄰李靈仙姐塔。可是，在診所建成不久接連發生事故，包括「村內有人打鬥，四個男子拿著剪刀作為武器，互相攻擊，其中兩人受重傷；一個十五歲男童在睡覺時被撕破喉嚨；有人求死深切，跳入一大鍋沸水內自殺……尚未包括夫婦糾紛大增和女村民打作一團的難看情況……一間堪輿師傅，他二話不說便稱，全是診療所惹來的禍」。<sup>492</sup> 因此，診所遭到小部分村民抗議反對，不過大部分村民由於受惠於天主教會教育及醫療等慈善福利，還是接受了新辦的診所，不滿聲音逐漸平息，甚至後來明神父每周日會前往診所舉行彌撒，並有越來越多人領洗入教。<sup>493</sup>

聖保祿診所與摩星嶺診所一樣，由黃李煜英女士負責監督，主任醫師是黃醫生。逢星期二上午九至十二時，及星期三晚上七至九時，有兩名醫生及公教護士義務助理診症工作，提供普通科及施藥。有需要時亦會為村民寫轉介信到瑪麗醫院就醫。診所「專為服務貧苦及工人階級患者」而設，收費低廉，一星期要診治的病人多達二千人。在《公教報》1967年的活動預報中指出，婦女會計畫對聖伯多祿診所「大加改良，

提供更好的醫療設備，更好的藥物」，可見這個信友團體為教會不求回報的奉獻。<sup>494</sup> 診所及後因人手不足而停辦，原址改作圖書館，亦曾有村民租用開辦茶餐廳，現今已廢置。<sup>495</sup> 診所除了讓外教村民認識天主教會，它亦曾「是連繫太古樓與薄扶林村的橋樑，是建立不同社區間和諧共處的象徵」，有文化保育團體希望保留用作歷史資源中心。<sup>496</sup>

### 15.2.3 九龍仔診所

位於大坑東的九龍仔診所是應瑪利諾會神父的要求下，於 1952 年後期成立，與瑪利諾會管理聖堂及學校相連，每周一及四應診。診症病人相比其他四間為最多。<sup>497</sup> 在 1953 年 7 月至 1954 年 6 月，救治病例達一萬五千八百人次。它亦是瑪利諾會提供醫療服務四個區域中——牛頭角、九龍仔、東頭邨、柴灣——救治病例最多。<sup>498</sup>

### 15.2.4 聖若瑟模範工人診所

這所位於九龍上海街 408 號 2 樓的診所，於 1963 年開辦，根據《香港天主教手冊》，1967 年由林玉生先生為主任，主任醫生為陸潤之；1971 年的監督是黃李煜英女士，主任是羅申先生。診症時間為每日上下午，提供普通科診治。同一地點也有牙科服務，由一位許姓醫生負責。此診所地點有可能曾轉換過，因為《瑪利諾會香港紀事 1976-1980》（*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76-1980*）一書，提到 1976 年 12 月婦女會在上海街開辦最新的診所。<sup>499</sup>

明愛社會服務部前部長陳秀嫻第一次接觸公教婦女會，就是為了上海街的診所。該診所的樓房是婦女會出資購買，醫生的薪金由明愛提供。後來婦女會缺乏經費，便將其最後一間診所交給明愛。「當時我都在會議中，是『新丁』，不懂什麼……反正是幫助窮人，又是教會的服務，誰人出錢都無所謂。」<sup>500</sup> 上海街的診所同樣收費便宜，且運作良好，受街坊歡迎。<sup>501</sup> 若然瑪利諾會的紀事仍有關於診所的消息，轉交明愛應是 1976 年以後之事。

### 15.2.5 天主教福利會婦女聯誼會流動診療所

此一流動診所亦是由黃李煜英女士監督、黃醫生負責，於 1958 年設立，服務地區是星期一及四上午在香港仔（填地區），星期五上午在西貢清水灣。

流動醫療車於 1964 年 6 月 22 日，由白英奇主教在堅道主教座堂祝聖。它是由德國天主教慈善會 Misereor 送贈，由英國公教婦女會捐助兩年每月二千元的營運費用。醫療車由明愛及公教婦女會共同使用，由婦女會義務護士及成員充任職員，每周三天在香港島服務，而另外三天由明愛職員開往新界區提供服務。<sup>502</sup> 1965 年時，服務地區還包括銅鑼灣天后廟、黃竹坑，主任醫生為林肇真。



林肇真醫生（後排右四）與白英奇主教及其他獲授勳者  
（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西物斯德騎士裝束（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林肇真醫生的名字在多年的《香港天主教手冊》醫療項目中經常出現，可惜對其所知不多，除了他是 1966 年六位獲教廷冊封聖西物斯德騎士章的香港教友之一。<sup>503</sup> 這個封號是教宗庇護十世於 1905 年設立，分為四級，林醫生屬於第三級。與所有教廷的章一樣，此章全由教廷自由提名及授予，但授勳者很多時是因功績或服務卓越，由教區主教或教廷大使向教廷推薦。授勳者有特別的騎士服飾，備有配劍、衣領徽章等（如圖）。授勳是令受表揚者繼續有動力為教會服務。有趣的是，騎士團雖無特殊權力，卻有在羅馬聖伯多祿廣場騎馬的特權。<sup>504</sup> 林醫生對天主教醫療服務的深度投入，獲提名是實至名歸。

至於公教婦女會成員 Debra Rull，她對公教婦女會的記憶，是來自 1969 年在香港仔診所期間，擔職暑期工，負責注滿藥水樽。這工作使她在 1979 年加入婦女會之前，早已認識這個信徒善會，而她的家族中就有三代人是婦女會成員。她們除了幫忙診所，也協助收集海外捐贈的物資。這些都是社會福利署成立以前的事。<sup>505</sup>

### 15.2.6 聯誼會捐贈的流動醫療船



瑪道納海上診療所的醫護與求診的病人

（照片由公教婦女聯誼會提供）

醫療船全稱為「瑪道納公教婦女聯誼會海上診療所」<sup>506</sup>，是為香港仔漁民而設，停泊在香港仔海灣，每周二上午提供普通科診治及派藥，在 1963 年診治病人達三千九百人次。<sup>507</sup> 那艘船由英國公教婦女會捐贈，時值一百英鎊。1961 年新船下水時由耶穌會士龔樂年神父（Fr Fregus Cronin, 1909-1990）祝聖。由於嘉諾撒修女在香港仔培德會院設有診所，醫療船一周有三天由公教婦女會運作，另外三天由嘉諾撒修女診治病人。<sup>508</sup> 陳秀嫻憶述：「由於郭神父是天主教醫生會的神師，他就找來了醫生。診金收得便宜，看症好像是兩元還是五元。如果醫生來幫忙看診，明愛就會負責給他們些少津貼。」<sup>509</sup>



婦女會成員、郭樂施神父及嘉諾撒會修女

（照片由公教婦女聯誼會提供）

1935 年出生的黃亞妹，由四十年代開始為華南總修院師生出入權艇，當時從香港仔到總修院必由水路前往。黃亞妹指出在大概現今香港仔中心所在地有一艘修女的醫療船，「架船泊係聖伯多祿堂對落個船塢，有些瑪麗的『醫生仔』會來幫人睇症。」<sup>510</sup> 她的一位女兒憶述有位外籍修女姑娘，大家稱她「毛mo」，住培德會院，「會在船上幫手」；另一位女兒則記得「隻艇係白色的」，神父有帶過她上去玩，並且「好像可以在上面打針，有方糖食」。

## 其他公教信徒組織

在教友善會組織中，除了以公教婦女會在醫療服務方面最為活躍，設有七間固定和流動診療所之外，與基層醫療服務相關的還有公教華人聯誼會，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和香港天主教護士會，以及聖雲先會，不過他們形式不盡相同。

### 15.3 公教華人聯誼會

相對於公教婦女會主要由外籍婦女組成，公教華人聯誼會（亦稱為公教華人俱樂部）除了成員是華人，亦不限性別，宗旨是「促進會員精神、文化、道德生活，組織會員積極支持宗教及福利工作」。<sup>511</sup> 由師人傑神父（Nicola Maestrini, PIME, 1908-2006）成立於 1946 年的公教華人聯誼會，第一屆會長為林肇真醫生。<sup>512</sup> 會址起初並非設於堅道教區範圍，或是大昌大廈公教進行社與教會密切相關的地點，而是設於皇后大道中啟明行四樓，並且附有餐廳。該會成員一度高達六百餘人，在六十年代平均超過三百人，登記地址此時亦改為在大昌大廈 19 號。

聯誼會於 1992 年最後一次在《香港天主教手冊》出現，附註指該會納入為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成員組織，成為該會的一個活動。對於聯誼會併入教友總會前的歷史，只能從往昔的中外報道中了解，例如這個善會在初創後已不時組織醫療義診服務，以及派發救濟食品及衣服等愛德事工。在 1954 年之時，名譽會長鍾境培指出，聯誼會的社會福利活動並不多為人識，「在香港人習慣『社會福利』這個名詞時，本地天主教徒已做了很多不同範疇可辨別為社會福利的義務工作了」。<sup>513</sup>

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該善會派出教友義工擔任醫生和護士，在柴灣、東頭村及牛頭角三間教會義診所及一間流動診所服務。<sup>514</sup> 這些固定診所都是由瑪利諾男修會開辦。

聯誼會主席 Paul Lam<sup>515</sup> 正正是一名醫生，他的工作是負責美國天主教福利會的難民醫療服務。1954 年，他的太太 Mary Lam 過境美國時接受教會媒體訪問，講及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說：「到目前為止，香港大部分的天主教工作都是由對眾多低下階層感興趣的團體來完成，這些低下階層經受了許多苦難。」Mary Lam 於 1961 年亦擔任過主席一職，與公教進行社緊密合作，將美國天主教福利會戰爭援助中心捐贈的救援物資分發給有需要的難民，並且組織華人醫生及護士在診所工作；當時的天主教診所每天診治一百至二百人。<sup>516</sup>

除了上述的林氏伉儷，初期成員還聖德肋撒堂公青會主席陳翕如先生、同是聖雲先會會員的黃其光先生；六十年代有黃振烈醫生，曾任會長的王昆士先生及其夫人等熱心教友。<sup>517</sup> 王昆士 1966 年亦曾獲教廷頒贈的聖西物斯德騎士勳章，以表揚其為教會的服務。

公教信徒善會對社會服務的高度參與，在 1961 年「教區教友傳教總會」<sup>518</sup> 第二屆周年大會上，得到白英奇主教的肯定，並感謝很多教友組織「隨時與教會及為教會而工作」，並點出教友的重要性，說籌備中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1962-1965）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澄清教友在教會中的位置和責任」。<sup>519</sup> 教區教友傳教總會，即現在的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是天主教香港教區所有參加宣揚福音工作的中央機構，除了所有在教區登記承認的信徒善會，還包括各個堂區議會及牧民議會。該次周年大會報告了在近七千名善會成員中，他們參與的活動，包括為義診診所擔任工作人員，探訪病人等。

## 15.4 天主教醫生會及護士會

香港天主教醫生協會 1953 年由耶穌會龔樂年神父組織成立，宗旨是為便利醫務人員互相切磋和研究醫學道德的問題，同時維護天主教道德的原則。醫生會早年的成員包括醫務衛生署署長蔡永業醫生、香港公教婚姻輔導會創會成員朱雷士醫生（Dr. Ramon Ruiz, 1925-2020）、聖保祿醫院醫務總監羅理基爵士等醫界知名人士。在六十周年紀念特刊中提到，該會成員定期在兩間診所義診。<sup>520</sup>

與醫生協會同年成立的香港天主教護士會，是由聖高隆龐會瑪利·馬丁修女（Sr. Mary Martin）和方濟各·德尚塔爾修女（Sr. Francis de Chantal）創立，但直至 1974 年才正式命名為「天主教護士會」，並隸屬於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目的是促進成員的心靈和專業發展，關注他們的社會福利，同時鼓勵他們對病人的工作秉持仁愛精神，發展出有社會良知的責任感」。<sup>521</sup> 由於護士具有專業資格，與一般只需中學學歷的診所姑娘不同，其成員主要來自各間公私營醫院工作的平信徒。早期有不少修女從事護士工作，所以也有她們的參與。

這兩個由專業天主教醫護人員組成的善會，均有合作義診服務，然而相關紀錄並不詳細。1954 年的《公教報》曾報道，兩個組織的成員自 8 月起開始前往港九各寮屋區、徙置區及山區，「在酷暑的情況下，奔跑於窮鄉僻壤間」贈醫施藥。藥品如維他命丸、盤尼西林等均是教友捐贈，其他藥物混合劑則通常在出診的義務醫生診所預先配製妥當。<sup>522</sup>

## 15.5 聖雲先會

至今已一百六十年的香港聖雲先會是於 1863 年由宗座外方傳教會霍允尼神父（又稱化神父，Fr. Gaetano Favini, 1829-1868）成立，是本港天主教善會中歷史最悠久的，即使在兩次大戰及日佔時期的惡劣環境下，該會從未間斷為貧民服務。這個善會初期是「一個男子的組織」，按 1913 年的五十周年特刊，婦女仍然「不能參加做會友」，只能做輔助會員，直至 1968 年該會才接納女性為正式會員。<sup>523</sup> 本地聖雲先會的會務主要是探訪及支援弱勢社群，早年並沒有開設自己的診所，而是對患病和有需要人士給予醫療接濟，以及支援嘉諾撒修女在灣仔聖方濟各醫院內的臨終關懷設施「高默斯醫療所」。<sup>524</sup> 高默斯先生亦曾捐款資助修女們對葡萄牙籍孤兒的服務，是修會的恩人。

聖雲先會本身投入中醫義診服務，是遲至 2009 年才開始，在石硤尾奧撒南綜合服務中心每周兩天在指定時間提供中醫和針灸治療，每月服務約六十人次。<sup>525</sup> 法國籍的真福菲德列·奧撒南（Blessed Antoine-

Frederic Ozanam, 1813-1853) 是聖雲先會的創辦人，石硤尾的綜合服務中心以他的名字命名，主要服務對象為深水埗區內的獨居無依長者、貧困病患者、窮苦家庭、新移民等弱勢社群。這項服務得到一群醫生和中醫師相助，為有需要的長期病患者及貧窮家庭免費義診，贈醫施藥，不收分毫。

然而，必須提到的是為了支援這些慈善工作的經費來源。聖雲先會除了得到法國總會（及現時公益金）的資助，香港分會早在 1880 年已想出舉行一年一度的賣物會來增加經費。它亦是率先把售旗籌款引進香港，由於成效顯著，立即被其他機構仿效。1933 年，聖雲先總會一百周年時，玫瑰被採納作為聖雲先的標記，售旗日由玫瑰日（或稱賣花日）取代，會員在街上售賣玫瑰，藉此讓社會人士明白該會的工作。<sup>526</sup>

瑪利諾會修女的日記就曾記敘「玫瑰日」的盛況：

#### 1937 年 12 月 13 日 爭賣最多的玫瑰花

這是玫瑰日，第一、二、三、四班的女孩為聖雲先會的福利事業，從早上七時至十一時售賣玫瑰花。在中午，第三班的女孩打電話告訴我們，她和同伴在香港（島）賣玫瑰賣得最多錢。她們的總數達 \$138.50。這是 [堅道] 聖神學校第二次贏得單次最高金額的錦標。<sup>527</sup>

至於一年一度的賣物會，由於五十年代難民潮引發出的各種社會問題，教區遂成立香港天主教福利會更全面地規劃福利工作，以應付需要。為支持教區的決定，聖雲先原先的賣物會，自 1961 年起改由天主教福利會舉辦。至於玫瑰日，社會福利署要求該會在 1964 年起暫停有關活動。<sup>528</sup>

## 15.6 其他團體

這裡還要提到的是公教婚姻輔導會及出生權維護會。這兩個組織在《香港天主教手冊》上，並不屬於「公教信徒善會」，而是列為「香港教區 / 修會及其他天主教組織營辦之服務機構」家庭服務類別，它們亦不是前線醫療診治單位。不過，它們的組成歷史是由教友作為骨幹，且與醫療相關，故納入介紹。

公教婚姻輔導會提供的是另類診所服務。該會於 1965 年由郭樂神父創立，兩年後註冊為服務社團，以促進美滿婚姻及促使父母善盡天職為宗旨。據香港教區的檔案，在公教婚姻輔導會籌備之初，郭神父即與朱雷士醫生、朱醫生的太太歐愛蓮醫生（Dr. Irene Osmund Ruiz）及多位教會醫護界人士參與的醫務小組討論在港九兩地的幾間天主教醫院設立「診所」提供自然家庭生育計畫，初期商定九龍區診所設於聖母醫院。<sup>529</sup>

這裡說的「診所」並非普通科醫療性質，在當時《公教報》的中文廣告稱之為「調劑生育指導所」，由有經驗的護士和醫生運作，提供自然家庭計畫醫學建議，指導求助者關於懷孕期的知識。家庭計畫的觀念早於 1936 年已由香港優生學會推行，於 1950 年改組更名為現在的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家計會）。家計會於 1955 年開始獲政府資助，翌年成立首間生育指導所。

雖然坊間已有類似服務，但在公教婚姻輔導會 1965 年 6 月的會議上，郭神父指出他收到很多關於天主教指導所應診日和時間的查詢。為何教會亦需要提供生育指導服務？該會同年 3 月對外發表新聞稿，解釋了其成立的背景及所提供的生育醫療建議服務，指出現今香港的家庭受到不少的壓力，原因包括缺乏空間、住屋問題，以及大量極其貧困的人口，又指華人家庭，特別是天主教家庭尤為需要這種服務。<sup>530</sup> 該報道沒有解釋此話背後的含意，意指華人傳統思想喜歡大家庭，而天主教不容許人工避孕，在窮困環境下，生養太多孩子為家庭造成更大負擔，難

以改善生活。這些都是「天主教訓導中關乎維持婚姻和家庭生活尊貴性質之事」。<sup>531</sup>

五間教會生育指導所的地點，包括嘉諾撒醫院、聖母醫院、寶血醫院，公立產科醫院贊育醫院，以及官塘徙置大廈第 18 座的天主教福利中心，共十二名醫生提供建議服務。各指導所從 1965 年不同月份啟用至 1966 年 9 月 30 日，共舉行了二百八十九節的輔導。<sup>532</sup> 一年後，五個中心的人手增加至十五名醫生，十三名護士，六名接待員，兩名輔導員及一名社工，而前來求助的人大多更不是天主教徒。<sup>533</sup>

在七十年代，隨著社會環境大為改善，政府醫務衛生署接辦了家計會三十二間在政府母嬰健康院內的生育指導所，家計會的生育輔導亦由每周二百一十節，減至 1973 年 1 月每周一百二十三節；其時政府審計署更認為家計會的診所應由十間減至六間。<sup>534</sup> 同期，天主教也對生育指導服務作出調整。1970 年，公教婚姻輔導會在堅道明愛大廈總部增設中心，與嘉諾撒醫院的中心合併；寶血醫院及同區的明愛醫院兩中心合併，以及在荃灣增加一指導所。<sup>535</sup> 據《香港天主教手冊》的資料顯示，該指導所設於啟明診所內。

出生權維護會是由白英奇主教發起的一個教友團體，1973 年登記為慈善團體，宗旨是幫助面對困難之孕婦，提供醫療照顧，心理輔導及其他種種需要服務，以保障腹中嬰兒之出生權利及孕婦之人性尊嚴，並策劃教育活動，使普羅大眾重視人類生命之意義及尊嚴。據同年在《公教報》刊登的介紹，他們在明愛醫院、診所、流動診所和其他的天主教醫院等地點，向孕婦供產前產後的醫療服務；又與天主教福利會家庭服務部合作處理二十五宗個案。<sup>536</sup>

天主教教義是反對墮胎的，從 1976 年的數宗事例中，出生權維護會可說是順應當時的環境而出現。1976 年 3 月，胡振中主教（1988 年擢升樞機，1925-2002）在天主教教友總會的會議上，就重申天主教對

墮胎的反對立場，因為當時的寫作對此變得模糊，而天主教徒是不能含糊的。同月，天主教大專聯會以人權為由，表達反對墮胎的行為，「強化出生權維護會的立場」。同年 4 月，二十六個教會機構組織祈禱會，並向胡主教遞交一份有六千人簽名反對墮胎的聲明。<sup>537</sup>

這兩個歸入「其他團體」的信徒善會，雖然並非提供前線醫護服務，不過作為輔助角色，它們捍衛了六十年代以至今天，因社會思潮變化對醫療相關的教會訓導的衝擊。

## 16. 流動診療所

為應對偏遠地區居民的需要，海陸空流動形式的醫療服務便應運而生。從《南華早報》報道可見，政府早於三十年代已開設流動醫療車的服務：1932年6月14日，政府在九龍醫院向公眾展示流動醫療車，翌日便派遣它到新界偏僻村落，緩解居民的苦況。該款六輪高馬力多用途車，幾乎可在各式路面行駛；車內配置完整的派藥設施及急救用品，由一位醫生及一位敷藥員負責，是「首次有的這類汽車將在九龍應用」，可服務整個九龍半島，每日會到訪三、四個村落，每日完工後停泊在粉嶺。<sup>538</sup>

即使在戰後，新界居民對此項服務仍需求甚殷。在五十年代初，此時大埔、元朗、沙頭角、沙田等新界地區雖已有公立醫局或醫站，由於大量難民湧入香港，醫療需求甚殷，政府1952年再撥出兩部車輛改裝為流動醫療車，服務也不限於新界區。<sup>539</sup>在瑪利諾修女1955年3月14日的一則日記中，亦曾提及政府的流動診所出現在當時難民聚居的東頭邨。

在海上，政府同樣於1932年開始使用醫療船到新界南區水上居民服務。五十年代末，賽馬會向政府捐贈兩艘流動醫療船。慈航號於1958年1月23日下水，為大嶼山、蒲台島及西貢等離島及偏遠村民服務，「使這些遠離診所和電話的人能得到治療和安慰」；該船由太古船廠建造，船身長七十尺，由六缸增壓柴油發動機推動，造價四十萬元，配備有擔架、儲物室及八名員工的住宿空間。<sup>540</sup>1959年下水的慈雲號則在吐露港一帶服務。兩艘船已於2009年賣出，完成它們的歷史任務。

時至六十年代，醫務衛生署開始為偏遠地區的居民提供「飛行醫生」服務。參與者都是「全職醫生，華洋人士都有，而且大部分都加入了輔助空軍的飛行醫務隊」，由輔助空軍會提供直升機及機組人員，從啟德機場出發，服務地點包括大嶼山及西貢的東灣、大灣、鹹田灣及西灣。<sup>541</sup> 在《先賢之路：西貢天主教傳教史》一書中，就提到西貢西灣的天主教海星小堂旁邊有空地供飛行醫生隊的直升機降落。「起初，飛行醫生隊每星期會來一次，為村民診症以及提供藥物，並且不收任何費用。村民需要自己準備容器去盛載藥物，感冒藥和胃藥則會給予特別多的份量」，後來因人口下降改為兩周一次，但開始有牙科服務。<sup>542</sup>

## 16.1 流動專科診所

流動診療車在用途上亦分門別類。香港在三十至六十年代肺癆猖獗，由於治療期長，政府著力及早發現新症，減少對病床的需求，除了夏慤道健康院和九龍療養院兩間公立診所，流動形式的診所也派上用場。1951年，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濟基金會曾撥捐香港醫務處管理和運用一組流動肺病診所，包括兩輛形似救護車但面積略大的汽車，其中一輛裝有X光機，另一輛分為前面的發電機，用來輸送電流給X光機，後面是診症室，設一張輕便診療床讓醫生為病人作臨床診斷之用。診所所有由醫務處指派的司機、技師、檔案員、護士及醫生。<sup>543</sup>

此外，香港慈善家鄧兆肇於1959年贈予一輛汽車給英國紅十字會香港分會作為眼科流動診所。<sup>544</sup> 1952年成立的非牟利社福組織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香港分會，有見本地牙科醫療缺乏，於1959年興辦流動牙科診所，在沙田、上水、大埔、粉嶺、沙頭角巡迴服務。該車配備牙科醫療設備，並有發電機供電。該流動服務由法國巴黎大學牙科畢業生譚泰榮牙醫負責，並有女護士及司機協助，只略收掛號費，其他費用全免。<sup>545</sup>

元朗的流動診療所除了醫生和護士，同時有兩名助產士。<sup>546</sup> 有社團更計畫派出專門應付流行性感冒的流動醫療隊，由社團旗下各診所義務

醫生輪流下鄉；<sup>547</sup> 而中華基督傳道會於 1956 年則以六千五百元購置二手車改裝為小型流動手術室，設有病床、配藥室，並配有電單車一部，擔任急症之通訊工作。該醫療車周一至周六在新界西一帶巡迴免費看診，只收取藥費二元。除了醫生、護士、司機、雜役各一人，該團體亦派宣道員隨行。<sup>548</sup>

## 16.2 天主教流動診療所

從新聞報道可見，本地天主教會的流動診療所早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已經存在。然而，《香港天主教手冊》至六十年代才列出，香港教區檔案處的社會福利統計，更是到 1967 年才將流動診療所獨立分項，其中 1967-1970 年間共有三所，1971-1975 年間<sup>549</sup> 只有兩所，一是普通科醫療車，另一是牙科醫療車；1976 年以後已沒有流動診療所此一分項。

比較早期的資料有 1954 年由美國教友捐贈的兩噸半貨車改裝而成，讓義務醫生和護士向難民提供免費診治，以解人滿為患的醫院的需求，並惠及了許多忽視身體小病痛的人。這間袖珍型診所配有一張診症床、一張桌子、三個藥櫃和由壓力泵提供的自來水。當時預計在全面運營後每月可為約四千名患者服務。<sup>550</sup>

1963 年流動診療車的主任為林肇真醫生，共有九名護士及八名社工職員。他們的服務地區為 1) 香港仔（小學碼頭），職員來自公教婦女會；2) 堅尼地城，職員來自嘉諾撒會修女；3) 筲箕灣聖十字徑及大口環則由聖高龐會修女充任醫護人員。



白英奇主教祝聖由公教婦女會主理的流動醫療車  
(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運用流動診療所的天主教機構和團體，要數公教婦女會最多，包括流動醫療車及醫療船。這些流動設施大多獲海外教會慈善機構贊助。例如 1961 年，澳洲悉尼公教婦女會捐贈價值二千英鎊的醫療車給本港公教婦女會及香港明愛，並贊助一年的營運費用。除了給兩機構共用作醫療用途，該車輛亦於九龍及新界區分發熱食給學童，由明愛在香港仔的廚房負責。<sup>551</sup> 醫療船則有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瑪道納公教婦女聯誼會海上診療所」，這艘船是英國公教婦女會捐贈，為香港仔漁民服務。<sup>552</sup>

1964 年的新醫療車則是由德國天主教福利會（Misereor Social Aid Fund）捐贈，英國公教婦女會贊助兩年營運費用；<sup>553</sup> 翌年，香港明愛再獲德國天主教福利會及弗里堡總教區赫爾曼·舍伊費勒總主教（Archbishop Hermann Schaeufele）聯合捐贈流動牙醫車。當時全港還有另外四部由其他非政府福利組織運作的牙醫車。

表五：天主教福利會 1968-1974 年度流動醫療服務

| 接受服務之病者人數 |       |        |        |
|-----------|-------|--------|--------|
| 年度 \ 類別   | 流動醫療車 | 流動牙醫車  | 總數     |
| 1968-69   | 1,480 | 9,809  | 11,288 |
| 1969-70   | 2,100 | 5,336  | 7,436  |
| 1970-71   | 1,304 | 6,398  | 7,702  |
| 1971-72   | 1,678 | 10,363 | 12,041 |
| 1972-73   | 2,017 | 8,056  | 11,452 |
| 1973-74   | 2,852 | 7,573  | 10,425 |

醫療服務在天主教福利會的社會服務中，「幾佔一半的地位」，尤其在明愛醫院落成後，僱員達五百人以上，每年需數百萬元經費。<sup>555</sup>在這些人員和支出中，亦包括了各間診所。雖然流動醫療服務尤其是流車牙醫車頗有需求（表五），但由於此沒有收取政府補助，故每年都要自行承擔赤字（表六）。<sup>556</sup>

表六：天主教福利會 1971-74 年度流動醫療服務收支

| 流動醫療車及牙科醫療車 |           |           |           |
|-------------|-----------|-----------|-----------|
| 年度 \ 類別     | 總收入       | 總支出       | 赤字        |
| 1971-72     | 46,798.06 | 21,680.30 | 25,117.76 |
| 1972-73     | 42,360.13 | 10,177.60 | 32,182.53 |
| 1973-74     | 89,293.42 | 25,952.80 | 63,340.62 |

### 16.3 流動醫療求診者之回憶

移民加拿大多年的鍾炳基先生小時候居於竹園村，五十年代初一場火災，他與家人得以搬進橫頭磡徙置區，而他就是在那裡發現公立醫院派出的及基督教團體營運的流動醫療服務隊。少年的鍾炳基尤其記得在基督教醫療隊看病的情況：「進去會有人與病人祈禱、祝福，然後打針，便可以離開。那時很奇怪，我記憶中不論什麼病都是在大腿打一針，把褲子拉低一點打針便可以，好像很神奇，就沒事了，嘔吐肚痛、頭暈，都是這樣的做。」<sup>557</sup>

除非如前述的分科醫療車，流動醫療隊一般醫治傷風感冒等輕症，無法處理更為嚴重的情況。鍾炳基說：「最嚴重的是骨科跌倒，需要打石膏，照 X 光，醫療服務隊無法醫治，所以那時候要找跌打醫生，而打開報紙隨便都會找到。一般來說，婦科、奇難雜症、骨科跌打就會到油蔴地掛有招牌的醫館診所去看，那個時候不會講究是否有牌的。」

雖然他的醫療體驗並非來自天主教機構，但仍可反映出社會狀況。正如本章開首的概況介紹，在五十至七十年代，報紙上醫藥廣告確實盛行。以《工商日報》1955、1965 及 1975 三個年份每月 1 日的醫藥分類小廣告作簡單統計，1955 年每月 1 日的廣告數量平均為 11.9 則，1965 年平均為 25.2 則，1975 年的平均為 15.2 則。<sup>558</sup>

### 16.4 取締流動診療車的政策爭議

然而，政府 1963 年通過於 1964 年 1 月 1 日實施《診療所條例》，使流動診療車的存廢成為爭議，因為有關條例包括「在 1967 年 12 月 31 日後，不得對在車輛（不論其能否移動）上營辦的診療所，或對在任何時間曾經是車輛的處所內營辦的診療所批予豁免」。<sup>559</sup>醫務衛生署的理據為：部分流動車已不能夠行駛，祇是擺在一處，有些甚至機器及車胎也已被拆去，失卻流動的意義。此外，車內兼有診症及配藥的空

間太狹窄，又要從附近樓宇取電，有安全隱患。當局同時表示已加緊在徙置區及新區物色地點，讓原有診療車的團體繼續開辦廉價診療所。

1967 年全港有五十二部診療車，不過當局提供的地方，是以營辦團體作單位來抽籤決定，故此各方對此政策反應不一，在條例通過之後及生效之日，甚至 1968 年停辦前，都仍有反對聲音，認為當局操之過急，未有考慮到病人的需要。如黃大仙區若以六千人有一名醫生的比例，該區應有二十名以上，實際上卻寥寥無幾。<sup>560</sup>

天主教會 1967 年只有三個流動診療所，七十年代開始減少，至 1976 年再無此項目統計，可以推想原因一方面是當局加強對醫生註冊的監管，逐步淘汰仍未註冊的「難民醫生」，以及未登記的流動和固定廉價診所，教會亦需遵守有關規定。另一方面是七十年代香港經濟向上，從部分口述歷史受訪者口中可知，西醫診所數目和選擇增加，也不介意付費向私家醫生求診，自然對流動醫療設施需求大減。

### 17.1 香港明愛的源起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多次的戰亂和政局變化，大量難民南下來港，為香港帶來很多挑戰。當時香港政府沒有足夠資源處理人口急速增加帶來的民生問題，故此很倚重非政府組織的服務和幫助，特別是天主教不同修會的服務。香港明愛<sup>561</sup>的前身稱為「天主教社會福利會」（下稱「福利會」），始創於1953年7月1日，最初為公教進行社<sup>562</sup>屬下的一個辦事處。當時福利會的主要職責是統籌天主教會不同團體為難民開辦的福利工作，例如物資派發、醫療照顧等，令在同一地區的服務不會重覆，又或遺漏了需要幫助的人。1955年3月福利會加入國際明愛及國際天主教移民委員會，並於1958年6月獲白英奇主教批准福利會章則，成為香港教區專責社會福利的機構。1955年的《香港天主教手冊》裡介紹：「天主教福利會自認為是間接的傳教工作。這種工作表示出天主教會是在進行，向不認識教會的人表示出教會關於形哀矜工作的觀念。愛德的言詞是人人都了解到。」<sup>563</sup>1960年末，福利會機構分拆為二：「香港明愛」和「香港天主教社會福利會」，「明愛負起協調、推進、及擴展社會服務，直接對教區負責；而天主教社會福利會則在各修會的福利活動上，負起調協的作用」。<sup>564</sup>由於沒有政府資助，1961年明愛舉辦首屆四旬期募捐及全港性籌款活動——明愛周（即今明愛周年賣物會前身）。期後教區每年舉行四旬期運動，為明愛社會服務籌集資金。1964年開始，明愛家庭服務和明愛醫院陸續獲得政府資助。

到了七十年代初，難民潮已停下來，但社會仍然有很多窮困人士需要支援，只是需求不再著眼於物資派發等簡單服務，而是更專業化的社會發展。因此，徐誠斌主教（1920-1973）於1971年7月解散福利會，

同時擴大明愛的理事會和目標。從此，香港明愛便成為香港教區唯一的官方社福機構，負責安排、改善和協調社會服務。從 1953 年開始，機構名稱經歷多次修改，英文法定名稱在 1966 年定為 Caritas Hong Kong，而中文法定名稱遲至 1974 年才易名「香港明愛」。<sup>565</sup>



明愛 70 周年展覽展示籌款抽獎卷（攝於 2023 年）

談到香港明愛的成長，不得不提及五六十年代的兩位功臣，他們是華德中蒙席和力理德神父，曾先後擔任明愛主席一職。

## 17.2 華德中蒙席

德國出生的華德中蒙席（Monsignor Charles Herman Vath，1909-1974）<sup>566</sup> 二十歲時來中國推廣德國拜耳公司的業務，先後在上海、廣州和內地其他地方工作，工餘時在當地的聖堂熱心服務，1948 年棄商修道，在羅馬伯達學院（Beda College）修道，期間認識了幾位終生的朋友和支持者，包括國際明愛創辦人卡爾·拜耳蒙席（Monsignor Karl Bayer）、德國主教團社會援助基金會的高列弗·多辛蒙席（Monsignor Godfrey Dossing）和德國明愛主席喬治·許澤勒蒙席（Monsignor Georg Huessler）等。<sup>567</sup> 後來他加入香港教區，

於 1952 年祝聖為神父後回港服務，首個重要任務就是籌備 1954 年的聖母年慶典，在加路連山道球場舉行大型集會，為香港教區大規模慶典開創先河。其後，他獲任命為公教進行社社長和英文公教報 *Sunday Examiner* 的編輯。當時公教進行社轄下包括明愛（時稱福利會）。華神父接任社長一職時，公教進行社財政緊絀。面對不斷湧入香港的難民，他沒有選擇縮減服務，反而發展和擴大服務範圍，致力幫助改善窮人的生活。這充份顯示他的遠見和協調能力，令人心悅誠服。<sup>568</sup>

華德中蒙席（圖）曾多次外訪歐美向當地教會募捐，1954 年明愛獲得的第一個慈善救助基金來自德國，批核人正是多辛蒙席。原因不單單是因為他們彼此相識，也不僅基於募捐提案出色，更重要的是華德中蒙席展現了他是一個值得信賴和務實的人，具備必要的規劃和領導技能來管理和落實提案、滿足香港的牧靈需求。他有遠見，認為人天性渴望不斷改善，只要透過鼓勵、培訓和彼此尊重，人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命運。同時間他明白服務人除了心態，還需要能力。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已聘請外國社會工作和幼兒工作的專家來港培訓員工。這些看法為明愛奠定了明確的發展方向和服務精神。他預期香港難民數目日增，需要興建醫院和社會服務中心<sup>569</sup>，好能照顧貧困人士。1959 年為聯合國世界難民年，他成功從德國籌得款項三千五百萬德國馬克來開展醫院和服務中心：包括 1961 年成立的香港仔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1963 年開設的濟貧醫院（即明愛醫院）等，為市民提供托兒、家庭服務、醫療和學習進修的服務。正如明愛醫療服務部現任部長雷操爽醫生指出：「早期明愛醫院不像典型政府醫院規劃整齊，原因是當年華神父出外籌集資金，回港後就按籌得多少資金便興建多少醫院設施，於是形成這裡一座，那裡一座」。<sup>570</sup> 從早期明愛醫院分散的建築群背後，可以看到華德中蒙席為明愛四出籌募資源所付出的辛勞，無怪乎一些文章標題把他稱作「為香港行乞的乞丐（a beggar for Hong Kong）<sup>571</sup>」。



1961 年他獲教宗授予「蒙席」名銜，同年三月，公教進行社社長一職由當時的徐誠斌神父接任，使華蒙席得以專注社會福利工作，令明愛的發展一日千里。除了香港的職務，他同時擔任德國主教團社會援助基金會駐遠東區代表（1961-1965），需要經常出差視察，確保基金會的捐助項目能適當執行。他傑出的貢獻亦獲得外間認同，獲得德國政府授以大十字勳章，於 1970 年又獲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頒授 CBE 勳銜。1968 年他應德國主教團的邀請，回國主持德國天主教會的援外工作，不得不離開他用心建設的香港明愛機構。1974 年他於德國病逝。

### 17.3 明愛的「眾人老寶」<sup>572</sup>——力理德神父

宗座外方傳教會士力理得神父<sup>573</sup>於 1956 年從意大利來港，初時在堂區和公教青年會擔任牧民工作。1959 年，他被委派協助華德中蒙席管理和發展明愛機構，兩人合作無間，致力援助社區中窮困階層和從內地湧入的難民。當時力神父負責全力計畫建設多元化社區服務中心，包括托兒所、青少年及社區服務。<sup>574</sup>1968 年，華德中蒙席返回德國服務，力神父接任明愛總裁一職，之後數十年盡心竭力策劃和領導明愛，開辦切合時代需要的社會服務。早在八十年代明愛已致力援助弱智人士、老人、露宿者和開展青少年服務，明愛機構的服務在香港日漸獲得社會認同，力神父功不可沒。



年青的力理得神父（右一）（相片由宗座外方傳教會田英傑神父提供）

1987年，力神父先後獲得英國 OBE 勳銜和德國功績榮譽十字勳章，獲勳銜時他表示這榮譽應該屬於明愛機構全體員工。這不是他客氣的體面說話，而是反映他一貫謙遜、關愛別人的性格，和他對愛人助人的體會。他從未將社會學博士的頭銜印在名片上，他接受《公教報》訪問時提及：「福音中曾提到人們憑好的果子來辨識結果的是一棵好樹；同樣，香港人也憑明愛的服務，來認識明愛以及認識基督精神。所以，明愛高層職員不僅每年開會檢討過去與計畫將來，更要以身作則，為基層的員工立下好榜樣，使他們明白關心別人的意義所在，瞭解到『愛主』和『愛人』是不可分割的」。<sup>575</sup> 他認為，「對窮人的真正貢獻，是幫助他們成長……明愛相信自己的使命，有自己的特恩，藉著對人的關心，尤其是對貧窮、有需要的人的關心，這種奉獻精神是來自福音，是為基督作見證。在香港社會，藉著明愛，使人知道教會是關心人的需要。」<sup>576</sup>

明愛退休員工陳若望在《公教報》撰文描述力神父接見員工代表反映意見時，強調在明愛服務，不同職位只是任務和責任不同，沒有階級之分，每位同工享有同等的權利及義務，著他們放心表達。力神父每個周末下午會獨自到長洲明愛營地，與員工一起勞動，星期日在營地舉行彌撒。「力神父雖身居明愛高職，但卻完全沒有半點架子，他謙虛待人，視屬下員工如手足……這位平易近人的力神父，確是明愛的好領導，明愛上下皆稱他為『老實』，由衷地尊敬這位老人家。」<sup>577</sup>

力神父大半生把時間、精神和金錢用作侍奉明愛，甚至把自己的薪金，在扣除交通費用後，全數捐給明愛。原來這位受人稱頌的明愛總裁，在當初知道要被調任到明愛工作，要離開堂區、離開前線的傳教工作時，他哭了。<sup>578</sup> 然而，當他承諾擔任這份工作和使命後，便全心全意去做，以社會服務繼續他的傳教理想，直至 2003 年 6 月在香港病逝。

## 17.4 明愛的醫療服務

明愛的醫療服務宗旨是「為痛苦患病和虛弱的人，設有醫院和診所，使他們付出力能負擔的費用，即得到完善的醫藥照料。」<sup>579</sup> 外界較

為認識的可能是 1963 年開設的明愛醫院，它為長沙灣、深水埗地區經濟、境遇困難的人士提供醫療服務。除了住院服務，明愛醫院於 1966 年加設門診服務。從 1967-68 年度到 1974-75 年度，醫院留院人數由四千人左右增至一萬一千人，門診人數也由十一萬人增加至差不多十八萬人。由此看到，當時政府醫療政策和服務遠遠未能應付龐大的需求，而明愛的醫療服務為病患帶來很大的支援。及至 1991 年，香港明愛把明愛醫院的管理及控制權移交至醫院管理局。

其實除了明愛醫院，早在 1961 年開始，明愛已在不同地區設立社會服務中心，提供托兒所、家庭支援、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如空間、資金和人手許可，多同時開辦診所服務。這些診所有的提供普通科服務，有的提供普通科和牙科服務。附設於明愛服務中心的診所包括：香港仔聖高弗烈診所、堅尼地城若望廿三世診所、東頭邨服務中心診所、太子道聖德肋撒診療所和堅道明愛分科診所。

此外，香港明愛在五十至八十年代醫療和救濟方面的一個更重要角色，是協調教會內各個參與其中的修會或信友團體的服務，避免重覆而浪費資源。它也與不同修會合作開設獨立診所，為部分有需要的修會籌募運作經費，又或在後期接手修會和教友團體未能維持的診所，繼續為貧困人士提供廉價的醫療。例如公教婦女會設於上海街的聖若瑟模範工人診所，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大坑道隆巴第診所，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在打鼓嶺的聖若瑟診所，寶血會主理的坑口聖法俾洛診所，瑪利諾傳教會移交給明愛的牛頭角服務中心診所和荃灣的啟明診所等。除了固定的診所，在六十年代中，明愛獲捐贈流動醫療車，為當時交通不便、人口分散的新界居民提供普通科和牙科醫療服務。後來由於流動醫療服務運作費用高昂，加上香港醫療服務選擇有所改善，到了八十年代流動醫療服務亦已結束。有關以上診所的細節在相關章節已有提及。

按明愛的年度報告，診所是按照《醫院、療養院或留產院註冊條例》165 條或《醫療所條例》343 條設立，每年到明愛普通科診所（不包括明愛醫院門診服務）求診人數由六十年代末七萬多人攀升至八十年

代高峰時的十萬人<sup>580</sup>，當中以東頭村和牛頭角的需求較大。<sup>581</sup> 在六十年代，病人只須付一元診金，如需要藥物或注射，則按物價收費。若經社會工作者或神父介紹的，則只收診金或免除費用。按 1968-69 的年度報告，醫療服務營運費用佔整個明愛超過一半，住院或求診人士獲得免費或減費的百分率高達百分之三十。

雖然明愛醫療服務從六十年代營運費用佔整個明愛超過一半到今天不足百份之一<sup>582</sup>，診所數目由高峰期十多間到現在四間牙科診所，但相信過往的診所和醫院服務已為當時的病人帶來莫大的支援與安慰。明愛未來的各種社會服務事功也會繼續履行當初定下來的使命，如力理得神父所言，社會服務讓人認識明愛，而「明愛是明白愛的意思」<sup>583</sup>，是一份見證。

## 小結

在戰後的二十年，天主教醫療服務仍然是以女修會為主力。在女修會中，從事醫療的人手，是僅次於教育。<sup>584</sup> 教區亦為此成立一個專為女修會的醫療服務小組委員會，包括在診所工作的修女，讓她們互通有無，加強團結。然而，有別於戰前，1946-1969年這時段的醫務工作，還出現了男修會、教友團體，以及香港明愛（前身是天主教福利會）的參與。明愛除了擔當協調角色，同時也作為香港教區的社福組織。這三大類別，至少有十五個團體和組織，既有獨立的診所，也互相合作，並聽從教區主教的差遣，彰顯天主教會「合而為一」的特色，即頭和肢體的關係。

此一時期是天主教診所發展的高峰期，在本地教會史上有著最多的診所數目。這一方面是教會看到當時社會迫切需要而作出的回應；另一方面，部分本身是神父修女的醫護人員，他們因內地政局關係，被驅逐來港。在1947-1968年來港的十四個女修會中，其中就有五個提供醫療服務。相對於十九世紀的「通才」修女，有什麼需要便從事那方面的工作，這時期的女修會更多是「專才」，部分本身的成立是以「傳教」為目的，以「地方」為重，可能從事包括醫療在內的多樣服務。<sup>585</sup> 這些傳教士許多當初是渴望到中國福傳而離鄉背井，在無奈離開之下，部分人選擇逗留在最靠近大陸、同樣是華人的地方——香港。這偶然的歷史時間和空間為香港天主教會創造了特殊的發展機會。原來從事醫療的神父修女自然以一技之長在本地服務，或因自己的醫療知識而特別關注到民眾在這方面的需要。他們並且如教宗訓示，沒有擠在同一地方，而是分散到各個偏僻的地點或難民聚居處。有助產士資格的修女，從接生到嬰兒診所的開設，更是減低孕婦和新生兒的死亡率的一大助力。

從受訪者的口述歷史可看到，這些神父修女透過醫療工作與民眾接觸互動。不過，這種接觸並非直接的傳教。部分是受限於他們身處的環境，像在政府資助的律敦治療養院，聖高隆龐修女是不能在醫院裡傳教；有些則選擇通過關心病人的見證來達到傳教效果。在社會緊迫的需要

下，從事醫療工作的外籍傳教士大多沒時間去兼顧本地語言的學習，一來到了香港便投入服務，或許行動的見證為他們更為奏效。

面對當時的人民難苦窮困的社會環境，教會除了提供醫療服務，照顧民眾的健康，亦派發食糧、日用品，以及提供各種幫助，令部分人欣然入教。相反地，民眾也會送贈土產食品以報答這些醫療傳教士的服務。在診所日常的細節中，既有請來看病的小孩吃糖果，修女們用些小技巧來預知每天工作的繁忙程度，修士因語言溝通不良而幫倒忙，也有病人失救或暈倒的驚險場景，可謂有笑有淚。對於需住院的病人，一些神父和修女還會親自送他們到醫院，又為無力支付住院費用的窮人結帳。另一些修女則為正在處理危急病人的同伴，在聖母像前點燃蠟燭，獻上祈禱，這種團結和宗教氛圍，是世俗診療所沒有的。

此外，基於天主教會的普世性，香港明愛及在本地服務的修會亦得到來自海外教會的幫忙，從藥物、器材到金錢都有。若沒有這些幫助，相信難以達到這段時期的發展高峰。

不過，這些團體營辦的診所發展至後期，隨著政府改善施政，提高福利水平，新市鎮的發展，以及更為嚴格的法例，再加上教會內部的革新，這些天主教診所在七十年代以後，開始面對關閉或轉向其他服務的抉擇。在下一章，會看到更清晰的改變脈絡。

## 註釋

- 1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香港：中華書店，2018），頁 263-270；及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Year Ended the 31st March, 1950*, (nk: Government Printers, 1950), p.4, 11;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s 1959-60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960), p.13.
- 2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Year Ended the 31st March, 1950*, p.7.
- 3 〈本港居民難民佔半〉，《工商晚報》，1949 年 12 月 30 及〈北角難民營生活甚規律〉，《工商晚報》，1949 年 12 月 13 日。
- 4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969), p.14.
- 5 “Medical Department Report: Number of Squatters in Colony Doubled Within Six Month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Apr 25, 1950;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6.
- 6 恩保德神父 (Fr.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 · 1934-2023) 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2023 年 2 月 20 日。
- 7 〈取締霸王屋〉，《工商日報》，1952 年 1 月 21 日。
- 8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Leyden: A.W. Sijthoff, 1955), p.116.
- 9 高添強：〈追尋公屋的發展軌跡〉，收於《文化葫蘆》，<<https://www.hadplushulhk.org/y2-f1>>
- 10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p.50.
- 11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p.117.
- 12 高添強：〈追尋公屋的發展軌跡〉。
- 13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p.123.
- 14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50-1*,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951), p.1.
- 15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50-1*, p.51.
- 16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59-60*, (Hong Kong: Government

- Printers, 1960), p.2, 78.
- 17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Year Ended the 31st March, 1950*, p.23.
  - 18 《工人醫療所通訊》，1952年3月第一期，收於劉蜀永、姜耀麟：《植根基層 70 載：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簡史》（香港：和平圖書，2020），頁 71。
  - 19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Year Ended the 31st March, 1950*, p.17.
  - 20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57-58*,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958), p.25.
  - 21 劉蜀永、姜耀麟：《植根基層 70 載：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簡史》，頁 50。
  - 22 〈聯合國贈香港流動肺病診所由醫務處管理運用〉，《華僑日報》，1951年6月13日，頁 7。
  - 23 《工人醫療所通訊》，1952年3月第一期，收於劉蜀永、姜耀麟：《植根基層 70 載：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簡史》，頁 24。
  - 24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頁 275。
  - 25 鍾炳基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 2022 年 9 月 2 日。
  - 26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頁 275。
  - 27 鍾炳基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 2022 年 9 月 2 日。鍾炳基在其《福傳萬家：六位香港神父的故事》中，與恩神父作口述歷史訪問時，亦提及律敦治療養院的聖高隆龐會修女。
  - 28 政府於 1974 年才立法通過中文的法定地位，但當時的《法定語文條例》仍訂明：「所有法例均只能用英文制定」，一直至 1987 年再修例才要求「所有法例均需以兩種法定語文制定及頒布」。當年華文報章皆稱《醫生註冊條例》為《醫務註冊條例》。
  - 29 LegCo Hansard May, 22, 1957.
  - 30 〈醫務註冊法例修正，社團擬再開會討論〉，《工商日報》，1957年7月6日：“Groups to Confer on Medical Clinics Ordinan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Jan 4, 1964;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10.
  - 31 LegCo Hansard, May 22, 1957.
  - 32 LegCo Hansard, April 16, 1958.
  - 33 LegCo Hansard Dec 31, 1952, and Jan 14, 1953.
  - 34 “Chinese Newspaper Cautioned: Published an Undesirable Medical

Advertisemen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Jun 25, 1955, p.6; “Publishers Admit Printing Undesirable Advertisemen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Jul 5, 1973, p.8; “Convicted for Magazine A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Feb 1, 1983, p.17. All from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35 李偉達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年3月18日。
- 36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p.14.
- 37 Eugene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Diss, 1964), p.152.
- 38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頁 266-267。
- 39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一九五九—一九六〇》（香港：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1960），頁 1。
- 40 “Hong Kong Mourns Pope Pius as Refugee's Sole Symbol of Hope and Freedom,” *NCWC News Service*, Oct 13, 1958,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ns19581013-01.1.94&spos=15&e=-----en-20--1--txt-txIN-hong+kong----->>
- 41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Year Ended the 31st March, 1950*, p.2.
- 42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Year Ended the 31st March, 1950*, p.2, 4.
- 43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p.107.
- 44 LegCo Hansard, July 31, 1963.
- 45 “Around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erald* (1950-1972): Jan 22, 196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10.
- 46 〈為市民健康著想，難民醫生應起用〉，《工商日報》，1960年7月12日。
- 47 LegCo Hansard, July 31, 1963。
- 48 LegCo Hansard, July 31, 1963；及〈管制社團及冒牌醫生經營的診療所，新例明年實施〉，《華僑日報》，1963年8月1日。
- 49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66-67*,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967), p.24.
- 50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1942-2015*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71-272.

- 51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66-67*, p.24.
- 52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70-73*,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973), p.41.
- 53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64-65*,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s, 1965), p.24.
- 54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1942-2015*, p.223.
- 55 劉騏嘉、李敏儀：《長遠醫療政策》（香港：臨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1997），頁 48。
- 56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8），頁 94。
- 57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1942-2015*, p.223.
- 58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 95。
- 59 LegCo Hansard, Feb 12, 1964.
- 60 張學明：〈香港的耶穌會士〉，收於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教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174。
- 61 有關歷史由新界 \ 史研究學者夏思義博士（Dr. Patrick Hase）撰寫，收於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編：《傳道無間：天主教大埔傳教一百五十年》，（香港：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2011），頁 213。
- 62 田英傑著，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1983），頁 239，246-249。
- 63 〈寶血會修女談日佔時期的日子〉，《公教報》，2015 年 9 月 20 日。
- 64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50-254。
- 65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192。
- 66 〈香港天主教會的福利事業〉，《香港天主教手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55），頁 276。
- 67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V-01-09-2。
- 68 徐錦堯：〈普世救恩——天主教的救贖觀，新答客問〉，<<https://fr.luketsui.idv.hk/archives/1329#p24>>
- 69 〈陳繼容博士電台短講〉，樂山樂水網站，2015 年 5 月 7 日，<<https://mountainandwater.blog/2015/05/07/radio-talk-by-dr-anna-chan-8/>>

- 70 教區的相關統計由 1934 年開始，1934-1947 年沒有統計。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1931-1969 年社會福利統計〉，<<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Online%20Exhibition/CCSWHK.htm>>
- 71 對照 1958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內所列診所十二間，1958 年的綜合統計顯示只有兩間，與 1957 年一年之間相差十二倍，治理病人卻不比 1957 年少，達五十一萬人次，明顯有誤。
- 72 《香港天主教手冊》的統計反映前一年度的數字，其中 1954 及 1955 年的手冊沒有數據。
- 73 “Catholic Work for Refugees in Hong Kong,” *Sunday Examiner*, May 13, 1960.
- 74 “Catholic Work for Refugees in Hong Kong,” *Sunday Examiner*, May 13, 1960.
- 75 有關統計包括了主日道理班，視之為社會福利工作是否合適，值得商榷，故此處未列出所有項目。
- 76 劉蜀永、姜耀麟：《植根基層 70 載：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簡史》，頁 29，58-59。
- 77 〈香港男女修會一覽表〉，《公教報》，1970 年 2 月 27 日。
- 78 華僑日報 1957 年出版的《香港年鑑》，內裡的香港細明全圖稱為照鏡灣。
- 79 劉義章：〈宣教士在調景嶺難民營的醫療服務〉，收於劉義章、黃文江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頁 115，126。劉義章在文章註釋中，指連尼自縊而死有不信之處，其經營及自殺始末，參閱香港歷史檔案館檔案編號 PRO/REF/193 Sub-file。另參看：〈蹈海誤傳成自縊——調景嶺果真曾「吊頸」？〉，西貢旅遊網：<<http://travelinsaikung.org.hk/historical/view.aspx?menu=15&Nid=38>>
- 80 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in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eds.,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1: Historical Material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2009), p.7.
- 81 更多關於耀漢會成立過程及精神，參看劉賢：〈從若翰到耀漢——中國本土男修會耀漢小兄弟會的成立及其修會精神（1928-1934）〉，《基督教文化學刊》，2020 年春，第 43 輯，頁 230-250。
- 82 〈香港男女修會一覽表〉，見《公教報》，1970 年 2 月 27 日。唯一的會士相信就是張斐理修士，他一直服務至 1973 年在港去世。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張文生修士（斐理），<<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P-Chang.htm>>。
- 83 董文學神父於 1835 年來華，在河南湖北山區傳教，三年後因清廷禁教令而被捕，

最終被判處死刑，死前仍跪著祈禱。教廷於 1889 年列他為真福，1996 年宣他為中國教會首位聖人。

- 84 劉賢：〈從若翰到耀漢〉，頁 233。南京主教羅文炤（也寫作羅文藻）祝聖為國籍主教，已是 1685 年之事。
- 85 陳聰銘：〈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對民國政治的觀察與醫療福傳行動〉，《輔仁宗教研究》第 43 期（2021 秋），頁 81-82。
- 86 劉賢：〈從若翰到耀漢〉，頁 249。
- 87 更多關於雷鳴遠神父的醫療活動，參看陳聰銘：〈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對民國政治的觀察與醫療福傳行動〉，頁 67-100。
- 88 陳聰銘：〈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對民國政治的觀察與醫療福傳行動〉，頁 87。
- 89 更多關於耀漢會在調景嶺的歷史，參看：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p.6-33.
- 90 王裕凱等著：《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香港：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1960）頁 53-54。因後來更多人入住，包括非難民，1961 年調景嶺重新劃分為十二區，天主教會所在位置改稱第十區。
- 91 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p.11.
- 92 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p.13.
- 93 具體位置可參看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2, Reprint), p.53.
- 94 王裕凱等著：《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90-92。
- 95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of Hong Kong*, p.131.
- 96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張文生修士（斐理），<<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FP-Min.htm>>
- 97 何若庸：〈送別——悼念張文生修士〉，見《公教報》，1973 年 4 月 20 日。
- 98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閔方鮑修士，<<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FP-Min.htm>>
- 99 1958-1973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資料。
- 100 本節為張寶英女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02 年 9 月 19 日。
- 101 指講授教會的信仰。
- 102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p.157；及王裕凱等著：《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53。

- 103 王裕凱等著：《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56。「法國醫院」是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主辦的醫院的俗稱。在港島區灣仔草創後遷至銅鑼灣的聖保祿醫院曾用上「法國醫院」這名字；但 1940 年才在九龍太子道成立的聖德肋撒醫院，亦因修會的來源地同樣俗稱為法國醫院。不過，從引文中指要運送到碼頭及上落船車，應是指聖保祿醫院。
- 104 1956-1966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資料。
- 105 Whitworth Digital Commons 標示照片拍攝時間為 1951-1958 年間，由於修女是 1954 年才抵港，故時間範圍應在 1954-1958 年之間。至於建築物地標，鍾紹華先生表示因當時尚未搬進調景嶺，可能有誤。
- 106 Canoesses of St. Augustine 亦譯作「聖奧斯定頌經團」，本文跟隨《香港天主教手冊》的紀錄。
- 107 Maria Claeys, ed. *History of the Mission in China (1923-1954)*, (Taipei: ICM-Taiwan, 2012 Reviewed Edition), p.1. 引文原為英文，由天主教研究中心翻譯。
- 108 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p.7. 香港教區其後放寬對兩個修會的規定，修女們於 1965 年在黃大仙區開辦溥仁學校；另見本章〈聖母聖心會〉一節。
- 109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p.181-182.
- 110 甘美雅修女 (Sr. Benedict Amutha, ICM) 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 111 根據修會的舊照片，修女既有黑色會衣加黑色硬頭紗，也有白色會衣加黑色硬頭紗。
- 112 信函沒有署名，原文為英文，由天主教研究中心翻譯。
- 113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羅貞德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L-Rotty.htm>>
- 114 見於修會歷史：Maria Claeys, ed. *History of the Mission in China (1923-1954)*，由甘美雅修女提供。
- 115 關於聖母聖心傳教女修會的更詳盡歷史，參閱：Caroline Boermans and Yvonne Van Hoof, "The Missionary Sisters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ICM), in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eds.,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1: Historical Material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2009), pp.431-456.
- 116 1962 年吹襲香港的溫黛，是戰後至今最強烈的颱風，也是受災最嚴重的一次，釀成一百八十三人死亡、三百八十八人受傷、一百零八人失蹤。
- 117 鍾紹華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 118 陳婉貞女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年2月20日。
- 119 James Smith, William Downs, "The Maryknoll Missio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9 (1979), p.32.
- 120 劉義章：〈宣教士在調景嶺難民營的醫療服務〉，頁118-123。
- 121 見將軍澳醫援會1974-75年度報告。
- 122 林蔭：《日落調景嶺》（香港：天地圖書，2007），頁73-74。
- 123 林蔭：《日落調景嶺》，頁82。
- 124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伯爾納鐸瑪利貝克維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BM-Broqueville.htm>>
- 125 蕭曉紅：〈戰後香港天主教社會服務——以香港明愛為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2），頁3。「天主教香港教區在1953年成立社會服務團體，到了1957年「香港公教社會福利會」成立，1958年英文名稱定為 Hong Kong Catholic Social Welfare Conference, Diocesan Caritas Organization，到了1961年10月正名為「香港明愛」（Caritas Hong Kong）。1960年末，香港天主教社會福利會由原來組織分拆出來，與明愛分家，主力協調各修會的福利活動。1971年徐誠斌主教解散天主教社會福利會，擴大明愛作為天主教社會服務的代表機構。」
- 126 申頌詩著，馮彩華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1848-1998）〉，頁51-54；及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65-66。
- 127 〈大坑道山邊木屋區 福利會設立診療所〉，《公教報》，1964年2月14日。
- 128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香港檔案館館藏：SPC Hong Kong Province Annual Report 1966.
- 129 湯漢：《在教區一起走過的日子（二）》，（香港：公教真理學會，2002，頁141。
- 130 〈李金玉修女安息主懷 生前照顧病人與兒童〉，《公教報》，2007年3月18日
- 131 陳秀嫻博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年12月8日。
- 132 申頌詩著，馮彩華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1848-1998）〉，頁54。
- 133 蕭曉紅：〈戰後香港天主教社會服務——以香港明愛為例〉，頁56-57。據聖保祿修會1966年的年度報告，診治病人數目僅為104人，由於該份檔案中，只有病人和探訪家庭數字為手寫填上，而明愛報告為3,103人，百位數之後相近，故有可能是手民之誤。

- 134 申頌詩：〈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頁 54。
- 135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21), 65-66.
- 136 有關歷史由新界史研究學者夏思義博士 (Dr. Patrick Hase) 為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一百五十周年撰寫，收於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編：《傳道無間：天主教大埔傳教一百五十年》，（香港：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2011），頁 135-136。
- 137 大埔墟內的大埔公路於 1936 年更名為大埔大街，及更再更名為廣福道。
- 138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編：《傳道無間：天主教大埔傳教一百五十年》，頁 126-154，196-202。
- 139 趙惠文：〈大埔元洲仔遊夜龍考察報告〉，《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 84 期（2016），頁 15；及《傳道無間》，頁 197-198。
- 140 廖馮麗屏女士、廖偉盈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8 日。
- 141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梁志修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S-Leung.htm>>
- 142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鄭瑞琮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E-Cheng.htm>>
- 143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香港檔案館館藏：Diary of Mother Bernard dated 11 May 1961.
- 144 申頌詩：〈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頁 59-60。
- 145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香港檔案館館藏：Letter from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Hong Kong) to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dated 18 October 1961.（按：來往公函指診所地址是廣福道 97 號，而《傳道無間：天主教大埔傳教一百五十年》記載鴨毛寮聖堂地址即現今廣福道 135、137 號，估計兩者差異與不同年代的路段變更有關。診所有幾個中文名稱：六十年代名為「海星施診所」，到了七十年代被稱作「海星診療所」。）
- 146 李鴻恩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9 月 20 日。
- 147 桑德嵐神父 (Fr. Narciso Santinon, PIME, 1916-1995) 於 1962-1987 年先後在大埔兩個堂區服務。天主教教區檔案處：<<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N-Santinon.htm>>
- 148 廖偉盈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8 日。
- 149 1963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頁 298 及香港聖保祿女修會檔案館館藏：

Letter from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Hong Kong) to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of Hong Kong dated 18 October 1961.。

150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香港檔案館館藏：Letter from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Hong Kong) to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dated Oct 18, 1961.

151 1965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頁 315。

152 〈香港馬會捐贈大埔診所啟用〉，《華僑日報》1957 年 7 月 6 日，頁 10。

153 即蓋上幾塊板當作座位的貨車，載客來回墟市和鄉村。

154 廖偉盈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10 月 19 日。

155 1976 年政府宣佈發展大埔新市鎮。政府在元洲仔一帶進行大規模的填海，元洲仔漁民被遷徙到其他地方，其中很多漁民入住大元邨。在原來地方與部分填海土地後來興建了廣福邨和宏福苑。

156 指糞便，因為艇戶棚屋沒有洗手間，排泄物直接排到海裡。

157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香港檔案館館藏：SPC Hong Kong Province Annual Report, 1966.

158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陳方善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A-Tin.htm>>

159 1970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頁 335。

160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香港檔案館館藏：SPC Hong Kong Province Annual Report 1975.

161 陳昭利：〈桃園先賢志略：奉獻桃園醫療的臺灣德雷莎修女——馬玉芳〉，《通識論叢》，第 19 期（2016），頁 1-6。

162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梁伯望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B-Leung.htm>>

163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陳保祿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PM-Chan.htm>>

164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香港檔案館館藏：SPC Hong Kong Province Council Report dated March 11, 1970 & Nov. 7, 1970.

165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香港檔案館館藏：SPC Hong Kong Province Council Report dated May 16, 1974.

166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香港檔案館館藏：SPC Hong Kong Province Annual Report 1976.

167 黎志邦：《從前有個香港仔》（香港：香港人出版有限公司，2018），頁 48-51。

- 168 黎志邦：《從前有個香港仔》，頁 76-87。
- 169 阮少林先生、蔡錦妹女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2 日。
- 170 黎志邦：《從前有個香港仔》，頁 84。「今香港仔大道（前稱香島道）還是瀕海的，近 38 號一帶，即今日香港仔工業學校西門雙喜大廈附近，有十五間兩層高的磚結構民房，居民稱之為『十五間』」。
- 171 劉超賢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7 日。
- 172 梁卓偉：《大醫精誠》（香港：三聯書店，2017），頁 176-181。
- 173 香港仔坊會：《南社之音》，2002 年 5 月第 119 期。香港仔坊會，前稱為「香港仔街坊福利會」，成立於 1950 年。1958 年當屆理事長羅桂祥先生遊說馬會捐款二十五萬元建立香港仔賽馬會診所，診所於 1960 年啟用。香港仔坊會本身也曾設立西醫診所，提供廉價醫療服務，診金連藥費收取三元。
- 174 香港仔聖伯多祿堂教友（姚秀卿女士、何送妹女士、陳玉英女士、鄧耀華先生、林少芳女士、廖幼冰女士和何瑪利女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2 日。按：因為習慣和歷史原因，提及修女時，受訪者多混合使用「姑娘」和「修女」兩個稱呼。
- 175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理雅各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G-Zilioli.htm>>
- 176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s—Hong Kong 1910–2000, Volume Three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2003), 169-170. 及 1957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57），頁 170、256。按：雖然手冊上學校和診所的地址相同，所有受訪者肯定說它們是分開的。估計當時學校和診所是毗連而建的建築。此外，在培德學校建校前，沒有資料可以追溯香港仔嘉諾撒修會診所或學校服務的正式名稱。
- 177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1860–2000）〉，頁 142、153。
- 178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曾玉卿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J-Tsang.htm>>
- 179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彭愛金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C-Pan.htm>>
- 180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白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M-Bertola.htm>>
- 181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Sr. Emilia Zimbaldi，<<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E-Zimbaldi.htm>>

- 182 "Madonna, Floating Clinic for Aberdee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February 23, 196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4. 關於瑪道納海上診療所，另見本書〈公教婦女會〉及〈流動診療所〉篇章。
- 183 1963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頁 295，及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1860-2000）〉，頁 148。
- 184 梁啟智：〈尋找香港仔船塢原址〉，《獨立媒體》，2022 年 2 月 7 日。<<https://shorturl.at/IBOQU>>。船塢最初建於 1857 年，名為夏圃船塢，後來被黃埔收購並發展為香港仔旱塢，並逐漸躋身本港四大船塢之一。隨著時間的推移，船塢的重要性逐漸下降，並在 1972 年停止運作。直到 1982 年，船塢拆卸，原址發展為今天的香港仔中心。
- 185 受訪者記憶深刻，那些『女仔』就是公教婦女聯誼會的會員，當時以外籍女性居多，而帽子不同是因為修女會衣款式不同。
- 186 黎志邦：〈從前有個香港仔〉，頁 94-97。按：香港政府決定遷徙香港仔涌尾的棚屋居民和艇戶。1966 年 2 月，仍有 2000 艘住家艇，但在同年 9 月時，已經全部被清拆，艇戶被安置到區內的石排灣邨居住。其後，田灣徙置區（1966 年落成）、黃竹坑邨（1968 年）和華富邨（1969 年）等屋邨相繼落成入伙，區內其他艇戶得以遷往岸上居住。
- 187 1970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還有記錄瑪道納海上診療所，到了 1973 年手冊上已沒有記載，估計海上診療所應該在 1971-1972 年間停止服務。
- 188 中心初期名稱是「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後期改名「香港仔明愛服務中心」。因為習慣和歷史原因，受訪者和一些資料會把兩個名稱混合使用。
- 189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142。
- 190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盧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l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R-Bescape.htm>>
- 191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153。
- 192 《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十週年特刊》，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1971 年。
- 193 按：以前的習慣中式稱呼地下為一樓，第二層為二樓，依此類推。英語稱第二層為 1st floor。
- 194 1966 年 4 月《公教報》報導，羅理基爵士和林肇真醫生因服務教會和人群有功，獲教廷冊封及授予「為教宗為教會」勳章。更多關於林肇真醫生，另見本章公教信徒善會一節。
- 195 鍾炳基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9 月 2 日。

- 196 《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十週年特刊》，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1971 年。
- 197 《香港仔明愛服務中心銀禧特刊》，香港仔明愛服務中心，1985 年。
- 198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周寶琮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G-Chow.htm>>
- 199 按 1998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香港仔明愛聖高弗烈診所地址為田灣街二十號。1999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診所改名為香港仔明愛診所，地址也改為田灣街二十二號。
- 200 詹秀璉：〈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香港的使命及貢獻〉，頁 80。
- 201 Gianni Criveller, "The Canossian Sisters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Protection, Education, and Emancipation of Women," In Cindy Yik-Yi Chu ed.,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Bible, and Evangelization in China*, ed. Cindy Yik-Yi Chu,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2), p.21.
- 202 〈關於我們〉，香港明愛網頁，<<https://www.caritas.org.hk/zh/about/litsoh/>>
- 203 見拯望會（中國印度）網頁：<<https://www.societyofhelpers.org/mission>>
- 204 荃灣葛達二聖堂編：《荃灣葛達二聖堂堂區通訊》，1970 年 9 月，頁 2。
- 205 荃灣葛達二聖堂編：《荃灣葛達二聖堂堂區通訊》，2012 年第 20 期，頁 24。
- 206 顧衛民：〈天主教東傳與上海徐家匯地區〉，《文化雜誌》，2002，頁 112-114。
- 207 *Hong Kong Statistics 1947-1967*, Hong Kong Government,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hist/1961\\_1970/B10100031967AN67E0100.pdf](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hist/1961_1970/B10100031967AN67E0100.pdf)>
- 208 荃灣葛達二聖堂編：《荃灣葛達二建堂特刊》，1971 年 12 月，頁 4。
- 209 《香港故事（第 18 輯）第二集：荃城》，香港電台，2011-12-19，2:36-2:5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IFfGoe\\_AY](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IFfGoe_AY)>
- 210 David Faur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suen Wa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4 (1984): 87。
- 211 〈荃灣人昔日要到九龍求醫？ 仁濟籌建飽歷政經困阻〉，《香港經濟日報》2019-11-19：<<https://shorturl.at/FJKM2>>
- 212 是谷穗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5 月 15 日。
- 213 朱三妹女士（曾太）和曾麗珊小姐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10 日。
- 214 〈天主教女修士主辦 荃灣診療所開幕〉，《華僑日報》，1955 年 7 月 8 日。

- 215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p.164.
- 216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法平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AM-Frapier.htm>>
- 217 〈美政府捐款興建荃灣啟明診所〉，《華僑日報》，1960年5月4日。
- 218 天佑幼稚園和荃灣明愛護理安老院分別是在1964年和1980年代初建立。
- 219 吳金桂女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年3月12日
- 220 〈學校簡介—歷史〉，天佑小學網頁：<<https://www.mpschool.edu.hk/itschool/php/webcms/public/index.php?refid=3387&mode=published&lang=zh>>
- 221 Anne Mae Buckley, "Medical Missioner in Hong Kong: Sister Juliana Dusts Off Her Doctor's Sign," *The Catholic Advocate*, Vol. 12, No. 32, 1 August 1964: p.7,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a19630801-01.2.73&srpos=6&e=-----en-20--1--txt-txIN-+Helpers+of+the+Holy+Souls%2c+hong+kong----->>>
- 222 荃灣商會坊眾診療所，1953年7月開幕，1966年聘梅健周醫生在那裡診症，到2014年退休，診所也隨之結束。
- 223 Bessie Casey, "Marquette's Medical Missionaries," *The Linacre Quarterly*, Vol 33, No. 3 (August 1966): 282-288.
- 224 "Hong Cong Clinic: Home for Missionary Doctor," *The Catholic Advocate*, Volume 18, Number 10, 27 February 1969: p.12,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a19690227-01.2.74&srpos=4&e=-----en-20--1--txt-txIN-+Helpers+of+the+Holy+Souls%2c+hong+kong----->>>
- 225 "Elizabeth Nun-Doctor Flies to Hong Kong," *The Catholic Advocate*, Volume 9, Number 19, 5 May 1960: p.13,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a19600505-01.2.132&srpos=2&e=-----en-20--1--txt-txIN-+Helpers+of+the+Holy+Souls%2c+hong+kong----->>>
- 226 Anne Mae Buckley, "Medical Missioner in Hong Kong Sister Juliana Dusts Off Her Doctor's Sign," p.7.
- 227 "Hong Cong Clinic: Home for Missionary Doctor," p.12.
- 228 Teresa：〈憶念拯望會的Sister Juliana〉，《証聲》，2013年第6期，頁10：<[https://cmartyrs.rcav.org/CMVoice/13-11-12/13-11-12\\_P10.pdf](https://cmartyrs.rcav.org/CMVoice/13-11-12/13-11-12_P10.pdf)>
- 229 陳秀嫻博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年12月8日。

- 230 1968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
- 231 "Missionary is Hong Kong Bound", *The Catholic Advocate*, Volume 13, Number 38, 10 September 1964, 11,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a19640910-01.2.109&srpos=2&e=-----en-20--1--txt-txIN-Sister+Mary+Juliana%2c+hong+kong----->>
- 232 "Medical Missioner in Hong Kong Sister Juliana Dusts Off Her Doctor's Sign," p7.
- 233 荃灣葛達二聖堂編：《荃灣葛達二聖堂堂區通訊》，2012 年第 20 期，頁 28。
- 234 1982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頁 344。
- 235 曾麗珊小姐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10 日。
- 236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施德寶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ME-Shih.htm>>
- 237 "Hong Cong Clinic: Home for Missionary Doctor," p.12.
- 238 Teresa：〈憶念拯望會的 Sister Juliana〉，頁 10。
- 239 〈荃灣人昔日要到九龍求醫？ 仁濟籌建飽歷政經困阻〉，《香港經濟日報》，2019-11-19。
- 240 〈戴麟趾夫人診所今春完成啟用〉，《工商晚報》，1966 年 1 月 20 日，頁 3。
- 241 〈荃灣仁濟醫院揭幕港督明日主持儀式〉，《工商晚報》，1973 年 10 月 23 日，頁 7。
- 242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pp100-101, 105-106.
- 243 香港明愛：《香港明愛周年報告 2010/2011》，（香港：香港明愛，2011），頁 44。
- 244 香港明愛：《香港明愛周年報告 2011/2012》，（香港：香港明愛，2012），頁 44。
- 245 香港明愛：《香港明愛周年報告 2020/2021》，（香港：香港明愛，2021），頁 52。
- 246 "Hong Cong Clinic: Home for Missionary Doctor," p.12.
- 247 由於傳教會已多年沒有派遣修士到港服務，在《香港天主教手冊》中，美國天主教傳教會所用的別稱是「瑪利諾神父」。為免誤會是某一神父，並為與瑪利諾女修會作清楚區別，本研究以「瑪利諾會」稱之。
- 248 Angelyn Dries, "The Foreign Mission Impulse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1893-1925,"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 15 No. 2 (1991): 61-62.

- 249 William Galvin,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Hong Kong 1920-2010* (nk: 2011), p.2.
- 250 William Galvin,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Hong Kong 1920-2010*, Introduction.
- 251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18-1975* (nk: 1978), p.1-2.
- 252 William Galvin,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Hong Kong 1920-2010*, p.12;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76-1980*, p.6, 208.
- 253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頁 127-128。
- 254 Jean-Paul Wiest, *Maryknoll in China: A History (1918-1955)*, (Armonk, NY: M.E. Sharpe, 1988), p.133. 關於瑪利諾會醫療傳教發展的詳情，參閱頁 131-138。
- 255 "First Annual Meeting Draws Delegates from Many Religious Communities—Speakers Tell of Origin and Growth of Organization," *N.C.W.C. News Service*, Sept 7, 1925.
- 256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頁 96。
- 257 教會提出的兩項傳統善工，合稱「神形哀矜」，「哀矜」是指救助別人肉身和靈魂必要的愛德行為。其中「有形哀矜」可分七個方面的物質援助慈善工作，包括食饑者、飲渴者、衣裸者、探病者、舍旅者、贖虜者、葬死者；「有神哀矜」則為滿足人們精神上的需要。
- 258 Jean-Paul Wiest, *Maryknoll in China: A History (1918-1955)*, pp.131-132.
- 259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頁 147。
- 260 William Galvin,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Hong Kong 1920-2010*, pp.52-53.
- 261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頁 163。
- 262 瑪利諾檔案館資料，摘自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頁 160-161。
- 263 Bill Surface and Jim Hart, *Freedom Bridge: Maryknoll in Hong Kong*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6), p.89.
- 264 Bill Surface and Jim Hart, *Freedom Bridge*, pp.89-90, 104.
- 265 Ayako Fukushima,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atholic Churches in Hong Kong From 1945-1955," *AIJ J. Technol, Des.* Vol. 25, No. 59 (Feb 2019): pp.467-472.
- 266 蘇衍慧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1 年 8 月 21 日及 2023 年 8 月 23 日。

- 267 呂茱莉：〈悼念涂挽靈神父〉，《公教報》，1996年6月14日。
- 268 Cindy Yik-Yi Chu, "From the Pursuit of Converts to the Relief of Refugees: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Hong Kong," *The Historian (Kingston)*, Vol. 65, No. 2 (2002): p.367.
- 269 "Maryknoll Sister Shows People Their Importance," *The Catholic Advocate*, Vol 14, No. 41, Sept 16, 1965, p.12,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a19650916-01.2.84&srpos=1&e=-----en-20-1--txt-txIN-Maryknoll+Sister+Shows+People+Their+Importance-----> >。  
此報道雖沒有提及修女居住的實際位置，但在其他有關瑪利諾女修會的論文中，只有鄰近九龍城寨的東頭邨提及附近有賭檔及鴉片煙館。
- 270 Cindy Yik-yi Chu, ed.,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177.
- 271 1965年10月政府改以數字代替英文字母為座號。
- 272 香港明愛：《香港明愛年度報告書》，1972-73，1974-75，1975-76年度。
- 273 Maryknoll Mission Archives, "Sister Pauline Gibbons, MM,": <<https://maryknollmissionarchives.org/deceased-sisters/sister-pauline-gibbons-mm/>>
- 274 William Galvin,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Hong Kong 1920-2010*, p.77.
- 275 Antoinette Tomanelli, "Her Job: Mission Miracles," p.16.
- 276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頁154。
- 277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of Hong Kong*, p.92.
- 278 William Galvin,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Hong Kong 1920-2010*, p.79: 〈海星堂建堂70周年〉，《公教報》，2022年8月14日；海星堂：〈堂區歷史〉，<<https://star.catholic.org.hk/zh/%E5%A0%82%E5%8D%80%E6%AD%B7%E5%8F%B2/>>
- 279 陶成章：〈文顯榮神父與我〉，《公教報》，2005年12月4, 11日；及海星堂：〈堂區歷史〉，<<https://star.catholic.org.hk/zh/%E5%A0%82%E5%8D%80%E6%AD%B7%E5%8F%B2/>>
- 280 "Mission Parish Helps Refugees," *The Catholic Advocate*, Jan 4, 1968, p.14,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a19680104-01.2.101&srpos=2&e=-----en-20-1--txt-txIN-Mission+Parish+Helps+Refugees----->>
- 281 〈堂區歷史〉，天神之后堂網頁：<<https://olqoa.catholic.org.hk/parish/History/Frame/index.html>>

- 282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of Hong Kong*, p.148.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頁 150-152。
- 283 王美笑修女 (Sr. Michelle Reynolds, MM) 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2023 年 2 月 24 日。
- 284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of Hong Kong*, p.150.
- 285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18-1975* (1978), p.283. 更多關於明愛牛頭角診所，可參看瑪利諾女修會一節。
- 286 香港明愛：《香港明愛年度報告書》，1970-71，1971-72，1973-74 年度。
- 287 William Galvin,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Hong Kong 1920-2010*, p.85;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p.137, 225, 290, 314.
- 288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頁 71；及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76-1980* (1982), p.24, 28.
- 289 張小蘭、黃奕清編：《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會口述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8），頁 278。
- 290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174。
- 291 Bill Surface and Jim Hart, *Freedom Bridge*, pp.105-106.
- 292 Bill Surface and Jim Hart, *Freedom Bridge*, pp.104-107.
- 293 蒙席是教宗頒賜有功神父的榮銜，通常可穿與主教近似之主教服裝，但與主教不同，蒙席本身並無特定職權。
- 294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76-1980* (1982), p.36; "Catholic Relief Closes Local Offi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Feb 21, 197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7.
- 295 Cindy Yik-Yi Chu, "From the Pursuit of Converts to the Relief of Refugees," p.364.
- 296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18-1975*, p.185.
- 297 Cindy Yik-Yi Chu, Marian Xavier Mug and Betty Ann Maheu, "The Maryknoll Sisters, their Ministries and Educational Work, 1921 to the Present," in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eds,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2009), pp.447-448.
- 298 Cindy Yik-Yi Chu, "From the Pursuit of Converts to the Relief of Refugees," p.366.

- 299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103-104。
- 300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包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K-Byrne.htm>>
- 301 Msgr. John F. Davis, "Could This Be Love?" *The Catholic Advocate*, Jan 11, 1969, p.16,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19680111-01.2.113&srpos=36&e=-----196-en-20--21--txt-txIN-hong+kong%2c+maryknoll+sister----->>>
- 302 Cindy Yik-Yi Chu, et al. "The Maryknoll Sisters, Their Ministries and Educational Work," p.449.
- 303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174。
- 304 Maryknoll Mission Archives, "Sister Monica Marie Boyle, MM," <<https://maryknollmissionarchives.org/deceased-sisters/sister-monica-marie-boyle-mm/>>
- 305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祈愛蘭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HM-Kenny.htm>>
- 306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174。
- 307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177；及 Cindy Yik-Yi Chu, et al. "The Maryknoll Sisters, Their Ministries and Educational Work," p.445.
- 308 Maryknoll Mission Archives: "Sister Joanne Bastien, MM," <<https://maryknollmissionarchives.org/deceased-sisters/sister-joanne-bastien-mm/>>
- 309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162，177，180。
- 310 白莎莉、胡德品著，林藹純譯：《說吧，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 70。
- 311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卜瑪利（安娜）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ME-Brophy.htm>>。
- 312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103。
- 313 Bill Surface and Jim Hart, *Freedom Bridge*, pp.96-97.
- 314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193，216。
- 315 朱益宜：《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頁 146-147。
- 316 Floyd Anderson, "Hong Kong Hospital Serves the Poor," *Catholic News Service*, July 18, 1964,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p.24: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ns19640718-01.1.24&e=-----196-en-20--1--txt-txIN-well+baby+clinic----->>>

- 317 Maryknoll Mission Archives, "Sister Maria Fidelis Rieckelman, MM,": <<https://maryknollmissionarchives.org/deceased-sisters/sister-maria-rieckelman-mm/>>
- 318 白莎莉、胡德品著，林藹純譯：《說吧，香港》，頁 73。
- 319 Floyd Anderson, "Hong Kong Hospital Serves the Poor," p.24.
- 320 白莎莉、胡德品著，林藹純譯：《說吧，香港》，頁 72。
- 321 白莎莉、胡德品著，林藹純譯：《說吧，香港》，頁 71。
- 322 本節為林鉅成醫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13 日。
- 323 王美笑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4 日。
- 324 張學明：〈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貢獻（1947-2008）〉，收於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頁 225-226。
- 325 張學明：〈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貢獻〉，頁 226-227。
- 326 〈修會聖人〉，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網站：<<https://fmm.catholic.org.hk/oursaints/>>
- 327 張學明：〈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貢獻〉，頁 229。
- 328 （清）舒懋官修；（清）王崇熙著：〈山水略〉，《新安縣志[嘉慶]》卷四，（出版者不詳，1930），頁 128。
- 329 李慧瑩、鄧桂昌、楊祥利編：《鞍山歲月——小城今昔》（香港：馬鞍山民康促進會），頁 44。
- 330 余震宇：《壹街一個故事——新界篇》（香港：日閱堂，2021），頁 152。
- 331 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編著：《礦山記憶：鐵，不一樣的故事》（香港：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2017），頁 45。
- 332 李慧瑩、鄧桂昌、楊祥利編：《鞍山歲月》，頁 47，78-90；〈歷史背景〉，鞍山探索館網站：<<https://gyc.elchk.org.hk/zh-hant/about/>>；及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編著：《礦山記憶》，頁 49。
- 333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香港：三聯書局，2014），頁 190-191。
- 334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頁 190。
- 335 更多關於天主教會在馬鞍山的事蹟，請參看 William Ng, "Ma On Shan Franciscan Missionary Archives: Barometer, Bell and Brown Paper

Packaging,” in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1: Historical Material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2009), pp.304-328.

- 336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文德華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MA-WojTukiewicz.htm>>
- 337 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編著：《礦山記憶》，頁 49。
- 338 見《香港天主教手冊》。因山下修院為聖方濟會院，亦稱作聖方濟診療所。
- 339 〈馬鞍山福利中心隆重舉行揭幕禮〉，《公教報》，1965 年 1 月 22 日。
- 340 張學明：〈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貢獻〉，頁 231。「一二·三事件」是指 1966 年 12 月 3 日爆發的嚴動警民衝突，後演變成政治事件，經中葡多番談判至 1967 年 1 月底才告結束。
- 341 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編著：《礦山記憶》，頁 81。
- 342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畢維德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N-Mugarza.htm>>
- 343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嚴艷嫻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T-Yim.htm>>
- 344 天 空 紀 念 碑：王聰敏修女，<<https://skymonu.org/guest/memorial/story/2m9c2c>>
- 345 麥婉琬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 2023 年 3 月 7 日；另參見 1982 及 1983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
- 346 官德儀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9 日及 2 月 10 日。
- 347 李慧瑩、鄧桂昌、楊祥利編：《鞍山歲月》，頁 109。
- 348 月婆為方言，指產婦。「大吉利是」這裡是指產婦可能有生命危險。
- 349 張學明：〈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貢獻〉，頁 239。
- 350 麥婉琬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 2023 年 3 月 7 日。
- 351 李慧瑩、鄧桂昌、楊祥利編：《鞍山歲月》，頁 126。
- 352 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編著：《礦山記憶》，頁 79-80。
- 353 張學明：〈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貢獻〉，頁 239。
- 354 William Ng, “Ma On Shan Franciscan Missionary Archives,” pp.310-311.
- 355 William Ng, “Ma On Shan Franciscan Missionary Archives,” pp.312-314.

- 356 更多關於張渤先生的事蹟，參閱：〈為人所尊——張渤教師〉，收於《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https://mos.hk/maonshan/3/17/50>；及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編著：《礦山記憶》，頁 51-52。
- 357 更多關於歐耀佳醫生的義診，參閱：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編著：《礦山記憶》，頁 226-235。
- 358 張學明：〈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在香港的貢獻〉，頁 239。
- 359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Our Founding History, <https://www.columbansisters.org/from-the-beginning/>
- 360 Sr. M. Gabriel O'Mahony, *A Time of Transition: Columban Sisters in Hong Kong* (Wicklow: The Columban Sisters, 2005), p.9.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only, use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Columban Sisters.
- 361 "Chinese Convert-Nurse Joins Missionary Sisters," *Trove*, March 19, 1953: <https://Trove.nla.gov.au/newspaper/article/175358918>
- 362 Edward Fischer, *Maybe a Second Spring: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ary of St. Columban in China* (New York: Cross Road, 1983), p.176.
- 363 區貴雅修女又稱亞規納·區桂蘭。其在跑馬地聖彌額爾天主教墳場的墓碑，刻上的名字為區貴雅，故以此名為準。
- 364 香港啤酒廠於 1948 年由菲律賓生力集團收購。
- 365 Edward Fischer, *Maybe a Second Spring*, p.194; and "Mission Comes Full Circle," *Misyon Online*, January-February 2016, <https://www.misyononline.com/jan-feb2016/mission-comes-full-circle>
- 366 Appendix M. Medical and Sanitary,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3*, p.M106; Appendix M. Medical and Sanitary,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2*, p.M104; "Hong Kong's Own Be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July 29, 1933;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10.
- 367 "New Brewery Opens: Hundreds Attend 'At Home' When First Brew is Sampl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Aug 17, 1933;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11.
- 368 Appendix M. Medical and Sanitary,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1935*, p.M105.
- 369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for the Year Ended the 31st March, 1950*, (nk: Government Printers, 1950), p.44.

- 370 "Sr Mary Bernadette Connolly," Columban Sisters website: <<https://www.columbansisters.org/?s=bernadette+connolly>>
- 371 "Funeral Mass Homily for Sisters Clare Farren RIP," Columban Sisters website: <<https://www.columbansisters.org/funeral-mass-homily-for-sister-clare-farren-rip/>>
- 372 O'Mahony, *A Time of Transition*, p.10.
- 373 Edward Fischer, *Maybe a Second Spring*, p.189.
- 374 對於診所成立的年份，不同資料有不同說法，從 1965-1967 都有，1965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已刊登診所資料，但據 *A Time of Transition* 一書，修會是於 1966 正式委派三位修女到打鼓嶺，而粉嶺聖若瑟堂 1978 年的《銀禧特刊》，亦指是 1966 年。1965 年可能是本小節後面提到，在建築期間以流動醫療車方式每周服務一天，故在此以 1966 年為正式成立的依據。
- 375 阮志：《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香港：三聯書店，2014），頁 50。
- 376 粉嶺醫院原稱真愛醫院，由基督教信義會 1960 年開始營辦，1973 年由政府接辦，九十年代併入醫管局。醫管局於 2001 年把粉嶺醫院的住院病人全部轉移到北區醫院，並將之從《醫管局條例》的公立醫院名單中剔除。
- 377 鄧明輝：〈粉嶺聖若瑟堂——歲月留聲六十載〉，收於《聖若瑟堂——粉嶺 60 周年紀念特刊》（香港：粉嶺聖若瑟堂，2014），頁 71-79。
- 378 鄧明輝：〈粉嶺聖若瑟堂——歲月留聲六十載〉，頁 71-79。
- 379 "Sisters Build Clinic on China Bord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380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的傳教歷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頁 62-63。
- 381 O'Mahony, *A Time of Transition*, 37.
- 382 診所的名稱在教會資料裡一直不統一，「天主教福利會聖若瑟診所」一名出自《香港天主教手冊 1965》，1967 年的《手冊》則稱為：「聖若瑟兒童福利暨婦女留產醫院」，1973 年的《手冊》稱為天主教福利會聖若瑟診所。雖然曾稱作醫院，但從修會的歷史資料、建築物的規模格局及受訪者口述歷史，均視之為診所。
- 383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麥德明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P-McDermott.htm>>
- 384 這位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的受訪者為當時幼稚園的其中一位老師，訪問日期：2022 年 7 月 18 日。
- 385 阮志：《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頁 293。

- 386 "She lived a fortunate life," *Sunday Examiner*, Sept 15, 2013.
- 387 粉嶺聖若瑟堂《慶祝建堂五十周年特刊》（香港：粉嶺聖若瑟堂，2004），頁 21-22。
- 388 賀維珍修女（Sr. Nora Mary O'Driscoll）以英語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的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11 月 9 日。
- 389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72-73 年度年報書》（香港：香港天主教福利會，1973），頁 92。
- 390 Mark O'Neill, "Healing Hong Kong," *Ariana* #03, Sept 1, 2019, pp.136-140.
- 391 〈公立醫院有幾趣〉，《協力》，2020 年 12 月，頁 2。
- 392 阮志：《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頁 194。
- 393 〈傳教修女黎碧潔：「我帶著病人送我的祝福回家鄉」〉，《公教報》，2011 年 12 月 23 日。
- 394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68-69 年度年報書》（香港：香港天主教福利會，1969），頁 2。
- 395 新界鄉議局：《第二十二屆新界鄉議局各委員會工作報告書》（香港：新界鄉議局編印，1976）。
- 396 陳秀嫻博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2022 年 12 月 8 日。
- 397 陳天權：〈大埔瞭望台俯瞰吐露港〉，《香港商報》，2021 年 3 月 17 日。
- 398 〈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游德肋撒修女安息〉，《公教報》，2006 年 9 月 3 日。
- 399 〈傳教修女黎碧潔：「我帶著病人送我的祝福回家鄉」〉。
- 400 戴遐齡：《香港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簡史》（香港：Victoria Press，1952），頁 11-12，21。
- 401 寶血會葉麗紅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的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7 月 5 日。
- 402 力理得神父（Fr. Francesco Lerda，1926-2003），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明愛總裁。
- 403 周家建：〈從《新建寶血醫院碑記》看戰前地區醫療發展〉，見於《華人文化研究》第 7 期，2019 年 6 月，頁 43。
- 404 鄧明輝：〈粉嶺聖若瑟堂——歲月留聲六十載〉，頁 71-79。
- 405 杜惠芬修女生平，見《寶血女修會網站·先賢懿行》：<https://spb.org.hk/pass56.html>。
- 406 朱宜益：《國籍寶血女修會與天主教會的演進》，頁 162。

- 407 馬慕真修女生平，見《寶血女修會網站·先賢懿行》：<https://spb.org.hk/pass50.html>。坑口明愛診所另見聖母聖心會一節。
- 408 黃惠霞修女生平，見《寶血女修會網站·先賢懿行》：<https://spb.org.hk/pass57.html>。
- 409 1952 年時稱為孤兒院，至 1962 年易名為兒童村。戴遐齡：《香港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簡史》，頁 11。
- 410 鄧明輝：〈粉嶺聖若瑟堂——歲月留聲六十載〉，頁 71-79。
- 411 新界鄉議局編：《第二十二屆新界鄉議局各委員會工作報告書》。
- 412 張亦葵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訪問日期：2023 年 4 月 11 日。
- 413 本節及下一節是張亦葵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4 月 11 日。
- 414 本節開始是陳素霞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3 月 6 日。
- 415 陳素霞：〈感謝聖母〉，《寶血之音》，2002 年 2 月，頁 14。
- 416 成世光主教在山西出生，1953 年抵達台灣，1960 年祝聖為台北總教區輔理主教，1966 年改任台南教區主教，直至 1990 年榮休。
- 417 最初譯名為南懷仁，但為避免與耶穌會南懷仁神父（Ferdinand Verbiest）混淆，改稱為南懷義。
- 418 顧厚德神父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4 月 6 日。
- 419 王慶餘：〈在華聖母聖心會士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東南文化》，1987 年第 2 期，頁 65-69；及古偉瀛：〈塞外蒼茫中的勇者——《在華聖母聖心會士名錄》〉，《心泉》第 79 期，[http://ccsc.org.tw/periodical\\_entries/286](http://ccsc.org.tw/periodical_entries/286)。
- 420 見於 *George Albert Dopchie* 紀念刊物，原文為法文及英文，頁 55-57。
- 421 羅馬聖母聖心會檔案，1953 年 12 月 3 日信件，收於 Daniel Verhelst and Nestor Pycke ed.,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2-1987*,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74-278.
- 422 顧厚德神父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4 月 6 日。
- 423 Daniel Verhelst and Nestor Pycke ed.,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2-1987*, pp.274-278.
- 424 本節的歷史圖片由聖心聖母會提供。
- 425 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p.36.
- 426 "Father Willy Wammes, C.I.C.M., R.I.P.," *Sunday Examiner*, March 30, 1973.

- 427 "Father Octaaf De Vreese, C.I.C.M., R.I.P.," *Sunday Examiner*, March 15, 1996.
- 428 天主教研究中心翻譯，原文見：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p.43.
- 429 古美蓮女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年2月4日。
- 430 〈教堂發展歷程〉，香港聖公會聖馬可堂網站：<<https://dek.hkskh.org/stmarks/aboutus.aspx?id=432&lang=2>>
- 431 〈利民診所〉，《ANN姐話你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YXNyl4y6o>>
- 432 岑紹裘醫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年2月28日。
- 433 天主教香港教區於2008年要求統一 St Vincent 的中文譯名為「聖雲先」，聖堂亦隨之更名。
- 434 "Caritas President Visits Colon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erald* (1950-1972): July 16, 196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2; 及〈調景嶺鳴遠中學新宿舍落成開幕〉，《公教報》，1967年7月28日。
- 435 "Father Willy Wammes, C.I.C.M., R.I.P.," *Sunday Examiner*, March 30, 1973.
- 436 顧厚德神父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年4月6日。
- 437 梁遇年：〈雷震東神父創立鯉魚門聖雅各伯堂的經過〉，《慶祝雷震東神父來華四十週年特刊1967》，頁24；及 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p.41.
- 438 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p.41.
- 439 梁遇年：〈雷震東神父創立鯉魚門聖雅各伯堂的經過〉，頁24。譚永亮神父在關於聖母聖心會的歷史論文中提到雷神父當時派遣廣州嶺南大學社會學系畢業的羅善原教友（1922-2004）前往視察。這裡未能確定「羅君」是對羅善原的尊稱，還是另有其人。見 Patrick Taveirne,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5-2006," p.41.
- 440 梁遇年：〈雷震東神父創立鯉魚門聖雅各伯堂的經過〉，頁24。
- 441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p.158.
- 442 阮媽玲：〈以感恩為生活動力的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神思》第64期，頁91-101。
- 443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趙蘊玉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J-Bouchard.htm>>
- 444 〈香港公教福利事業概況〉，《公教報》，1953年5月17日。

- 445 "Sister Bouchard retires after 60 years in China," *Sunday Examiner*, May 16, 1999.
- 446 天主教研究中心與田英傑神父的電郵通訊，2023 年 4 月 28 日。
- 447 "Sister Bouchard retires after 60 years in China," *Sunday Examiner*, May 16, 1999.
- 448 香港中和出版：〈鑽石山沒有鑽石：香港最大型寮屋區的傳奇〉，香港中和出版微信公眾號，2021 年 7 月 9 日，內容摘自郭漢陽：《元嶺傳奇：鑽石山寮屋區起居注》（香港：中和出版，2021）。
- 449 香港中和出版：〈鑽石山沒有鑽石：香港最大型寮屋區的傳奇〉。
- 450 吳昊：〈「小九龍塘——鑽石山」〉，收於《回到舊香港》（香港：喜閱文化，1999），頁 66-67。
- 451 陳永超神父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5 月 27 日。
- 452 天主教會於 1952 年已在鑽石山上元嶺大觀路設立臨時宿舍及辦事處，而在下元嶺則有母佑女修會在 131 號開辦幼稚園，周日用作臨時小聖堂。1953 年在鑽石路建成新聖堂，即聖家天主堂。1966 年彩虹邨天主教中學落成，教區將聖家堂遷往彩虹邨。隨著大量內地難民入住鑽石山，教友人數亦增加，教區 1968 年重設堂區，定名聖則濟利亞堂。見：香港朝聖服務中心：《網上朝聖——聖家堂介紹》，2020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3DcC4-Vrys&t=44s>>；及〈則濟利亞堂揭幕 鑽石山關小堂區〉，《公教報》，1969 年 3 月 14 日。
- 453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的傳教歷程》，頁 29-31。
- 454 恩保德神父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 455 香港四十年代出現學額供應不足，遂出現下午校與夜校之間的特別班。從《星島日報》的新聞標題〈英文小學萬人投考招新生額僅四百名〉（1952）及〈官立小學取錄新生報名者已逾三萬人〉（1955）等可見，學額問題在五十年代仍然持續，直至政府加建學校，特別班才逐漸消失。見：麥肖玲、方駿：〈1930-1950 年代香港基礎教育的發展與挑戰：中文剪報鉤沉〉，收於《基礎教育學報》第 16 卷第 2 期，2007：頁 1-20。
- 456 謝修明女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訪問，日期：2023 年 6 月 15 日。
- 457 陳永超神父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訪問，日期：2023 年 5 月 27 日。
- 458 陳永超神父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訪問，日期：2023 年 5 月 27 日。
- 459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德娟清修女，<<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ln%20Memoriam/Religiou%20Sister/L-Therrien.htm>>

- 460 〈聖母無原罪傳教會 趙蘊玉修女安息主懷〉，《公教報》，2006年6月4日：“Sister Bouchard Retires after 60 Years in China,” *Sunday Examiner*, May 16, 1999.
- 461 這裡是指 1953 年石硤尾大火之後的徙置區。
- 462 「浸甩 label」指讓用膠水貼在瓶上的紙質藥物標籤泡在水中一段時間後鬆脫；「過水」指用清水再洗一遍；「焗」指用大量沸水煮東西，這裡是指用沸水來消毒用具。
- 463 Capsule 指膠囊藥丸；Amoxil 阿莫西林，藥名，屬於青黴素一類的抗生素。
- 464 郭漢陽：《元嶺傳奇：鑽石山寮屋區起居注》（香港：中和出版，2021），頁 103-107。
- 465 〈聖母無原罪傳教會 趙蘊玉修女安息主懷〉，《公教報》，2006 年 6 月 4 日，及參看《香港天主教手冊》。
- 466 謝修明女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訪問，日期：2023 年 6 月 15 日。
- 467 〈公教婦女聯誼會新界建屋贈貧戶〉，《公教報》，1964 年 2 月 21 日。
- 468 “From Fr Russell’s Desk...Saluting the Vigilant Women of Yesteryears,” *Catholic Women’s League Hong Kong Newsletter*, 80th Anniversary Special, Nov 17, 2017.
- 469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p.13.
- 470 Thomas Ryan, SJ,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p.146.
- 471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Ladies’ Union*, Vol.1, No. 6, 1st December, 1913.
- 472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Women’s League*, Vol.1, No. 10, 6th April, 1914.
- 473 陳秀嫻博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2022 年 12 月 8 日。
- 474 “Activities of Catholic Women’s League in Hong Kong: Need for Seamen’s Hoste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Sept 5, 195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5.
- 475 〈公教婦女聯誼會新界建屋贈貧戶〉，《公教報》，1964 年 2 月 21 日。
- 476 “Catholic Women’s League Raises Money: Games Driv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Mar 24, 196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9.
- 477 〈公教婦女會畫展 籌經費支持診所〉，《公教報》，1966 年 10 月 21 日，及〈天主教婦女聯誼會 籌募慈善基金〉，《公教報》，1967 年 2 月 10 日。
- 478 〈公教婦女會慶祝 80 周年 服務社會貧苦擔當先驅〉，《公教報》，2018 年 1 月 19 日。

- 479 "Bella Sun, A Leading Light," *Catholic Women's League Hong Kong Newsletter*, 80th Anniversary Special, Nov 17, 2017: 6.
- 480 "Catholic Women Run Clinics for Poor of Colon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50-1972): Aug 18, 195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2.
- 481 "Catholic Women Fete 2,000 Childre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Dec 29, 1959;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8.
- 482 據南華早報報道為 1952 年開辦，參看 "Catholic Women Run Clinics for Poor of Colon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50-1972): Aug 18, 1957.
- 483 其後各年手冊標注為 1958 年設立。
- 484 參看林榮鈞、張小蘭、黃家欣：《重塑香港天主教會領袖之搖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21）。
- 485 夏其龍、溫國珩：〈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區的傳道及慈善工作〉，頁 14-19；及林雪碧：〈明之剛神父小傳〉，頁 20-27；兩文同收於夏其龍編：《內外縱橫太古樓——太古樓與薄扶林區的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2）。
- 486 夏其龍、溫國珩：〈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區的傳道及慈善工作〉，頁 16。
- 487 〈聖伯多祿診所開幕 由公教婦女會主辦〉，《公教報》，1967 年 4 月 28 日。
- 488 冼昭行：〈一位社區工作者眼中的明之剛神父〉，收於夏其龍編：《內外縱橫太古樓——太古樓與薄扶林區的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2），頁 30。
- 489 由公教婦女會提供。
- 490 見本書第二章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一節。
- 491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香港：香港演藝學院，2006），頁 120。
- 492 樂艾倫引用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館藏：Bulletin MEP, 1954, p.1046，見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頁 120。
- 493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頁 120，及冼昭行：〈一位社區工作者眼中的明之剛神父〉，頁 31。
- 494 〈天主教婦女聯誼會 籌募慈善基金〉，《公教報》，1967 年 2 月 10 日。
- 495 林雪碧：〈明之剛神父小傳〉，頁 20-27，及冼昭行：《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香港：三聯書局，2012），頁 88-91。

- 496 夏其龍、溫國珩：〈論巴黎外方傳教會在薄扶林區的傳道及慈善工作〉，頁 18。
- 497 “Catholic Women Run Clinics for Poor of Colon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50-1972): Aug 18, 1957.
- 498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頁 160。
- 499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76-1980* (1982), p.32.
- 500 陳秀嫻博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2022 年 12 月 8 日。
- 501 Joyce Chang, “My Encounter with CWL: Joyce Chang,” *Catholic Women's League Hong Kong Newsletter*, 80th Anniversary Special, Nov 17, 2017: pp.12-13.
- 502 Mobile Clinic Blessed by Bisho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Jun 23, 1964,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5.
- 503 〈本港教友九人獲教廷授勳銜〉，《公教報》，1966 年 4 月 8 日。
- 504 參見 The Christian Knighthood Information Center 網站：<<https://www.papalknights.org/syl.html>>
- 505 Debra Rull, “I am Blessed to be Able to Serve CWL: Debra,” *Catholic Women's League Hong Kong Newsletter*, 80th Anniversary Special, Nov 17, 2017: 8.
- 506 醫療船有多個中文音譯名稱，包括麥當拿、瑪道娜及瑪道納。此處沿用《香港天主教手冊》中的名稱。
- 507 Joyce Chang, “My Encounter with CWL: Joyce Chang,” pp.12-13.
- 508 “Madonna, Floating Clinic for Aberdee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February 23, 196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4.
- 509 陳秀嫻博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2022 年 12 月 8 日。
- 510 黃亞妹婆婆及兩位女兒於 2022 年底及 2023 年初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
- 511 公教華人聯誼會 1964 年 9 月 18 日刊登於《公教報》的廣告。
- 512 〈公教華人聯誼會昨祝九週年紀念〉，《工商日報》，1955 年 8 月 17 日。
- 513 “Chinese Catholic Club Holds Annual Par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Nov 5, 1954;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5.

- 514 Chinese Catholic Club Par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erald* (1950-1972): Feb 9, 1958;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2; and "Maryknoll Missionaries Bring Relief and Hope to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Catholic News Service*, July 13, 1953,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ns19530713-01.1.38&srpos=3&e=-----en-20--1--txt-txIN-tung+tau----->>
- 515 該英文報道中的 Paul Lam 有可能是林肇真醫生。
- 516 "Catholic Busy in Aiding Refugees who Stream into Hong Kong from Red China," *NCWC News Service*, February 21, 1961,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ns19610220-01.1.147&srpos=1&e=-----en-20--1--txt-txIN-Catholic+Busy+in+Aiding+Refugees+----->> ; and "Visitors from Hong Kong Sees Opportunity for Church Among Influential Chinese There," *Catholic News Service – Newsfeeds*, February 15, 1954,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ns19540215-01.1.16&srpos=1&e=-----195-en-20--1--txt-txIN-chinese+catholic+club----1954--->>
- 517 〈公教華人俱樂部敦請恩主教聖屋〉，《公教報》，日期 1949 年 4 月 17 日；及〈公教華人聯誼會選出下年度職員〉，《公教報》，日期 1966 年 8 月 5 日。
- 518 1959 年成立時稱為教區教友傳教總會，1967 年更名為香港天主教教友傳教總會，1974 年再度改稱為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沿用至今，目前共有五十一個議會及三十個信徒善會。
- 519 "Catholic Laity Activity Prais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erald* (1950-1972): April 23, 196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2.
- 520 Florence Siu-ting Mok et. al, ed., *The Guild of St. Luke, St. Cosmas & St. Damian, Hong Kong 60<sup>th</sup> Anniversary*, (Hong Kong: The Guilds of St. Luke, 2014), p.12.
- 521 "The Ruttonjee Sanatorium Give Birth to 50-year-old Holistic Health Care and the Catholic Nurses Guild," *Sunday Examiner*, July 13, 2003.
- 522 〈天主教醫生和護士為山區貧病者服務〉，《公教報》，日期 1954 年 8 月 15 日。
- 523 香港聖雲先會：《香港聖雲先會百周年紀念特刊 1863-1963》（香港：香港聖雲先會，1963），頁 5：9；Celebrating International SSVP Women's Day, 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USA, <<https://ssvpusa.org/news/celebrating-international-ssvp-womens-day/>>
- 524 香港聖雲先會：《香港聖雲先會百周年紀念特刊 1863-1963》，頁 7。

- 525 〈香港聖雲先會 150 周年〉，《公教報》，日期：2013 年 9 月 29 日。
- 526 香港聖雲先會：《香港聖雲先會百周年紀念特刊 1863-1963》，頁 5，9-10。
- 527 Cindy Yik-yi Chu, ed.,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6*, p.65.
- 528 香港聖雲先會：《香港聖雲先會百周年紀念特刊 1863-1963》，頁 12。
- 529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 IV-08-03-1：Hong 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Project。第二次臨時會議於 1964 年 11 月 20 日舉行。
- 530 “Church Marriage Clinics for H.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Mar 26, 196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1.
- 531 白英奇主教 1967 年 4 月 10 日在公教婚姻輔會周年會議上致詞。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 IV-08-03-3。
- 532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 IV-08-03-1：Hong 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Project。
- 533 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 IV-08-03-2 及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檔案 IV-08-03-3：Hong Kong Catholic Marriage Advisory Council Project。
- 534 “Call for FPA Clinic Closures under Fir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Feb 2, 1980;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9.
- 535 〈調劑生育指導所整頓港九服務處〉，《公教報》，1970 年 5 月 1 日。
- 536 〈本會服務範圍廣泛 維護母嬰不遺餘力〉，《公教報》，日期：1973 年。
- 537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76-1980* (1982), p.7, 8, 10.
- 538 “Vehicular Clinic: To be Used for the New Territories. Government Pl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41), June 15, 1932;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9.
- 539 〈新界兩部流動診所交接禮由范德霖醫官及黃炳英主持〉，《華僑日報》，1952 年 12 月 7 日。
- 540 “Mercy Mission Vessel: Floating Clinic Presented by Jockey Club to Gov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23 January 1958;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7. “Floating Clinic for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4 May 195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6.
- 541 急症室的福爾摩斯：〈淺談香港空中醫療服務的歷史（二）〉，《輕新聞》，2023 年 3 月 28 日：<<https://shorturl.at/fDNST>>

- 542 阮志偉、余嘉浩等著：《先賢之路：西貢天主教傳教史》（香港：中華書局，2021），頁 139。
- 543 〈聯合國贈香港流動肺病診所由醫務處管理運用〉，《華僑日報》，1951 年 6 月 13 日，頁 7。
- 544 〈鄧兆肇汽車一輛曾紅十字會作眼科流動診所〉，《華僑日報》，1959 年 3 月 14 日。
- 545 〈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設牙科醫療車巡迴新界服務〉，《華僑日報》，1959 年 6 月 16 日。
- 546 〈新界民眾希望多派診療車〉，《華僑日報》，1957 年 9 月 19 日。
- 547 〈港九各社團診療所港聯席座談研究防治流行性感冒組織下鄉流動診療隊〉，《華僑日報》，1957 年 7 月 22 日。
- 548 〈另一流動診療所又將在新界服務〉，《工商晚報》，1956 年 9 月 23 日。
- 549 1973 及 1975 年沒有統計資料。
- 550 "Clinic Tours Hong Kong," *The Catholic Standard and Times*, Vol. 59, No. 49, 3 September 1954 p.16,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 <https://thecatholicnewsarchive.org/?a=d&d=cst19540903-01.2.181&srpos=1&e=-----en-20--1--txt-txIN-Clinic+Tours+Hong+Kong----->>
- 551 "Mobile Van for Social Wor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24 October 196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4; "Sydney Women Donate Va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23 October 1961;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6.
- 552 見本章公教婦女會一節。
- 553 "Bishop Bianchi to Bless New Mobile Clin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erald* (1950-1972), 21 June 1964;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2.
- 554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68-69 年度年報書》（香港：香港天主教福利會，1969），頁 8。《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69-70 年度年報書》（1971），頁 31。《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70-71 年度年報書》（1971），頁 29。《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71-72 年度年報書》（1972），頁 52。《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72-73 年度年報書》（1973），頁 112；《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73-74 年度年報書》（1974），頁 76。
- 555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68-69 年度年報書》，頁 11。
- 556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71-72 年度年報書》，頁 53；《香港

天主教福利會 1972-73 年度年報書》，頁 122；《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73-74 年度年報書》，頁 85。

557 鍾炳基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9 月 2 日。

558 《工商日報》1955 年的分類小廣告刊登於第二版，3 月及 4 月為缺頁，故以十個月來計算平均量；1965 年的醫藥廣告刊登於第十一及十二版，1、3、5、6、9 及 11 月的醫藥廣告部分亦刊登於第十一版，7 月的廣告則刊登於第十三及十四版；1975 年的醫藥廣告刊登於第十一版，1 月則刊登於第七版，10 及 12 月刊登於第 6 版。

559 第 343 章《診療所條例》，1964 年 1 月 1 日：<[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43!en-zh-Hant-HK?INDEX\\_CS=N&xpid=ID\\_1438403037255\\_001](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343!en-zh-Hant-HK?INDEX_CS=N&xpid=ID_1438403037255_001)>；及 “Health Department Replies on Mobile Clinics Issu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erald* (1950-1972), 17 December 1967;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8.

560 〈醫務衛生處發言人稱取締流動診療車設新區廉價診所〉及〈黃大仙街坊會首長指出醫療未作適當安排流動診療車應保留〉，《華僑日報》，1967 年 11 月 17 日。

561 由於機構名稱曾多次修改，除了引用資料原文外，本文統一使用「明愛」稱謂，代表「天主教福利會」和「明愛」，指的是同一機構。

562 公教進行社於 1945 年底由師人傑神父 (Fr. Nicola Maestrini, PIME, 1908-2006) 和馬奕猷神父 (Fr. Bernard Meyer, MM, 1891-1975) 創立。

563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56。

564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58-259。

565 《香港明愛大事回顧【1953 年至 1969 年】》，<<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Online%20Exhibition/CCSWHK/CAR/Caritas.pdf>>。

566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華德中蒙席，<<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CH-Vath.htm>>

567 Dr. Joyce Sau Han Chang, “Monsignor Charles Herman Vath, Founder of Caritas Hong Kong,”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in the 20th Century*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2021), p.529.

568 田英傑：《香港天主教掌故》，頁 253。

569 Dr. Joyce Sau Han Chang, “Monsignor Charles Herman Vath, Founder of Caritas Hong Kong,” pp.534-536.

570 雷操爽醫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3 年 3 月 21 日。

- 571 Dr. Joyce Sau Han Chang, "Monsignor Charles Herman Vath, Founder of Caritas Hong Kong," p.535. 按：文章稱謂用意是帶出華蒙席的辛勞和貢獻，沒有貶義。
- 572 「老竇」：廣東用語，意思是父親。
- 573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力理得神父，<<https://archives.catholic.org.hk/In%20Memoriam/Clergy-Brother/F-Lerda.htm>>
- 574 李啟宇：〈力理得神父與我〉，萬籟寂、吳灼棣編：《照顧弱勢社群的傳教士力理神父》（香港：香港明愛傳訊統籌辦公室，2020），頁 39。
- 575 〈明愛總裁力理得神父 獲西德政府頒授勳章〉，《公教報》，1987 年 7 月 31 日。
- 576 基德多撰，萬籟寂譯：〈力理得神父專訪〉，萬籟寂、吳灼棣編：《照顧弱勢社群的傳教士力理神父》，頁 13。
- 577 陳若望：〈可敬的力理得神父〉，《公教報》，1993 年 2 月 9 日。
- 578 艾巧智撰，吳黎雲笑譯：〈並肩同行鐸職路〉，萬籟寂、吳灼棣編：《照顧弱勢社群的傳教士力理神父》，頁 18。
- 579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68-1969 年度年報書》，頁 1。
- 580 據《香港天主教福利會年度年報書》，1968-69 年度診所求診總人數是 75,967 人，1985-86 年度診所求診總人數是 101,293 人。不過，每個年度的診所數目可能不同。
- 581 以 1973-74 年度《明愛年報》數字為例，該年度東頭邨服務中心診所和牛頭角明愛中心診所求診人數分別是 14,580 人和 35,763 人，其他個別診所的求診人數由一千多人到八千多人不等。
- 582 按《明愛年報 2021/22》，社會工作服務支出佔明愛年度支出 70.87%，而醫療服務佔 0.79%。
- 583 基德多撰，萬籟寂譯：〈力理得神父專訪〉，頁 12。
- 584 Sister Joan Delaney, *A Survey on Religious Women in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Major Superiors of Religious Women, 1975), p.24.
- 585 Sister Joan Delaney, *A Survey on Religious Women in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p.9-10.

## 第四章

303

### 〔1970-1990〕 在歷史使命中功成身退

第四章

1970-1990

在歷史使命中功成身退

自香港開埠而來，天主教不同團體在本港不同地區開設診所，服務貧困人士。從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難民潮和高生育率導致香港人口，從二百萬人急速增長至差不多三百六十萬人，帶來龐大的醫療需求。按《香港天主教手冊》資料記錄，撇除醫院、留產所和育嬰院等醫療服務，同期天主教診所數量由十間增至三十二間。到了七十年代，隨著出口製造業發展蓬勃，香港經濟起飛，市民生活水平亦大大提高，天主教診所數量漸漸減少，從六十年代高峰期三十二間減少至 1970 年二十七間，再下降至 1990 年只剩十間。本章將分別從香港政府醫療政策和法例的發展等外在因素，以及香港天主教會服務方向改變的內在因素，闡釋天主教診所服務的變化。以 1970 年作為回顧教會診所服務的分水嶺，一方面是因為難民潮影響已消退，距離香港政府於 1964 年推出《香港醫療服務發展》白皮書已有六年，醫療服務的改善成果開始出現；另一方面是徐誠斌主教於 1969 年 5 月就任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後，首項要務就是召開天主教香港教區會議。會議於 1970 年 2 月揭幕，至 1971 年 11 月基督君王節閉幕。這是自 1946 年香港由代牧區升格為教區以來首個教區會議，目的是按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下稱「梵二會議」）的內容和精神，檢討香港教區的事工和進行革新，擬定未來發展方針。<sup>1</sup> 這會議奠定了香港教區的事工和服務運作方向，當中包括社會服務。

## 1 七十至九十年代的醫療概況<sup>2</sup>

在五六十年代，人口急速增加，衍生了就業、住屋、公共衛生等問題。由於資源短絀和未有長遠規劃，公營醫療服務遠遠未能應付突增的人口，故此十分歡迎慈善團體和教會的服務和參與。有關當時居民求診苦況和天主教開設的診所服務，在前一章節已有提及。

到了五十年代後期，當香港政府意識到大量湧入的難民不是短期避難而是選擇長期居留，不得不就醫療、教育、房屋等範疇作出長遠計畫。1957年，香港醫務衛生署就如何為社會提供醫療服務向政府提交一份十五年醫療衛生發展計畫。礙於缺乏人口統計數據和經濟發展資料，政府要求醫務衛生署把計畫細分為五年一階段。1959年醫務衛生署提交了一份五年計畫（1960-65），並於翌年獲行政局原則上同意。及至1961年人口統計完成，有關數據幫助政府更準確擬定十年醫療發展計畫，並在1964年推出第一份醫療白皮書《香港醫療服務發展》。白皮書指出政府將會「直接或間接向不能從其他途徑獲得醫療服務的廣大市民提供低廉或免費的醫療及個人健康服務」<sup>3</sup>，正式為開展醫療服務定下政策和方向。政府這項政策可以說是在無可奈何之下作出的承擔，因為按統計，以當時市民入息分佈與醫療成本相比，人口中有一半不能應付資助門診，八成不能承擔住院費用，遑論私家醫療服務。<sup>4</sup>這印證了當時慈善團體和教會的診所服務對基層大眾的幫助是何等重要。

1964年白皮書回顧戰後人口膨脹，住屋和食水供應緊張，居住環境衛生惡劣，故此衛生服務集中在控制及預防疾病，包括注射疫苗、制定措施控制肺結核、發展母嬰健康服務以減低嬰兒夭折率等。當時傳染疾病不再是香港的主要死亡原因，醫療衛生部門的重點開始轉向個人治療護理，醫療發展以醫院為主，同時間政府也投入資源興建新的公立診所。白皮書指出醫院病床服務嚴重缺乏，建議政府興建醫院，擬定增加病床的目標，從1963年年底每一千人3.13張病床增至1972年每一千人有4.25張病床，同時也提到門診服務發揮預防及治療功能，每當一間地區或分區醫院落成時應有一間專科

或分科診所提供支援。<sup>5</sup> 雖然醫療服務實況未能達到目標，但整體發展方向明確，到 1970 年，香港每一千人有 4.03 張病床；而從 1964 到 1973 年十年間，政府開設了十五間公立診所，兩間在港島，六間在九龍、七間在新界新市鎮。截至 1973 年底，全港共有七十三間公立診所，往政府診所求診人次（包括新症、舊症）也由 1963 年約五百八十萬人次增加至 1975 年大約一千萬人次。<sup>6</sup> 在此期間，政府亦於 1972 年推出十年建屋計畫，為一百八十萬香港居民提供公共房屋單位，大大改善居住條件，減少了許多以前普遍因環境衛生問題引致的皮膚瘡癩、腸胃不適等病患。以上種種措施雖然帶來改善，但同期香港人口也由大約三百四十萬人增至四百五十萬人<sup>7</sup>，公立醫院的病床仍然不敷應用，需要常常在病房通道加開「帆布床」應付留院病人。

及至 1974 年，政府進一步擴展醫療服務，推出第二份醫療發展白皮書《香港醫療衛生服務的進一步發展》，其政策的目的是「保障及促進整體的公眾健康，以及確保向香港市民提供醫療及個人健康設施，特別是那些須依賴資助醫療服務的廣大市民」。<sup>8</sup> 白皮書提出把全港分為五個區域，採用分區規劃及管理醫療護理服務的模式，在每區提供一間或以上專科診所和多間普通科診所，提高效率處理每區不同的醫療問題。此外，白皮書建議擴建醫院，提升病床數量至每一千人有 5.5 張病床的目標<sup>9</sup>，並開展新的服務，包括老人科病床和精神專科醫院。自 1974-1990 年間，因應新界新市鎮的發展，政府新建的七所醫院，五間在新界新市鎮，餘下的在港島區和九龍區各有一間。<sup>10</sup> 除了硬件，白皮書同時指出醫療人手短缺，帶出成立第二間醫學院的需要，也建議成立第三間護士訓練學校。就白皮書建議，1974 年立法局通過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一所新的醫學院，1980 年中文大學醫學院正式成立。

上述措施雖然提升了醫療服務的供應和水平，但早在戰前成立的醫務衛生署架構未能有效管理及運作這些服務。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展開談判，到了 1984 年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決定香港在 1997 年

回歸中國。在這巨大的政治局勢變化下，香港政府沒有推出新的醫療白皮書，取而代之的是政府於 1983 年聘請澳洲獨立調查機構審視公立醫院運作模式，並在 1985 年公佈顧問報告書《司恪報告書》（Scott's Report）<sup>11</sup>。報告書指出區域醫院規模龐大，管理缺乏連貫性和整體性，制度缺乏靈活性。一方面政府醫院超出負荷，另一方面補助醫院病床未有充分使用。報告書建議的改善方案是成立一個法定獨立的公營機構負責營運政府醫院及補助醫院等公立醫院。政府採納報告書，於 1988 年 10 月成立「臨時醫院管理局」，翌年 4 月，醫務衛生署分拆為衛生署和醫院事務署，前者負責提供普通科門診及其他疾病預防的服務，後者負責醫院事務。及至 1990 年 12 月，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正式成立，負責管理全香港公立醫院，統一所有政府醫院和補助醫院的員工服務條件，並於一年後取代醫院事務署。自此，政府不再為香港居民直接提供醫療服務，改為只負責調撥經費，通過醫管局提供服務。

從 1964 年第一份醫療白皮書到 1985 年《司恪報告書》可以看到政府的醫療政策集中在興建醫院和改革醫院管理，成立醫管局的確改善了醫院及專科服務的質素，但資源大部分投放在專科診療和醫院服務上，忽略了基層的醫療服務，為人詬病。1990 年政府發佈《人人健康展望將來：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指出基層醫療健康的重要性，而當時公營診所在門診醫療服務中只佔 15%，故此醫療政策重點應該放在基層健康服務，改善公共衛生及預防護理，確保基層醫療健康服務的質素及水平得以提升，並為無法負擔私人醫療服務的人提供基層醫療健康服務。<sup>12</sup> 這份報告書建議成立一個「基層健康管理局」負責管理醫管局在各區的工作和基層健康服務，但基層醫療服務議題沒有引起當時社會的關注和重視，加上在當時的政治狀況下，政府的看守角色甚濃，自然地吧建議束之高閣。隨著 2003 年非典型肺炎（沙士危機）、人口增加、社會疾病模式改變等問題的出現，基層醫療服務問題才逐漸成為大眾議題。到了政府設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負責全面檢視基層醫療服務的規劃和為香港基層醫療健康服務可持續發展制訂藍圖時，已是二十七年後的事了。<sup>13</sup>

縱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香港醫療政策發展，重點放在醫院建設、醫院管理、醫護人手培訓、法例制定等各方面，同期的診所服務發展雖然有所不足，但相比六十年代或之前已大幅改善，加上經濟發展蓬勃、私人診所數量增加，市民求醫的途徑和能力已大幅增加，對教會診所服務的需求也隨之減少。

### 1.1 中醫藥再獲重視<sup>14</sup>

談到香港醫療政策，不得不提及中醫藥的發展。香港開埠初期殖民政府財政緊絀，醫療政策重點以照顧歐洲人為主導，加上 1842 年《南京條約》協定不干涉華人社區的習俗和慣例，故此政府並不想參與華人醫療事務，1884 年的《醫生註冊條例》並不包括中醫。當時華人普遍相信中醫，抗拒西醫，學者李沛良形容香港開埠至十九世紀末是「中醫盛行期」<sup>15</sup>，而香港第一所照顧華人的東華醫院也是提供中醫藥服務的。

1894 年鼠疫發生時，華人普遍以中藥治療，又或到東華醫院求診，但治療成效不佳，高死亡率引起政府對東華醫院和中醫藥的批評。鼠疫過後政府檢討醫療體制和政策，決心糾正漏洞缺失，不再完全放任華人醫療事務。隨後幾十年，政府推廣西式醫療，包括與教會團體興辦西醫院，對華人士紳開辦公立醫局提供土地或其他便利，訓練西式分娩的助產士，改善衛生風險從而減低嬰兒死亡率，同時設立香港大學醫學院培訓醫生，擴大華籍醫護人員數目，增加華人接觸西醫機會，減低華人對西醫的抗拒。<sup>16</sup> 即使在淪陷時期，日佔政府也以西式醫療為重，強制推行疫苗注射。1957 年港英政府成立醫務委員會，更加「確立了醫生（西醫）在香港醫療系統中的自治權力，也鞏固了西醫的主導地位」<sup>17</sup>，慢慢建立西醫權威。相比下，雖然中醫在華人中仍然很受歡迎，但中醫業沒有培訓機制，任何人都可以稱自己為中醫師，容易魚目混珠，加上中醫師行業模式是個別私人執業，欠缺組織性，在醫療政策上完全沒有影響力，遑論有組織的發展。

六十年代或之前，除了相信中醫醫術理念，市民看中醫主要原因是費用不高和求診方便。七十年代到回歸前，經過幾十年對西式醫療的推廣、教育和權威的建立，中醫被視為另類治療。再加上沒有政府的監管和資助，本地中醫師只需領取商業牌照就可以執業，無須註冊，故此執業水平差異頗大。政府法例對中醫師亦有許多限制，例如他們不被允許稱自己為醫生，只允許稱自己為從業者。他們不能簽署死亡證明或病假證明，也不能開西藥，如抗生素和類固醇。對於追求醫療效率和急於在病後恢復工作的市民來說，中醫治療需時，不像西醫般那麼快見效，加上中醫未能提供病假證明，市民因此放棄向中醫求診，又或把中醫視作輔助治療選項，導致中醫行業不斷萎縮。

1984 年中英兩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後，政治氛圍的改變為中醫藥發展帶來契機，李沛良稱這個階段為「中醫復殖期」。1989 年，政府成立中醫藥工作小組，負責檢討香港中醫的執業情況，以及中醫藥在本港的使用情況，並就推廣中醫藥的正確使用和確保中醫藥的專業水平，提供意見。<sup>18</sup> 1990 年，中國政府頒佈《香港基本法》，其中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 1997 年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發展中西醫藥和促進醫療衛生服務的政策。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提供各種醫療衛生服務」<sup>19</sup>，確立了回歸後中醫藥發展的憲法地位，也解釋了港府成立中醫藥工作小組的原因。<sup>20</sup> 概括來說，在一百多年港英政府統治期間，中醫未被視為正規醫療，也不包括在香港社會醫療發展進程。自回歸後，中醫服務才有所發展，但差強人意的地方是即使到今天，中醫門診未被納入政府資助的公共醫療系統之中，中醫團體也沒有代表參與醫療政策的制定。<sup>21</sup>

隨著社會對中醫藥治療的改觀，當天主教結束西醫診所服務時，一些修會人士或信友團體改以中醫方式服務病者。例如寶血會莊晉宜修女，她小時候久咳不癒，吃三個月中藥後痊癒，患有末期癌症的祖母又是靠中醫紓緩痛症，安詳離世；這些經歷使莊修女同樣希望以中醫知識幫助和減輕病人的身心不適。她 2008 年畢業後成為註冊中醫師，其後

加入寶血會，現在以中醫修女雙重身份服務和關懷病人。<sup>22</sup> 至於先前診所服務的另一股力量——信友善會，雖然原先活躍於醫療服務的團體同樣已淡出舞台，但同時間也有其他的善會替代。例如今年（2023）創會一百六十年的聖雲先會由起初以探望病人、捐助醫療費用方式行善，於 2010 年開始每周有三個半天為深水埗區居民義診。與十九和二十世紀不同，這項服務不是提供由傳教士帶來的西方醫學，而是回歸傳統的中醫和針灸治療。

## 1.2 新的服務趨勢——生死教育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香港醫療界出現一種新的服務趨勢，並且由天主教醫護人士引領先鋒，其他宗教營辦的醫院跟隨，再推及到公營的醫療和醫學體系，那就是對垂死病人的臨終關懷和生死教育。生死教育學會創會會長謝建泉醫生指出，雖然華人都想「好死」，卻很害怕談死，所以香港很遲才開始有生死教育。最早期是七十年代末瑪利諾修女在聖母醫院推行善終服務，照顧臨終病人的「身心社靈」<sup>23</sup> 的健康。「當時這服務做得很好，但沒有人知道，直至八零年代初電視台訪問一位臨終病人，該病人說：『病人臨死前如果獲得照顧，是很舒服的，有意思的，令他們最後的日子生活得很有姿彩』。」訪問播出後，社會有很大的反響，認識到聖母醫院有這麼好的善終服務，使這議題的關注度升得快，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包括醫護、修女。<sup>24</sup>

律敦治療養院是另一間由天主教修女主理、同樣關注善終服務的醫院。謝醫生解釋：「以前肺癆會致命，肺氣腫也會致命，律敦治醫院照顧很多末期病人。」修女們得到凱瑟克基金（The Keswick Foundation）的支持，在 1984 年邀請到一位在英國醫院做善終服務「好叻」的醫生做講座，是香港第一個公開的善終服務講座。該次講座吸引了香港人的注意，兩年後善終服務會（現今善寧會）正式成立，並在凱瑟克基金支持下，開辦不同公開活動，尤其是培訓醫護人員。

1987 成立贍明會，專門培訓義工探病。之後陸續有不同的非政府善終服務團體出現。同一時間，由於聖母醫院和律敦治療養院的成功榜樣，天主教明愛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佛教醫院等跟隨開辦，這些都是宗教團體營辦的醫院，其後才有公立醫院參與。1992 年，白普理寧養中心成立，是香港第一間為末期癌症病人提供專科寧養護理的院舍，它標誌對生死教育的講解、知識傳遞，進入到真正行動。至於高等教育差不多到 2000 年才有生死教育，首先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通識教育講解墳場、墳墓設計和歷史，接著有嶺南大學，其他大學很後期才有這樣的課程。

退休前是腫瘤科顧問的謝醫生表示：「善終服務本來是很好的服務，有些病人和他們的家人卻很抗拒：『去南朗醫院？唔得呀，等死啊。』我在想他們已是末期，為什麼這樣抗拒？其中一點是欠缺真真正正的生死教育。」這一思考推動了生死教育學會在 2006 年成立，目的是教育公眾，透過探討死亡、反思生命、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學會成立十多年後，一位青年又於 2018 年成立生死學協會，將行動提升，推廣很多服務，例如「一切從簡」、「大體老師」等。自從有了生死教育和服務，香港的死亡質素提升了不少，十年前全球排名二十多，而 2016 年有了「賽馬會安寧頌」計畫後，兩年前排名已上升至第九位。

## 2 法例和政策對天主教醫療服務的影響

在五六十年代，報章常常刊登新開設業務的慈善診所的公告，甚或官員主持診所開幕的報道。這些診所由天主教、其他教會團體、街坊會、工會和其他組織贊助，旨在為貧困病人提供平價醫療，政府對此十分歡迎。當時香港合資格醫生人數不多，在這些診所服務的醫護人員，有的是具有非英聯邦醫學資格的「難民醫生」，未能滿足英國醫學委員會的標準，不能在香港註冊為醫生。有的是受過醫護訓練的護士，當沒有醫生時，她們充當醫生角色，診治派藥，服務一些病情較輕的病人。從一些受訪者口中得知，第二種情況在天主教團體開辦的診所甚為普遍。嚴格來說，上述的醫療服務並不符合法規。但 1953 年《醫生註冊條例》中規定，只有註冊醫生才能以營利形式行醫，這意味著未註冊的醫生，或者說任何人，只要不獲得利潤，仍然可以行醫。因著這個「法例漏洞」，很多慈善團體診所得以運作，政府對這現象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及至 1963 年，為確保在診所就診的病人得到可靠的治療，政府制定了《診療所條例》，規定所有診所都必須登記或登記豁免，而每名診療所註冊人須委任及保持聘用一名註冊醫生，該註冊醫生須負責其獲委任的有關診療所的醫務管理工作。<sup>25</sup>

到了八十年代，當局重新檢視 1963 年《診療所條例》的罰則。<sup>26</sup> 1981 年，醫務衛生署署長唐嘉良醫生在立法局動議修訂條例二讀時指出，相關刑罰十八年來從未修訂，過低的刑罰水平已不再具阻嚇作用，法院和警方都對此作出了負面評論。警方認為應嚴肅處理經營未經登記診所的人，並有必要對此類場所採取嚴厲行動；而有法官評論說，過低的刑罰把病人的生命置於險境。這些經營無牌診所的人，往往是無法通過執照考試在香港行醫者。自 1977 年以來，當局每年都舉行執照考試，有充足的機會讓有能力的從業人員取得資格，但在 1980 年，仍有七十人違反規定。故此當局對涉及經營或參與管理未登記診所，或在未經登記診所診斷、處方或實施任何治療，大幅提高罰則，從罰款一千元和監禁三個月，增加到五萬元和監禁五年。

《診療所條例》提升診所服務水平，但全面聘用註冊醫生意味薪酬開支增加，加上醫生匱乏，招聘困難，為當時本來資源短缺的慈善團體診所運作所帶來更大的挑戰。在 1965-1970 年間，天主教診所數目減少了四間（見表一），但同期香港人口增加了三十多萬人。<sup>27</sup> 雖然沒有資料證明該條例直接導致診所減少，但法例的改變確實為天主教診所運作帶來影響。

因應時代轉變，2018 年 11 月 30 日《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第 633 章）刊憲，引入新制度來規管四類私營醫療機構：醫院、日間醫療中心、診所及衛生服務機構，以取代逾半個世紀以來涵蓋範圍已變得狹窄的舊有條例，其中《診療所條例》（第 343 章）和《根據〈診療所條例〉註冊的診所實務守則》為非分享利潤形式營辦的診所制訂規管架構。<sup>28</sup> 五十多年後的《私營醫療機構條例》亦成為香港明愛——現在唯一提供診所服務的天主教機構——考量是否繼續其服務的因素之一（見下文）。

除了法例的影響，在前述政府醫療政策之下，社會醫療服務有所改善，天主教診所的數目在 1970-1990 年間，減少了十七間（見表一），餘下的都是由香港明愛開辦或接辦。導致教會診所進一步縮減的外在原因之一，是政府診所數目在同期增加了三十二間，遍佈港九新界各地，包括舊區和新市鎮，例如西營盤、牛頭角、黃大仙、觀塘、順利邨、沙田、大埔、屯門、荃灣、青衣、葵涌。1989-1990 年度，市民往政府診所求診也增加至大約一千五百五十萬人次<sup>29</sup>，當中頗多新設的診所位置附近原先也有天主教診所服務。另一項資料顯示，社會進步，市民獲取醫療服務的選擇和能力也大大提高。在八十年代末，約有 70% 市民在需要門診服務時，會向私營執業西醫求診，前往政府診所或向傳統中醫求診的人各佔 15%。私營診所選擇眾多、效率高，不用花長時間排隊；而政府診所的服務規模和資源充足，收費便宜，兩者都比天主教診所優勝。此外，整體社會疾病模式有所改變，主要病患成因不再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咳嗽和感冒、胃部不適、腹瀉疾病或皮膚病，而是慢性疾病甚至癌症，需要專科甚或住院治療。<sup>30</sup> 新的醫藥和診治儀器費用高昂，沒有政府的資助，天主教診所很難為病人提供合適的治療和服務。

1990 年，政府按 1985 年《司格報告書》的建議，正式成立醫院管理局，負責監督公立醫院的管理事宜，並把當時政府醫院與補助醫院雙體合併。1991 年，服務對象以基層人士為主的長沙灣明愛醫院和黃大仙聖母醫院加入醫院管理局，嘉諾撒醫院和寶血醫院則於 1991 和 1993 年先後移交由香港明愛管理，其餘兩所由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管理的聖保祿醫院和聖德肋撒醫院則以私營方式繼續服務市民。<sup>31</sup> 連同診所的關閉，天主教整體醫護服務可以說正慢慢淡出人力和財力資源需求甚高的醫療舞台。

這些決定為提供服務的教會團體殊不容易，以寶血醫院為例，在醫院手術室服務三十年的葉麗紅修女憶述當時修會想多一些修女在醫院服務，她聽命前往澳門山頂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的護士學校接受四年護士訓練，受訓後回港在寶血醫院服務。當時法例比較寬鬆，「我記得初初好像跟著馬修女，現在已經過了身，她在門診，病人什麼『頭暈身癢』都是她看的。她看完病就給病人藥，那個時候是可以的。……最高峰時醫院有十六位修女服務，每個部門都有修女，沒有領薪水的，只吃兩餐、三餐，我們只是全心全力工作、服務。」到了八十年代後期，由於人手短缺，加上修女們漸漸年長，需要退休，修會決定把寶血醫院交給香港教區。「因為不夠人，大約營運到九零年代初，我 handover 給明愛的。好像賣仔賣女一樣，很淒涼。」當寶血醫院移交明愛管理後，葉修女沒有放下照顧病患的心，她進修後在屯門醫院做醫院牧靈的工作超過十年，以另一種方式繼續陪伴受苦的人。<sup>33</sup> 醫院架構龐大，各方面牽涉的事務繁多，轉手的決定必定經過深思熟慮。相對之下，診所規模小，從前一章可見，天主教經營者雖有不捨，也會較易接受社會發展、供求改變的事實，從而像同年代的其他宗教及福利團體的「慈善診療所很多都無聲無色地結束了」。<sup>34</sup>

| 香港天主教手冊<br>年份 | 普通科診所 | 牙科診所 | 流動診所<br>(包括海上診所) | 總數 |
|---------------|-------|------|------------------|----|
| 1966          |       |      |                  | 31 |
| 1971          |       |      |                  | 27 |
| 1976          | 17    | 5    | 2                | 24 |
| 1981          | 7     | 4    | 2                | 13 |
| 1986          | 6     | 4    | 0                | 10 |
| 1991          | 6     | 4    | 0                | 10 |

表一：1965-1990 年天主教診所數目每五年的變化。1973 年之前診所數字沒有分類。（按：公教真理學會一般是在前一年年中收集各教會機構的資訊更新，至年底印行新一年的手冊，上述數字反映之前一年診所數目。）

## 2.1 教會內對醫療使命的重新定位

從戰後至六十年代，香港天主教不同組織，特別是外籍修會會士，致力為難民服務，包括與政府協商開展難民中心<sup>35</sup>、提供救濟品、營運原有的和開設新的診所和醫院照料病患等。1953 年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明愛前身）成立，職責是協調教會內各種難民服務；其後它成為國際明愛成員後，時任主席華德中蒙席努力不懈地向歐美教會募捐，籌集資金為當時貧困的基層市民開展各種社會服務。此外，白英奇主教十分關注教會的教育事業。當時香港人口激增，為幫助人擺脫貧困和無知，秉承教會辦學的使命和傳統，教區繼續投入資源，天主教學校從 1950 年七十間學校增加至 1969 年二百五十一間，學生人數也增加了十倍。<sup>36</sup>

六十年代初，天主教會舉行梵二會議。在信仰和實踐方面，此會議為當時全球的天主教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教會與世界的關係和教會在世界的角色。這體現在教會自我檢視其使命、運作和服務，回應世界的變更和人的需要。梵二會議最重要的議題之一是教會本地化問題，而在 1965 年，白英奇主教便請求教宗任命一位國籍主教作為他

的繼任人。1969年5月，香港教區迎來首位華人主教徐誠斌。翌年徐主教便召開教區會議，「目的是根據梵二精神，檢討香港教區的各項事工和進行革新，並擬定未來的發展方針」。<sup>37</sup>驟眼看來，梵二會議、教會本地化和教區會議純粹是教會內部的宗教事務，和大部分非信徒的香港市民無關，但實際上，其探討的議題除了福音傳播、禮儀、基督徒生活等信仰問題，還探索教會的社會使命，但不是純社會性或政治性的角度去探索，而是把重點放在基督徒的角度。當時教區會議建議香港明愛按會議討論內容和精神研討行政和工作方針上的優點和弱點，為能更完善地服務，這行動為香港天主教後期社會服務定下明確的方向。<sup>38</sup>隨著越來越多公共屋邨落成，明愛也在不同屋邨成立社區中心、服務窮困人士，顯示教會與基層市民同在，分享社會資源，擔當僕人角色。<sup>39</sup>

到了七十年代後半期，香港人口已達五百萬，天主教信友數目也達二十六萬人，不再是一個等待救濟的貧困社會。社會經濟的好轉亦促使五六十年代為難民事務作出許多貢獻的美國天主教福利會於1977年決定結束香港的辦事處，將其服務轉移至澳門。此辦事處1949年從上海轉移至香港，在中環公教進行社一個小辦公室內運作，隨著大陸難民湧進香港，得以快速擴張。<sup>40</sup>社會經濟起飛，出口表現亮麗，生活水平改善，教會亦由身體的健康轉而更關注心靈的健康，如《英文公教報》就有社評提醒天主教徒，物質帶來的暫時歡愉可能會令人民轉向，摧毀靈魂。<sup>41</sup>

1975年當胡主教就任後，為回應和落實梵二會議，他首要工作焦點放在教區架構改革，目的是改善牧靈和傳教工作，促進教友的使命感，參與建設教會和在日常生活中以行動傳遞福音精神。與此同時，梵二改革衝擊舊有信念，自六十年代中全球各地有不少教友及修會人士選擇離開教會。據社會學家安東尼·斯賓塞（Anthony Spencer）的計算，1959年約有三萬天主教徒「出走」，但到1960年代末，這一數字上升至每年二十三萬五千人。<sup>42</sup>雖然此一結果並不能一概而論地歸因於梵二的變革，也有社會轉變的因素，但它帶來的問題是，外國修會能否持續

委派更多傳教士來港服務，因為當時香港天主教在牧養信友和社會服務各方面十分倚重外籍傳教士。教會本地化問題亦與外國傳教會在香港的發展方向、外籍傳教士在港的角色和服務息息相關；外籍會士因為更多樣的使徒工作，需要面對工作優次的選擇，這些事例在前一章不同修會的診所服務中也有提及。

同時間，從事教育和研究工作的瑪利諾會德蘭寧修女開展了一項調查，探討在香港服務的修女的服務狀況和期望，能讓修會和教區更好地計畫未來需要，特別是修女們的需要。<sup>43</sup> 這份名為《香港教區修女狀況調查報告》指出，在 1975 年前的二十年，香港天主教會的特點是有大量的修女從外國或中國大陸來港服務，主要在她們各自營運的教育及醫療機構工作。當時從事醫療的修女人手（56 人）佔 13.4%，僅次於首位佔 42.8% 的教育事業（173 人）。這五十六人當中，有醫院院長、醫生、護士長、護理學教師、助產士、助理護士、登記護士、護士助理、營養師和人數最多的註冊護士，以及從事藥劑師、放射治療師等其他相關職位。<sup>44</sup> 接受訪問的修女群均已發初願，年齡在四十五歲以上的高達 55%，而二十一至二十五歲的卻只有 1.5%（見表二），華人佔 52.7%。這些數字意味著外籍修女人數佔差不多一半，從年輕修女數目已可預視到她們遠遠不能補充使徒工作所需的人手，尤其在人手密集的醫療工作。對於未來工作優次，受訪修女認為香港教區未來的工作，應以青年的需要為重，其次是教育及靈修輔導／宗教教育。<sup>45</sup>

| 接受訪問修女年歲 | 人數比例  |
|----------|-------|
| 21-25    | 1.5%  |
| 26-30    | 11.6% |
| 31-40    | 30%   |
| 41-45    | 11.9% |
| > 45     | 55%   |

表二：調查訪問中修女年齡分佈

此外，表三顯示 1976 至 1991 年間香港天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的數目變化。單以數字來說，十五年來教友人數維持在二十六萬左右，神父人數只增加七位，輕微增加了 2%，而女修會作為本港天主教醫療服務的主力，修女人數卻減少了 13%（一百零三人）。社會進步，無論是社會服務或信仰培育方面，人的要求自然有所提高。當服務人數減少，要維持本來的服務已見吃力。

| 年份   | 教區神父 | 修會神父 | 修女  | 教友人數    |
|------|------|------|-----|---------|
| 1976 | 64   | 274  | 770 | 250,197 |
| 1980 | 71   | 270  | 778 | 263,405 |
| 1985 | 73   | 267  | 745 | 267,321 |
| 1991 | 76   | 269  | 667 | 250,605 |

表三：70 年代中至 90 年代初香港天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人數每五年的變化。

（資料來源：《公教報》2017 年 2 月 26 日）

如前所述，呼應教會本地化，當外國傳教修會在檢視發展方向和外籍傳教士在港的角色和服務範疇時，必然會考慮到診所服務的取捨。一方面是因為診所服務涉及大量人手，而一些修會正面臨人數下降、年齡老化的問題；另一方面是整體社會醫療服務有所改善，病患者不會求醫無門，加上城市發展，部分地區診所服務需求漸漸減少，甚或因遷拆而結束。從 1975 到 1985 年間有十一間天主教普通科診所結束服務，當中由修會開辦或由修會神父、修女管理運作的佔九間，很多診所的位置與政府開設的診所地區重疊（見表四）。此外，在八十年代初，公教婦女聯誼會和拯望會先後把油蔴地聖若瑟工人診療所和荃灣啟明診所交給明愛管理，前者改名明愛油蔴地診所，後者成為明愛荃灣診所。自此，

外國傳教修會再沒有直接參與診所服務，原先活躍於醫療服務的信徒善會亦在成員的世代更替中淡出，天主教診所全由香港明愛負責。其實上，天主教診所的沒落，亦可從《公教報》七十年代的報道題材看出端倪，該年代的報道不少篇幅屬於教區會議、教育、青年、勞工事務及社會正義，而關於本地教會醫療的報道，只剩少量有關天主教醫生會和護士會的周年聚會，或是明愛周年籌款呼籲中提及。

### 1975-1990 年關閉的天主教診所

#### 港島區

嘉諾撒會 - 西營盤凌月仙診療所

#### 九龍區

瑪利諾 - 觀塘瑪利諾神父診所

聖母聖心會 - 紅磡愛德診所

加拿大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 - 鑽石山聖家施藥所

明愛 - 東頭診療所、九龍明愛中心診所

#### 新界

寶血會 - 粉嶺聖若瑟診所

聖保祿女修會 - 大埔海星診所

聖母聖心會 - 坑口法俾洛診所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 - 馬鞍山聖若瑟診所、亞松大診療所

表四：1975-1990 年關閉的天主教診所一覽表

到了八十年代，香港社會環境日趨複雜，加上回歸議題，市民面對最嚴峻的問題不再是醫療服務或物資短缺，而是家庭關係、青少年成長、吸毒和長者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服務和傳教工作必須回應這些社會及政治上的轉變。為此，胡樞機在 1989 年發表《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定下本地教會的工作和服務路向。除了牧靈和直接的傳教工

作，教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教育及社會服務範疇。香港明愛依照牧函指示的路向，再作檢討，「把工作優次放在推廣倫理教育、探討家長會／教師會所能作出的貢獻、為弱智、老年及諸如菲傭、工業勞工和問題青年等邊緣人士提供服務，以及與堂區關社小組加強聯繫。」<sup>46</sup> 直至今日，天主教的社會服務仍然強調人的尊嚴、基督徒價值和與弱勢者同行。

## 2.2 明愛的診所服務



香港明愛 70 周年展覽展示的服務時序（攝於 2023 年）

明愛整體服務的理念是「按照本身能力，隨時隨地提供最需要的社區和福利服務。根據這原則，明愛（原文是『天主教福利會』）會不時隨著情況的變更而終止一些計劃」<sup>47</sup>，故此明愛不斷檢視社會需要而調整服務範圍和內容。隨著市民對天主教診所服務需求減少，八十年代初開始，香港天主教診所已差不多全由明愛管理，當時診所數目為十三間——七間普通科診所、四間牙科診所及兩所流動診療所。到了 1990 年，數目減少至普通科診所和牙科診所各四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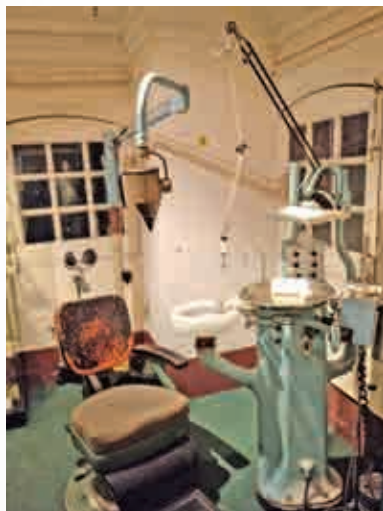
過往明愛診所是附設於明愛服務中心，運作是以中心行政主導，到了九十年代，明愛成立醫療服務部，管理醫院「公立及私家醫院」和診所。<sup>48</sup> 明愛醫療部部長雷操爽醫生接受訪問時指出，社會上有越來越基層醫療醫生<sup>49</sup>，教會的普通科診所服務需求降低；再加上香港人口疾病模式改變了，病人求診主要原因不再只是普通傷風感冒，基層醫療醫生也要照顧病人的專科或慢性疾病。自醫管局接管了所有公立普通科門診，教會診所沒有能力像政府診所一樣，以低成本提供各類型藥物，故此求診人數下跌，服務效果不顯著。<sup>50</sup> 按明愛年報記載，從九十年代初至 2008/09 年度，年度求診人數從四萬五千人降至不足一萬二千人。到了 2018/19 年度，整年求診人數更不足六千五百人。<sup>51</sup> 加上 2018 年《私營醫療機構條例》的出現，為本來服務效益不彰的診所運作帶來新的挑戰和財政負擔，經過評估後，香港明愛在 2020 年取消了所有普通科診所服務。

### 3 天主教牙科診所服務

由於政府沒有把牙科醫療納入公營醫療體系，故此明愛至今維持四間牙科診所服務。除了某些年度，其牙科診所服務大都維持收支平衡，甚或有一點盈利，而年度求診人數亦維持在兩萬人左右。<sup>52</sup> 除了明愛的牙科診所，部分天主教其他團體實際上在六十年代亦提供牙科服務，但僅屬於少數，故在本章一併介紹。

#### 3.1 早期香港牙醫發展

在傳統中醫概念中，口腔和牙齒狀況被視為反映整體健康的鏡子，中醫會幫助病者作整體醫治和調理，而不會針對性地處理牙患。以前一般人並不重視牙齒本身的健康，認為牙齒終會脫落，重點只放在處理牙患帶來的痛楚。一般方法是忍受牙痛，等待牙齒脫落；又或找拔牙匠拔除、修補有問題的牙齒。拔牙匠的技術傳授是依靠祖傳或師徒式傳授，沒有規範。直至十九世紀末，在香港居住的外籍居民增加，對正規牙科醫療有所需求。1880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並獲得專業牙科學位的寶特醫生（Dr. Herbert Poate）在香港成立了第一間正規的牙科診所。1887年，他的校友那布醫生（Dr. Joseph Whittlesey Noble）也加入其診所工作。兩人積極參與香港醫學界組織，後期他們合伙的牙科診所還在雅麗氏利濟醫院提供免費的牙科服務。<sup>53</sup> 至於首位華籍牙醫周夢熊則要到1901年才出現。<sup>54</sup> 後來政府為了規管牙科服務，在1914年6月推出第一部《牙科條例》，承認牙科外科醫生為專業，開始正式規管並設立牙醫名冊，分為接受過正規訓練的牙醫，和在《牙科條例》頒佈前以其他方式獲得技術且已經執業的從業人員（「豁免」人員）。首份名冊中每類只有一個名字，當中第一位在香港註冊的牙醫就是被譽為「中華牙醫鼻祖」的關元昌醫生。<sup>55</sup>



舊式牙科治療椅及器材（攝於 2023 年，獲香港醫學博物館准許使用）

在香港醫學博物館二十五周年系列「牙科：源來如齒」講座中，香港牙醫學會前會長（任期 1972-73）曾翼生醫生指出：「二次大戰前，只要有兩名太平紳士擔保品格良好，便可以牙醫身份為市民處理牙齒問題，可想而知水平和訓練也是參差不齊，而且當時本地沒有牙科培訓學校，主要靠外國來港或在外地完成培訓的專家提供專業牙醫。」<sup>56</sup> 1940 年《牙科條例》被廢除，當時名冊只有二十三名牙科外科醫生和九名豁免人員。同年立法會通過了《牙醫註冊條例》，該法令規定了兩年的臨時期，供任何未取得正規牙醫訓練資格的人向政府提供宣誓書，證明他依靠從事牙科醫療為主要謀生手段，以獲得豁免註冊。《牙醫註冊條例》的通過，一方面結束了牙科師徒式傳授時代，規範了牙科醫療的發展；另一方面有認可牙科醫療訓練資格的人為數甚少，沒有註冊或未能獲得豁免註冊的人若繼續從事牙醫服務就是「無牌行醫」。

### 3.2 山寨牙醫、城寨牙醫

二戰過後，大量大陸移民湧入，牙科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受牙患之苦的市民面對求診無門和費用高昂的困境。據《華僑日報》1955 年

的報道，當時香港人口為二百五十萬，而在港執業的註冊牙醫人數約二百人，即平均每一萬市民只有約 0.8 名牙醫。<sup>57</sup> 在五十年代末期，私家牙醫普通拔牙一隻收費最少十元<sup>58</sup>，對於普羅大眾來說這是一個沉重負擔，遑論其他如洗牙、補牙等牙科護理。所以當時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服用成藥止痛、待牙齒自行脫落，又或光顧無牌牙醫，其中又以九龍城寨的無牌牙醫最普遍。

早在 1940 年《牙醫註冊條例》通過時，部分沒有註冊或未能獲得豁免註冊的「牙醫」不願意「改行」，繼續無牌行醫，而九龍城寨就是無牌牙醫的集中地，這一現象在九龍寨城公園的網頁也有提及：「二次大戰後，大量多層樓宇在沒有政府監管和欠缺穩妥地基的情況下如雨後春筍般在寨城內興建。樓宇密集、通道濕窄的寨城逐漸成為罪惡的溫床，內有黃、賭、毒窟、罪犯匿藏的巢穴以及廉價的無牌牙醫等。」<sup>59</sup> 原因是按 1898 年清廷與英國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列明，「所有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職，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這讓九龍寨城成為港英殖民統治的「飛地」，管治權仍屬中方。其特殊的地位，亦令九龍寨城成為戰後移民、逃避英方法律制裁的「三不管」地帶。<sup>60</sup> 當年九龍城寨內主要分為東西兩區，西區是一般民居、小型工廠，而一切不法勾當都集中在東區。這些無牌牙醫，有些是原先在香港執業的、有些是從大陸來的專業人士，但未能註冊或獲得豁免，於是在城寨經營無牌牙科診所行醫，為市民提供了收費低廉的服務。按 1987 年 2 月出版的《城寨福利會訊》，七十年代以來，曾到城寨診所（普通科和牙科）就診的有數十萬人次。<sup>61</sup> 在大埔長大的廖偉盈先生提到，七十年代初在大埔區是沒有私人牙醫，如果牙齒有問題，「爛到不能再爛就沒事了」，而家住橫頭磡的林桂明先生憶述光顧九龍城寨無牌牙醫，「剝一隻牙收費十五元。如果去私人牙醫求診，費用就高很多」。九龍城寨的診所他也只不過去過一兩次，通常牙齒不痛就會置之不理了。<sup>62</sup>

牙齒疾病不像其他疾病那樣引致即時生命危險，所以香港政府沒有投入大量資源發展公營牙科醫療服務，對無牌牙醫現象也沒有大力取締。

在「牙科：源來如齒」講座中，李健民醫生提到他在學時曾做過相關調查，港大牙科學院在 1982 年成立時，市面仍有逾二千名非法牙醫<sup>63</sup>，而「據 1983 年 8 月 10 日的調查，九龍城寨內共有 97 間牙科診所」。<sup>64</sup>後來中英兩國在 1987 年達成清拆城寨協議時，港英政府提出補償方案，加上更多本地牙科畢業生陸續投入服務，成行成市的非法牙醫才被逐漸淘汰。

### 3.3 香港政府牙科醫療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一般市民對牙科護理的需求非常低。很多人認為牙齒是可有可無的物品，對牙齒衛生和護理沒有認識，哪怕有意識，沉重的費用也令人卻步。當時只有富人才向私人牙科醫生尋求治療，而香港政府只僱用少數私人牙科醫生為公眾提供必要的醫院和緊急牙科治療。戰後初期，政府成立了三個牙科診所，開展政府牙科服務，為公務員、他們的家屬和政府養老金領取者提供全面的治療。該服務還為監獄囚犯和公立醫院的長期住院患者提供有限的服務；至於一般公眾，政府只提供一定程度的緊急牙科護理，而且名額很少。

隨著人口增加，政府不得不面對牙醫嚴重不足的事實，也意識到單純靠治療方式無法改善居民的口腔健康。1953 年香港牙醫學會<sup>65</sup>向政府提出兩個建議：在食水加氟及籌設牙科專門學校，減少牙患和改善牙科醫療人力資源。前者獲得政府接納，於 1961 年開始在食水加氟，使得無齲齒（蛀牙）的兒童比例大大改善：從 1960 年的 3% 改善至 2021 年的 49%。<sup>66</sup>至於建議設立牙科專門學校一事，政府一直擱置，但為了舒緩牙醫短缺和社會批評，1955 年香港政府設立了牙科獎學金計畫，讓香港居民在英聯邦大學的牙科學院接受專業教育，畢業後必須回港在政府牙科部門服務一段時間。但這計畫成效不理想，因為牙醫人數增幅遠遠低於人口的增長。1969 年香港人口與牙醫比例是每一萬市民只有約 0.5 名牙醫，比 1955 年數字 0.8 還要低。<sup>67</sup>直至 1976 年香港大學開始籌辦牙醫學院，於 1982 年起每年培訓大約六十名牙科醫生，香港牙醫人數才得以穩定增長。此外，政府於 1980 年恢復小學學童牙科保健

服務，這項服務正正由於缺乏牙醫，於 1963 年取消了。與此同時，當局亦開設牙科護士訓練學校培訓牙科治療員，以配合服務學童，推行口腔健康教育。<sup>68</sup>

### 3.4 天主教會營辦的牙科診療所<sup>69</sup>

在政府不願意把牙科醫療納入公營醫療體系的大前提下，新增的牙醫大多是私人執業，高昂的費用令有牙患的普羅大眾寧願忍受痛楚，不輕易求診，遑論牙齒護理。故此，在六七十年代一些慈善機構如香港明愛、扶輪社等設立了非牟利的牙科診所，以滿足部分貧困人士的牙科醫療需求。而且關於市民對牙科保健的需求和應對，教會主事者的看法明顯與政府有別。1965 年，天主教福利會主席華德中蒙席接受流動牙科醫療車捐贈儀式時指出，傷風感冒被視為最普遍的疾病，「這是謬論」，因為全港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兒童有蛀牙問題，有些嚴重到需要拔牙。在一百萬名學童中，四份之三有幾百萬隻蛀牙」，很明顯「單是兒童牙齒護理的需要已經很龐大」。<sup>70</sup>

就在這個牙科醫療服務匱乏的年代，香港天主教團體，特別是天主教福利會（即香港明愛前身），開始在一些既有的診所中增加牙醫服務。由於缺乏牙醫是香港整體現象，當時天主教牙科診所服務多是依賴兼職醫生，盡量安排人手使服務涵蓋香港多個地區。後來按資源調配和服務需求變化，一些牙科診所服務已停止運作，現存的還有四間明愛牙科診所繼續服務市民。

至於最早記錄有牙醫服務的天主教診所是九龍東頭村福主教診療所<sup>71</sup>，於 1952 年由瑪利諾修會開辦。五十年代只有普通科，六十年代初牙醫才開展服務，當時有羅醫生（Dr. Joseph Law）及陳醫生（Dr. Stephen Chan）駐診。牙醫服務運作至六十年代尾<sup>72</sup>，而普通科診所於七十年代後期亦告結束。

差不多同期成立的另一間牙科診所，是公教婦女聯誼會於 1963 年在油蔴地上海街開設的聖若瑟模範工人診所，提供全日普通科和半日牙科醫療服務。香港明愛社會服務部前任部長陳秀嫻女士在訪問中提及公教婦女聯誼會擁有診所物業，診金收得便宜，約兩至五元之間。後來診所經費不足，為了繼續服務貧苦大眾，公教婦女聯誼會決定把診所物業和運作交予明愛。診所醫生多是兼職、半義務性質，如果醫生來幫忙看症，明愛負責給他們津貼，其中一位應診的醫生就是公教婦女聯誼會一位會員的丈夫。<sup>73</sup> 模範工人診所在六十年代末已停止牙醫服務<sup>74</sup>，診所名稱於 1981 年亦改為明愛油蔴地診所<sup>75</sup>。油蔴地診所結束牙醫服務後，脫牙和補牙服務改由界限街明愛聖德肋撒診療所提供，位置即今天界限街明愛服務中心。1983 年明愛在油蔴地聖若瑟模範工人診所舊址重新開設油蔴地明愛牙科診所，至 1994-1995 年間結束。



白英奇主教（右一）和華德中蒙席（左一）接受德國天主教福利會  
送贈流動牙醫車。（照片由香港教區檔案處提供）

港島區方面，1964 年天主教福利會在堅尼地城開設「若望二十三世社會中心」，提供職業訓練、日間托兒所、普通科門診部和牙科診療服務。牙醫是兼職性質，同一位牙醫在不同日子去明愛不同的牙科診所應診，所以若望二十三世診療所的牙醫服務每星期只有一至兩個下午。其後由於社會中心發展計畫重點放在照顧青年和兒童的需要，若望

二十三世診療所服務在 1968 年 12 月也停辦了。另一所在港島區的天主教牙科診療所是六十年代在柴灣新區開辦的海星牙科診療所，牙科診所設備儀器由東區扶輪社捐出，由海星堂瑪利諾會文顯榮神父負責管理，駐診牙醫是林建勳醫生。<sup>76</sup> 診所費用低廉，拔牙一隻兩元，補牙五元。1974 年診所改名為明愛柴灣牙科診療所，1982-83 年間診所結束。<sup>77</sup>

如果在市區找牙醫求診已經這麼困難，那麼在交通不便、人口分散的新界，有牙患的居民更是求醫無門，苦況更不可想像。1965 年初，香港天主教福利會獲德國天主教福利會及弗里堡總教區主教聯合送贈一輛設備完善的流動牙醫車，開往不同的學校為學童服務，同時兼為堂區、徙置區患者服務，兒童五毫，成人一元。<sup>78</sup> 當時全港還有另外四部由其他非政府福利組織運作的牙醫車。香港天主教福利會營運的這部流動醫療車會前往沒有醫療設備的明愛中心服務，並按時前往港九新界各校，觸及範圍由港島南面的香港仔遠至新界錦田、元朗及邊境地區。據年報統計，流動醫療車診治患病者每年度均逾千人，而牙疾求診者每每是其好幾倍，確實以治理牙患者為多。

在七十年代，明愛的流動牙醫診療所每年照顧的求診人數高達七八千人。<sup>79</sup> 由於流動醫療車運作費用高昂，按《1981/82 明愛年報》，單是該年度，流動牙科醫療車的營運赤字差不多高達十七萬元。最終牙科醫療車服務在 1982 年結束。<sup>80</sup>

### 3.5 現存及未來的牙科服務

香港明愛現有的牙科診療所之中，歷史最悠久的是香港仔田灣聖高弗烈診療所<sup>81</sup>，1962 年開始投入服務，為居民提供脫牙、補牙和洗牙服務和推廣牙齒健康和護理方法，收取費用為一至五元，比私人牙醫收費便宜一半以上。初期診所每周服務三節時段，每星期為六十個病人治理牙齒；<sup>82</sup> 到了七十年代末，服務時間增至每周兩天，到了八十年代初開始有全職牙科醫生，增加假牙製作、根管治療（「杜牙根」）等服務。診所後期更名為明愛香港仔牙科診所。

另一間設在港島區的是明愛堅道牙科診所，位於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毗鄰的明愛大廈。1968年，署理港督祈濟時爵士（Sir Michael David Irving Gass）為堅道明愛大廈主持開幕，大廈二樓為慈善醫療中心，除了普通科外，還包含牙醫室及X光室。<sup>83</sup>牙科診所提供脫牙、補牙、洗牙和安裝假牙等服務。



堅道牙科診所是目前僅餘的四間明愛牙科診所之一（攝於2023年）

至於九龍區，明愛牛頭角牙科診所位於明愛牛頭角社區中心地下，該中心於1970年成立，《香港天主教手冊》從1976年開始記載明愛牛頭角牙科診所服務，至今超過四十五年。最後一間是明愛荃灣牙科診所，2010年香港明愛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的資助，改裝原有普通科診所，增設牙科，在翌年9月投入服務。<sup>84</sup>荃灣明愛普通科診所所在2020年底畫上了句號，牙科診所則仍然維持服務。<sup>85</sup>

超過半個世紀，香港政府牙科醫療政策仍然停留於鼓勵市民預防牙患，而非投入資源提供免費或低廉牙科服務。按衛生署網頁，目前三十九間政府牙科診所仍主要是為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服務，當中只有十一間可為公眾提供止痛及脫牙的緊急服務，但名額僅四千。即使時至今日香港牙科醫學技術有所提升，但香港人口與牙醫比例是每一萬市民約有3.7名牙醫，落後於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一般工業化國家的人口與牙醫比例，即每一萬市民有五名牙醫。<sup>86</sup>2023年1月《香港01》報

道，市民即使花長時間在深夜輪候政府診所緊急牙科服務，仍是一籌難求。<sup>87</sup> 沒有公營醫療支援、牙醫比例偏低、加上私營診所動輒過千甚至上萬元的高昂價格，人口老化帶來更多的牙齒健康問題，基層負擔仍然沉重。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更多市民選擇跨境到內地惠顧價格較香港平均低六至九成的牙科服務。<sup>88</sup>

基於服務為本，以及前述華德中蒙席觀察到市民對牙科醫療的高需求，香港明愛的牙科診維持低廉的收費支援社區牙患病人，特別是基層人士。如果患者是領取綜援的，診金由政府代付。四間牙科診所中，尤以牛頭角區的服務需求最大。與政府牙醫服務不同，這四間診所服務目標不單為減少病人牙患痛楚，更盡量提供脫牙以外的治療牙患方案，讓病人選擇，好能盡量保存病人牙齒。這樣可以減少患者，特別是長者，因牙齒問題帶來進食困難、營養不良等問題。不過，當被問及香港明愛會否增加牙科診所數量，香港明愛現任醫療服務部部長雷操爽醫生回應：「第一步不是開多一些診所，而是聘請多一些牙醫，服務更多病人。因為我們很多中心都有兩間診室，兩張牙科椅，但現在每間診所的使用率還未達百分之百。……我們外在環境可以做得更多，最重要是有牙醫和牙醫助護，現在兩種職位在人手招聘上也不容易。」

## 4 天主教會為病者服務的延續

在普通科診所服務停止前後，不同修會團體開始投身於其他社會服務，又或在前線診所服務以外，逐漸轉為醫院牧靈的輔助角色，關懷病人及其家屬，正如前面提到，其中有一群天主教醫護人員及修會人士更大力推動臨終關懷。

早在七十年代中，在診所服務以外，聖高隆龐傳教會的修女在打鼓嶺開辦英語學習班，並推出送飯服務。八十年代末，香港的肺傳染病受到控制，修女讓本地醫護人員接手管理律敦治療養院。前線醫療服務雖然結束，好幾位修女仍然關顧病患的需要。例如紀寶儀修女退下律敦治療養院服務後，啟動了香港寧養照顧的推廣工作。當她為善寧會的創會主席時，與同會李潔靈修女（Sr. Mary Geaney）及其他女修會共同推動善寧會成立白普理寧養中心。另一位曾在律敦治療養院和打鼓嶺診所服務的黎碧潔修女在九十年代從外地進修回港後擔任醫院牧靈工作，直至 2012 年返回愛爾蘭。

瑪利諾女修會卜瑪利修女曾在明愛牛頭角診所擔任主管（1965-1976），八十年代初在加拿大深造回港之後二十多年來，先後在聖母醫院及明愛社區中心從事護理服務及牧靈，又協助兩間公立醫院成立牧靈部。同會的祈愛蘭修女曾在觀塘診所和聖母醫院工作，看到臨終病人在心靈關顧方面的需要，便推動善終服務。她是善寧會的執行委員會委員，同樣參與了白普理寧養中心的興建計畫。

因著新市鎮發展，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於 1986 年結束在馬鞍山診所和社會服務後，重新分配服務，其中何桂萍修女在香港教區內推廣醫院牧靈服務和培訓相關人員。何修女是祈愛蘭修女最先派去菲律賓修讀醫院牧靈課程的兩人之一。同樣地，其他不同修會會士離開了診所服務工作後，仍然選擇往醫院探訪病人，與他們傾談，聆聽他們的心聲。談到醫院牧靈，不得不提及香港天主教教區醫院牧民委員會。該委員會於 1991 年由時任副主教林焯煒神父成立，並先後由耶穌寶血女修會王

秀玲修女及聖高隆龐會衛愛蓮修女（Sr. Mary Anthony Ryan）擔任主席。多年來，醫院牧民委員會致力推廣醫院牧靈工作，在眾多委員的努力下，到今天已在三十多間醫院設有牧靈部，為照顧病者及其家屬靈性的需要。<sup>89</sup>

331

第四章

1970-1990

在歷史使命中功成身退

## 小結

從七十年代中開始，香港天主教教會的牧靈和社會服務方向和重點有所改變，外來傳教修會會士老化和流失，加上香港的醫療政策和制度逐漸建立及優化，病患者得到基本醫療的狀況得到改善，天主教診所作為香港醫療制度輔助的角色漸漸消褪。時至今日，香港明愛在 2020 年關閉了所有普通科診所，餘下四間牙科診所服務；從事醫療的傳教士則投身於牧養和陪伴病患者。這些改變反映了天主教社會服務的特色，不在於服務種類或某種特定成功經驗，而是回應人的需要。正如前述，《公教報》七十年代的報道，更多是關於教育、勞工、社會正義，這些明顯受梵二會議的成果所影響。自十九世紀末，香港天主教會透過不同形式服務有需要的人，診所服務正正回應當時社會受苦者的需要。當診所服務需求減少時，教會毫不猶豫地更改服務形式，繼續支援與陪伴有需要的，特別是窮困的人；又或是投身於其他社會服務。正如梵二文憲《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 1965）一開首便指出：「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基督徒的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教會深深感到自身和人類及其歷史，具有密切的聯繫。」（#1）

## 註釋

- 1 李亮：〈過去五十年香港教區內部結構及關係重組〉，收於張家興編：《社會變遷與教會回應交流會論文集》（香港：公教教研中心，1996），頁 25。
- 2 林昭寰：〈香港醫療政策的發展與分析〉，收於余雲楚、馮可立、林昭寰等著：《醫學霸權與香港醫療制度》，修訂版。（香港：中華書局，2019），頁 104-131。
- 3 劉騏嘉、李敏儀：〈長遠醫療政策〉，附錄 I，臨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1997。<<https://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sec/library/c01plc.pdf>>
- 4 顏文雄、趙維生、黃威廉：《香港社會政策的迴響》（香港：集賢社，1988 年第二版），頁 221。
- 5 顏文雄、趙維生、黃威廉：《香港社會政策的迴響》，頁 209-219。
- 6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96. 該七十三間診所包括普通科診所、專科診所和母嬰健康院。
- 7 China, Hong Kong, SAR, Population Pyramids of the World from 1950-2100: <<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
- 8 劉騏嘉、李敏儀：〈長遠醫療政策〉，附錄 I。
- 9 1973 年全港醫院病床數目為每一千人有 4.0 張病床，見《香港統計年刊》數字。
- 10 從 1974 年至 1990 年間建成的醫院包括港島麥理浩復康院（1984）、九龍瑪嘉烈醫院（1975）和新界小欖醫院（1972）、葵涌醫院和大埔醫院（1981）、威爾斯親王醫院（1984）和屯門醫院（1990）。回應白皮書建議，九龍瑪嘉烈醫院開設了老人科病床，而葵涌醫院專門照顧精神科成年人，同時提供多項附屬精神科的服務。註：不包括其他團體興建而後期移交給醫院管理局的醫院。
- 11 1985 顧問報告書 Scott's Report 在不同文件、書籍中有不同的中文翻譯，例如《司格報告書》、《斯科特報告書》、《司葛報告》等，本文採用《司格報告書》。
- 12 見醫務衛生署網頁 <<https://www.primaryhealthcare.gov.hk/bp/tc/supplementary-documents/appendix/appendix-c/>>
- 13 政府在 2017 年 11 月設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
- 14 何寶英、陳和順：〈從中西醫融合看醫療霸權〉，收於余雲楚、馮可立、林昭寰等著：《醫學霸權與香港醫療制度》，修訂版。（香港：中華書局，2019），頁 223-254。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pp.289-293.
- 15 何寶英、陳和順：〈從中西醫融合看醫療霸權〉，頁 224。
- 16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頁 178、226-228。

- 17 何寶英、陳和順：〈從中西醫融合看醫療霸權〉，頁 225。
- 18 見香港衛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網頁：<[https://www.cmro.gov.hk/html/b5/about\\_us/development.html](https://www.cmro.gov.hk/html/b5/about_us/development.html)>
- 19 見《基本法》網頁：<<https://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chapter6.html>>
- 20 何寶英、陳和順：〈從中西醫融合看醫療霸權〉，頁 225。
- 21 為符合資格人士，現時公營普通科門診（西醫）費用是每次診症五十元，每種處方藥物以最多十六星期為一徵收單位，每單位收費為港幣十五元正（自費藥物除外）。因為中醫沒有政府資助，在公營中醫診所每次診症收費為一百二十元，包括診金及最多五劑中藥。
- 22 〈寶血會中醫修女 雙重身份救人救靈〉，《公教報》，2020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kkp.org.hk/past/detail/45118/>>
- 23 現今全人關顧的四大元素，成形於世界衛生組織 1946 年通過對健康的定義，即個人在體格（身）、精神（心）及社會（社）適應三方面完全健康狀態；後期有許多討論支持加上屬於觀念、信念、價值及倫理範疇的「靈性」維度。
- 24 生死教育學會創辦人謝建泉醫生在 2023 年 11 月 25 日天主教醫護生死教育歷史回顧講座中的發言。
- 25 按 1963 年《診療所條例》註冊主任可按其絕對酌情決定權，使 1963 年 9 月 5 日前已存在的任何診療所豁免受條文規限，不用委任及保持聘用一名註冊醫生管理診所醫務工作。
- 26 LegCo Hansard, July 8, 1981.
- 27 China, Hong Kong SAR, Population Pyramid of the World from 1950-2011: <<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
- 28 〈私營醫療機構規管〉，衛生署私營醫療機構規管辦公室網站，<[https://www.orphf.gov.hk/tc/regulatory\\_regime/new\\_licensing\\_scheme](https://www.orphf.gov.hk/tc/regulatory_regime/new_licensing_scheme)>
- 29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pp.96-110.
- 30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pp.111-126.
- 31 按批地條款聖德肋撒醫院需向市民提供不少於兩成的病床為低收費病床，即每日住院費用不得超出公立醫院三等病床的最高收費。按 2022 年十月數字，聖德肋撒醫院提供一百零四張資助病床。見聖德肋撒醫院網頁 <<https://www.sth.org.hk/download/Chi%20-%20About%20Subsidized%20Ward.pdf>>
- 32 更多關於馬慕真修女生平，見第三章寶血女修會一節。
- 33 寶血會葉麗紅修女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7 月 5 日。

- 34 劉蜀永、姜耀麟：《植根基層 70 載——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簡史》，（香港：和平圖書，2020），頁 101。
- 35 從 1948 年開始至 1952 年底，天主教香港教區共開設了八個難民中心，分別位於調景嶺、馬鞍山、東頭村、鑽石山、九龍仔、長沙灣、牛頭角和柴灣。
- 36 李亮：〈過去五十年香港教區內部結構及關係重組〉，頁 22。
- 37 李亮：〈過去五十年香港教區內部結構及關係重組〉，頁 23。
- 38 李亮：〈過去五十年香港教區內部結構及關係重組〉，頁 25-35。
- 39 陳秀嫻：〈教會從社會服務回應社會變遷的探討〉，張家興編：《社會變遷與教會回應交流會論文集》（香港：公教教研中心，1996），頁 209-224。
- 40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76-1980 (1982), p.36.
- 41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76-1980 (1982), p.39.
- 42 Madeleine Davies, "A Post-Vatican II Exodus," *Church Times*, Sept 6, 2019: <<https://www.churchtimes.co.uk/articles/2019/6-september/features/features/a-post-vatican-ii-exodus>>
- 43 當時教區有二十二個女修會共 793 位修女，636 位可回答的修女當中，共回收 404 份問卷。
- 44 Sister Joan Delaney, *A Survey on Religious Women in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Major Superiors of Religious Women, 1975), p.24.
- 45 Sister Joan F. Delaney, *A Report on a Survey of Religious Women in Hong Kong*, pp.11-16.
- 46 李亮：〈過去五十年香港教區內部結構及關係重組〉，頁 37-38。
- 47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 1968-1969 年度年報書》，頁 1。
- 48 李啟宇：〈力理得神父與我〉，頁 39。
- 49 「基層醫療」是指在普通科門診、專科門診、住院三層醫療系統中的第一層。
- 50 《明愛年報 1992/93》：普通科診所年度赤字為 \$2,045,745，求診人數為 46,324 人；《明愛年報 2008/09》：年度赤字為 \$300,162，年度求診人數為 11,861 人；《明愛年報 2018/19》：年度求診人數為 6,362 人。按：2010/11 年度開始，網上《明愛年報》不再刊登個別服務的盈利、赤字資料。
- 51 《明愛年報 1992/93》：牙科診所年度求診人數為 20,054 人；《明愛年報 2008/09》：年度求診人數為 16,295 人；《明愛年報 2018/19》：年度求診人數為 21,450 人。按：2008/09 年度有三間牙科診所，另外兩個年度期間服務的診所有四間。
- 52 Chiu, G KC, and W.I.R. Davi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Dentistry in Hong Kong." In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4, No. 1 (1998), 73-74.

- 53 周夢熊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第一位華裔畢業生。<<https://global.upenn.edu/global-initiatives/history-penn-china>>
- 54 關肇碩、容應英：《香港開埠與關家》，（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頁 7-10、45-48。
- 55 〈由山寨牙醫處處到牙醫規範化 你知道香港牙醫的歷史嗎？〉，《醫理說》，2021 年 11 月 14 日；<<https://shorturl.at/myWZ5>>
- 56 〈赴馬來亞大學學習牙科 本年七八兩月申請〉，《華僑日報》，1955 年 7 月 8 日。
- 57 〈公務人員牙科治療半補助一取消〉，《華僑日報》，1958 年 3 月 24 日。
- 58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九龍城寨公園歷史：<<https://www.lcsd.gov.hk/tc/parks/kwcp/historical.html>>
- 59 關懷遠：〈從歷史裏走出來的九龍城寨〉
- 60 陳惠芬：《由「九龍寨城」到「寨城公園」》（香港：陳惠芬，2008），頁 204-205。
- 61 廖偉盈先生、林桂明先生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10 月 19 日。
- 62 〈由山寨牙醫處處到牙醫規範化 你知道香港牙醫的歷史嗎？〉，《醫理說》。
- 63 陳惠芬：《由「九龍寨城」到「寨城公園」》（香港：陳惠芬，2008），頁 205。
- 64 香港牙科學會於 1950 年 2 月成立，並在 1973 年改為香港牙科協會，現在名稱是香港牙醫學會。
- 65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Dentistr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Medical Societies of Hong Kong, 1985, 74, 及衛生署《2001 年口腔健康調查報告》頁 156。
- 66 <觀塘職業訓練中心牙科診所及醫療室定本月十二日行啟用禮>，《華僑日報》，1969 年 6 月 10 日。
- 67 <學童牙科保健計劃 預料將擴展至中學>，《華僑日報》，1978 年 11 月 1 日。
- 68 牙科診療所不包括附設於醫院的牙科服務。
- 69 “Caritas Gets Mobile Dental Clinic From German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March 5, 196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6.
- 70 1968 年診所交由天主教福利會管理，後期先後改名為天主教福利會診療所和明愛東頭診療所；1970 年之後再沒有記載東頭診所牙醫服務。
- 71 1963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頁 292。
- 72 陳秀嫻女士接受天主教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訪問，日期：2022 年 12 月 8 日。

- 73 七十年代開始，天主教手冊已沒有福主教診療所或聖若瑟模範工人診所的牙醫服務記載。
- 74 1981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頁 354。
- 75 〈東區扶輪社捐贈牙科診所 設柴灣新區第十二座〉，《華僑日報》，1966 年 6 月 25 日。
- 76 1974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頁 339。按：1983 年開始，天主教手冊再沒有記載明愛柴灣牙科診療所的服務。
- 77 “Caritas Gets Mobile Dental Clinic,”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46-), 5 March 1965;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p.6; 〈德國天主教福利會贈予本港福利會一輛流動牙醫車〉，《公教報》，1965 年 3 月 12 日，及〈福利會流動牙醫車 本月起為學童服務〉，《公教報》，1965 年 4 月 2 日。
- 78 流動牙科醫療車求診人數記錄：見 1971-1977 每年的《明愛年報》。1977/78 或之後的年報已沒有獨立記錄流動醫療車求診人數。
- 79 《香港天主教手冊》1982 年開始已沒有記載天主教流動醫療服務。
- 80 初期牙科診所沒有獨立名稱，與普通科診所名字相同。中文名稱最初名為「福利會中心診療所」，1965 年改為「天主教福利會聖葛菲診療所」，1966 年改為「天主教聖高弗烈診療所」，最後到了 1976 年改為「香港明愛聖高弗烈診療所」。1977 年開始，牙科診所有自己的名稱：香港仔明愛聖高弗烈牙科診療所，即今明愛香港仔牙科診所。
- 81 《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十週年特刊》，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1971 年。
- 82 〈全港最大福利中心 署理港督主持揭幕〉，《華僑日報》，1966 年 6 月 25 日。
- 83 1976 年《香港天主教手冊》，頁 361。
- 84 《香港明愛周年報告 2010/2011》，（香港：香港明愛，2011），頁 44。
- 85 《香港明愛周年報告 2020/2021》，（香港：香港明愛，2021），頁 52。
- 86 〈牙醫人手荒〉，《明報》，2022 年 8 月 16 日。
- 87 〈公營牙醫短缺 | 政府堅持私營主導 基層長者形同「無牙老苦」〉，《香港 01》，<[https://www.hk01.com/article/85950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https://www.hk01.com/article/85950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 88 〈96% 港人感本港睇牙貴 北上診療成趨勢 跨境牙科保險滿足需求〉，《香港經濟日報》，2023 年 10 月 31 日。
- 89 香港天主教教區醫院牧民委員會網頁，<<https://hpc.catholic.org.hk/%e9%97%9c%e6%96%bc%e6%88%91%e5%80%91/%e6%88%90%e7%ab%8b%e5%8f%8a%e7%99%bc%e5%b1%95/>>

天主教會在信仰傳統和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便與西方文明及醫學和醫療服務結下不解之緣。修道院的經典抄寫，大學的成立，以及教宗的敦促，使修道人成為醫學知識的傳播和學習者、醫療服務的提供者。但有一段時期，教會對神父及修女從事醫療工作有諸多規限，神父因肩負施行聖事之職，更不被鼓勵擔任繁重和見血的醫護工作。不過，教會訓導當局亦深明醫療服務有利於傳教，對那些到異地傳教的教士有較寬鬆的限制。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歷史當中，不難看到不同年代的傳教士為掌權者治病，又以贈醫施藥方式與基層民眾接觸，從而獲得好感和信任，作為傳教的第一步。香港在 1841 年雖已被佔領開始殖民統治，但這片土地在民族上與中國同根連枝，在天主教體制內仍屬中國教會的廣東教省，即使由代牧區升格為教區，其轄區實則上絕大部分面積仍在大陸境內，而很多外國修會更把香港視作前往內地傳教的踏腳石，直至 1949 年後因政治現實而只限於現今香港特區全境，故而當時對華人的醫療傳教策略和看法可說基本上是一致的，包括由修女從事醫療服務接觸婦女，好讓神父們更專注於聖事、教會管理及傳教牧靈，成為心靈的醫治者而非神父醫生。

本研究由天主教會在香港成立半世紀之後開始，分三個時段、三大服務團體和組織來展現本港天主教診所在一百年間的發展歷史。第一個時段是 1890-1945 年，即開教之後半個世紀至日佔結束。在十九世紀中後葉，最早從事醫療工作的教會團體只有從外地前來的女修會——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和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她們起初對傳教和服務沒有全盤計畫，因為她們一抵埗便投入工作，社會有甚麼需要便從事甚麼。這些外籍修女本身要面對水土不服、衛生條件不佳，加上繁重工作所帶來的健康問題。在香港的團體與遠方的母會溝通不容易，需要花很長時間

和功夫才能爭取到人力和財力的支持。她們同時間還要面對言語障礙、文化差異、種族階級分明等困難，基本上是抱著石頭過河的一個摸索階段。從信仰角度來看，摸索的勇氣來自信德和傳教熱忱。藉醫療等有形哀矜的慈善服務來傳教，靈魂得救是這一階段的重要使命。

天主教會在這個漁村小島立足之初，醫療服務著眼點是照顧不適應亞熱帶氣候的外籍病人。隨著收養孤兒、保護婦女和教育等社會福利事業的開展，修會在其會院或教會學校附近開設診所，向華人贈醫施藥，與其他教會事工互相呼應。這些新設會院的地點多是貧困地區，比政府更早關顧窮苦人士。與此同時，因為言語不通，嘉諾撒仁愛女修會衍生了第三會，招納有意修道的華人女性協助服務，孕育成日後的寶血女修會——教會內的另一支醫療隊伍。然而，對西方醫學的憂慮，初期香港的華人居民不輕易接受或相信西方的醫療服務，公立醫院和私人執業的外籍西醫收費昂貴亦令他們卻步。這情況一直至 1894 年鼠疫爆發才開始扭轉過來，因為西方醫術的治療效果令華人改觀，政府對華人衛生和健康問題也改弦易轍，主動管理而不像在疫情前放任不管。此外，當時的西醫以男性為主，助產服務因能減低嬰兒夭折率和孕婦死亡率，讓華人婦女慢慢接受西式醫療。政府撥地給地方華人士紳成立華人公立醫局，委派由華人西醫主理，除了作為病疫的數據收集，也進一步把西醫推廣開來。

時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獨立出來的寶血女修會開始有了自己正式的醫療事業，早期在深水埗貧民區以總會院旁的寶血醫院和嬰兒診所為主要服務。此外，瑪利諾女修會 1921 年的到來，標誌著女修會的服務不再是沒有計畫的摸索，而是很清楚傳教目的地的需要，奉派前來的瑪利諾修女部分是醫療專業。雖然瑪利諾修女起初也是以中國大陸為目的地，但曾同意擔任公立九龍醫院的護理工作，可惜最後落空。所以在 1890 年至戰前的五十年間，天主教會仍是以女修會為醫療主力，多數與孤兒院、學校等機構及修會會院相連和相關。到了三十年代末的備戰期到日佔結束之間，神父、修女們的修道人身份，加上原本的國籍，成為了他們服務的助力或障礙。不過，即使在拘留營內還是在所謂的「自

由」生活中，教會上下仍在艱鉅的環境中，用盡各種辦法維持未被接管的醫院和少數診所的服務，照顧傷病人。

天主教診所的最蓬勃階段是在第二個時段 1946-1969 年，戰後重建至六十年代末。教會在戰後與整個香港社會一樣，極需重建。同時間，羅馬教廷於 1946 年建立中國聖統制，承認中國天主教會已趨成熟，香港由代牧區升格為教區，標誌著本地教會的成長。然而，內地政治局勢變化，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醫療需求激增。很多身處大陸的修會神父、修女、修士亦因被驅逐來港，直至 1955 年的統計，有來自二十七個國家，逾三千人到港，他們中有很多具醫療經驗和知識的人員。此時的香港失去了作為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跳板角色，很多修會重新定位，檢視如何看待香港和自己在港的使命。

面對戰後嬰兒潮和難民人口暴增，連帶產生包括住屋和衛生等各樣社會問題。可是，政府一方面不願提供太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無力滿足所有需要。所以在這四份之一世紀，天主教會與其他宗教和慈善團體擔起輔助角色，為難民和貧民提供食物、醫藥、住宿、教育等物資和服務。在前述的四個女修會之外，這個時段參與醫療工作的修會還有耀漢小兄弟會、聖母聖心女傳教女修會、拯望會、瑪利諾男修會、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聖母聖心會、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部分信友善會亦以團體成員的專長在天主教診所提供義診，甚或開設固定或流動的診所。他們包括公教婦女會、公教華人聯誼會、天主教醫生會及天主教護士會，其中尤以外籍成員為主的公教婦女會參與度最高。除此以外，還有其他信徒善會以其他方法參與其中，像聖雲先會以金錢資助的方式協助有醫療需要的人群，出生權維護會與天主教醫院和診所合作為未婚媽媽提供協助，以及公教婚姻輔導會的另類診所，以自然生育計畫抗衡社會當時開始出現的墮胎風氣。後兩者是在醫療範疇中捍衛天主教教義的一種方式。為免教會團體各行其是，此一階段出現了協調各服務組織的天主教福利會，奠定了香港明愛作為教區社福部門的發展雛形，亦體現教會內頭和肢體的關係。

教會的醫療事業得到在本地服務的國際修會的母會支持，既有派出醫療人手，也有搜羅藥物。聯合國的世界難民年指定香港是其中一個需要關注的地方。外國天主教福利會（特別是美國、德國）亦響應世界難民年，提供了大量金錢和物質援助。如同第一階段，教會透過生活觀察、由上而下，由普世到本地，提供支援和服務，受眾欣然接受。在普遍貧窮的大環境中，市區繁忙的診所不是傳教的理想地點和時間，醫療是接觸人群的第一步，傳教工作是在接觸之後，由其他傳道員或神父來跟進，又或是在診所工作結束後成為要理教授的空間。在鄉野偏僻的診所，隨著時代演變，應診工作沒有往昔那麼忙碌，即使語言不同，診所和到戶看診和探訪，是純樸的人情互動。

相對第一時段，第二時段整體社會需求變化急速。從一開始醫療和各樣社會救濟極其需要，社會日趨進步之下，醫療法例逐漸清晰和嚴謹，以往有醫護常識和經驗的義務工作者未必擁有合法的資格繼續服務，增加了教會診所的營運成本，帶來服務人手短缺的問題。除了原有的外圍政治因素，六十年代中期，香港社會經歷兩次動亂後，迫使港英政府正視社會的問題，開始銳意改善施政，為市民提供更好的住屋環境、醫療服務，而經濟發展使生活水平提高，增加了市民的選擇能力和選項，不再停留在單向接受基礎診所服務，而是要求更全面和多選擇的醫療服務。

到了本研究的最後一個時段 **1970-1990** 年，已發布六年的第一份醫療白皮書（**1964**）此時成果初現，第二份白皮書於 **1974** 年推出，政府更為進取，願意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使不會有人因沒能力而得不到醫療援助。在這二十年間，生活水平改善也令香港社會整體疾病模式改變，出現所謂「富貴病」，並且需要配套的檢查和跟進。沒有政府資助的非政府團體慈善診所漸漸失去吸引力。難民問題逐漸消失，新市鎮的建造和老區重建，外國教會團體資助減少或取消，外國修會面對老化問題，信友組織教友成員更替等種種因素，各營辦團體不得不面對去留問題。天主教診所數目從六十年代中期最高峰的三十二間開始一直下降，至 **1990** 年只剩十間。

另一方面，在教會內部，梵二會議的影響開始出現，本地化和教會更新的議題使香港於 1969 年迎來首位華人主教徐誠斌。他的首項要務就是在 1970 年召開的教區會議，其中香港教區和外籍修會按梵二精神檢視本身的使命和在社會的角色。香港教區重點放在傳揚福音和培育信徒參與教會事務，不同修會則按各自的神恩、人手資源檢討服務優次，例如聖高隆龐傳教女修會在肺癆病逐漸消退之時，投入了教育服務，瑪利諾男修會順應本地化把在徙置區成立的堂區交給教區，改為承擔輔助者的角色；人手需求極大的醫療服務比重漸漸減低。梵二推動的合一運動，除了有修女身體力行選擇到基督教醫院服務，教區為從事醫療服務的女修會成立小組委員會，也促使修會之間打破界限，增加合作，在各自營辦的天主教醫院中可見到有其他修會的修女在服務。

在醫療服務方面，明愛作為教區的社福機構，從七十年代開始接手其他教會團體的診所，亦按社會需求和政府政策調整資源運用，故在 1990 年醫院管理局的成立之時，只剩下十間診所，其中四間為牙科診所，亦是至今社會仍極其缺乏的一項醫務服務。這十間診所，加上納入醫管局的聖母醫院（1991）和明愛醫院（1992），維持私營體制的聖保祿醫院、聖德肋撒醫院、嘉諾撒醫院（明愛）和寶血醫院（明愛）<sup>1</sup>，天主教醫療事業在時段看似式微，實則卻不然。天主教傳教士從醫療前線退出後，仍從事現代社會更為需要的醫療牧靈工作，關注病人及家屬的心靈健康，這是忙碌的醫護人員未能兼顧的一個範疇。早在七十年代末，天主教修女已領頭開展臨終關懷及生死教育，得到其他宗教團體的醫療機構跟隨，再廣而及之到公營醫院，並成為專上學府的通識教育。

本研究以《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為題，用了四章由大到小的介紹了天主教會的醫療，它傳入到中國，以至在香港營辦的各間診所，而前面亦簡單總結了當中一百年的轉變。那麼，這些文字能還原本港天主教診所的歷史嗎？這當然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正如第二章中，華民政務司夏理德對華人公立醫局的評語：「華人慈善團體就是這樣，他們做得很好，但從沒想過要宣傳或得到即時的讚許。」天主教診所事實上也有著相似的情況。相比一間醫院，有規模有歷史，「診

所開業和關閉可以很流動」。在城市發展中，這些診所建築幾乎全都悄無聲息地消失無蹤，若非有受訪者的口述歷史、舊報道和歷史資料，大家也不會清楚診所的醫護到底有誰、做過些甚麼，遑論造福人群的好事，甚至幾宗拯救性命的事例。不過，相對於純粹的歷史重構，獲得別人的讚許，本研究更重視是這項教會服務在本質上的演變，因為「歷史承載的不僅是往事的記錄，也是從他人經歷敘述和追憶中獲取知識」，並且需要加以「保存、整理和分析」。<sup>2</sup>

現代文化告訴我們，我們因為所做的事情而有價值，無時無刻催促我們需要做更多的事情。然而，天主告訴我們，我們是寶貴的，純粹因為我們是人，是按祂的肖像創造的。故而，除了 **doing**（做事），**having**（擁有），更重要是 **being**（存有），一旦迷失了，就會偏離信仰的本質。回顧這一百年的歷史，診所作為一個實體機構的存在的確是式微了，但在教會醫療服務的本質上，對鄰人的陪伴與同行，自始至終存在，而且在觀念上更趨成熟。早在 1884 年政府報告中討論到對在醫院服務的專職天主教神父給予報酬。由於氣候及流行病，當時香港被稱作「白人的墳墓」，受影響的不只是佔領的英國官兵，教會亦同樣損兵折將，許多外籍男女傳教士英年早逝。雖然該報告沒有明言更多，不難推斷教會對沒有親人在身邊的垂死天主教徒官兵的牧靈關顧，為他們施行每位信徒臨終前都希望得到的傅油聖事，或為已逝者作妥當的安息禮儀。這份陪伴和關懷在一百年後，以更系統的臨終服務方式存在，醫院牧靈更是遍及所有公私營醫院，而早年從事診所或醫院工作的醫護修道人，部分退出前線後，沒有停下腳步，轉而投入醫院牧靈的工作。

從事醫療工作的傳教士，早期一貫稱之為「醫療傳教士」，是本研究中的主角。但傳教士是甚麼？在《剛恆毅回憶錄》中，這位曾任駐華宗座代表、也曾在香港短暫停留的樞機，引用聖保祿宗徒稱之為「天主的助手」，指他們離鄉背井，回應天主愛的呼喚，把自己的一身獻給天主。「他們是一支龐大的隊伍，口講不同語言，身穿不同服裝，面帶各種膚色。大家都服從最高統帥——教宗和傳信部。」<sup>3</sup> 這個定義在今天

來說不完全適用，傳教士是所有肩負起傳播福音使命的神職人員、修女和信徒，可以是本地人向本地人傳教。這同樣顯示了作為主角的醫療傳教士，亦在歷史中改變了，從最初外籍傳教士，到中後期已有：華人神職人員、修女、信徒扛起這份傳教的責任。這為他們並非是一項工作而是服務，信徒團體更是出錢出力，多是義務參與，甚至成立診所。在診所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傳教士放下自己的信仰指標，不再是從上而下、作為緊急首務的態度去拯救靈魂，而是在與民眾互動中，接觸和感染別人，同時自己也得到成長，贏得友誼。

無論是一個團體、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人始終是其中中心。醫療傳教士是診所的靈魂，沒有他們便開不成診所。然而，就本研究題目而言，同樣重要的是來求診的貧苦大眾，他們對醫療傳教士的反應，以及他們與天主教會的關係，不論有沒有宗教信仰。醫療傳教士的合作者——診所姑娘，更是傳教士的重要見證。在本研究中可見到這些合作者的經歷有驚有喜，有學習成長，而少有不滿。故而有別於整體醫療史的框架，主要以官方和權威機構角度為主導，政策闡釋，分析社會影響等為視野，天主教診所研究更緊扣基層市民的生活、看法和感受，這往往是在大歷史中所缺乏的。對於診所服務的群體，天主教診所在五六十年代因著難民的湧入，得到了最蓬勃的一段發展時期，其服務的病人固然以他們為主，數量自是最多。然而，從一百年的整體發展來看，教會其實與另一個在今天尤其被高度發展的社會所遺忘的小群體也有很密切的接觸，那就是漁民和水上人。在第二章中，嘉諾撒會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所設立的診所，都是設於沿海地區，像筲箕灣、香港仔、油蔴地。在第三章，到了二十世紀，除了嘉諾撒會所延續的服務，我們還見到瑪利諾男修會為赤柱漁民治傷，聖保祿女修會在大埔的求診者亦是以漁民為主，而公教婦女會捐助流動醫療船，並在船上提供醫療服務等。此外，基於昔日社會的特殊性、法例未完備，主理天主教診所、施藥所的未必都是註冊醫生，有可能是由有醫學知識的護士坐鎮，偶有正式的醫生前來看診。女修會主理的診所，由於民眾不了解天主教會，不認識何謂修女，民眾叫她們做「白頭姑」，稱開設在修會會院的診所做「姑娘堂」。即使到了五六十年代，在不同地區、不同修會，仍有這種叫法，除了顯示

修女外在形象深入民心，受訪者「非常好」和「好過自己阿媽」的讚譽，更是來自教會服務者對「病人的尊重和臨在」，沒有將服務作為一種交換的代價，而是將天主的愛生活出來，正如天主教福利會介紹中說，靠的是「間接的傳教工作」，因為「愛德的言詞是人人都了解到」。

此外，天主教診所的歷史緊扣著社會發展。診所服務的式微，很大程度與社會現代化講求效益有關。社會窮困之時，天主教會伸出援手。當社會發展和進步，有了規範和規模，社會自然會從新選擇。因此，教會的診所服務與醫療環境和社會現代化存在著張力。教會本質既然是陪伴，就不是要跟社會競爭。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可見到一些修會意識到社會的轉變和需要，在重新檢視後便轉投到較少人提供的其他服務，陪伴社會上更邊緣的人士，像性工作者、愛滋病者。所以在現代化中退場，是天主教診所歷史的自然結局。

- 1 嘉諾撒醫院（明愛）和寶血醫院（明愛）分別於 1991 和 1993 年交由明愛管理。
- 2 李向平、魏揚波：〈口述歷史研究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頁 3。
- 3 劉嘉祥編著：《剛恆毅樞機回憶錄》（台北：主徒會，1980），頁 266。

## 參考資料：

### 檔案：

天主教教區檔案處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檔案館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檔案館  
寶血女修會檔案館

### 政府文件：

*Administrative Reports for the Year*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Medical Services*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Hansard*  
*Hong Kong Statistics*  
*Sessional Papers for the Yea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Hong Kong*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衛生署：《2001 年口腔健康調查報告》

### 報章及期刊：

《工商日報》  
《工商晚報》  
《公教報》  
《協力》  
《明報》  
《星島日報》  
《香港 01》  
《香港統計年刊》  
《香港經濟日報》  
《華字日報》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Ladies' Union*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Women's League*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unday Examiner*  
The Catholic News Archive  
The Hong Kong News Online

347

參  
考  
資  
料

口述歷史訪問：

王美笑修女 (Sr. Michelle Reynolds, MM)，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4 日。  
古美蓮女士，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4 日。  
打鼓嶺幼稚園一位退休老師，訪問日期：2022 年 7 月 18 日。  
甘美雅修女 (Sr. Benedict Amutha, ICM)，訪問日期：2022 年 11 月 17 日。  
朱三妹女士 (曾太) 和曾麗珊小姐，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10 日。  
何兆煒醫生，訪問日期：2022 年 6 月 23 日。  
吳金桂女士，訪問日期：2023 年 3 月 12 日。  
岑紹裘醫生，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8 日。  
李偉達先生，訪問日期：2023 年 3 月 18 日。  
李鴻恩先生，訪問日期：2022 年 9 月 20 日。  
阮少林先生、蔡錦妹女士，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2 日。  
官德儀修女，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9 日及 2 月 10 日。  
林桂明先生，訪問日期：2022 年 10 月 19 日。  
林鉅成醫生，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13 日。  
是谷穗先生，訪問日期：2023 年 5 月 15 日。  
香港仔聖伯多祿堂教友 (姚秀卿女士、何送妹女士、陳玉英女士、鄧耀華先生、林少芳女士、廖幼冰女士和何瑪利女士)，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2 日。  
恩德德神父 (Fr. Giovanni Giampietro, PIME, 1934-2023)，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張亦葵修女，訪問日期：2023 年 4 月 11 日。  
張寶英女士，訪問日期：2002 年 9 月 19 日。  
陳永超神父，訪問日期：2023 年 5 月 27 日。  
陳秀嫻博士，訪問日期：2022 年 12 月 8 日。  
陳素霞修女，訪問日期：2023 年 3 月 6 日。  
陳婉貞女士，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麥婉琰修女，訪問日期 2023 年 3 月 7 日。

曾麗珊小姐，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10 日。

賀維珍修女（Sr. Nora Mary O'Driscoll, SSC）以英語接受訪問，訪問日期：2022 年 11 月 9 日。

黃亞妹婆婆及兩位女兒於 2022 年底及 2023 年初接受訪問。

葉麗紅修女，訪問日期：2022 年 7 月 5 日。

雷操爽醫生，訪問日期：2023 年 3 月 21 日。

廖偉盈先生，訪問日期：2022 年 10 月 19 日及 2023 年 2 月 8 日。

廖馮麗屏女士，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8 日。

劉超賢先生，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7 日。

謝修明女士，訪問日期：2023 年 6 月 15 日。

鍾炳基先生，訪問日期：2022 年 9 月 2 日。

鍾紹華先生，訪問日期：2023 年 2 月 20 日。

蘇衍慧修女，訪問日期：2021 年 8 月 21 日及 2023 年 8 月 23 日。

顧厚德神父（Fr. Ferdinand Bouckhout, CICM），訪問日期：2023 年 4 月 6 日。

#### 書籍：

（清）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88。

（清）舒懋官修；（清）王崇熙著：《新安縣志 [嘉慶]》，1930。

公教報編：《鐵筆七十年：公教報社論選輯》。香港：公教報，1998。

王裕凱等著：《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香港：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1960。

王曉鶴編：《中國醫學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田英傑著，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1983。

申頌詩著，馮彩華譯：〈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香港（1848-1998）〉，收於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

白莎莉、胡德品著，林藹純譯：《說吧，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

朱益宜著，周玉鳳譯：《關愛華人：瑪利諾修女與香港（1921-1969）》。香港：中華書局，2007。

朱益宜著，寶血女修會譯：《國籍寶血女修會與天主教會的演進》。香港：原道出版有限公司，2019。

何心平：《美國天主教傳教會與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

余雲楚、馮可立、林昭寰等著：《醫學霸權與香港醫療制度》，修訂版。香港：中華書局，2019。

余震宇：《壹街一個故事——新界篇》。香港：日閱堂，2021。

吳昊：《回到舊香港》。香港：喜閱文化，1999。

李慧瑩、鄧桂昌、楊祥利編：《鞍山歲月——小城今昔》。香港：馬鞍山民康促進會。

肖喜學：《香港城市探微》。香港：中華書局，2016。

阮志：《入境問禁：香港邊境禁區史》。香港：三聯書店，2014。

阮志偉、余嘉浩等著：《先賢之路：西貢天主教傳教史》。香港：中華書局，2021。

冼昭行：《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香港：三聯書局，2012。

林富士編：《宗教與醫療》。台北：聯經，2011。

林榮鈞、張小蘭、黃家欣：《重塑香港天主教會領袖之搖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21。

林蔭：《日落調景嶺》。香港：天地圖書，2007。

施其樂著，宋鴻耀譯：《歷史的覺醒：香港社會史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1999。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的傳教歷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9。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編著：《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8。

香港聖雲先會：《香港聖雲先會百周年紀念特刊1863-1963》。香港：香港聖雲先會，1963。

夏其龍，譚永亮編：《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1。

夏其龍著，蔡迪雲譯：《香港天主教傳教史 1841-1894》。香港：三聯書局，2014。

夏其龍編：《內外縱橫太古樓——太古樓與薄扶林區的發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2。

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編著：《礦山記憶：鐵，不一般的故事》。香港：基督教信義會社會服務部，2017。

張小蘭、黃奕清編：《東西薈萃：香港天主教會口述歷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18。

張家興編：《社會變遷與教會回應交流會論文集》。香港：公教教研中心，1996。

梁卓偉：《大醫精誠：香港醫學發展一百三十年》。香港：三聯書店，2017。

郭漢陽：《元嶺傳奇：鑽石山寮屋區起居注》。香港：中和出版，2021。

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一九五九一

一九六〇》。香港：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1960。

傅立吉神父著，陳小霞譯：《醫院牧靈工作》。台灣：光啟文化事業，1976年初版，2009年再版。

湯漢：《在教區一起走過的日子（二）》。香港：公教真理學會，2002。

新界鄉議局：《第二十二屆新界鄉議局各委員會工作報告書》。香港：新界鄉議局編印，1976。

聖母聖衣堂編：《天主足跡在灣仔》。香港：聖母聖衣堂。

萬籟寂、吳灼棟編：《照顧弱勢社群的傳教士力理神父》。香港：香港明愛傳訊統籌辦公室，2020。

劉蜀永、姜耀麟：《植根基層 70 載：香港工會聯合會工人醫療所簡史》。香港：和平圖書，2020。

樂艾倫：《伯大尼與納匝肋：英國殖民地上的法國遺珍》。香港：香港演藝學院，2006。

鄭興：《香港漁民辛酸史》，第二版。香港：鄭興，2022。

鄭寶鴻：《香港華洋行業百年——工業與服務業篇》。香港：商務印書館，2017。

黎志邦：《從前有個香港仔》。香港：香港人出版有限公司，2018。

蕭國健：《舊日足跡：香港地區與民生尋蹤》。香港：三聯書店，2023。

戴遐齡：《香港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簡史》。香港：Victoria Press，1952。

謝永光：《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香港：明報出版社，1994。

鯨島盛隆著，龔書森譯：《香港回想記》。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1。

顏文雄、趙維生、黃威廉：《香港社會政策的迴響》。香港：集賢社，1988年第二版。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 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2018。

關肇碩、容應英：《香港開埠與關家》。香港：廣角鏡，1997。

Bill Surface and Jim Hart, *Freedom Bridge: Maryknoll in Hong Kong*.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66.

Cindy Yik-yi Chu,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Daniel Verhelst and Nestor Pycke ed., *C.I.C.M. Missionaries Past and Present 1862-1987*.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5.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Leyden: A.W. Sijthoff, 1955.

Edward Fischer, *Maybe a Second Spring: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ary of St. Columban in China*. New York: Cross Road, 1983.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18-1975*. 1978.

Fr. James Smith, *Maryknoll Hong Kong Chronicle 1976-1980*. 1982.

George Albert Dopchie *Memorial Booklet*.

Ida Sala, *History of Our Canossian Missions—Hong Kong 1860-1910*, Vol. Three.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1997.

Jean-Paul Wiest, *Maryknoll in China: A History (1918-1955)*. Armonk, NY: M.E. Sharpe, 1988.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eds.,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1: Historical Material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2009.

Louis Ha and Patrick Taveirne eds., *History of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s and Missionary Congregations in Hong Kong, Vol 2: Research Papers*.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2009.

Maria Claeys, ed. *History of the Mission in China (1923-1954)*. Taipei: ICM-Taiwan, 2012 Reviewed Edition.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 the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ions of Outpatient Servic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21.

Moira M.W. Chan-Yeung, *A Medical History of Hong Kong: 1942-2015*.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Sister Joan Delaney, *A Survey on Religious Women in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the Major Superiors of Religious Women, 1975.

Sr. M. Gabriel O'Mahony, *A Time of Transition: Columban Sisters in Hong Kong*. Wicklow: The Columban Sisters, 2005.

Thomas J. Morissey, *Jesuits in Hong Kong, South China and Beyond: Irish Jesuit Mission: Its Development 1926-2006*. Hong Kong: Xavier Publishing Association, 2008.

Thomas Ryan, SJ *Catholic Guide to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62, Reprint.

Thomas Ryan,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Foreign Missions, (P.I.M.E.), in Hong Kong, 1858-1958*.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William Galvin,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in Hong Kong 1920-2010*. 2011.

## 論文：

- 張明佳：〈傳工作與社會服務 香港嘉諾撒仁愛會的個案 究（1860-1941 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1。
- 黃巧蘭：〈清廷查禁天主教期間傳教活動之探究（1717 ~ 1840）〉。台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
- 楊祥銀：〈殖民權力與醫療空間：香港東華三院中西醫服務變遷（1894-1941 年）〉。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7。
- 蕭曉紅：〈戰後香港天主教社會服務 以香港明愛為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2。
- Eugene Dial, *A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Refugees in Hong Kong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Colony's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World War II*.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 Diss, 1964.

## 文章：

- 〈【源來如齒】由山寨牙醫處處到牙醫規範化 你知道香港牙醫的歷史嗎？〉。《醫理說》，2021 年 11 月 14 日：<<https://shorturl.at/myWZ5>>
- 〈中國第一位西醫誕生記〉，《中國青年報》，2015 年 12 月 2 日。
- 〈為人所尊——張渤教師〉，收於《馬鞍山風物誌：鞍山歲月》：<<https://mos.hk/maonshan/3/17/50>>
- 〈香港故事（第 18 輯）第二集：荃城〉。《香港電台》，2011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fFgGoe\\_AY](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WfFgGoe_AY)>
- 〈香港第一位華人西醫〉，《基督教週報》，2004 年 2 月 29 日。
- 〈陳繼容博士電台短講〉，樂山樂水網站，2015 年 5 月 7 日，<<https://mountainandwater.blog/2015/05/07/radio-talk-by-dr-anna-chan-8/>>
- 〈蹈海誤傳成自縊——調景嶺果真曾「吊頸」？〉，西貢旅遊網：<<http://www.travelinsaiung.org.hk/Historical/view.aspx?menu=15&Nid=38>>
- Teresa：〈憶念拯望會的 Sister Juliana〉，《証聲》，2013 年第 6 期。
- 王慶餘：〈在華聖母聖心會士對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東南文化》，1987 年第 2 期，頁 65-69。
- 古偉瀛：〈塞外蒼茫中的勇者——《在華聖母聖心會士名錄》〉，《心泉》第 79 期，<[http://ccsc.org.tw/periodical\\_entries/286](http://ccsc.org.tw/periodical_entries/286)>。
- 白雅詩著，董建中譯：〈康熙宮廷耶穌會士醫學：皇帝的網絡與贊助〉，《清史研究》，2014 年 2 月 1 期，頁 1-27。
- 安貝蒂著，陳愛潔譯：〈彰顯天主的愛：瑪利諾女修會百年慶〉，《鼎》第 32 卷總第 164 期，頁 16-22。
- 何若庸：〈送別——悼念張文生修士〉，見《公教報》，1973 年 4 月 20 日。

吳國樑：〈近四十年來香港醫學發展史的研究概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31期。

呂茱莉：〈悼念涂挽靈神父〉，《公教報》，1996年6月14日。

李威成：〈日佔時期香港醫療衛生的管理模式，以香港日報為主要參考〉，《台大文史哲學報》第88期2017年11月，頁119-155。

阮嬌玲：〈以感恩為生活動力的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神思》第64期，頁91-101。

周家建：〈從《新建寶血醫院碑記》看戰前地區醫療發展〉，《華人文化研究》第7期，2019年6月，頁41-52。

招群英修女：〈修會歷史（初期階段之草稿）〉。

姜鍾赫：〈鼠疫與香港殖民醫學下的華人女性病患（1841-1900）〉，《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6期，2015年12月，頁67-132。

急症室的福爾摩斯：〈淺談香港空中醫療服務的歷史（二）〉，《輕新聞》，2023年3月28日：<<https://shorturl.at/fDNST>>

劉賢：〈從若翰到耀漢——中國本土男修會耀漢小兄弟會的成立及其修會精神（1928-1934）〉，《基督教文化學刊》，2020年春，第43輯，頁230-250。

胡哲翰：〈黃寬（1828-1878）〉，收於《基督教史人物傳記》網站：<<https://bdconline.net/zh-hant/stories/huang-kuan>>

香港中和出版：〈鑽石山沒有鑽石：香港最大型寮屋區的傳奇〉，香港中和出版微信公眾號。

香港仔坊會：《南社之音》，2002年5月第119期。

徐錦堯：〈普世救恩——天主教的救贖觀，新答客問〉，<<https://fr.luketsui.idv.hk/archives/1329#p24>>

高添強：〈追尋公屋的發展軌跡〉，收於《文化葫蘆》：<<https://www.hadplushulhk.org/y2-f1>>

張先清：〈疾病的隱喻：清前期天主教傳播中的醫療文化〉，《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第48卷，頁100-111。

張學明：〈香港耶穌會士的「沈默」事工〉，《香港01》，2017年4月3日。

曹紹釗：〈不尋常的文憑〉，收於香港醫學博物館：《杏林鴻爪：香港醫學博物館藏品選》。香港：香港醫學博物館學會，2016。

梁啟智：〈尋找香港仔船塢原址〉，《獨立媒體》，2022年2月7日：<<https://shorturl.at/IBOQU>>。

梁遇年：〈雷震東神父創立鯉魚門聖雅各伯堂的經過〉，《慶祝雷震東神父來華四十週年特刊1967》。

陳天權：〈大埔瞭望台俯瞰吐露港〉，《香港商報》，2021年3月17日。

陳天權：〈灣仔進教團的百年變遷〉，《灼見名家》2016年12月28日：<<https://shorturl.at/kxB29>>

陳昭利：〈桃園先賢志略：奉獻桃園醫療的臺灣德雷莎修女——馬玉芳〉，《通識論叢》，第 19 期（2016）。

陳若望：〈可敬的力理得神父〉，《公教報》，1993 年 2 月 9 日。

陳素霞：〈感謝聖母〉，《寶血之音》，2002 年 2 月，頁 14。

陳惠芬：《由「九龍寨城」到「寨城公園」》。香港：陳惠芬，2008。

陳聰銘：〈天主教傳教士雷鳴遠對民國政治的觀察與醫療福傳行動〉，《輔仁宗教研究》第 43 期（2021 秋），頁 67-100。

陶成章：〈文顯榮神父與我〉，《公教報》，2005 年 12 月 4, 11 日

麥肖玲、方駿：〈1930-1950 年代香港基礎教育的發展與挑戰：中文剪報鉤沉〉，《基礎教育學報》第 16 卷第 2 期，2007：頁 1-20。

楊祥銀：〈近代香港醫療衛生史研究的新視角〉，《社會科學輯刊》，2010 年，第 4 期，頁 209-213。

楊祥銀：〈試論香港殖民政府的早期醫療服務〉，《社會科學戰線》，2009 年第 2 期，頁 116-120。

趙惠文：〈大埔元洲仔遊夜龍考察報告〉，《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16 年，第 84 期，頁 15-17。

劉義章：〈宣教士在調景嶺難民營的醫療服務〉，收於劉義章、黃文江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

劉遠明：〈近代西醫在中日兩國傳播之比較〉，《中華醫史雜誌》，2009 年 5 月第 39 卷第 3 期，144-149。

劉騏嘉、李敏儀：《長遠醫療政策》。香港：臨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1997。

關懷遠：〈從歷史裏走出來的九龍城寨〉

顧衛民：〈天主教東傳與上海徐家匯地區〉，《文化雜誌》，2002，頁 112-114。

“Celebrating International SSVP Women’s Day,” Society of St Vincent de Paul USA, <<https://ssvpusa.org/news/celebrating-international-ssvp-womens-day/>>

“Chinese Convert-Nurse Joins Missionary Sisters,” Trove, March 19, 1953: <<https://trove.nla.gov.au/newspaper/article/175358918>>

“Mission Comes Full Circle,” *Misyon Online*, January-February 2016, <<https://www.misyononline.com/jan-feb2016/mission-comes-full-circle>>

“The Servant of God—Sr. Luigia Grassi,” The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Servants of the Poor: <<http://kanosjanki.org.pl/en/zgromadzenie/swieci-i/s-luigia-grassi/>>

Angelyn Dries, “The Foreign Mission Impulse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1893-1925,"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Vol.15 No. 2 (1991): 61-66.

Ayako Fukushima,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Catholic Churches in Hong Kong From 1945-1955," *AIJ J. Technol, Des.* Vol. 25, No. 59, (Feb 2019): 467-472.

Bessie Casey, "Marquette's Medical Missionaries," *The Linacre Quarterly*, Vol 33, No. 3 (August 1966): 282-288.

Brian Edgar, "Steering Neutral? The Un-interned Irish Community in Occupied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57 (2017): 67-87.

Cindy Yik-Yi Chu, "From the Pursuit of Converts to the Relief of Refugees: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Hong Kong," *The Historian (Kingston)*, Vo. 65, No. 2 (2002): 353-376.

David Faur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suen Wa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4 (1984): 46-104.

Dr. G.H. Chao, "A History of Medicine in Hong Kong," in *The Medical Direc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Medical Societies of Hong Kong, 1970, pp.13-33.

Dr. Joyce Sau Han Chang, "Monsignor Charles Herman Vath, Founder of Caritas Hong Kong," *Conference Proceedings of the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in the 20th Century* (Hong Kong,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CUHK, 2021), pp.525-542.

Dries Vanysacker, "Body and Soul: Professional Health Care in 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Between 1920 and 1940," in Koen de Ridder ed., *Footsteps in Deserted Valleys: Missionary Cases, Strategies and Practice in Qing China*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9-54.

George Dunea, ed., "St. Fabiola and Her Hospital," in *Hektoen International: A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Vol. 15, Issue 2, (Spring 2023): <<https://hekint.org/2023/01/03/st-fabiola-and-her-hospital/>>

Gianni Criveller, "A Quiet Arrival with a Huge Impact: The Canossian Sisters in Hong Kong," *Sunday Examiner*, April 20, 2020.

Gianni Criveller, "The Canossian Sisters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Protection, Education, and Emancipation of Women," In Cindy Yik-Yi Chu ed.,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Bible, and Evangelization in China*, Singapore: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2022, pp.21-30.

James Kroeger, MM, "Papal Mission Wisdom: Five Mission Encyclicals 1919-1959," in Steven Bevans ed., *A Century of Catholic Mission: Roman Catholic Missiology from 1910 to the Present*. Oxford: Regnum, 2013, pp.93-100.

James Smith, William Downs, "The Maryknoll Mission,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9 (1979), pp.27-148.

Jane Gordon, "For Maryknoll Sisters, Some Memories Don't Fade,"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6, 2000, p.6.

Madeleine Davies, "A Post-Vatican II Exodus," *Church Times*, Sept 6, 2019: <<https://www.churchtimes.co.uk/articles/2019/6-september/features/features/a-post-vatican-ii-exodus>>

Mark O'Neill, "Healing Hong Kong," *Ariana* #03, Sept 1, 2019, pp.136-140.

Mary Ellen Manz, "China Bound and Beyond," *Maryknoll Magazine*, Sept 1, 2019: <<https://www.maryknollmagazine.org/2021/09/maryknoll-sisters-centennial-china-bound-and-beyond/>>

Patti Maguire Armstrong, "Religious Orders Carry on the Traditions of Health Care, Education," in *Our Sunday Visitor*, April 4, 2022.

Pietro Battistella, "Hospitaller History (2): The Knights as Medics and Doctors," *Medieval Reporter*, March 22, 2023: <<https://medievalreporter.com/knights-hospitaller-healthcare/>>

Suzanne R. Thurman, "The Medical Mission Strategy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Missionar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XXX, No. 3 (July 2002): pp.361-362.

Thomas Heyne,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s First Hospital: The Basiliad," in *Hektoen International: A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Spring 2015): <<https://hekint.org/2017/02/24/reconstructing-the-worlds-first-hospital-the-basiliad/>>

Tom Solomon, "Hong Kong's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London*, Vol. 31, No. 4 (July/August, 1997): pp.458-463.

William Fanning, "Medicine and Canon Law,"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10. 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1: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10142a.htm>>

## 年度報告／紀念特刊：

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傳道無間：天主教大埔傳教一百五十年》，2011年。

公教真理學會：《香港天主教手冊》。

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天主教福利會聖高弗烈服務中心十週年特刊》，1971年。

香港天主教福利會：香港天主教福利會年度年報書。

香港仔明愛服務中心：《香港仔明愛服務中心銀禧特刊》，1985年。

香港明愛：香港明愛周年報告。

粉嶺聖若瑟堂：《聖若瑟堂——粉嶺60周年紀念特刊》，2014年。

粉嶺聖若瑟堂：《慶祝建堂五十周年特刊》，2004。

荃灣葛達二聖堂編：《荃灣葛達二建堂特刊》，1971年12月。

荃灣葛達二聖堂編：《荃灣葛達二聖堂堂區通訊》。

將軍澳醫援會：1974-75年度報告。

華僑日報：《香港年鑑》

*Catholic Women's League Hong Kong Newsletter, 80th Anniversary Special, Nov 17, 2017.*

Florence Siu-ting Mok et. al, ed., *The Guild of St. Luke, St. Cosmas & St. Damian, Hong Kong 60th Anniversary*. Hong Kong: The Guilds of St. Luke, 2014.

## 網站：

天佑小學：<<https://www.mpschool.edu.hk>>

天空紀念碑：<<https://skymonu.org/guest/memorial/story/2m9c2c>>

天神之后堂：<<https://olqoa.catholic.org.hk/parish/History/Frame/index.html>>

政府新聞網：<<https://www.news.gov.hk>>

香港天主教教區醫院牧民委員會：<<https://hpc.catholic.org.hk>>

香港明愛：<<https://www.caritas.org.hk/zh/about/litsoh/>>

香港朝聖服務中心：《網上朝聖》：

<<https://www.youtube.com/@user-ho3hp5te5o>>

香港聖公會聖馬可堂：

<<https://dek.hkskh.org/stmarks/aboutus.aspx?id=432&lang=2>>

香港衛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https://www.cmro.gov.hk>>

海星堂：<<https://star.catholic.org.hk/>>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九龍城寨公園：<https://www.lcsd.gov.hk> >

聖德肋撒醫院：<https://www.sth.org.hk>>

電子版香港法例：<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

嘉諾撒培德學校：<https://www.ptcps.edu.hk> >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https://fmm.catholic.org.hk>>

賓夕法尼亞大學：

<https://global.upenn.edu/global-initiatives/history-penn-china>>

衛生署私營醫療機構規管辦公室：<https://www.orphf.gov.hk>>

鞍山探索館：<https://gyc.elchk.org.hk>>

醫務衛生署：<https://www.primaryhealthcare.gov.hk>>

寶血女修會：<https://spb.org.hk>>

Gwulo: <https://gwulo.com/>>

Maryknoll Fathers and Brothers website: <https://maryknollsociety.org>>

Maryknoll Mission Archives: <https://maryknollmissionarchives.org/>>

Missionary Sisters of St. Columban: <https://www.columbansisters.org/> >

Population Pyramid of the World from 1950-2011:

<https://www.populationpyramid.net>>

Society of Helpers China-India: <https://www.societyofhelpers.org/mission>>

The Christian Knighthood Information Center：

<https://www.papalknights.org/syl.html>>

#### 講座：

天主教醫護生死教育歷史回顧講座，2023 年 11 月 25 日。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叢書主編**

林榮鈞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譚偉倫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學術顧問團**

古偉瀛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夏其龍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譚永亮博士（香港中文大學）

勞伯壘教授（聖神修院神哲學院）

Prof. Philip CHMIELEWSKI, SJ (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

Prof. Leo D. LEFEBURE (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

Prof. Peter C. PHAN (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

Prof. Nicolas STANDAERT, SJ (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

Prof. Gerard Kevin WHELAN, SJ (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

**General Editors of the Series**

Dr. LAM, Anselm Wing Kw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TAM, Wai Lu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dvisory Committee**

Prof. CHMIELEWSKI, Philip, SJ (Loyola Marymount University, USA)

Dr. HA, Louis E. Kelo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KU, Weiy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f. LEFEBURE, Leo D.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LO, William, S.J. (Holy Spirit Seminary College of Theology & Philosophy)

Prof. PHAN, Peter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Prof. STANDAERT, Nicolas, SJ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Belgium)

Dr. TAVEIRNE, Patrick, CIC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 WHELAN, Gerard Kevin, SJ ( 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 Rome)

香港中文大學 天主教研究中心 研究系列【17】

默默無聞的服務：香港天主教診所歷史

作者：林榮鈞、張小蘭、劉慶廣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電話：(852) 3943 4277

傳真：(852) 3942 0995

網址：[www.cuhk.edu.hk/crs/catholic](http://www.cuhk.edu.hk/crs/catholic)

電郵：[catholic@cuhk.edu.hk](mailto:catholic@cuhk.edu.hk)

承印：雅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利眾街 35-37 號泗興工業大樓 8 字樓)

ISBN：978-988-79921-2-7

***Serving Humbly in Silence: History of Hong Kong Catholic Clinics***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uthors: Anselm Wing Kwan LAM, Lucia Siu Lan CHEUNG and  
Hing Kwong LAU

Publisher: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 3943 4277

Fax: (852) 3942 0995

Website: [www.cuhk.edu.hk/crs/catholic/](http://www.cuhk.edu.hk/crs/catholic/)

Email: [catholic@cuhk.edu.hk](mailto:catholic@cuhk.edu.hk)

Printer: Allion Printing Co. Ltd  
(8/F, Sze Hing Industrial Building, 35-37 Lee Chung Street,  
Chai Wan, Hong Kong)

ISBN: 978-988-79921-2-7

All Rights Reserved © 2023 by Centre for Cathol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